

\*0001846\*

# 马克思以后的 马克思主义

〔英〕戴维·麦克莱兰著

東方出版社

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79

根据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79 年初版译出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MAKESI YIHOU DE MAKESIZHUYI

著者/[英]戴维·麦克莱兰

译者/林春 徐贤珍等

校者/蔡声宁

封面设计/马少展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850 × 1168 毫米 32 印张 12 字数/277,000

版次/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书号 3453·22

定价 2.35 元

内部发行

##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它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指南,通过亿万人的社会实践,使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将继续产生更大的变化。同时,作为一门科学,它也在亿万人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于这样光彩夺目而又千姿百态的战斗历程如何记载,世界各国的学者已撰写了不少专著,戴维·麦克莱兰的这本《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的一本。

麦克莱兰是英国肯特大学政治理论教授,除本书外,还著有《青年黑格尔派和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和《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等专著。本书是以哲学为主线,旁及政治、经济、社会学等领域的一部关于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简史。尽管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整理工作,但他毕竟是一名资产阶级的学者,并且是一名脱离革命实际的学院式研究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不能不受到这方面的限制。因此,他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我们翻译这本书,只是想反映国外在这个领域内研究的一般情况,供理论界及一切关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读者研究参考。

原书第四编的开头两章是专述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的,我们删去未译。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主要是林春和徐贤珍,此外,李彬和梁忠锋也翻译了个别篇章。

# 目 录

前言 ..... 1

绪论 马克思的遗产 ..... 3

## 第一编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第一章 恩格斯的贡献 ..... 11

    哲学 ..... 12

    历史 ..... 16

    政治学 ..... 19

第二章 修正主义的论战 ..... 25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以外的传播 ..... 25

    德国修正主义的起源 ..... 28

    经济学 ..... 32

    社会学 ..... 35

    政治学 ..... 38

    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 42

    结论 ..... 47

第三章 激进派 ..... 53

    引言 ..... 53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 55

    卢森堡：意识与活动 ..... 58

卢森堡：帝国主义 .....	64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	66
第四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	73

## 第二编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 起源 .....	81
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 .....	8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	86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	90
第六章 托洛茨基 .....	97
第七章 列宁 .....	108
党 .....	108
革命 .....	114
帝国主义 .....	120
国家 .....	123
民族问题 .....	128
哲学 .....	131
第八章 19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	143
战时共产主义 .....	143
新经济政策 .....	146
一国社会主义 .....	151
艺术和哲学 .....	156
第九章 斯大林主义 .....	163
工业、农业和党 .....	163
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	167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	171
第十章 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 .....	180

### 第三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马克思主义

第十一章 卢卡奇 .....	197
第十二章 科尔施 .....	209
第十三章 委员会共产主义 .....	213
第十四章 葛兰西 .....	219
引言 .....	219
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 .....	220
《狱中札记》 .....	225
知识分子 .....	225
领导权 .....	231
国家、市民社会和革命 .....	235

### 第四编 中国和第三世界

第十五章 中国革命的形成(略)	
第十六章 掌握政权时的毛主义(略)	
第十七章 拉丁美洲 .....	249
引言 .....	249
古巴 .....	249
里吉斯·德布雷 .....	252
第十八章 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现象 .....	261

### 第五编 欧洲和美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

引言 .....	267
第十九章 法兰克福学派 .....	268
法兰克福学派与政治 .....	268
批判理论 .....	272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和法西斯主义 .....	275

美学 .....	278
马尔库塞 .....	280
哈贝马斯 .....	287
<b>第二十章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b> .....	<b>297</b>
引言 .....	297
萨特 .....	302
论辩派和“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 .....	312
<b>第二十一章 德拉-沃尔佩学派</b> .....	<b>318</b>
<b>第二十二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b> .....	<b>320</b>
<b>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b> .....	<b>332</b>
<b>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b> .....	<b>339</b>
<b>历史</b> .....	<b>339</b>
马克思和恩格斯 .....	339
魏德迈和左尔格 .....	340
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里昂 .....	341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344
新左派 .....	347
马克思主义未能成功的原因 .....	350
<b>理论</b> .....	<b>351</b>
新左派 .....	352
美国史 .....	353
经济学 .....	354
结束语 .....	365
大事记 .....	368
马克思主义系谱图 .....	373



## 前 言

近百年来，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繁多，有时还如此微妙，以致任何力求较为全面的研究也不免有些肤浅。我试图要做的，是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为了说清楚这一思想的发展，必然要少许论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但我并不是想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史。我希望把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献给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部发展状态感兴趣的读者，或那些对诸如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具体思想感兴趣的读者。由于我这本书仅系概述性的，所以我在每一章后都附有大量的参考读物，并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评论性的（就各书的内容向读者提供某种指导，尽管有些主观），另一大类纯系供参考的文献目录。

盖伊·夏普对本书的每一页都作了润色；托尼·特里维利在我写葛兰西一章时曾给予重大的帮助；尼克·卡斯韦尔提供了文献目录的基础；乔伊斯·麦克雷和玛丽·纳什提供了极好的最后打字稿。

**戴维·麦克莱兰**

1978年9月于坎特伯雷



## 绪 论

# 马克思的遗产

乍看起来，马克思似乎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个牢固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自认为在他称之为他的研究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已经说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及其使用的工具，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生产其生活资料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政治、精神的全部生活。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会超过生产关系。这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阶段就会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些生产力只有在现存生产关系下发展到了最充分的程度，旧的社会秩序才会崩溃。我们可以举出亚细亚、古代、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四种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渐进的四个时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分裂的最后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崩溃，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将随着革命时期的到来而崩溃；而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崛起，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并经过一段专政时期，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马克思的思想暴露出一些十分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十分混乱。他不仅没有完成其著作，而且那些草稿（为数已超过实际发

表的著作)还表明,他已对自己的学说作了一番新的评价。至少很多人是这样看的。马克思逝世时,人们对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过于简练的《共产党宣言》和艰深的《资本论》这两部书。1930年前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得以出版;1941年,《大纲》<sup>①</sup>问世。这两件事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产生了影响的最明显的例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根据这些重新发现的马克思思想来撰写。而这些思想多年来要么为人所忽略,要么无人知晓——至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这样。

马克思遗产自相矛盾的另一个不那么偶然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法不容许把自身概括为几个简单的公式。马克思既在年轻时曾发现他的先师黑格尔有矛盾之处,那么这种矛盾也出现在这位弟子身上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辩证的思想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没有止境:只要主观因素是和客观因素一致的,理论便总是与实践相互影响并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本人生前就曾改变并发展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

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不是去解释世界,而是去改造世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卓著,马克思主义就越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理论。群众性政党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其中最为激进者倡导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所有在新工业社会中无益可得或受益甚少的人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使得马克思主义有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一是它把革命热情和改革要求同历史前景相联系起来的罕见能力,一是它所宣称的科学性。这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僵硬化和

---

<sup>①</sup> 指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下册。由于1939年和1941年这份手稿在莫斯科用原文分两册陆续出版时,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后来便习惯上沿用这一篇名,并简称为《大纲》。——译者注

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千百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给他们灌输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就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离马克思原来的思想越来越远，并使之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种异端概念，即常说的“修正主义”。

最后一点，也是最明显的一点：世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未曾注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是无根据的了。诚然，马克思对德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性质谈过一些看法，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考虑过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是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而现在，这位思想家却被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更为广泛地尊为导师，这是很矛盾的。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其经济福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贫穷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政治自由在那里却是无法得到的奢侈品。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种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

这里，我们想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这些关键领域中自相矛盾的观点，以说明马克思遗产中的一些难题，至少是马克思拥护者们心目中的难题。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逝世时，其基本原理是很不清晰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可作为分析现实经济活动的有益工具，还有待于马克思的遗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有待于马克思对于价值转化为价格这一问题的解答。但是对他的许多追随者来说，马克思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一些较为直接的实际问题上，马克思虽然确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但确切的机制是什么，他则不

甚了了。关键在于利润率趋于下降吗？或是生产过剩问题和随之出现的消费不足问题？还是二者兼而有之？马克思远未解决这个问题，以致时至今日仍然是激烈争论的一个主题。再者，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只涉及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虽然他正确地预言了垄断的发展，但并未分析垄断的发展规律，更不用说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了。当时，这个问题刚刚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而今已成为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了。

在**社会学**方面，《共产党宣言》曾经把阶级对立加以简单化，宣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①</sup>。然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于中产阶级和非生产部门的发展所进行的研究，似乎提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甚至连伯恩斯坦也会感到情投意合的观点。这些问题未得到澄清，因为众所周知，马克思打算给阶级下定义的尝试，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仍未完成。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留下的一大空白是关于农民的论述。鉴于西欧农民普遍持保守态度，马克思沮丧地谈到“农村生活中的白痴”，并认为农民在任何革命运动中充其量只能起一种从属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十分明显，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的东移，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日益微乎其微了。

但是，马克思著作中最大的空白在于**政治学**。民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及其实际发展，显然是马克思远未注意到的一种现象。马克思尽管曾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作过有力的分析（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但都没有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51页。

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本来，他是要就这个专题写一部专著的。在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中，据他自己说，这是唯有他才能圆满完成的一部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者才在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方面大大超过马克思本人。更为重要的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没有碰到过领袖、政党、群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其中从事活动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前者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宣传团体，后者是各种政治派别和工会组成的松散联盟。群众性政党的时代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的。虽然马克思曾宣称工人阶级将自己解放自己，但事实却清楚地表明：从马克思本人起，工人阶级的领袖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出身于资产阶级。因此，不管是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先锋队党”以领导工人（否则工人就极不成熟）的列宁主义者也好，或是主张政权应由工人大会直接授与的自由主义社会党人也好，都可以有恃无恐地宣称自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的。

最后，还有马克思哲学遗产的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谈到要扬弃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所提出的理念原则和本质将会在社会经济的现实中体现出来，因而哲学将失去其作用。但是，由于这一革命为期尚远，人们不得不研究这些“给柏拉图作的注释”，何况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数不断增加，也需要有一种真正具有缜密的原理体系的“哲学”，对宇宙作出全面的解释。鉴于十九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马克思后期的著作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式的，是恩格斯；而使之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共产党正统派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卢卡奇率先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中那些黑格尔的（因而是赤裸裸反科学的）因素，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则为再度强调这一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30年以后，许多马克思主

义者异乎寻常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两个概念，接着又就“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谁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今天，这一分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

### **参考读物**

D·麦克莱兰：《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伦敦和纽约1974年版）收集了一份相当详尽的关于马克思著作和第二手文献的重要书目。参见该书第469—489页。



## 第一编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正统观念有一种伸缩性，能适合迥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并把它们统一在共同的术语内。但是，不同的社会集团所持的正统观念形式必然不同，体现了各个集团的观点。

奈杰尔·哈里斯：《社会信仰》



# 第一章

## 恩格斯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以后，在解释他的思想方面，最有影响的无疑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人们认为，他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合作者，对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有权威性的见解。他善于通过书信来往，充当新诞生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热忱顾问，把他惊人的渊博知识贡献给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一般地说，恩格斯在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显然都与马克思原来的思路很不同。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其道路上的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对这一问题被迫作出了妥协。

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些倾向在马克思生前就已有所滋长。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曾实行有意识的“脑力劳动分工”（马克思注重研究历史和经济，恩格斯则侧重军事和自然科学）；他们刚一相识，就在一些看法上一直有着细微的差异。恩格斯是自学成才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上缺乏严格的学院式训练，而且他的生涯主要是在非常实际的工厂管理中度过的。甚至在他们分别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初稿中，恩格斯的进化论和决定论色彩就略浓于马克思<sup>①</sup>；后来恩格斯特殊感兴趣的领域又必然使他在

方法论上有不同的侧重面<sup>②</sup>。然而必须记住,在恩格斯阐发他的哲学观点的三部主要著作中,有两部是在马克思生前写成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在1925年才最终出版,但初稿是在1873年开始撰写的;《反杜林论》在未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连载以前,恩格斯实际上念给马克思听过<sup>③</sup>。只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才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成的。

## 哲 学

有两个一般因素影响了恩格斯,使他发展出强烈倾向于科学的总的世界观。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得越广泛,就越需要对哲学作出一种明确的表述以指导党员——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已存在着相互匹敌的体系情况下。而且,英国和德国愈来愈注重科学的方法论,这对恩格斯提出系统的哲学方针自然有强烈的影响。还有一个事实是,恩格斯曾把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恩格斯写道:自1870年退出商界以后,“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sup>④</sup> 这项

---

① 参见H·博尔诺:《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对革命和发展的理解》,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集》,图宾根1954年版。

②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的探讨,参见D·霍奇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载R·米里班德和J·萨维尔编《社会主义论丛》,伦敦1965年版;A·甘布尔和P·沃尔顿:《从异化到剩余价值》,伦敦1971年版第51页以下;I·费切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纽约1971年版第162页以下;R·德乔治:《苏联思想模式》,安阿伯1966年版第77页以下;特别是M·卢贝尔为《卡尔·马克思文集》第3卷(巴黎1975年版)写的导言。

③ 恩格斯在1885年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提到此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49页。

④ 同上书,第51页。

研究是在同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这样的科学界朋友密切接触中进行的。有三件事以其特殊重大意义触动了恩格斯，这就是：能量转化的发现、作为生物转化基本单位的细胞的发现，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引起关注的大事必然影响了恩格斯对自己“世界观”的表述，使他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达尔文的发现尤其给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sup>①</sup>；使他遭到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当严厉的批评，指责他把生物学中的概念运用于社会<sup>②</sup>。由此可见，恩格斯某些著作的阅读对象必然是科学家和工人阶级中受过教育的成员。的确，他深信“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sup>③</sup>。恩格斯除了受这种一般影响之外，还（自相矛盾地）采纳了他的对手们的某些观点，特别在他的《反杜林论》中（虽然《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作为《反毕希纳论》构思的）。杜林和毕希纳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是有些简单化。恩格斯尽管鄙弃杜林的“创造体系”，但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仍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sup>④</sup>。鉴于杜林、毕希纳、福格特和海克尔这类思想家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化论在社会主义者中日益流行（杜林的著作在出版时曾受到伯恩斯坦和倍倍尔的热情称赞），恩格斯“为了不在……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sup>⑤</sup>，很想驳倒这种进化论，于是为唯物主义一元论提

---

① 参见E·卢卡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的探讨》，载《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9卷，1964年。

② 参见L·克拉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种学著作的比较》，载同上刊，1973年，第2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254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49页。

⑤ 同上书，第45页。

出了一种“更好”的形式。

可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路之间差异的，是恩格斯经常使用“物质”这一概念，而马克思的著作中则完全没有这种用法<sup>①</sup>。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谈及“所有存在的物质性”，并说“物质及其存在的方式即运动都是不能创造的……因此是它们自己的终极原因”<sup>②</sup>。然而同时，恩格斯又宣称他的唯物主义不同于“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sup>③</sup>。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努力将自己与机械唯物主义相区别，并附和了一种与谢林及其同时代的“生命力”论者那样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有密切关系的物质观点。这种观点使物质蒙上一层似乎隐蔽的精神化色彩。因为，虽然恩格斯说他的观点“完全不是什么哲学，而只是一种必须在实际科学中建立和证实的世界观”，但由于他宣称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他在自己的思想中就加进了十足的目的论因素<sup>④</sup>。

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黑格尔的认识。恩格斯晚年认为，黑格尔是一位“具有最伟大天才”的思想家，他“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sup>⑤</sup>。的确，在老年黑格尔的创造体系与恩格

---

① “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并非首创于约瑟夫·狄慈根，但恩格斯对他的著作表示受益不浅。

② 参见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莫斯科1954年英文版第71页以下。原文略有出入，请参见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57页以下。——校者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64—65页。

④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版第186页。恩格斯还认为这个过程是循环的，由于太阳变冷，所有行星都要跌落到太阳中去。但这不会是宇宙的终结，因为物质会重新产生出它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同书，第23—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2页。

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倾向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但得出的结果却不是对于哲学的扬弃加实现，而这种扬弃加实现正是他们在1840年代的思想特征。哲学可以实现和付诸实践的内容这一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恩格斯预期有一天，“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sup>①</sup>。恩格斯的目标是要建立一门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自成体系的唯物主义。如果说恩格斯的体系主要是以“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绝对物，恐怕不能说是过分简单化。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最重大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明确阐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思想家。这些规律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条：“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sup>②</sup>。显然，只有在极含糊的意义上，这些才可以称作“规律”。（有意味的是，它们并不是用阐述规律的典型格式表达的，如“一切量若增加到足够程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例如，要识别什么是正题和反题就很困难<sup>③</sup>。而恩格斯对这些规律所作的启发式的定性叙述也模棱两可。有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辩证思维不过是对自然界不存在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的一种认识<sup>④</sup>。当杜林指责马克思是借助辩证规律推论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命运时，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484页。

③ 参见R·库珀：《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逻辑影响》，华盛顿1925年版第103页以下。该书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评价不足的探讨。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3页。详见G·斯特德曼·琼斯：《恩格斯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新左派评论》（1973年）第79号第28页以下。

格斯对杜林进行了驳斥。他说：“相反地，在他（指马克思——译者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sup>①</sup>但是与此同时，恩格斯又能够谈论这些规律的“证明”（他似乎是指例子），并且把辩证法描绘成“探寻新结果的方法”<sup>②</sup>，而不是对自然科学结果的一般的（因此有人会说近乎肤浅的）概括<sup>③</sup>。

恩格斯的认识论是他的唯物自然观的组成部分。在恩格斯看来，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反映”，或者“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sup>④</sup>，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sup>⑤</sup>。同时，恩格斯决不愿完全舍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说。的确似乎矛盾的是，这个学说最精辟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然而，恩格斯关于“实践”包括什么内容的思想有时显得很贫乏，例如他曾把它概括为“实验和工业”<sup>⑥</sup>。

## 历 史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他对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74页。

② 同上。

③ 关于恩格斯辩证法的含义和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可参见S·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纽约1940年版第183页以下。关于最近对恩格斯观点的捍卫和应用，可参见M·科索克：《自然辩证法》，载B·格拉尔和P·皮柯尼合编的《走向新马克思主义》，圣路易1973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64页。

⑤ 同上书，第4卷第239页。还可参见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同书，第514页）。

⑥ 同上书，第221页。然而在《自然辩证法》中有很不相同的说法。见同上书第3卷第551页。



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和他对历史的研究。象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样，恩格斯在历史方面比在哲学方面强一些。如果说马克思想要改变世界而恩格斯旨在解释世界，那么这种说法虽然言过其实，还是包含了某些真理。恩格斯对历史的研究不同于马克思，不大直接涉及政治。诚然，马克思在晚年确实对原始社会发生了兴趣，并从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作了大量的摘录，但是恩格斯却把这些笔记变成一本完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sup>①</sup>。

恩格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是使社会主义者注意到，在原始社会里两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好一些。这本书尤其对妇女解放的研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后来，倍倍尔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写了他的名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一书（1883年），较充分地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然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过分依赖摩尔根而有些失色，以致摩尔根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使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过于一般化的进化图式——尤其是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和非洲。而且摩尔根关于原始杂交、群婚以及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的观点既然都是极其可疑的，那么据以论述家庭的一节成为这本书最薄弱的一环就不足为奇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恩格斯对种的生产（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资料的生产提出了严格的二分法划分。这表现在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种家庭形式，还表现在他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自然选择与后来才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加以对比——这一切似乎对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了最非马克思主义的

---

<sup>①</sup> 关于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政治方面更感兴趣，可参见E·卢卡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态度》，塞古鲁姆 1964年版。一般情况可参见Z·克拉德为《卡尔·马克思的人种学札记》（阿森 1972年版）一书所写的导言。

划分<sup>①</sup>。于是恩格斯似乎认为，原始社会不象文明社会那样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显然比马克思更单线式地描述社会的发展。

当然，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确实是对经济因素的作用强调得不够。这里有一部分原因：他是为那些由于把对马克思的过分简单解释应用于历史而陷入困境的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因此是力图反驳当时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理论的粗糙表述所提出的尖锐批评。

恩格斯承认，“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sup>②</sup>他自己的观点是：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sup>③</sup>

总的说来，恩格斯的观点是：上层建筑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偶尔是与经济基础平行发展的；上层建筑能够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它自己特有的结构和规律；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和一定时期内，上层建筑甚至能决定基础的发展；但是归根到底，上层建筑是由基础决定的。恩格斯的表述中的新颖之

---

① 一般情况可参见E·利科克为该书(纽约1973年版)写的导言。关于恩格斯的国家观点的有害影响，可参见L·柯莱蒂：《从卢梭到列宁》，伦敦和纽约1972年版第105页以下。

② 恩格斯致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79页。

③ 同上书，第477页。

处是交互作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用类似化学分子相互作用的说法表达的,与《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段落有有趣的相似之处<sup>①</sup>。恩格斯认为:“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sup>②</sup>他把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对立起来的说法,会把社会进程分割开来,并为以后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准备了理论结构。

## 政 治 学

政治学不单凭辩证方法研究理论,而应更多地从实际问题中推导出结论。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便是把技术性的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例子,他在该文中把革命后社会必要的纪律与当时工厂通行的纪律作了比较。至少从1847年写《共产主义原理》以来,他思想中就存在着对非主观因素的强调,从而使他常常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倾向于避免强调国家需要打碎的思想,而认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sup>③</sup>。他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值得详尽地引证: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51—552页。恩格斯写道:“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观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的原因。”

② 同上书,第4卷第478页。

③ 恩格斯致拉法格(同上书,第508页)。又参见恩格斯致范-派顿(同上书,第438页)。其中恩格斯又特别提到《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一段话,而那段话他和马克思在187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已宣布过时。

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sup>①</sup>

这个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纯系从生物学中借用的一种比喻说法——并包括其一切内涵<sup>②</sup>。

恩格斯对科学研究的一般倾向,是把科学和政治分开的二分法:“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sup>③</sup>由于恩格斯被迫生活在远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隔绝状态中,他未能施展他作为实际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在他的晚年,社会民主党人在竞选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这使他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渐进发展的一面,而不是其革命的一面。他宣布1848年的策略在一切方面都已过时。他逝世前不久,即1895年,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重版撰写的序言中说,社会民主党的成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他接着写道: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二百二十五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320页。

② 马克思从未用过“消亡”(absterben)一词,宁愿用更直接的“废除”(abschaffen)这个词。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6卷第198页。

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某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 1871 年那样在巴黎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sup>①</sup>

这些话被看作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无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起了影响作用，尽管应当指出，恩格斯曾在当时柏林领导者的压力下（极其勉强地）同意删去一些较革命的段落<sup>②</sup>。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讲：恩格斯的颇为矛盾的立场为马克思政治学说是否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加以修正的大论战的双方都提供了弹药。

## 参考读物

原著

一部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在编辑中，将由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和纽约国际出版商公司出版。这部全集总共将达五十卷之多，现已出至 1840 年代末以前的各卷。全部出齐尚需十年时间。

目前，唯一一部英文版恩格斯选集是 W·O·亨德森编的《恩格斯著作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合编本已有数种，其中最常见的是莫斯科版的《选集》，它的优点是收录广泛，其中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全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全文，以及《反杜林论》的详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22 卷第 609 页。

② 参见 H·-J·施泰因贝格：《革命和合法性：一封未公开发表的恩格斯致理查·费舍的信》，载《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67 年）；C·埃利奥特：《谁捍卫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问题》，载《思想史杂志》（1967 年）第 28 期第 73 页以下。

摘要。福伊尔和塔克分别编辑的选本则收录较少。此外，莫斯科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论爱尔兰、论英国和论文学艺术等选辑本。

《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已译成英文，由劳伦斯与威沙特公司和国际出版商公司以单行本出版。后者的版本还载有爱琳娜·利科克所写的长篇导言。恩格斯关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已由爱琳娜·马克思编辑出版，书名为《1848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恩格斯关于军事的论述也已编辑出版，有W·O·亨德森和O·查洛纳合编的《军事批评家恩格斯》。这两位编者还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新译本。该版本的评注对恩格斯批评得很严厉。与此相反的情况，可参见潘瑟的版本，内有霍布斯鲍姆写的导言。

#### 评论

S·马库斯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撰写了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名为《恩格斯、曼彻斯特和工人阶级》。关于恩格斯的传记，有古斯塔夫·迈耶尔著《恩格斯传》的节本。迈耶尔的两卷本德文版《恩格斯传》是迄今为止一部最佳之作，而节本只不过是暗淡的阴影而已。格雷斯·卡尔顿的《恩格斯：幽灵般的预言家》一书则很浅薄。俄国出的英文版《恩格斯传》内容详尽，却是一个极端偶像化的实例。东德出的《恩格斯传》也是如此。最近，出版了W·O·亨德森的两卷本《恩格斯生平》。这部传记的长处在于个人生活和史实方面，但通篇都对恩格斯持不同情态度，实际上并没有把恩格斯作为理论家来评价。关于恩格斯晚年的个人生活方面，请参见Y·卡普的《爱琳娜·马克思：多事之秋》。麦克莱兰在《现代大师》中也有一篇题为《恩格斯》的传略。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大约在四年内将出版一部研究恩格斯的大部头著作。

## 文献目录

### 原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伦敦197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莫斯科 196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著作》，L·福伊尔编，纽约 195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读》，R·塔克编，纽约 1972年版。

《恩格斯著作选》，W·O·亨德森编，伦敦 1967年版。

《作为军事评论家的恩格斯》，W·O·亨德森与O·查洛纳编，伦敦 1959年版。

F·恩格斯：《反杜林论》，莫斯科 1954年版。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W·O·亨德森与O·查洛纳编，牛津 1958年版。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编，伦敦 1969年版。

——《自然辩证法》，莫斯科 1972年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莫斯科 1946年版。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爱琳娜·利科克编并作导言，伦敦 1972年版。

——《德国农民战争》，莫斯科 1965年版。

——《1848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爱琳娜·马克思编，伦敦 1971年版。

## 评论

G·卡尔顿：《恩格斯：幽灵般的预言家》，伦敦 1965年版。

H·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德累斯顿 1972年版。

W·亨德森：《恩格斯生平》，两卷本，伦敦 1976年版。

L·伊利切夫等：《恩格斯传》，V·施奈尔森译，莫斯科 1974年版。

Y·卡普：《爱琳娜·马克思：多事之秋》，伦敦 1976年版。

D·麦克莱兰：《恩格斯》，伦敦和纽约 1977年版。

S·马库斯：《恩格斯·曼彻斯特和工人阶级》，纽约 1974年版。

- G·迈耶尔：《恩格斯传》，伦敦 1936 年版。
- F·诺瓦：《恩格斯对政治理论的贡献》，伦敦 1967 年版。
- J·普拉麦纳兹：《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伦敦 1954 年版。
- G·琼斯：《恩格斯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新左派评论》第 93 期，1973 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载同上刊第 106 期，1977 年。



## 第二章

# 修正主义的论战

###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以外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限定了修正主义论战的范围。因此这场论战主要是在德国展开的，其次是在奥地利和俄国。考茨基对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王德威尔得的如下评论也同样适用于法国和意大利：

“……对于他们搞修正主义的说法我却不以为然。他们并没有修正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理论。修正主义者想要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为一种折衷的庸俗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离他们（比利时人）却十分遥远，甚至他们还没开始提出来呢。普鲁东、谢夫莱、马克思——在他们看来都一样；情况一向是这样，谈不上他们在理论上的倒退，而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他们的。”<sup>①</sup>

1860年代以后，意大利工人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是到了1890年代，随着一个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产生影响。不过，这个党仍“十分软弱，观点十分混乱”<sup>②</sup>，在工业中缺少坚固的基础，且不断受到工团主义者的威胁。

---

① 考茨基致V·阿德勒，见后者的《通信集》，维也纳1954年版第401页。

② 恩格斯致左尔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9卷第206页。

1890年代该党设法吸引了几位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哲学教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他在经历了青年黑格尔主义时期后，于1894年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拉布里奥拉有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方法的倾向（几个不同的哲学流派都有此倾向），但他仍可能是恩格斯逝世不久的那些年中世界上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者了<sup>①</sup>。在他的经典著作《唯物史观概论》中，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实利主义解释，并作为葛兰西和卢卡奇的先驱，使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受到欢迎。但他是孤零零的。另一位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贝内德托·克罗齐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终生都是个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克罗齐感兴趣的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洞察力，但并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预见社会发展的理论。因此，他拒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观念，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特别是其价值学说，而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方面。<sup>②</sup>

在法国，有三个重要因素阻碍了修正主义运动的出现。首先，关键的对立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德国，工会在187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期间遭到镇压，党反倒被许可通过选举发挥作用，并由此成为左右局势的力量；法国的工会则摆脱了这种政治的控制。其次，法国运动的领导总的来说，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国与意大利、西班牙一样，只有经济的缓慢增长，却缺少德国的那种特点，即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基础。第三，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人真正关心经济学，而经济学是修正主义论战的焦点之一。

---

① 关于拉布里奥拉的最好的英文介绍是L·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牛津1978年版第2卷第175页以下。

② 详见H·休斯：《意识和社会》，伦敦1959年版第2章和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伦敦1977年版第94页以下。

唯一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茹尔·盖得的追随者们，他们聚集在小小的法国工人党内。虽然最初他们强调革命的原则，但在理论上却很薄弱，以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拉法格用一种异常肤浅的方式去宣传马克思的思想<sup>①</sup>。马克思关于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sup>②</sup>，就是受到法国那些自称是他的追随者们的启发，他们对于他的著作，不要说原著，就连译本无疑也读得极少。在1893年选举中当选的三十七名社会主义代表里，盖得的法国工人党只有六人——其余的代表分属于另外四个党，还有相当一部分无党派人士。但随着1893年议会选举的成功，法国工人党立即成了“修正主义者”，而致力于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合作，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达到社会主义，甚至（为了竭力争取选票）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使之为中农所接受。1905年统一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立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都成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阻碍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者之间发生争论的另一原因是让·饶勒斯的作用，他在1914年遇刺前，控制了法国左派政治力量达二十年之久。饶勒斯倾向于使理论服从于一时的策略需要。把他描绘为一位革命民主派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几乎比他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同代人，无疑地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不过从思想上说，饶勒斯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与特定的阶级无关，而充其量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它产生于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仅指法国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在道德基础上的统一。

---

① 详见N·麦金尼斯：《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载《应用经济科学研究所手册》第102卷（1960年）。

② 引自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385页。又参看马克思对龙格和拉法格持保留态度的信，见同上书，第35卷第106—107页。

## 德国修正主义的起源

可以明确地说，1880年代甚至在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1875年在哥达，两派联合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中一派强烈坚持由其缔造者斐迪南·拉萨尔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拉萨尔思想的影响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仍然居支配地位）；另一派，即马克思的追随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所谓爱森纳赫派，则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本人相反地持乐观看法。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开初进展得如此之慢，以致据统计到1880年为止，德国只有五个人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sup>①</sup>。也许，除了埃卡留斯和狄慈根，德国工人阶级对《资本论》一无所知。直到18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得力于两个因素。首先，1879—1890年的反社会党人法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左派反政府的活动，但同时看来也揭穿了拉萨尔式社会主义的虚伪性，后者显然没有得到其社会主义方案中所信赖的国家的支持。1880年代的经验似乎表明，把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才是正确的。其次，日益壮大的党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简直就没有别的自成体系的替换物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理论斗争中也占有关键性地位，因为伯恩斯坦自1881年起担任党报《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而考茨基于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创办的《新时代》，也始终不渝地在涉及党的利害关系的一切问题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倍倍尔则以天赋的实际政治

---

<sup>①</sup> 参见H·-J·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波恩1972年第3版第16页。

家和组织者的杰出才能，得以作为帝国议会的议员发挥了重大影响。到1880年代末，由于看法更趋一致，拉萨尔主义以及早先的洛贝尔图斯通俗经济学已被党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所摒弃。1887年右翼离开了党，从而为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于1891年在爱尔福特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单化了的的形式尊为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爱尔福特纲领预示着党在方针上将来要发生分裂。纲领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理论，由考茨基负责起草；另一个关于实践的部分，则由伯恩施坦起草。第一部分重申了传统学说——垄断的趋势、中等阶级的衰落、无产阶级的贫困，以及无阶级社会内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然性；第二部分包括这样一些近期目标，诸如普选权、言论自由、免费教育和累进所得税。但这种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刚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获胜，就提出需要修正它的建议了。正如奥托·鲍威尔所说：“修正主义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当马克思的学说首次深入到对它还没有准备的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时，它必然是贫乏的。”<sup>①</sup> 这个修正主义的首席辩护士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是柏林一位铁路工程师的儿子，1872年入党并随即成为党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反社会党人法迫使他侨居英国，以便能够继续从事活动。侨居英国这段时期对于伯恩施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sup>②</sup>。虽然伯恩施坦本人表示，认为他受费边社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sup>③</sup>，但几乎所有德国社会

---

① 转引自Y·布尔代为R·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巴黎1970年版）所写的序言。

② 有关可靠的文件证据，见B·古斯塔夫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法兰克福1972年版第1卷第129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128页。

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恩格斯和倍倍尔在内，都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伯恩施坦是在英国得出的各种关系上形成他的理论的，他戴着英国眼镜看世界。”<sup>①</sup>而且这也是费边派本身的想法。伯恩施坦初去英国时，确曾批评过费边派的许多理论，但到1890年代，他的观点就十分接近后者了。

从1891到1893的几年中，伯恩施坦确实发展了某种修正主义，但直到恩格斯逝世，这场争论才爆发起来。1895年，伯恩施坦写了一篇论法国1848年革命的文章。（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对1848年革命的惯常评论，以及他们回顾那次革命的处境，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待1917年革命是非常相似的。）伯恩施坦的观点同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在伯恩施坦看来，六月的日子是不必要的冒险主义，他宁愿要路易·勃朗，不要布朗基；而且这一对照对1895年也有一些教训。伯恩施坦在1896—1898年间的《新时代》上，有系统地写作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来阐述这些教训。这些文章后来便扩展为伯恩施坦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于1899年出版，并冠以冗长的书名《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当然，早在伯恩施坦开始产生这些思想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就由福尔马尔和大卫这样一些作者表达出来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思想引起反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自己声称的、系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至少在意图上是如此<sup>②</sup>。伯恩施坦（还有考茨基）也被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但在捍卫传统方面他失职了（他曾与恩格斯的遗嘱执行者倍倍尔一起担当这一重任）。这

---

① R·卢森堡：《全集》，柏林1925年版第3卷第104页以下。

② 参看党的书记I·奥艾尔对伯恩施坦的劝告：“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要这样说！”见E·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成长历程》，莱比锡1925年版第35页。

就是为什么对伯恩施坦的新观点反响慢得惊人的原因。考茨基出于对伯恩施坦个人的忠诚，直到1898年夏天都不肯公开地批评他。其实，考茨基同意某些形式的修正是必要的，甚至鼓动伯恩施坦对之加以补充：“你已推翻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的哲学；现在就全靠你构思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了。”<sup>①</sup>只是在伯恩施坦的根本意图真正明朗以后，反对力量才开始强硬起来。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尽管伯恩施坦要求系统性，但他基本上是个折衷主义思想家。1895年他写道：“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是社会主义的折衷主义者。”<sup>②</sup>这评语用之于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还写道：“系统的思想和逻辑的推演对我来说不堪重任”<sup>③</sup>，而这一点使人难以连贯地勾勒出他思想的轮廓。

在详细地考察这些见解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说明一下修正主义激烈论战的社会政治背景。伯恩施坦的书名很重要，因为他设想他本人将改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前提，并使之符合已改造的实践。在他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多少是改良主义的（这里他想，他可以求助于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而他的任务就是使理论与实践中的这种改良主义协调起来。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更为强大时，行政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也在严重增长，直至最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sup>④</sup>。虽然令人惊奇的是，党员保持着无产阶级成分，但代表们（主要是律师和新闻记者）却大都是积极分子的右翼，较保守的农村地区还拥有超额代表；而最重要的是，把巨大努力投入到表决机器的极大成功上，必定使党偏

---

①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引自H·-J·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8页。

② E·伯恩施坦语，见《新时代》第13卷第103页。

③ 引自J·P·内特尔：《罗莎·卢森堡》，牛津1966年版第1卷第204页。

④ 详见J·P·内特尔：《1890—1914年作为政治模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见《过去与现在》第30期（1965年）。

离比较革命的目标。工会没有直接参加修正主义论战（它们没有时间关心任何种类的理论），但它们无疑同情修正主义者的渐进主义。从这一观点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不是一个道地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而理论上的争论也大致只限于其主要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观点能获得相当广泛的支持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观点的主要批评者是卡尔·考茨基。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他认识马克思。人们普遍认为，他和伯恩施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者”。伯恩施坦一变节，就轮到考茨基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了。被半讽刺地称作“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在1914年以前的二十年间，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以至斯大林都景仰地效法他。作为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的长达三十多年的编辑，他在全体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占有主要位置，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尽管存在着明确的分歧，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分别论述激进派（特别是罗莎·卢森堡）之前，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两人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对照是有意义的。

## 经 济 学

也许，伯恩施坦想要修正的马克思学说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其价值理论。伯恩施坦从费边派诸如肖和韦伯那里，学到了好多杰文斯的边际学说；后者想要把价值与效用等同起来，并使之取决于个人的需要和供求关系。伯恩施坦对《资本论》第三卷感到失望，以致他对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发生怀疑。当时最有影响的批评马克思的著作，是奥地利边际主义者欧根·庞巴维克的《卡尔·



马克思及其封闭体系》。他认为价值概念不象马克思说的那样，它并非一个客观的存在物，而只是各种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数量关系，是使用价值的一个抽象。这就使伯恩施坦也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某种抽象的假说——而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追随了恩格斯而已<sup>①</sup>。按伯恩施坦的说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sup>②</sup>，而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理论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sup>③</sup>。他还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说明社会产品的总价值，因此不适宜作为起点。这使折衷主义者伯恩施坦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与边际主义的价值概念综合起来。

伯恩施坦的水平并不很高，却是位密切关注当代趋势的观察家。正因为他对系统的理论缺乏兴趣，便愈显得他能够比许多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清楚地洞察这些趋势。至于他是否能准确地解释这些趋势，就不那么明显了。伯恩施坦因而敏锐地领悟到有关 1895 年起开始出现的经济福利主义的新观念：上世纪最后几年实际工资大幅度提高并产生了“工人贵族”，后者在一场革命中可能会丧失不少东西。伯恩施坦观察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是一些重要现象，其伴随物则是生产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根据这些因素，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和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伯恩施坦断定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资本的所有权正在集中。相反，他相信（并用大量统计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象联合股份公司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使财产分散，而这意味着资本家比以前多了。此外，中小厂家也并未被消灭，而是一如既往地继续繁荣。由

---

① 见恩格斯为整理《资本论》第 3 卷而写的序言。

② E·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纽约 1961 年版第 29 页。

③ 同上书，第 30 页。

此可得出如下政治结论：

“假定社会的当前发展状况表明占有者阶级的成员数量已相对或确实绝对地减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数量相对地和绝对地都增加了。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前途有赖于‘财富’的减少，那也许真该躺下睡大觉了。但事情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有赖于增多。”<sup>①</sup>

可见，伯恩斯坦不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相信托斯拉、卡特尔等的存在能够使资本主义几乎无限期地生存下去。他甚至确信资本主义的这种和谐发展将使它不停顿地走向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考茨基却认为这些思想是危险的错误观念。他特别认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学说所作的批评是其修正主义的要害。考茨基不同意伯恩斯坦从统计材料中得出的结论，他坚持说虽然小企业的数量未必减少，但它们经济活动的范围却缩小了，因为它们通常只得缩小规模来作为濒于无产阶级化的下层中间阶级的最后退路。考茨基相信周期性的萧条将最终挤垮小业主，而不断增加的资源引起再投资的需要时，只有巨富者才能生存。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之类视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工具，而考茨基则认为，它们是制度最终衰落、“自由”竞争终结和崩溃迫近的证明。虽然考茨基在答复伯恩斯坦的批评时，否认马克思持有“崩溃”理论；爱尔福特纲领看来也肯定持有这种观点，但考茨基本人却认为危机将比以往更加严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的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反对罗莎·卢森堡时）他才承认国内的消费能够吸收增加的产品。但在与伯恩斯坦的争论中，他坚持认为更多地使用机器必然带来生产的增长，然而由于制度促使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却不会随之增长。结果资本家不能吸收

---

<sup>①</sup> E·伯恩斯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第48页。

剩余产品,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再行投资,最后的崩溃便不可避免。

虽然修正主义论战并未直接涉及帝国主义问题,但这个问题显然与考茨基的消费不足论见解有联系,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指望资本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合作社的方向演进。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考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理论创新之一<sup>①</sup>,而伯恩施坦有时却陷入为德国的殖民扩张作辩护。早在1880年代中期,考茨基就把对海外领土的兼并与他的消费不足论见解联系起来,认为国内市场不足,需要到殖民地去寻找新市场。后来他强调工业资本家之外的集团——军队、官僚,尤其是金融资本家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性,这种扩张不仅能出口剩余商品,还能输出购买剩余商品的资本。在《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一书(倍倍尔认为这是考茨基最好的著作)中,他论证说资本输出现在已成为限制生产能力和稳定制度的一种努力。考茨基还强调世界市场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扩张不平衡,后者扩张得慢从而不能为前者提供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他最早提出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但到1912年,在更趋合作的国际气氛影响下,加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问世<sup>②</sup>,考茨基宣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殖民地甚至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有害的。资本主义需要和平以图发展,因此资本家充分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能够开创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来阻止军备竞赛和战争。这样,帝国主义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如列宁所激烈抨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 社 会 学

经济学中这种根本的分歧,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社会发展

<sup>①</sup> 详见H·C·施略德尔:《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汉诺威1968年版。

<sup>②</sup> 参见该书第四章。

道路、特别在无产阶级贫困化和阶级分化问题上各自的观点，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伯恩斯坦拒绝已在爱尔福特纲领中阐述得十分清楚的贫困化观念。在这一点上他（具有讽刺意味地）步了恩格斯的后尘<sup>①</sup>。伯恩斯坦为德国在1890年代后期的繁荣所感动（也许太过分了），而断然否定实际工资正在下降，尽管马克思对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观点还远未明确赞同<sup>②</sup>。无疑，1890年代实际工资、尤其是工人贵族中的实际工资确实有提高，但这个过程也无疑是暂时的，并且到1900年代初期事实上出现了相对贫困化的现象。考茨基从未持有绝对贫困化的理论<sup>③</sup>。但他的确认为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以往增大；认为尽管众多的工人完全可以迫使雇主和国家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技术的增进必然意味着剥削的增加，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人阶级享用的比例会下降。

伯恩斯坦主要思想中的第二个论断是，虽然资本的控制也许在集中，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权的分散。伯恩斯坦关于阶级的定义比马克思的要模糊得多。他简单地认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相同的生活条件。他认为中间阶级将会壮大，而且有收入方面的统计资料等可资验证。他用下述提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此大量的、不是被大亨及其代理人消费掉的商品到哪儿去了呢？”并回答（无视明显的答案，即剩余已用于再投资）说：“如果它们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到无产者那里去了，那么肯定是被其他阶级吸收掉了。要么资本家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无产者的财富增加，要么中间阶级数量增多——只有这两者是生产力继续增长所允许

---

①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270页。

② 见T·索威尔：《马克思的“苦难增长”学说》，载《美国经济评论》，1960年。

③ 见G·赫雷：《卡尔·马克思论贫困化和无产阶级》，杜塞尔多夫1973年版第14页以下。

的可能抉择。”<sup>①</sup>不过，据伯恩施坦说，中间阶级不仅正在增加，而且随着日益增长的工业康采恩和政府官僚机器雇佣的白领工人的出现，其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伯恩施坦根据存在非对抗性政治发展的可能性的乐观见解，认为这个中间阶级将最终站在工人一边——但只是当工人已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一个等级的和文明的社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的成员时才是这样。考茨基也认识到一个“新中间阶级”正在产生，但他总是坚持认为，即使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却终究要无产阶级化并加入阶级斗争。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其政治态度会自动地受到影响去反映这种经济地位。虽然考茨基有时认识到德国许多中间阶级的群体具有潜在的反动因素，但无论他还是伯恩施坦，最终采取的政治态度都体现了悲剧性的错误信念。

通常在阶级分化问题上，农民问题是个难题。伯恩施坦只是简短地说：“在整个西欧……小农和中等的农户数量正在增长。同时，大的或极大的农户正在减少。”<sup>②</sup>象爱德华·大卫这样一些南德改良主义者，从倡导与农民合作中得到了明确的政治结论：那些地区农民的选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党为了吸引小农的选票而在修改其策略方面能走多远，是修正主义论战背后的中心政治问题。考茨基在他 1899 年出版并得到列宁十分称赞的《土地问题》一书中争论说，农民的利益——特别是保护关税和维护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农民——至少在德国，决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对俄国的农民则比较乐观。他进一步认为，农民阶级是注定要绝迹的。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投资资金和适应性，他们对小块土地的经营是不

---

① E·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第 50 页。

② 同上书，第 71 页。

经济的,而且事实上他们正在被消灭,还说:“小农户在数量上的增长不过是无产者家庭数量增长的一个特殊形式,这与大资本家在工业乃至有时在农业中加重剥削是联系在一起的。”<sup>①</sup>在统计资料面前,这个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论题是难以成立的,考茨基后来也放弃了这种看法;但他既坚持反对同农民合作,也坚持他关于为了农业进步必须废除小土地和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剩余产品的见解。

## 政 治 学

修正主义辩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纯理论性的,但事实上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有着严肃的实际意义。对于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的解释,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的利益毫不相容,没有什么“民族利益”可言,以及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必须保持孤立。另一方面,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他们想要放弃劳动价值论,就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且指出中间阶级的成长是非两极分化的证明,资本主义已显示出它自身足够的适应性,因为它有希望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至少被看作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和平后继者。

伯恩斯坦在他 1898 年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书中写道:“虽然社会灾难无疑能够,也无疑会极大地加速发展过程,但它们决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同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经济的同步改造是必要的,但至少到今天还不具备。”<sup>②</sup>就这样,伯恩斯坦拒绝采取任何革命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既然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还

---

① K·考茨基:《农民问题》,斯图加特 1899 年版第 174 页。

② E·伯恩斯坦:《乌托邦和折衷主义概论》,载《新时代》第 15 卷第 167 页。

没有真正具备，那么政治斗争便应当是为开创民主而进行的一种渐进的斗争（民主在伯恩施坦看来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没有一个阶级享有反对全社会的政治特权。”<sup>①</sup>），一种阶级平衡的制度。这种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它将“把工人的社会地位从无产者提高到资产者”<sup>②</sup>或市民。社会民主党内有了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就没有尖刻反对自由主义的地盘了。由于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年代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自由概念无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要素。”<sup>③</sup>由此产生了伯恩施坦的政治渐进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实现。1898年他概括他的信条说：

“我坚信今天的一代人必将看到，社会主义即使不是在正式的形式上，至少也是在内容上已经大部分实现了。各种社会义务的持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及其相应权利和社会对个人的义务的持续扩大、在民族或国家内部已组织起来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力的扩大，以及村、区和省各级民主自治政府的建设，再加上这方面社会联系任务的增加——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发展。

把经济企业从私人手里转交给公众管理当然也带来这一发展，但这只能缓慢地进行……一部好的工厂法比把一批工厂全都国有化可能更体现社会主义。我坦率地承认，我对通常称作‘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东西极少热情和兴趣。这个目标无论怎样，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sup>④</sup>

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分歧的焦点在于，他强调阶级冲突的现实及其合乎逻辑的结果，即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系。考茨基正确地

---

① E·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第142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151页。

④ E·伯恩施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载《新时代》第16卷第555页以下。

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各阶层事实上正变得更加反动,他甚至始终拒绝与农民联盟的思想。改良不能触动阶级冲突的根本现实,而授与民主权利决不能代替革命。他甚至认为,议会民主连同其选举战只是增强了阶级意识,并加剧了阶级冲突。

这个无产阶级孤立的方针,部分地是1890年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崩溃已经迫近的结果。早在1881年倍倍尔就曾写道,统治阶级投降的条件是“发展能够达到成熟,而不被一场意外的中断所破坏,还能够更快地促使它实现”<sup>①</sup>。1897年他仍相信,“用数学的精确性”计算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能的<sup>②</sup>。同样,恩格斯在1895年预见资本主义“到世纪末”垮台的可能性,而且据《每日记事报》载,恩格斯曾有一个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何时能夺取政权的日程表<sup>③</sup>。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组织上,以便党能够利用革命形势,而这种形势不会自行到来。

于是产生了自相矛盾:既然条件永远别想“成熟”到足以需要干预的程度,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般所采取的宿命论态度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便成为它活动迟缓的理由。当然,考茨基常常强调组织、宣传和最终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但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往往被曲解了。考茨基的根本立场在下面他答复伯恩施坦的一段话中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总结:“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尽可能地延迟这种灾难,也就是说,要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挑衅的事件,避免出现挑衅。”<sup>④</sup>在考茨基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革命的党,却不是一个正在准备实行革命的党。甚

---

① A·倍倍尔:《与恩格斯的通信》,哈格1965年版第106页。

② 《汉堡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1897年版第125页。

③ 参看恩格斯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636页。

④ K·考茨基:《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伯恩施坦的批评》,巴黎1900年版第XII页。



至在他 1909 年那本最激进而当时备受赞扬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中,也有一种隐晦的消极味道——尽管奇怪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曾认为该书太激进,并曾试图对它进行审查。1907 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强调统一,而竭力掩饰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党的领导人也注重加强党的组织,结果在 1907 年以后导致党内的官僚成分滋长起来<sup>①</sup>。足以说明考茨基有那种隐晦的消极味道的一个事例,是他关于群众罢工的见解。考茨基自称是最拥护群众罢工这种策略的人,是其热烈的捍卫者,尤其是在 1905—1906 年。但他从不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提倡群众罢工,并附加上一大串罢工前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全体工人参与,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感到不满,虚弱的政府,等等。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在考茨基看来,群众罢工从来只是一种防卫武器,只是在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权利遭到打击时才能使用的最后手段。考茨基的这种消极态度由于考虑到普鲁士国家控制着无限的权力——包括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更加严重了。

但考茨基的政治观点远不是机械论的。他总是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而且甚至在列宁之前,就提出了在列宁的“从外部灌输阶级意识”理论中也包含的一些东西。早在 1901 年他写道:“知识在今天仍然是财产所有者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不能从自身中创造出强大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由别人给它带来知识才能走进社会主义。”<sup>②</sup> 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来自观察并随即被一些熟练的学者以社会工程的形式加以运用的理论,所以

<sup>①</sup> 关于群众运动的官僚机构导致群众运动实行寡头政治和保守的命题,见 R·米歇尔斯:《政治党派》,纽约 1959 年版。米歇尔斯本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感到幻灭的前党员。又见 J·P·内特尔的文章,载《过去与现在》第 16 期。

<sup>②</sup> K·考茨基语,见《新时代》第 19 卷第 90 页。对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更积极的评价,见 R·拉森:《革命理论》,斯德哥尔摩 1970 年版第 49 页以下、77 页以下和 256 页以下。

一个具有完善组织的党的经常责任就是去传播阶级意识，并向无产阶级提供一种始终一贯的政治理论；零敲碎打的改良主义主张是永远不够的。考茨基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否认国家是拯救工人阶级的可能的根本手段。因此工会本身的斗争就完全不够了。他象列宁一样坚决否定“经济主义”。他的目标一向是（这是他与伯恩施坦的主要分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随即对国家实行根本的改造。不过当考茨基谈论国家时，他总是想到德国的军事专制政体，它最多是个半民主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德国实现完全的民主。考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指使伯恩施坦那么恐惧的阶级战争形势或“雅各宾派的无政府状态”<sup>①</sup>，而仅仅是指无产阶级在充分的民主（和议会）制度下实行多数统治<sup>②</sup>。这种观点虽然只是当他批评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才明确起来，但无疑是包含在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

## 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伯恩施坦在阐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时，总是赞同地引证恩格斯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sup>③</sup>。在他看来，恩格斯是在含蓄地评论唯物史观“事实上并非纯粹唯物主义的，更非纯粹经济的”<sup>④</sup>。

---

① 伯恩施坦致考茨基，1898年2月20日，引自H·-J·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4页。参见《渐进的社会主义》，第145页以下。

② 参见K·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安阿伯1964年版。该书处处强调考茨基的如下观点，即布尔什维克统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政，是无产阶级错误地希望超越社会发展规律所产生出来的。

③ 见本书第18页中的一段引文。

④ E·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第17页。

伯恩斯坦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太唯物主义也太决定论了。因此他把唯物主义者称为“不信上帝的加尔文教徒”<sup>①</sup>。他宣称：

“要揭露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那么确切地存在，以致人们能够有把握地确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最强大的动力，这决不是容易的事。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产生接受某些思想的意向，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整系列影响的协同作用。如果一开始人们就把不强调纯粹经济性影响而强调其他影响、不考虑生产技术及其可预见的发展而考虑其他经济因素视为折衷主义而加以抛弃的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有害的。折衷主义（它从对各种现象的不同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以唯一方法处理万物这种教条主义愿望的自然反作用。每当这种愿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以强大的自然力量再度起作用。这是清醒的理智对于每一种思想禁锢的学说所固有的倾向的反叛。”<sup>②</sup>

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别被弄得异常分明。因为理性判断和道德理想也对行动起重要促进作用，所以伯恩斯坦希望给予“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以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sup>③</sup>。爱尔福特纲领却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有效性，几乎类似于自然规律，所以伯恩斯坦批评考茨基有“把只具相对意义的事物说成绝对的习惯”<sup>④</sup>。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解释起源于根本的哲学偏差，这种偏

---

① E·伯恩斯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伯恩斯坦致考茨基，1886年1月22日，引自H·-J·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60页。

差关系到唯物主义的含义、辩证法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已增长的康德的影响。后来伯恩斯坦宣称他本人成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的一名拥护者”<sup>①</sup>。他还热衷于否定“唯物主义”——他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这样的见解，即“从某一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sup>②</sup>。这种见解与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一样，同马克思毫无关系。当然，伯恩斯坦受达尔文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观点与后者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主张完全一致。他在未发表的1898年手稿中写道：“生物学研究得出一个命题：一种有机体愈发达，即愈复杂和愈具变异机能，它的进化就愈不是由整个有机体的绝对对立的变化实现的。在一定范围内，人类社会同样也是这样。”在同一手稿后面，他还写道：“显而易见，政治革命对工业社会化来说，是最不合拍的了。”<sup>③</sup>进化能够与革命彻底地对立。伯恩斯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他否定（且全然不懂）黑格尔和厌恶辩证法。他在《渐进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每当我们看到以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基础为出发点的理论在过分强调暴力崇拜的理论面前投降时，我们都会感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伟大成就都不是依靠而是不顾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取得的。”<sup>④</sup>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布朗基主义恰应归咎于他们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坚持。

尽管伯恩斯坦否定唯物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他思想中还有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癖好——主要由于他否定黑格尔和探

---

① E·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成长历程》（今日国民经济学的自我表述），莱比锡1925年版第40页。

② E·伯恩斯坦：《渐进的社会主义》，第7页。

③ 引自B·古斯塔夫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第2卷第389页。

④ E·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罗沃尔特编，汉堡1972年版第62页以下（英译本中不负责任地漏掉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整整一章）。

索事物的任何辩证方法。正是他那贫乏的实证主义方法使他为其社会主义寻找另一种道德基础，而他关于经济力量本身不会带来社会主义的信念又使他寻求其他可能的动力。他在新康德主义的复兴中找到了一种现成的动力。新康德主义自1860年代以来成为德国各大学所讲授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使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方法不能有充分的估价。F·H·朗格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是一部基本教科书，而伯恩施坦还受到施米特、福伦德、科恩和沃尔特曼的强烈影响，他们都引导了社会民主党人和新康德主义者<sup>①</sup>。康德主义观点在两点上具有吸引力：首先，康德的学说既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世界的种种范畴，这便使得任何唯物主义都带上了极端唯心主义的色彩。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康德在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间所作的区分，意味着他的伦理学既然被人们公认为独立于任何描述性的陈述之外，那就是要自成体系，从而能够逻辑地与一种被估计为没有价值判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共存。正是在这个领域里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成了一场纯粹的混乱。

但是伯恩施坦并不是孤立的，连考茨基也受到新康德主义的感染。1898年考茨基(完全正确地)承认“哲学非我所长”，但他仍然认为，“如有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与历史观点甚至能与新康德主义相结合”<sup>②</sup>。但考茨基并未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他比伯恩施坦更为系统地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因为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是达尔文主义者，而且他终其一生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早年的色彩。他的社会发展观总是与其自然进化观联系在

---

① 一部基本证明修正主义运动中康德主义影响的书籍是K·福伦德的《康德和马克思》，图宾根1926年版。

② 考茨基致普列汉诺夫，见《战斗》(1925年)第18卷第1页。

一起,因此他过分强调生产力和客观必然性。考茨基在1907年著的《伦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用一种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相当露骨的方式试图论证伦理观念是依据阶级而发生变化的。相比之下,他的《基督教的起源》一书倒是具有创见性地、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当时情况<sup>①</sup>。考茨基鼓不起对黑格尔的任何热情,他对黑格尔一无所知;对他来说,黑格尔是一名进化宿命论者,带着可悲的思辨色彩和保守倾向。考茨基对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康拉德·施米特的惊人宣言产生了共鸣:“在鼓动工作中,我们宁愿用准确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进化’概念取代‘辩证法’。对工人们来说,‘进化’概念是更明白易懂的。倍倍尔阐发了伟大达尔文的精神,我们离达尔文比离黑格尔更近。”<sup>②</sup>考茨基不同于伯恩斯坦之处在于他强调自然界中对立面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直接而无情地应用于阶级斗争。然而,尽管考茨基几乎不断地重申“自然的必然性”,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伦理学来看,却也无法避免处于与某些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同样的地位。他在论伦理学的那本书的结尾处宣称: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不能没有道德理想,不能在道德上不憎恶剥削和阶级统治。但是,这种理想不可能从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支持……当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是战士……所以,例如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理想的作用突破了他的科学研究,他就总是竭力把前者从著作中消除掉,而且他理所当然地会这样做……科学只与对必然的认识有关。”<sup>③</sup>

---

① 见D·麦科恩:《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评》(海牙1975年版)一书最后一章中的再评价。

② 《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柏林1899年版第148页。

③ K·考茨基:《伦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图加特1906年版第141页。更极端的说法,见希法亭为其《金融资本》所写的序言。

## 结 论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同，他们的分歧只是逐渐发展的，而论战则是在其进展过程中尖锐起来的。考茨基在一份信仰宣言中奋笔疾书：

“一旦放弃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是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动力的观念，我就不得不承认我完蛋了，我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sup>①</sup>

人们通常描绘考茨基，说他具有一种掩饰任何策略性妥协的空洞理论。这也许适用于他 1920 年代一些比较杂乱的著作，但并不完全公正。早年的考茨基以他关于阶级意识、关于帝国主义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特殊历史领域的运用等方面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没算他在爱尔福特纲领评注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所显示出的作为一个鼓动家的非凡才能。说考茨基越来越保守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思想至少在 1914 年以前是始终一致的。他的理论在许多年中肯定有助于保持党的团结——虽然这不应看成是其主要的作用<sup>②</sup>。因为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考茨基总是随时都准备着党发生分裂。说考茨基理论与实践相矛盾也不对。从根本上讲，他的理论决不比实践更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的说来，从来没有、即使其初创时期也没有象它通常被想象的那么激进，这倒是事实。党最关心的是实现 1848 年未能赢得的完全民主的理想。所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许

---

① 考茨基致伯恩施坦，1897 年 8 月 30 日，引自 H.-J·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77 页。

② 见 E·马蒂亚斯：《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图宾根 1957 年版。该文有影响且有见识，但在这方面说得太过分了。

多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完全投身于议会策略，尽管他们在无产阶级孤立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正如精通那段历史的一位最卓越的历史学家所说：“争论者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这种分歧是对现实估价上的思想分歧，而不是行动领域中的分歧。”<sup>①</sup> 伯恩斯坦在对黑格尔的无知和热衷于达尔文这两点上，与考茨基也是一样的，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简单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与观察社会现实的任何辩证尺度恰好背道而驰。这样，伯恩斯坦的思想就不过是现代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反映而已。不过，二十世纪初欧洲摒弃实证主义的理性思潮已在日益兴起<sup>②</sup>，而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一趋势是在罗莎·卢森堡那样一些激进派的著作中得到其最初表现的。

## 参考读物

关于本时期的通论性著作

讨论第二国际期间欧洲知识界的一本好书，是H·休斯的《意识和社会》。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起源，见利特克的《被取缔的党》。吉尔里论党的群众基础是篇好文章，内特尔的简短研究具有当代政治分析的洞察力。亨特的书是一部可靠的综览，但基本教科书还是肖尔斯克的优秀著作《德国社会民主党》。

关于第二国际，有一部好的总体介绍。柯尔写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和布朗撒尔写的第1卷稍微详细一些。豪普特对导致第二国际1914年瓦解的各种事件进行了卓越的研究。

## 修正主义论战

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以节译本的形式译成英文，题为《渐进的社会主

---

① C·肖尔斯克：《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5年版第29页。

② 见H·休斯：《意识和社会》，伦敦1959年版第2章。



义》。唯一一本英文本长篇评论是彼得·盖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而格诺伊斯和埃利奥特的两篇文章可以作为该书的补充。

考茨基的主要著作有下列译本：关于他的政治学，见《取得政权之路》；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看法，见《无产阶级专政》；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能力，体现于《基督教的起源》。利希特海默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章专论考茨基，其行文虽短但写得很好。又见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2卷第2章和萨尔瓦多里的长篇研究。

## 文献目录

### 关于本时期的通论性著作

E·安德森：《锤或砧：德国工人运动史话》，伦敦1945年版。

A·倍倍尔：《我的生平》，伦敦1912年版。

M·毕尔：《国际社会主义五十年》，伦敦1935年版。

A·J·伯劳：《1914—1921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纽约1950年版。

J·布朗撒尔：《国际的历史》第1卷（1864—1914年），伦敦1966年版。

G·柯尔：《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第3卷《社会主义思想史》，伦敦1956年版。

B·克罗齐：《历史唯物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伦敦1966年版。

R·杜德：《国际》，伦敦1964年版。

R·吉尔里：《德国劳工运动（1848—1919年）》，载《欧洲问题评论》第6期，1976年。

H·戈德堡：《让·饶勒斯》，麦迪森1966年版。

G·豪普特：《社会主义和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的破产》，牛津1972年版。

H·休斯：《意识和社会：欧洲社会思潮的转变（1918—1933年）》，伦敦1959年版。

- R·亨特：《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1933年)》，伦敦1964年版。
- J·乔尔：《第二国际》，伦敦1955年版。
- L·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2卷，牛津1978年版。
- A·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概论》，伦敦1966年版。
- 《社会主义和哲学》，密苏里州圣路易斯1978年版。
- V·利特克：《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载《社会史国际评论》第9期，1964年。
- 《被取缔的党：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1878—1890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66年版。
- W·梅尔：《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一项责任重大的德国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发展》，载《欧洲研究杂志》第1卷第6期，1976年。
- H·马克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的根源(1890—1914年)》，载《现代史杂志》，1939年第11卷第3期。
- J·内特尔：《1890—1914年作为一个政治模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载《过去和现在》第30期，1965年。
- G·尼迈尔：《第二国际(1889—1914年)》，载M·德拉克科维奇编《革命的国际》，斯坦福1964年版。
- G·罗恩：《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新泽西州托托瓦1963年版。
- B·罗素：《德国社会民主党》，伦敦1965年版。
- C·肖尔斯克：《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分裂的发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5年版。
- J·斯坦莱编：《乔治·索列尔论文选：社会主义和哲学》，牛津1977年版。
- H·-J·施泰因贝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大战之前党的意识形态》，汉诺威1969年第2版，波恩1972年第3版。

伯恩施坦

原著

- E·伯恩斯坦：《克伦威尔和共产主义》，伦敦 1930 年版。
- 《渐进的社会主义：批判和肯定》，S·胡克作序，纽约 1961 年版。
- 《社会改良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伦敦 1893 年版。
- 《我的流亡岁月：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回忆》，伦敦 1921 年版。

## 评论

- S·贝利：《修正马克思主义》，载《政治学评论》第 16 期，1954 年。
- C·埃利奥特：《谁捍卫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问题》，载《思想史杂志》第 28 期，1967 年。
- P·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挑战》，纽约 1962 年版。
- C·格诺伊斯：《先驱者：爱德华·伯恩斯坦》，载 L·拉贝兹编《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文集》，伦敦 1962 年版。

## 考茨基

### 原著

- K·考茨基：《布尔什维主义的僵局》，伦敦 1931 年版。
- 《阶级斗争》，芝加哥 1910 年版。
- 《改革时代的中欧共产主义》，伦敦 1897 年版。
- 《无产阶级专政》，J·H·考茨基作序，安阿伯 1964 年版。
-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伦敦 1925 年版。
-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芝加哥 1907 年版。
- 《基督教的起源》，伦敦 1925 年版。
- 《爱尔兰》，贝尔法斯特 1974 年版。
- 《取得政权之路》，芝加哥 1909 年版。
- 《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一个分析》，贝尔法斯特 1975 年版。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伦敦 1920 年版。
- 《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伦敦 1927 年版。

评论

L·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牛津1978年版，第2卷第2章。

G·利希特海默：《马克思主义》，伦敦1964年版，第5部分第5节。

M·萨尔瓦多里：《考茨基和社会主义革命》，纽约1979年版。

## 第三章 激进派

### 引言

到1905年，修正主义的争论实际上已经终结；在这场争论中，那些后来以“左翼激进派”面目出现的人所持的观点，与考茨基的观点并无殊异。真正的决裂发生于1910年，当时党已经历的逐步变化过程开始明朗化了。关于这一过程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意识形态，即老一套日益外向的革命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专门维持内部团结的手段了。由于各级组织继续推行‘务实’的政策（参加各种选举，工会活动，企图在德国国会内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集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因此，加强维护意识形态的主张更变得有必要使无价值的实际政策提到理论高度（这些无价值的实际政策都是经允许的）。党的工作的下级组织反而成了进身之阶，而不是生存斗争的基地；党的代表大会不再是制定法律 and 政策的独立的大会，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意识形态受到推崇，与会者从中得到了充分的精神满足而离去，足以使他们的同志们也相应地心里亮堂起来。这种组织结构除使执行委员会及其官僚主义扩大外，仍然是老一套，只是其职能以及连同产生的权力集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sup>①</sup>

---

<sup>①</sup> J·内特尔：《罗莎·卢森堡》节本，牛津1969年版第151页。

然而,在1918年年底共产党未建立以前,激进派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党,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压力集团而已。而且,激进派大多数是外乡人,主要是犹太人的血统,他们不易在德国的和周围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发生动摇。仅有的两位著名“本地人”是梅林和李卜克内西。弗兰茨·梅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记者,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德国——特别在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普鲁士方面。他在文艺批评领域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者。他注重作家们的伟大成就与其阶级愿望之间的关系,认为最佳的文学出自新兴的阶级。他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德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他1893年写的《莱辛传奇》,受到了恩格斯的颂扬。梅林还编辑了几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著有经典的《马克思传》。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唯一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代表,尤以其《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一书驰名于世,该书也是第二国际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职能的最佳著作之一。除外乡人外,激进派的力量来自非德国人。帕尔乌斯(真名为伊斯雷尔·格尔方德<sup>①</sup>)是党内最严厉批判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也是“机会主义”一词的首创者。他就是出生于敖德萨的一位俄国犹太人<sup>②</sup>。安东尼·潘涅库克是一位荷兰天文学家<sup>③</sup>,他经常为德国党报撰稿参加论战。卡尔·拉狄克出生于加利西亚<sup>④</sup>,在1914年定居俄国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位积极活动的记者。最后,激进派中的最杰出者是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罗莎·卢森堡。

---

① 原文如此。据查,真名应为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格尔方德。——校者

② 参见Z·泽曼和W·沙尔劳:《革命贩子》(伦敦1965年版)中对帕尔乌斯的论述,详见第79页以下。

③ 见同上书,第171页以下。

④ 参见W·勒纳:《卡尔·拉狄克:最后的国际主义者》,斯坦福1970年版。

##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激进派自然大声疾呼地反对伯恩施坦，尽管他们在那个阶段的思想与考茨基并无殊异。帕尔乌斯在1890年1至3月份的《萨克森工人日报》上，首先对伯恩施坦发起了抨击。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一切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能按一种有机的计划把党的当前工作同党的社会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互相分离的两个方面：这里是‘目标’，那里是当前的任务。他们至多只承认一种平行论：为社会革命而鼓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从事活动。”<sup>①</sup>但是，对伯恩施坦抨击得最猛烈的是罗莎·卢森堡于1899年在《莱比锡人民报》上的文章，同年这篇文章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题再版成书。这篇文笔精练有力的论战文章已成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经典著作之一。卢森堡起初的论点是，“在社会改良和革命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sup>②</sup>。她还说，伯恩施坦承认他只注重手段（社会改良），不注重目的（革命）。但是，伯恩施坦关于改良的概念是放弃资本主义崩溃的学说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如果同伯恩施坦一样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走向其自身的灭亡，那么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客观的必然了。”<sup>③</sup>

更具体地说，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进行了抨击。她宣称，在经济学领域内，伯恩施坦所说的稳定资本主义的信贷和卡特化，

---

① 帕尔乌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载《新时代》第19卷第660页。

② R·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载D·霍华德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伦敦和纽约1971年版第52页。

③ 同上书，第58页。

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信贷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加剧，从而扩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卡特尔化则加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组织的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际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处于平静时期，一场严重的危机仍不可避免。

关于伯恩施坦的学说，卢森堡宣称他的错误在于否认中间阶级的消失。中等企业明显地复苏无损于马克思的崩溃理论：

“中等企业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不能视为实力较弱的部队继续不断地直接和大量遭歼灭那样通常进行的一种战斗，而应视为小资本的定期被摧毁又迅速再生，而再为大工业所摧毁。这两种趋势君临着中等资产阶级各个阶层，而与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反，其下降趋势终将取胜。下降趋势取胜本身并不必然表现为中等企业的绝对数减少，却表现为：首先是旧生产部门企业运转所必需的最小量资本逐渐增加，其次是小资本家利用新生产部门的机会的时限在不断缩短。就小资本家而言，其结果是经济生命期逐渐缩短，生产和投资的方法变化得更快；就整个阶级而言，社会新陈代谢的加速度愈来愈快。”<sup>①</sup>

联合股份公司造成资本的大量集中，从而恰恰使生产和所有权分离了。在或许是这篇论战性文章的关键段落中，卢森堡写道：

“伯恩施坦把‘资本家’这一概念从生产关系中搬到财产关系中，把‘企业家’称为‘人’而不称为企业家。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到财产关系领域，即从劳资关系转到贫富关系。”<sup>②</sup>

卢森堡还驳斥了伯恩施坦对合作社和工会寄托的希望。她认为，合作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中的一种混合形式。至于工会，其使工人阶级自然增长社会财富比例的作用，由于遇到受失业威胁的中

<sup>①</sup> R.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载D.霍华德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伦敦和纽约1971年版第70页以下。

<sup>②</sup> 同上书，第96页以下，并参阅第107页。



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孪生过程，而注定要受挫。工会的斗争便成了“一种西西富斯的劳动”<sup>①</sup>。罗莎·卢森堡因这一说法立即招致工会领导人长期的憎恨。

第三，卢森堡宣称伯恩施坦对政治民主的信念是一种错误。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民主制度“大体上已丧失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sup>②</sup>。她并不否认议会斗争的重要性，但更确切地说，她的理由是从反面提出的：正是议会斗争的无效才使无产阶级确信，要进行任何根本的改革，就必须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卢森堡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财产结构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sup>③</sup>。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雇佣劳动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在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中，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现在的阶级统治。”<sup>④</sup>而这就是说，伯恩施坦所主张的那种政治改良和法律改良不可能解决问题。

总之，卢森堡的结论是，伯恩施坦的观点是机械论的、不合乎辩证法的：

“合法改良和革命是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方法，不象挑选冷热香肠那样，可以在历史的柜台上任意拿取。它们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要素，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同时又互相排斥。这种关系就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sup>⑤</sup>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决非什么创新——或许她关于资产阶级统治

---

① R·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96页以下。还可参阅第107页。（西西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特暴君，死后被罚在冥府推石上山，但巨石每次推近山顶都滚下来，成为徒劳无功的重活儿。——校者注）

② 同上书，第110页。

③ 同上书，第112页。

④ 同上书，第116页。

⑤ 同上书，第115页。

是超法律的思想是个例外<sup>①</sup>。恰恰相反，她宣称要捍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策略，反对伯恩施坦的革新。她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命题和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与考茨基并无二致——只是她较快地起来抨击伯恩施坦，而考茨基则最初顾及到友谊关系而踌躇不前。在支持议会斗争中，她仍然想把改良主义的做法同革命的理论统一起来。当时，只有列宁主张另一种不同的方法。

### 卢森堡：意识与活动

虽然《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篇著作并不是罗莎·卢森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分道扬镳的标志，但是她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所写的著作却表明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侧重点。这些年生活费用上涨和市场紧缩，使工人阶级的活动大大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莎·卢森堡开始阐发她关于阶级意识的思想。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她就已经谈到了工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通过二者，无产阶级的觉悟即意识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了”<sup>②</sup>。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她在1904年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批评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在该文中，她竭力强调了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反对她视为中央委员会的机械控制。在她看来，列宁的思想是“把布朗基式密谋集团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sup>③</sup>。卢森堡赞扬了后来几年俄国工人阶级示

---

① 详见J·内特尔：《罗莎·卢森堡》节本第134页。

② 同上书，第86页。

③ R·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第290页。关于对列宁当时的观点更细致的描述，见本书第七章。卢森堡后来改变了她对布朗基主义指责的方式，见N·杰拉斯：《1905年以后的罗莎·卢森堡》一文，载《新左派评论》（1975年）第89期第44页以下。

威运动的“自发”性。在她看来，中央集权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战斗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统治”<sup>①</sup>。在德国，非中央集权制必然帮助了修正主义运动——但这并不是俄国推行中央集权制的理由。卢森堡倾向于把列宁的观点看成伯恩施坦的左翼反映，即一种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正如伯恩施坦把运动和其目的隔离开来一样，而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在颂扬工厂的纪律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上，列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俄国下一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官僚主义的纪律只能很快地有利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最后，卢森堡坚持认为，机会主义不可能被一份精心制定的党章（不论它有多么完备）所根除。她总结说：

“然而，在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这样殷切地试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管理，以防止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失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再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但是现在，俄国革命家的‘我’迅速把事情颠倒过来，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全能舵手——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陛下的身份出现。但是，机敏善变的政客却没有看到，起这种舵手作用的真正主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这个集体的我坚决要求自己犯错误的权利，有自己学习历史辩证法的权利。最后，我们自己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同可能是最好的、一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有价值得多。”<sup>②</sup>

当然，卢森堡强调党作为鼓动者而不是作为组织者，多半是出自她在德国形势下的经历，因为她认为群众要比领导激进一些。<sup>③</sup>

① R·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载《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305页以下。

③ 关于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的详细论述，见P·吕

卢森堡革命观的核心是“自发性”概念。自发性这一词后来已成为正统共产党人用于贬义的术语：因为如果革命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自行产生的，如果工人起义是自发的，那么就没有“先锋党”的用武之地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自发性概念与1840年代（宿命论未起作用的时期）马克思关于意识与革命的思想多么惊人地相似。还应当指出的是，卢森堡关于自发性的思想越明确，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感到不能令人满意。自发性指的是行动上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上的自发性<sup>④</sup>。她从来不否认必须有创造性的领导。

在卢森堡看来，自发性的具体表现是群众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前对群众罢工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源出于无政府主义。但是，1903—1904年工人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在比利时），从而使人们日益注重这一手段；甚至伯恩斯坦也倡导群众罢工可能是对侵犯普选权的回击。考茨基也对这一手段表示慎重的欢迎，因为它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已得到相当大的推广。1905年在耶拿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激进的一次，这次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关于群众罢工首先是防御性策略的这种充满矛盾心理的决议。其实也仅仅止于防御，因为在同年晚些时候，面对限制普选权的强硬措施，一则由于俄国革命的失败，再则由于党执行委员会的淡漠，运用群众罢工的努力已逐渐消失了。工会领导人强烈反对提群众罢工；他们认为群众罢工危害他们逐步赢得的收益、精心经营的组织、财务供应和集中领

---

舍：《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柏林1976年版第二章和C·韦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1904年）》，巴黎1977年版。

④ N·杰拉斯：《卢森堡关于崩溃的概念》，载《新左派评论》（1973年）第82期第20页。

导。在1905年的科隆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谴责了关于群众罢工的思想，连带还谴责了党内激进的一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莎·卢森堡撰写了《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小册子，力求把工会的经济改良主义和政治行动之间的脱节连接起来。她力图阐明群众罢工不再是无政府主义的工具，因此现在再沿用恩格斯以前在这些方面的批判已不恰当了。至于工会的反对，那大体上是不中肯的，因为俄国革命的主要教训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凭空‘决定’，更不是‘鼓动’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一定时期遵循历史必然性而从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历史现象”<sup>①</sup>。然后她分析了1905年俄国群众罢工的作用，并得出了三条主要结论。第一，群众罢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相反是一个“征兆、是持续数年或数十年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整体性概念”<sup>②</sup>。第二，群众罢工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割的。

“经济斗争是把政治斗争从一个阶段点引到另一个阶段点的斗争；政治斗争是定期为经济斗争的土壤施肥的斗争。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不断更换位置。因此，不象学究式的看法那样，二者远不是完全分离或甚至互相排斥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仅仅是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方面。而且二者的统一正是群众罢工。”<sup>③</sup>

第三，不是群众罢工导致革命，而是相反：正是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群众罢工中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能够融合在一起。她在概述她的观点的一段话中写道：

---

① R·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载《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第231页。

② 同上书，第237页。

③ 同上书，第241页。

“如果群众罢工不是表示一个单独的行动，而是表示阶级斗争的整个时期，如果把阶级斗争时期等同于革命时期，那么很明显，就不能注意号召群众罢工，哪怕号召的决定是出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委员会。只要社会民主党不能根据它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发动和取消革命，那么，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热情高昂和多么跃跃欲试，也不足以形成一个真正的、作为生动有力的人民运动的群众罢工时期。”<sup>①</sup>

卢森堡认为，自发性因素在俄国一切罢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有“不受教育的”天赋，而是因为“革命不允许任何人充当它们的老师”<sup>②</sup>。这并不是说领导是不必要的。卢森堡把领导的作用列举如下：

“提出斗争的口号和方向；以下述方式确定政治斗争的策略，即无产阶级现有的、已解放出来的积极力量的总和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时期都会体现出来，并在党的战斗立场上表现出来；务必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坚决性和准确性上，决不低于甚至高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这就是群众罢工时期‘领导’最重要的任务。”<sup>③</sup>

卢森堡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几节中力图表明，俄国群众罢工取得较大的成就不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比一般想象的更为相似。德国工会也不能表明他们组织得不够充分，难以发动群众罢工。组织和斗争是辩证的统一。工会所显然忽视的是阶级意识：

“社会民主党灌输给进步的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理论上的、潜在的，因为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统治时期，阶级意识通常是不能作为群众的直接行动而活跃起来的……在革命中，群众登上了政治舞台，阶级意识才成为

---

① R·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载《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第244页。

② 同上书，第245页。

③ 同上书，第247页。

实际的、活跃的。”<sup>①</sup>

最后，卢森堡抨击了那种认为工会和党享有“平等权威”的思想。工会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但从非常特定的意义来说，工会运动不是与其领导人相一致的，而是“存在于已争取过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之中的事物”<sup>②</sup>。

倡导群众罢工的并非只有卢森堡一人。伯恩斯坦也因倡导群众罢工以实现某些具体的改良而使其工会伙伴感到焦虑；而倍倍尔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则认为群众罢工是防御措施的最后一招；最后，甚至连考茨基也没有超越这一立场<sup>③</sup>。卢森堡认为，群众罢工意义更为深远，即代表了她全部的政治战略。她最初尽管主张以传统的议会策略为辅助，后来便开始转向这样一种观点（与她发展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有联系），即认为议会活动已进入过时的斗争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狄克说卢森堡论《群众罢工》这本小册子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开始脱离了社会民主党<sup>④</sup>，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在当时的德国形势下，她的观点显然过于乐观，而考茨基在短期内是正确的。德国与俄国毫无共同之处。列宁肯定认为考茨基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甚至连急躁的帕尔乌斯也认为卢森堡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的种种现实。耶拿代表大会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工会领导人反对群众罢工的全部思想，并赞同党的书记奥尔所持的观点，即“总罢工全然没有意义”<sup>⑤</sup>。1906年，他们开始反击，在曼海姆代表大会

① R·卢森堡：《政治手稿》，莱比锡1969年版第194页。

② R·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载《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第270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④ K·拉狄克：《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利奥·约吉希斯》，汉堡1921年版第15页，引自J·内特尔：《罗莎·卢森堡》节本，第205页。

⑤ 《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会议纪录》，柏林1906年版第246页。

(正是卢森堡写《群众罢工》的小册子施加影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尽管考茨基反对,仍然还是明确规定工会与党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从属的,没有工会的同意(极不可能同意),不得发动任何群众罢工。耶拿代表大会的精神被推翻了,工会的影响通过更加难以对付的种种手段使修正主义重新渗入党内。

## 卢森堡:帝国主义

群众罢工的学说是与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密切相联系的。在左翼激进派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和随后产生的军国主义意味着官僚主义的权力更大,而议会的权力更小,因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从1900年代初开始,艾斯纳、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都指出,帝国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是齐头并进的<sup>①</sup>。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她原先一直研究经济学,1907年她在柏林的党校执教,主要讲授经济学。她写好讲稿后便立即编成简明《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1911年她特别对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感到兴趣,而于1913年发表了杰作《资本的积累》。她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提出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模式着手阐述。她对马克思的主要批评是,一旦把技术改革引进他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就解释不了在这种封闭的体系中怎样才能吸收随后产生的剩余产品,因为对这种体系说来,不存在任何要求剩余价值积累的理由。卢森堡在广泛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家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后,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必须放弃封闭体系的想法;剩余的实现是靠把产

---

<sup>①</sup> H·-C·施略德尔:《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和1914年前世界政治的讨论》,汉诺威1968年版。



品销售给非资本主义国家。“确凿的事实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不能靠把产品销售给工人或资本家，只有靠把产品销售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组织或阶层。”<sup>①</sup> 因此，就出现了扩张殖民地的现象。卢森堡对农民社会的解体有几节话阐述得很精辟，并着重强调了军国主义的经济作用。因此，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发展，恰恰是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可供剥削。当所有这些社会都已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时，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崩溃，因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下去，正是靠兼容那些唯一能确保其生存的条件”<sup>②</sup>。所以，

“资本愈是残酷地消灭国内和外部世界的非资本主义阶层，就会愈加降低全部工人的生活标准，资本的日常工作史中的变化也就愈大。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与骚动，在这些条件下，积累由于被周期性经济灾难或危机所中断，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到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采用社会主义原则，就别无其他出路。”<sup>③</sup>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没有一人同意《资本的积累》中的这些结论。这部著作一直受到批评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时人们大都批评这部著作持的是技术经济论点，而且普遍认为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错误的<sup>④</sup>。第二，对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想法，认为相当含糊不清。她似乎肯定相信某种崩溃理论对制订正确的社会主义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列宁当然不同意。卢森堡

---

① R·卢森堡：《资本的积累》，伦敦1971年版第351页以下。其主要的一章是第26章。

② 同上书，第466页以下。

③ 同上。

④ 见她勇敢的答复：《资本的积累：反批判》，K·塔尔伯克编并为之写有一篇好的序言，伦敦和纽约1972年版。还可参见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42年版第202页以下和T·肯普：《资本主义理论》，伦敦1967年版。更为同情性的论述，见J·罗宾逊为《资本的积累》英文版所写的导言。

的自动崩溃论,连同人们认为她自发性观点中固有的宿命论一起,后来都成为列宁主义连续密集批判的目标<sup>①</sup>。这些批判很多是完全错误的,卢森堡肯定不比马克思本人更崇信“宿命论”<sup>②</sup>。尽管她在再生产的较技术性问题上思想混乱,但是她对经济帝国主义及其对不发达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主要论述仍然是中肯的。

##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从1906年起,激进派在党内的地位日益困难。在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中,他们大致居于支配的地位,因而曾得到中派的支持。然而工会由于在策略上与执行委员会取得了一致,其影响已显露出来,激进派愈来愈受到排挤。肖尔斯克在其关于这段时期的经典著作中这样写道:

“可以认为,在我们这段时期,持反革命态度的工会主义者较之社会民主党更准确地代表了工人群众。工会领导人通过把党所不能影响的那些工人组织起来,得以把政治上消极的工人所持的主观看法渗入社会民主党内,而党的执行委员会则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工会所赢得的胜利使党较之1906年以前更代表德国工人。然而这里包含着致命的困难:工会的官僚主义由于在现存的制度中有共同的利益,永远是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完全那样,因而党既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也代表了其改良主义现状。在我们这段时期,党在工会面前屈服,放弃其政治灵活性,这就为随后的瓦解铺平了道路。”<sup>③</sup>

- 
- ① 参见E·斯托克斯:《十九世纪后期的殖民扩张和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抨击:是误认为有同一性的一例吗?》,载《历史杂志》(1969年)第12期第297页。
- ② 参见N·杰拉斯:《卢森堡关于崩溃的概念》,载《新左派评论》(1973年)第82期。
- ③ C·肖尔斯克,《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5年版第110页。

党的组织助长了一个总的保守趋势，即官僚主义分子在执行委员会内占大多数，而管理方面又日益脱离政治。到1911年，艾伯特这个社会民主党新官僚的化身，成了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1910年短暂的激进化连同罢工和鼓动选举改革的浪潮，使考茨基和卢森堡之间产生了分裂。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发表她的《现在干什么？》的文章，原因是该文主张群众罢工和共和主义。她把她对党的领导的总看法概述如下：

“甚至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每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运动不必来自一伙领导人的倡议，而是来自支持党的那些群众的决心和信心。当前俄国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所作出的决定（包括发动群众罢工的决定）‘必定’只能由党内最广泛的集团作出。”<sup>①</sup>

1912年的选举运动是修正主义者最后胜利的标志，那次运动预定是要取得同各资产阶级政党最大限度的合作。<sup>②</sup>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除李卜克内西一人外，都作出决定投票赞成1914年的战争预算，这就不足为奇了。从1900年代初起，李卜克内西和艾斯纳二人都强烈要求党严肃看待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引人注目地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采取了保守的立场，甚至主张对殖民主义持积极态度。这是因为代表团害怕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害怕被沙皇俄国击败而事先决定工会同政府合作，尤其害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以致影响了8月4日的选举。

到1912年，左翼激进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开始形成一股团结

---

① R·卢森堡：《下一步》，载R·卢克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伦敦1972年版第159页。

② 关于党逐渐反映它所反对的国家结构的方式，见G·里特尔：《帝国主义时期的工人运动》，柏林1959年版。

的力量,并强调了群众罢工(一般的群众行动)和帝国主义同是主要的政治现象。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反战加剧,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达到了顶点。到1917年初,斯巴达克派(左翼激进派的称号)和持反对立场的中派都被驱逐出党。于是德国独立社会党组成了,它包括从斯巴达克派到考茨基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和平主义者伯恩斯坦。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对他们的态度作了最好的阐述,其中对第二国际的瓦解作了深刻的分析。卢森堡还发表了一篇切题的文章《非此即彼》。这两篇著作都已由斯巴达克联盟发表,其主要观点是:全面反对战争,战争被视为不同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理所当然地强调国际主义;依靠群众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后一种观点相对的一面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批评,它是1918年卢森堡在狱中写进去的。虽然她比列宁更不信任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也不同意列宁对农民的那股热情,但一般地说,她还是同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sup>①</sup>。而且她高度赞扬了1917年的事件:

“列宁的党是唯一了解真正革命政党的义务和责任的党;他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从而确保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这样,布尔什维克便解决了‘赢得人民的大多数’这一著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经常象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sup>②</sup>

但她也批评了似乎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必要条件的那些东西。在她看来,土地国有化比夺取土地并分配给农民更可取;在俄国强调民族自决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是错误的;以及最后,

---

<sup>①</sup> 参见N·杰拉斯:《1905年以后的罗莎·卢森堡》,载《新左派评论》(1975年)第89期第21页以下。

<sup>②</sup> R·卢森堡:《俄国革命》,B·沃尔夫编,安阿伯1961年版第38页。

“仅仅支持政府的人享有自由，仅仅一个党的成员享有自由（不论其成员多么众多），便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对于想法不同的人来说，自由是自始至终的、不容觊觎的自由。这不是出于对‘正义’的任何狂热概念，而是由于所有那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有益的、纯粹政治自由的东西都是由上述本质特征决定的；当‘自由’变为特权时，其效力便化为乌有了……列宁所运用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法令、工厂监工的专政力量、残酷的刑罚、恐怖统治，所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是公众接受生活本身的教育，是最无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和公众舆论。正是恐怖统治才产生蜕化。”<sup>①</sup>

卢森堡临终前几个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或修改了这些观点，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sup>②</sup>。

结果，斯巴达克联盟对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的骚动事件影响甚微。直到1918年最后几天，这个联盟还是德国独立社会党内的一个压力集团，1919年1月1日才改变为德国共产党。这个党只包括一些孤立的小宣传集团。1918年10月，社会民主党终于掌握政权（这是它完全彻底采取容忍态度的典型）时，斯巴达克联盟及时反对了政府的议会形式，但它处在这种地位已是毫无建树的了。同年12月，斯巴达克联盟发布其纲领，正式承担如下义务：“除非反映德国全体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明确无误的意志，决不推翻政权。”<sup>③</sup>

① R·卢森堡：《俄国革命》，第69页以下。

② 参见J·内特尔：《罗莎·卢森堡》节本第444页以下，并详见P·吕舍：《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第134页以下。还可参见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对卢森堡的答复（第272页以下）和杰拉斯在《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中的评价（第176页以下）。

③ R·卢森堡：《斯巴达克联盟希望些什么？》，载霍华德编《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第376页。

当1月初发生大规模街道示威之后，社会民主党政府出来维持秩序时，曾爆发一次只持续了几天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既非斯巴达克联盟所发动，又未受它控制，更未能同意它的目标。但是起义却为政府提供了镇压极左派的机会，而且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二人均遭杀害。后来德国的社会主义便两极分化为布尔什维化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后者那里，人们日益难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痕迹。<sup>①</sup>

## 参考读物

卢克，沃特斯和霍华德各编的三本卢森堡著作选都编得好，并附有卓见的导言。戴维斯还编了论民族问题的专辑。沃尔夫著有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著作，其书名《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有令人误解之感。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的积累》已发行，琼·罗宾逊为它写了一篇好的导言。她的一些次要著作，如《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群众罢工》等也有单行本。

对卢森堡思想最佳的评论要算杰拉斯的《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关于背景，见内特尔为她撰写的精采传记，这部传记原本分上下两卷，也有大部头节本的一卷本。巴索的《罗莎·卢森堡：重新评价》也有教益。

论激进派其他人士的，有泽曼和沙尔劳合写得很好的帕尔乌斯传，勒纳对拉狄克的论述篇幅较单薄，迈耶对李卜克内西的描述则更为单薄。关于1918年失败的革命，见米沙尔克和沃尔德曼的著作。

## 文献目录

卢森堡

原著

《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D·霍华德编，伦敦和纽约1971年版。

---

<sup>①</sup> 详见D·奥瑟尔和J·巴罗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1918—1921年）》，巴黎1976年版。关于1920年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见本书第十三章。

- 《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R·卢克编，伦敦1972年版。
- 《民族问题：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H·戴维斯编，纽约1976年版。
- 罗莎·卢森堡：《资本的积累》，J·罗宾逊写有导言，伦敦1971年版。
- 《资本的积累：R·卢森堡和N·布哈林著作中的反批判》，载K·塔尔伯克编《帝国主义和资本的积累》，伦敦和纽约1972年版。
- 《1902年比利时总罢工》（五篇文章），载《不断革命》（工人战斗杂志）1973年第1期。
-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纽约1971年版。
- 《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B·沃尔夫写有导言，安阿伯1961年版。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伦敦（未注明出版日期）。
- 《罗莎·卢森堡言论集》，纽约1970年版。

#### 评论

- H·阿伦特：《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载《黑暗时代的人们》，伦敦1970年版。
- L·巴索：《罗莎·卢森堡：辩证的方法》，载《国际社会主义》第16—17期，1966年。
- 《罗莎·卢森堡：重新评价》，伦敦1975年版。
- E·卡尔：《红色的罗莎，1917》，载《1917年：前前后后》，伦敦1969年版。
- F·卡斯頓：《自由与革命：罗莎·卢森堡》，载L·拉贝兹编《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文集》，伦敦1962年版。
- T·克利夫：《罗莎·卢森堡》，伦敦1968年版。
- P·弗吕里奇：《罗莎·卢森堡：她的生活和工作》，伦敦1940年版。
- N·杰拉斯：《罗莎·卢森堡的遗产》，伦敦1976年版。
- G·李：《罗莎·卢森堡与帝国主义的影响》，载《经济杂志》第81期，1971年。
- G·利希特海默：《罗莎·卢森堡》，载《论意识形态概念及其他》，纽约

1967年版。

G·卢卡奇：《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载《历史和阶级意识》，伦敦 1971 年版。

J·内特尔：《罗莎·卢森堡》（两卷本），牛津 1966 年版（第 863—917 页有详细的传记）；此外还有节本（一卷本），牛津 1969 年版。

E·沃尔拉斯：《罗莎·卢森堡的革命学说》，载《社会研究》第 40 卷第 1 期，1973 年。

### 其他激进派人士

Ch·伯迪克和 R·卢茨：《德国革命的政治制度（1918—1919 年）》，伦敦 1966 年版。

W·勒纳：《卡尔·拉狄克：最后的国际主义者》，斯坦福 1970 年版。

R·洛温撒尔：《斯巴达克联盟的布尔什维化》，载《圣安东尼文集》第 9 辑，伦敦 1960 年版。

F·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纽约 1975 年版。

K·迈耶：《卡尔·李卜克内西：没有国家的人》，华盛顿 1957 年版。

J·米沙尔克：《革命的道路：德国马克思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底特律 1967 年版。

A·米切尔：《1918—1919 年巴伐利亚革命：艾斯纳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普林斯顿 1966 年版。

A·赖德尔：《1918 年的德国革命：对战争和起义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研究》，剑桥 1967 年版。

H·舒热：《拉狄克和德国革命》，载《综览》（对苏联和东欧研究的杂志）第 53 期，1964 年。

——《亚历山大·格尔方德，即帕尔乌斯：俄国革命家、德国爱国主义者》，载《俄国评论》，1959 年。

E·沃尔德曼：《1919 年斯巴达克主义者起义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密尔沃基 1958 年版。

Z·泽曼和 W·沙尔劳：《革命贩子：亚历山大·格尔方德（帕尔乌斯）的生涯》，伦敦 1965 年版。



## 第四章

#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词是指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中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从1907年创办《马克思研究》这一颇有影响的刊物时开始形成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或工人组织，而是一种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阿德勒、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以及鲁道夫·希法亭。他们最初都迫切希望解决马克思主义在诸如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和民族问题等各个不同领域中所面临的新问题。

马克斯·阿德勒以新康德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作了最精辟的阐述。他主要是强调了认识论：经验是一种逻辑概念，因此先于精神与物质的区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德勒把马克思的方法论视为康德的方法论：透过外表看其实在。阿德勒自称效法考茨基，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与哲学或世界观无关。阿德勒的目的是要用一种以新康德主义形式出现的哲学去补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与福伦德等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拒绝把社会主义看作伦理学的一条准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因而与伦理学无关，而伦理学本身能够由对人性和社会的一种（康德式的）批判观建立起来<sup>①</sup>。阿德勒虽然在哲学上接近唯

<sup>①</sup> 详见T·B·博托摩尔为一本题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集（牛津1978年版）所写的导言，见该书第11页以下。

心主义,但在政治上却属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同康德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结合在一起)。战后,他仍是工厂委员会的积极倡导者,而没有去鼓吹民族议会<sup>①</sup>。

卡尔·伦纳由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转向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战后唯一没有分裂的党)的右翼。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把法律和经济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殊实例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鲍威尔和希法亭两人的政治和经济著作。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他在关于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居民来说,这无疑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的主要著作<sup>②</sup>中,特别强调了构成民族的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并提出以联邦的形式作为实现民族自决的过渡。鲍威尔不同于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他认为民族共同体体现着同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价值。在这本民族问题著作的结尾,鲍威尔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这一节在当时具有罕见的创见。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周期性萧条使得资本家进一步向不发达国家寻求势力范围,因为那里的利润率更高。卡特尔和银行使这种寻求过程更容易了,因为资本家的投资能够受到关税的保护。鲍威尔还注意到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sup>③</sup>。他后来开展了对俄国革命的批判,承认少数人暂时专政的必要性,但这种专政只能是向多数人的民主过渡这一条件下的、正当的自卫措施<sup>④</sup>。鲍威尔尖锐地批判了1930年前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20年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和其他欧洲工党建立所谓

① 参见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柏林1922年版第171页以下。

② O·鲍威尔:《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维也纳1907年版。

③ 详见G·利希特海默:《马克思主义》,纽约和伦敦1964年版第307页以下。

④ 参见Y·布尔代编《奥托·鲍威尔与革命》,巴黎1968年版。

“第二半国际”时，鲍威尔的观点居支配地位。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大量引用了鲍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金融资本》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负盛名之作，考茨基称之为“不愧为《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续卷”<sup>①</sup>。希法亭在回答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攻击时，提出了区分边际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最明确定义<sup>②</sup>。在此之前，他早就名噪一时了。在《金融资本》中，他一开始就分析了信用机构日益控制工业使公司所有制不断壮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之所以加剧，是由于工业为了保护自己、防止利润率下降而必然使资本集中所致。在日益实行有意识的控制和计划的社会里，决策者的人数在减少，而银行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则与日俱增。“工业资本中愈来愈多的部分不再归使用资本的工业家所有。他们只能运用资本，因为银行仍然是资本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银行需要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工业作为固定资本，于是银行在更大的规模上成为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实际上已转化为工业资本，也就是我所称为的金融资本。”<sup>③</sup>一旦国内竞争已经消除，便会产生促进关税保护以抗拒外来竞争的压力，以便能够实行垄断价格政策。其结果是国家权力加强，彻底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原则相对立。希法亭撰写的一些段落，经过了几十年，至今仍未丧失其洞察力。他写道：

“金融资本不是力求自由，而是力求统治；它并不主张每个资本家有独立性，而是要他们处于从属地位；它避免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力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规模更大的竞争。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它需要国家行使如下职能，即通过关税

① K·考茨基：《金融资本与危机》，载《新时代》第29卷第883页。

② 庞巴维克的著作和希法亭的答复最近已由P·斯威齐作序出版（纽约和伦敦1975年版）。

③ R·希法亭：《金融资本》，E·马尔兹编，法兰克福1968年版第2卷第309页。

政策保障自己的国内市场,并易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其贸易政策无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敌对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权国家来增进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并运用其政治力量把利己的供应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在世界各个地方进行干涉,以便把整个世界变成本国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金融资本需要强权国家推行扩张政策,把新殖民地并入它的势力范围。”<sup>①</sup>

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支持下,日益具有强权和侵略的本性,因而通过对市场和原料来源进行垄断的竞争的日益激化,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助长了以高的“垄断”价格向国外倾销滞销商品的做法,以及在国外建立企业从而输出资本的倾向。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和为扩大潜在市场而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武力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民主和平等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金融资本并不关心资本家利益的协调。它知道竞争愈来愈变成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随着和平观念日益淡薄,人道思想被国家的强权观念取代了……金融资本虽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通过对民族观念的严重歪曲,也为自己制造了意识形态的托词,因而不再承认每个民族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也不再从民族的角度来体现人类在一切事物上平等这一民主信念。相反,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地位,正是由其本民族所获得的优势反映出来的。于是这个民族俨然比其他一切民族优越。由于征服其他民族要靠暴力,因此习以为常地看来,居于优势的民族似乎得力于自己特殊的自然品质,即其种族的特性。这一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冒充科学而替金融资本追逐权力辩护的依据,借以证明其争夺行为的科学决定性和必要性。民主的平等观念被寡头统治的观念所取代了。”<sup>②</sup>

---

① R·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卷第456页以下。

② 同上书,第457页以下。

最后，整个过程以武装冲突而趋于结束。“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资本巨头的专政最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sup>①</sup>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革命前景。

人们批评希法亭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其实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是短暂的；还批评他只注重流通领域，而不注重生产领域——因此他把危机只看作各个生产领域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果。但是总的说来，希法亭是第一个对帝国主义作出认真的经济分析的人，从而为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希法亭的这本书由于对垄断及其后果——帝国主义进行了研究，因而在第二国际所有思想家的经济著作中，是最引人瞩目的。

### 参考读物

有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英语文献寥寥无几。但可参见莱塞尔和克隆的有关文章，以及科拉科夫斯基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第12章，特别是博托摩尔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集和他为该书写的导言。庞巴维克和伦纳的著作已译成英文，并都写有导言。《金融资本》的英译本即将出版。

### 文献目录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T·博托摩尔和P·古德选编，牛津1978年版。

E·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P·斯威齐编，纽约1949年版。

M·克隆：《苏维埃专政的展望：奥托·鲍威尔》，载拉贝兹编《修正主义》，伦敦1972年版。

L·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牛津1978年版，第2卷第

---

① R·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卷第507页。

12 章。

N·莱塞尔：《重新评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载W·拉克和G·莫斯合编《两次大战间的左翼知识分子（1919—1939年）》，纽约1966年版。

K·伦纳：《私法制度及其社会职能》，卡恩-弗罗因德编，伦敦1976年第2版。

## 第二编

#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

恩格斯致维拉·查苏利奇





## 第五章 起源

### 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

乍看起来，俄国不象是最有革命前途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以其反动落后而成为讥笑的对象，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状态。即使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以后，俄国也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然而，俄国社会的某些阶层却把西欧文明视为俄国求取进步的楷模，并在其深远影响下享有一种活跃的精神生活。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运动却在政府的顽固保守主义势力下始终处于在野的地位。政权的独裁和集权性质以及工业发展不足（因而没有相应的资产阶级）意味着俄国的革命运动往往仅由知识分子组成。而俄国知识分子所依仗的是道德热情和长于辞令，不太求助于系统而细致的批判性分析。

这些革命运动中的最激进者以民粹主义著称。正如这个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为了民族复兴，对俄国人民和人民的权力有着最强烈的感情。民粹派在吸收西方哲学时是折衷主义的，对黑格尔、唯物主义诸倾向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加以兼收并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全俄国的农业公社，首先是反对被西欧社会主义者有力批判的资本主义，其次是把农业公社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策略上，民粹主义思想则有两派：一派相信人民能自

我解放并试图通过和平宣传来达成；另一派认为必须通过恐怖分子小组直接打击专制制度。1870年代中叶在农民中的宣传运动失败以后，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即“土地与自由社”建立起来了，但很快就限于分裂。赞成土地改革的自称为重分黑土党<sup>①</sup>；把重点放在恐怖行动上的称为民意党<sup>②</sup>。后者在1881年行刺沙皇时达到了其目标之一，事后却发现这一举动本身除了把十分之一的小组葬送掉以外一无所获。

1880年代，在俄国生气勃勃地第一次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在与民粹派不断争论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则更早些：他的《哲学的贫困》曾译成俄文；主要的民粹派革命家特卡乔夫在1860年代就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1872年的《资本论》俄译本是最早出现的外文译本。然而民粹派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他们大体上接受的是马克思的社会学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他的唯物主义观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政治学未必能直接适用于俄国。而俄国检查官起初正是据此允许了《资本论》的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关于俄国的见解有着惊人的矛盾。他们对俄国的发展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中心问题是农业公社的命运。1875年恩格斯在反驳特卡乔夫时写道：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

---

① 重分黑土党是1879年民粹派中以机关报《重分黑土》而得名的派别组织。1880年代初瓦解，其中一些著名人士如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脱离民粹派，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译者注

② 民意党是1879年民粹派中出现的革命恐怖组织，曾杀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80年代被沙皇警察摧毁。——译者注

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sup>①</sup>

1870年代初，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者或多或少地受巴枯宁的影响。但到187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运动的成长和“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马克思逐渐同情起民粹派来了。马克思在1877年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农村公社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基础的观点未加评论。他仅仅声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sup>②</sup>而当1881年维拉·查苏利奇再次强调这一点时，马克思却答复说：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sup>③</sup>

所以似乎矛盾的是，恰当普列汉诺夫及其在日内瓦的追随者们确立了反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马克思却在接近民粹派<sup>④</sup>。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宣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⑤</sup>但到1894年时，恩格斯则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消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8卷第620页。

② 同上书，第19卷第129页。

③ 同上书，第19卷第269页。

④ 参见马克思对与民粹派活动家相对抗的日内瓦小组的尖锐评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第3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326页。

除了这种公社的革命可能性,认为俄国革命只会“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sup>①</sup>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矛盾(其证据当时大部分未曾发表<sup>②</sup>)并未对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内部一股活跃的力量只是伴随着1890年大饥荒后社会政治活动的重新觉醒才得以崛起,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紧密结合的团体早在1883年就在日内瓦成立了。这个自称为“劳动解放社”的团体只有三个成员: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是军官的儿子,在1880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若干年中,曾是一个活跃的民粹派。他不仅是全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而且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并教育了整整一代革命者。

对于普列汉诺夫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sup>③</sup>——这是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的题辞。他既具有冷静的、逻辑力强的、有系统性并极其重视理论正统性的头脑,同时又具有一种由于1917年以来四十年间一直留居国外而具有的个人独特性。普列汉诺夫最初是用笔名于1884年在俄国发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该书是俄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也使普列汉诺夫在西方赢得了声誉,他的威望由于最先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观点作出详细批判而得到提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510页。

②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这封长信的手稿直到1924年和1926年才分别发表。

③ G·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伦敦1937年版第1页。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把马克思主义阐述为集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中固有的积极倾向之大成的继承者。在这一著作和后来其他著作中，他用他的一元论观点来对抗诸“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纯地理的影响对历史发展有重大作用<sup>①</sup>；以及他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美学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与梅林和拉法格一道，详细发挥了这样的见解：艺术依赖于阶级的价值观念，因而其最终的判断标准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但这些观点不过是把恩格斯的观点通俗化了而已。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贡献是对俄国革命发展提出了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法。正如大多数“西方化”了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普列汉诺夫看不到俄国和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他刚刚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写的两本冗长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及《我们的意见分歧》——确立了直到上世纪末为止在这一领域中的正统学说（尽管这两本小册子遭到了恩格斯的冷遇<sup>②</sup>）。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点：

首先，俄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并愈益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农奴解放意味着采用商品市场和雇佣劳动。普列汉诺夫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的描述，断言俄国已经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体系。

其次，就政治策略而言，上述情况表明俄国大致已进入工厂生产阶段，而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它在资产阶级之前就作为一个政治反对派出现了，并且具有更良好的组织。西欧的经验——特别是1848年德国

① 参阅他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6节。

② 参阅恩格斯致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50页以下。

的经验——证明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是靠不住的。

第三,如果承认以上两点是正确的,便赋予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以在一个政党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政党将为(1)推翻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2)继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而战斗。普列汉诺夫的战友阿克雪里罗得发挥了第一阶段应处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下”的思想<sup>①</sup>。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1880年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停滞时期。1891年的大饥荒终于刺激了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他们进行更实际的活动。普列汉诺夫本人是第一批提出从广泛宣传转向更直接鼓动的人之一。在这一方面领先的是维尔纽斯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唯一拥有大量组织得很好的犹太工人的地区<sup>②</sup>。他们的主要文件是《论鼓动》这本小册子。由于这个文件更加强调纯经济目标——虽然这些目标是把工人阶级觉悟提高到政治水平上的出发点——因而必然大大减低了其作为政治文献的重要性。维尔纽斯社团的思想在遍布欧俄中部的、通常具有民粹派根源的一些反对派团体中间是有影响的。这些反对派团体中便包括有1895年以来在当地工厂中就具体问题进行鼓动的彼得堡小组,并自称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他们的思想由于1896年彼得堡组织工人罢工取得成功而具有了号召力<sup>③</sup>。

① 参阅A·阿谢尔:《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版第134页以下。

② 主要参阅A·帕特金:《俄国犹太劳工运动的起源》,伦敦和墨尔本1947年版第101页以下。

③ 关于该协会,参见R·派普斯:《社会民主主义和圣彼得堡劳工运动(1885—189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3年版和A·怀尔德曼对派普斯的批评,见《工人革命的形成》,芝加哥1967年版第73页以下。

可是劳动解放社感到自己难于适应这些新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希望致力于广泛的理论问题，而不是日常的工人鼓动。这项工作大部分由阿克雪里罗得来承担。但在1895年<sup>①</sup>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的两个组织之间，最多只有一种不稳定的共处关系。俄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也受到压力而遇到了困难，因为若干工人要求加入这些组织并消除一直存在着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一思想是1890年代中期由于历次罢工成功而促成的。老的活动家日益感到固执于经济目标将有碍于清晰的政治远见，于是阿克雪里罗得于1897年广泛地批判了“经济主义”<sup>②</sup>。尽管如此，1898年3月初创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在明斯克成立了。

但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国外联合会被年轻的革命者控制着，他们虽然不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争执，却对他要求加以控制感到不快。而俄国国内希望把工人的斗争与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隔离开来的“经济主义者”又不断取得成功。到1900年，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迁就伯恩斯坦的态度感到震惊，便竭力主张与经济主义者断然决裂。当时俄国有两个基本的思潮：第一个是以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明显的经济主义者；第二个是诸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司徒卢威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同情伯恩斯坦，但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活动，有时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这两派都是对立的，他抱怨经济主义者否认为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他希望保持党对于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维持党的觉悟水平。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党应该是无

---

① 原文有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是1894年成立的。——译者注

② “经济主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术语。见J·基普在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牛津1963年版）一书中的探讨（第58页以下）。

产阶级的先驱，正统的理论家应该控制党——这就是后来由列宁大力发展的一种思想。

列宁 1870 年生于萨马拉<sup>①</sup>。象几乎所有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起初也被民粹主义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 1882 年因参与民粹派暗杀沙皇的尝试而被处死），但 1890 年代初期他在彼得堡度过三年之后，成了一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②</sup>。在那里他参加了协会，抨击《论鼓动》中的思想，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而崭露头角。这些经历使得列宁周密地研究了组织策略和工人阶级觉悟从生产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发展观点。1895 年他写出了第一部题为《什么是人民之友》的主要著作，这是他先前与民粹派辩论的成果，其基本思想完全符合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首先论证，虽然民粹派（“人民之友”）是在为反对专制制度并为激进的民主纲领而斗争便可以作为次要的同盟者看待，但只要他们试图充当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就必须加以反对。其次，他断言农民日益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因而他们越来越愿意接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第三，他坚持无产阶级有作为“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的使命。“其所以是天然的代表，是因为俄国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生产者大众所受的剥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化的”<sup>③</sup>。这里，列宁与他的同志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对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和农民的革命性的看法较之别人，例

---

① 原文如此。据苏联文献，列宁生于西姆比尔斯克（今之乌里扬诺夫斯克），1889 年秋才居住在萨马拉。——译者注

② 驳斥关于列宁思想受民粹派或雅各宾派思想因素持久影响的偏见，可参阅 N·哈丁，《列宁的早期著作——源与流的问题》，载《政治研究》，1975 年 12 月。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276 页。



如普列汉诺夫，稍微乐观一些。

1896年列宁被捕并流放。由于他认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与俄国经济的发展携手并进的，因此流放期间他极为细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写了一部被大大低估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是明明白白地根据俄国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兴起的大量记实材料写成的一部研究著作，列出了马克思无疑会放进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去的一些细节。列宁不同意民粹派关于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工资太低无法扩大国内市场的论调，他论证说，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在某些地方，马克思所概述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阶段早已为产业资本、即直接运用于生产系统中的资本所取代，而产业资本的下一阶段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列宁从这一详细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持有一种独特的立场，因为他们是完全懂得并能阐明俄国全体劳动人民（包括手工业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所受剥削的唯一阶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列宁已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得出的结论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证据：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

“剥削则已十分发达，并且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混杂着任何模糊真相的枝节成分。工人已不能不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他们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因为如此，工厂工人不过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sup>①</sup>

这个观点（连同其中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领导全体人民的思想）支配着1914年以前列宁的政治思想。

1900年初，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与他先前在彼得堡的协会的同志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一道，支持普列汉诺夫为制

<sup>①</sup>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8页。

定一条明确的正统路线而进行的斗争。但在列宁看来，既然正统派已经聚集了力量，就只是个为此选择时机的问题了。他认为最好通过一份报纸(《火星报》)来达到这个目的，它将不仅确立一条正统路线，还将通过其发行网把久待建立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当《火星报》主要由于列宁的大力推动而在俄国国内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时，列宁与国外联合会决裂了，后者抱怨《火星报》委员会独裁和对工人阶级群众运动持分离主义态度。这次决裂预示了两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列宁在长篇小册子《怎么办?》中对《火星报》的组织原则作了总结<sup>①</sup>。

##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

《火星报》编辑部内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早有争论。这是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已在俄国占统治地位(因而也关系到党对自由派的态度)的意见分歧；是涉及同农民的未来关系的意见分歧，而在农民支持无产阶级目标的问题上，列宁远没有普列汉诺夫那么有信心；同时也是涉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的意见分歧<sup>②</sup>。尽管如此，在1903年7月的代表大会前夕，领导成员看来是团结的。代表大会是《火星报》为建立一个全俄社会民主党而进行长期斗争所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代表大会因以压倒的多数谴责了“经济主义者”和拒绝了分离组织犹太崩得鼓吹的联邦制原则而有良好的开端，但在辩论党章时这种一致性便消失了。列宁和马尔托夫对第一条提出了不同的草案。列宁的草案说，只有“承认党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6页。

<sup>②</sup> 详见J·弗兰克尔为《弗·阿基莫夫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一书(剑桥1969年版)所写的导言(第60页以下)。

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是党员<sup>①</sup>。而马尔托夫宁肯说,作为一个党员应“接受党的纲领,既在物质上又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定期工作来支持党”<sup>②</sup>。列宁坚持说,他最初的草案“把党员的概念……缩小了……,而马尔托夫的条文却是把它扩大了,因为它的特点是有(根据马尔托夫本人的正确的说法)‘伸缩性’。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党的生活的这个时期,这种‘伸缩性’无疑会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sup>③</sup>。随后,马尔托夫声称列宁的草案

“不仅排除了觉得自己不能参加一个非法组织但同情和帮助党的大量知识分子;而且还排除了一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他们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却由于利害关系而拒绝加入党的行列。”<sup>④</sup>

尽管字面上的差别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却表明双方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列宁为了弥补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败(马尔托夫的草案获得微弱多数),更加热衷于搞一个小型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精减的《火星报》编辑部——两者都只有三个成员。这就势必让“老卫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退隐。从效率来看,这样做虽然能证明是正确的(三人从未对这份报纸的经营有过多大贡献),但还是引起了好多恶感。不过列宁总有办法,当崩得的代表们退出代表大会时,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便占了多数——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尔托夫追随者的敌对面,后者被称为“少数派”或孟什维克。

争论一开始时无疑有许多个人因素。马尔托夫写信给卡尔·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31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7卷第63页。

③ 同上书,第6卷第455—456页。

④ L·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柏林1925年版第84页。

考茨基说，争论带有私人性质而不是原则性的。将近一年以后阿克雪里罗得还承认，“在原则或策略上双方仍然没有明确的差别。即使在组织问题上，分歧也并没有达到原则高度，而只出现在应用的范围上，即如何实施我们全都接受的组织原则。”<sup>①</sup>确实，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暂时联合了起来，列宁的草案没有受到反对就被接受了。孟什维克较之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并不明显地更为民主——相反，当列宁于1905—1906年修改了《怎么办？》中提出的结构以后，孟什维克就更显得不民主了。在1905年革命中，孟什维克的革命性并不亚于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后，由于孟什维克主张与激进的自由派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并对农民表示怀疑，而布尔什维克则倾向于持相反的意见，分歧才开始清楚地暴露出来。列宁根据上述两点，猛烈抨击孟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老的正统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他发出要“清”党的指令，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因为孟什维克仅仅希望通过从事合法（与非法）活动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在1912年以后也实行的政策。

## 参考读物

### 苏联(概述)

夏皮罗尽管一贯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所著的《苏联共产党》却含有很多经过仔细研究的材料。麦考利的《政治和苏联》是一本好的入门书，虽然偏重于当代和社会学。内特尔的《苏联的成就》是一本值得一读的短篇概述。

###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概述性的书籍有海姆森写的书，更好一些的有孟什维克西奥多·丹的

---

<sup>①</sup> 阿克雪里罗得致考茨基(1904年5月22日)，转引自C·韦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巴黎1977年版第131页。

书。文图里关于民粹派背景写得很精彩。门德尔和金德斯利论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弗兰克尔对阿基莫夫的介绍对经济主义有不少阐发；派普斯写出了彼得堡的背景；帕特京考察了犹太崩得的作用。基普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是一本基本教材。所有这类书中最好的是怀尔德曼的《工人革命的形成》。

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见于他的《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他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都有英译本可资利用。一本《哲学著作选集》最近正在发行。巴伦的著作是这方面主要的评注。

关于孟什维克最好而简短的概述是阿谢尔的文集《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有一篇很好的导言。阿谢尔写了一本关于阿克雪里罗得的极为详尽的传记；而盖茨勒则对马尔托夫作了精细的研究。

## 文献目录

### 苏联(概述)

- A·巴伊柯夫：《苏联经济状况的发展》，纽约1948年版。
- N·博迪亚耶夫：《俄国的思想》，纽约1948年版。
- J·博琴斯基：《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多德雷赫特1963年版。
- M·康福恩：《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伦敦1949年版。
- M·多布：《1917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纽约1966年第6版。
- M·芬索德：《俄国是怎样统治的》，剑桥1963年修订版。
- J·吉利森：《苏联的乌托邦形象》，巴尔的摩1975年版。
- L·格雷厄姆：《苏联的科学和哲学》，纽约1966年版。
- J·哈泽德：《苏联的政府体制》，芝加哥1965年第3版。
- 《苏联共产党(布)史》，莫斯科1943年版。
- D·约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伦敦1961年版。
- J·基普编《苏联镜子中的当代史》，伦敦1964年版。
- E·曼德尔：《论苏联国家的本性》，载《新左派评论》第108期，1978年。

- M·麦考利：《政治和苏联》，伦敦 1977 年版。
- P·莫斯利：《克里姆林和世界政治》，纽约 1960 年版。
- J·内特尔：《苏联的成就》，伦敦 1967 年版。
- M·尼古劳斯：《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芝加哥 1975 年版。
- A·诺夫：《苏联经济史》，伦敦 1969 年版。
- A·菲利波夫：《苏联的逻辑和辩证法》，纽约 1952 年版。
- M·拉什：《苏联的政治成就》，纽约 1965 年版。
- L·夏皮罗：《苏联共产党》，伦敦 1970 年第 2 版。
- D·斯科特：《俄国的政治体制》，伦敦 1965 年版。
- H·谢尔曼：《苏联的经济》，纽约 1969 年版。
- 《苏联共产党简史》，莫斯科 1970 年版。
- J·萨默维尔：《苏联哲学，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纽约 1946 年版。
- R·托克斯编《不同政见在苏联：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民》，巴尔的摩 1977 年版。
- R·塔克：《苏联的政治思想》，纽约 1963 年版。
- G·韦托尔：《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哲学的一个历史的和系统的考察》，伦敦 1958 年版。
- P·怀尔斯：《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牛津 1962 年版。
- K·维特福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社会和革命的看法》，载《世界政治学》第 7 期，1960 年。

###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 N·博迪亚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伦敦 1937 年版。
- Th.丹：《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纽约 1964 年版。
- D·富特曼：《红色的序曲：A. L. 热利亚波夫的一生》，伦敦 1968 年第 2 版。
- F·弗兰克尔：《V·阿基莫夫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困境(1885—1903 年)》，剑桥 1969 年版。
- Sh·盖雷：《俄国的解放运动(1900—1905 年)》，剑桥 1973 年版。
- L·海姆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坎

布里奇 1955 年版。

J·基普：《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的兴起》，牛津 1963 年版。

R·金德斯利：《第一批俄国修正主义者：关于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牛津 1962 年版。

D·莱恩：《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社会的 和 历史的研究(1898—1907 年)》，阿森 1969 年版。

A·门德尔：《沙皇俄国进步的困境：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合法民粹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1 年版。

A·帕特京：《俄国犹太劳工运动的起源》，伦敦和墨尔本 1947 年版。

R·派普斯：《社会民主主义和圣彼得堡劳工运动(1885—1897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3 年版。

L·夏皮罗：《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第 4 期，1961 年。

J·施奈德曼：《祖巴托夫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沙皇俄国为工人阶级进行的斗争》，纽约伊萨卡 1977 年版。

S·厄特钦：《俄国政治思想简史》，伦敦 1963 年版。

F·文图里：《革命的根源：十九世纪俄国民粹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由 I·伯林写导言，伦敦 1960 年版。

A·怀尔德曼：《工人革命的形成：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1891—1903 年)》，芝加哥 1967 年版。

## 普列汉诺夫

### 原著

G·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伦敦 1906 年版。

——《保卫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伦敦 1947 年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伦敦 1937 年版。

——《战斗的唯物主义：答波格丹诺夫先生》，伦敦 1973 年版。

——《唯物史观》，伦敦 1940 年版。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伦敦 1940 年版。

——《哲学著作选》共 5 卷，伦敦和纽约 1978—1980 年版。

## 评论

S·巴伦:《马克思和列宁之间:G·普列汉诺夫》,见L·拉贝兹编《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文集》,伦敦1962年版。

——《普列汉诺夫和1905年革命》,见J·S·柯蒂斯编《俄国和苏联史随笔》,伦敦1963年版。

——《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伦敦1963年版。

## 孟什维克

A·阿谢尔:《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载《斯拉夫评论》第26期,1967年。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伦敦1976年版。

——《P·阿克雪里罗得和孟什维主义的发展》,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版。

A·布圭娜:《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孟什维克运动文献目录》,斯坦福1968年版。

I·盖茨勒:《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墨尔本1967年版。

——《孟什维克》,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6期,1967年。

L·海姆森编《孟什维克:从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芝加哥1974年版。

G·霍斯金:《俄国的宪政实验:政府和杜马(1907—1914年)》,剑桥1973年版。

J·基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一届国家杜马》,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34期,1955年。

M·佩里:《俄国社会革命党从开始到1905—1907年革命的土地政策》,剑桥1976年版。



## 第六章

#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在1903年是列宁的一个主要反对者。他1879年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犹太农民家庭，很早就显示出革命热情和新闻写作的才华。他曾是《火星报》集团成员和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可是1904年以后却逐渐站到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不相同的立场上去了。对广大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活动持乐观主义，使托洛茨基拒绝列宁所强调的组织一个革命先锋队的政党。的确，托洛茨基在反对列宁关于党的见解时，就象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一样凶狠。在他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中，托洛茨基严厉批评列宁“凭着他特有的天才和精力，充当了党的瓦解者的角色”<sup>①</sup>。托洛茨基希望党组织成为适应工人阶级运动和允许工人最大限度加入的党。在他被公认为“对布尔什维克现象作最中肯分析”<sup>②</sup>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托洛茨基认为列宁的思想和“经济主义者”一样，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潜力丧失了信心：

“如果经济主义者为了逃避其浩繁的任务，而使自己充当了跟在历史后

---

① L·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日内瓦1903年版第11页，引自B·奈-帕兹：《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牛津1978年版第180页。

② 引自同上书，第193页。

面跑的低下角色,那么‘政治主义者’解决了这个问题是通过奋力把历史改变成他们自己的尾巴。”<sup>①</sup>

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希望把具有雅各宾派分子特征的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希望由他们自己来代替无产阶级。在比较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托洛茨基写道:

“两种体制间的差别……对确定我党工作的性质有决定性。一种情况是我们有一个为无产阶级着想的体制,一个政治上取代无产阶级的体制;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个政治上教育和动员无产阶级的体制,使它能够对所有集团和政党的意志施加有效的压力。这两个体制产生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同的。”<sup>②</sup>

在这种背景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他许多最著名预言中的一个: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党的组织以党自居,又为中央委员会所取代,最后被一个‘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sup>③</sup>

1905年他关于苏维埃的经验只能加深上述看法,尽管他曾试图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两翼之间的调停人进行活动,但这一看法还是原封未动。只是到了1917年的危机时刻,托洛茨基才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党是实现他的革命目标的必要工具。

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见解决不是独一无二的,但他对俄国社会的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论断倒是独特的。1904年春天他和帕尔乌斯在慕尼黑的会晤,对于这些观点的发展有决定意义。帕尔乌

---

① L·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日内瓦1904年版第54页,引自同上书,第197页。

② L·托洛茨基的同上著作,第50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斯是德国党左翼中的一位杰出的俄国犹太移民。他在1904年《火星报》上发表的以《战争与革命》为题的一组文章中概述了如下几个命题。由于对海外市场的争夺和工业连续不断的扩张,导致资本主义列强互相冲突并最终将归结于战争,因而民族国家在迅速地落后于时代。俄国将被迫卷入一场这样的战争,但由于她的社会结构早已过时,其结果会有助于社会解体从而增大革命的可能性: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给俄国带来了政治动乱,这又会影 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基础,俄国无产阶级将起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sup>①</sup>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国的迅速工业化,无产阶级成了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结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应立即以工人政府为目标。

据托洛茨基说,帕尔乌斯“使我更接近了社会革命问题,并且对我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从天文学的‘最终’目标明确地转变为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sup>②</sup>。托洛茨基接过了这些思想,并在他本人起主要作用的1905年事件中加以坚持,使之结合当时俄国社会和政治的详细分析而形成其理论结构。这个结构分两部分:其一是关于混和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社会经济理论,其二是政治上与之相对应的不断革命论。二者合在一起是“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来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的最激进的(如果不是修正主义的)重新表述”<sup>③</sup>。托洛茨基在其社会经济的分析中,从俄国落

---

① N·帕尔乌斯:《俄国与革命》,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33页。引自A·泽曼和W·沙尔劳:《革命贩子》,伦敦1965年版第64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伦敦1930年版第147页。又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伦敦1947年版第429页以下。

③ I·多伊彻:《武装的先知:1879—1921年的托洛茨基》,牛津1954年版第150页。

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比较原始和缓慢”<sup>①</sup>。但除此以外还存在一个事实,即“建立在一定内部经济基础上的俄国社会生活,始终处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甚至压力下”<sup>②</sup>。俄罗斯国家必须吸收更多的剩余产品来保全自己,因为它比那些向它施加压力的国家——波兰、瑞典和立陶宛更不发达。于是,

“从某一时期(特别是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国家致力于加速本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机械制造、加工工业、大工业、资本作为新的分枝,可以说都是人为地嫁接到自然经济主干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国家的产物。”<sup>③</sup>

这就是说,在国内根本没有靠自己的剩余进行投资的、自给自足的资本家阶级,而国家的投资只能从国外向欧洲资产阶级借贷而来——这是一种人为的靠不住的安排。其人为性(不同于缓慢的有机增长)意味着它能发展得更快。而且确实,1900年前后工业化的步子是巨大的。较少数的资本家靠国家引进的外国资本实现了这一扩张,因而缺少独立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非常迅速地形成起来了,并直接来自农村——这与西方不同。这样,俄国得以跨越经济发展的一些阶段,但同时也造成了奇特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专制而带有贵族特权的政府和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再加上先进的工业化和一个为数甚少但有内聚力的工人阶级。这种缺乏强大的中间阶级作为中间因素的新旧力量的结合,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托洛茨基的结论是:

“专制主义能够不顾社会发展而赖以继续存在的行政、军事和金融力量,

---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纽约1969年第3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41页。

不仅没有如自由派所主张的那样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恰好相反，却使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且这一革命随着专制主义的巨大势力使自己与民族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其预先确保具有的激进性就越发增大。”<sup>①</sup>

后来变得著名的“不断革命”论就出自这一分析。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具有的重要性，按照大规模工业中的工人比小企业中的工人更重要这一规则来衡量，是同其规模尚不相称的——俄国只有大规模的工业。而且俄国工业比在西方更袒露在外，而缺乏一个持久的、遍布全身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风气的保护膜。象少数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工人阶级能使工业瘫痪并控制城市中心。因此，托洛茨基断言，“工人阶级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地夺取政权”<sup>②</sup>。他还断言，俄国已把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政治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力量微不足道和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了。他引证考茨基来说明“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唯一现存的强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的身上”<sup>③</sup>。当然，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觉悟水平是夺取政权所必需的，但托洛茨基声称，有一个下了决心的少数就足够了。（这里我们看到了政治统治社会和经济的萌芽状态，它将成为革命后俄国的主要特征。）农民的支持是必要的，他们也会看到，他们的问题只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仍然必须保持统治。但在土地再分配之后农村出现分化时，无产阶级就要被迫采取社会主义态度。（这里托洛茨基远远超过了帕尔乌斯。）无产阶级政府将发现，他们会被迫采取越来越多的激进措施：

---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一旦权力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里，我们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别便在原则上和直接实践上都将失去其全部意义。无产阶级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这种区别的限制。”<sup>①</sup>

因此，

“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既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又不越出民主纲领的界限。对这一点存在任何幻想都将是致命的，都从一开始就会与社会民主主义妥协”<sup>②</sup>。

这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一个把肃清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sup>③</sup>。但就是这些社会主义措施肯定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反抗(特别是一定的分散和落后的社会结构)，以致无产阶级政府存在本身如果没有外部援助，也将成为问题：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也就不能把其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sup>④</sup>

当然，恰恰是在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候，欧洲无产阶级的这种援助并未到来。

## 参考读物

原著

托洛茨基流亡期间的著作收入纽约“探索者”1972年起陆续出版的多卷本中。最好的一卷本文集是多伊彻编的。托洛茨基的早期著作之一《总结与

---

①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81页。

④ 同上书，第105页。

展望》可在以《不断革命》为书名的著作中找到。他作为一个当代历史学家的才能，见《1905年》，当然还有《俄国革命史》。关于1920年代他的见解，《十月的教训》、《新方针》和《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提供了单行本。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看法，见《被背叛了的革命》和他写的传记《斯大林》。《文学与革命》证明了他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才能。

## 评论

长期以来，多伊彻的杰出的三卷本传记是仅见的详细评述。而最近，戴伊的《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对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的政策有不少阐发。豪的《现代大师》一书中的《托洛茨基》篇是立足于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篇精彩而简短的介绍。但基本著作无疑是奈-帕兹作过深入研究和综合性的新著《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还有克拉索和史密斯收编有许多短篇的论文集。马弗拉基斯的《论托洛茨基主义》是用毛主义观点写的一本令人失望的论战性著作。

## 文献目录

### 原著

《列昂·托洛茨基著作集(1929—1940年)》，G·布赖特曼和S·洛弗尔编，纽约1972年起陆续出版，共11卷。

L·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和平》，纽约1918年版。

——《托洛茨基案件》，伦敦1937年版。

——《流放日记——1935年》，伦敦1959年版。

——《共产国际的头五年》，两卷本，纽约1953年版。

——《俄国革命史》，三卷本，伦敦1945年版。

——《保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73年版。

——《十月的教训》，伦敦1937年版。

——《文学与革命》，安阿伯1960年版。

——《卡尔·马克思的生动思想》，伦敦1940年版。

- 《我的生平》，纽约 1960 年版。
- 《新方针》，安阿伯 1965 年版。
- 《1905 年》，伦敦 1972 年版。
- 《论列宁：为一部传记准备的笔记》，伦敦 1971 年版。
- 《中国革命的问题》，伦敦 1969 年版。
- 《俄国局势的真相》，纽约 1928 年版。
- 《总结与展望》，载《不断革命和总结与展望》，伦敦 1962 年版。
- 《被背叛了的革命：什么是苏联和它往何处去？》，伦敦 1937 年版。
- 《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伦敦 1941 年版。
- 《斯大林伪造学派》，纽约 1937 年版。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答卡尔·考茨基》，安阿伯 1961 年版。
-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纽约 1936 年版。
-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伦敦 1976 年版。
- 《托洛茨基文集(1917—1922 年)》，两卷本，J·M·梅耶尔编，海牙 1964 年和 1971 年版。
- 《英国向何处去？》，伦敦 1926 年版。
- 《青年列宁》，伦敦 1972 年版。

## 文集

- L·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时代 托洛茨基文集》，一卷本，I·多伊彻编，纽约 1964 年版。
- 《基本著作集》，I·豪编，伦敦 1964 年版。
- 《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伦敦 1963 年版。
- 《托洛茨基论英国》，纽约 1973 年版。
- 《托洛茨基论犹太人问题》，纽约 1970 年版。
- 《托洛茨基论文学和艺术》，P·N·西格尔编，纽约 1970 年版。
- 《托洛茨基论工会》，纽约 1969 年版。
- 《托洛茨基的言论》，纽约 1972 年版。
- 《马克思主义和军事问题(1921—1924 年)》，科伦坡 1969 年版。



-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科伦坡 1973 年版。
- 《军事著作集》，纽约 1969 年版。
- 《日常生活问题和论文化与科学的其他著作》，纽约 1973 年版。
- 《西班牙革命(1931—1939 年)》，纽约 1973 年版。
- 《在德国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E·曼德尔作序，纽约 1971 年版。
- 《法兰西向何处去?》，纽约 1936 年版。

### 评论

- S·巴尼：《托洛茨基论斯大林的俄国》，载《综览》，1962 年。
- J·卡迈克尔：《托洛茨基的苦痛》，载《文汇》第 5—6 期，1972 年。
- 《托洛茨基：对他生平的评价》，伦敦 1975 年版。
- R·戴伊：《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剑桥 1973 年版。
- 《长波理论：康德拉季夫，托洛茨基，曼德尔》，载《新左派评论》第 99 期，1976 年。
- I·多伊彻：《武装的先知：1879—1921 年的托洛茨基》，牛津 1954 年版。
- 《非武装的先知：1921—1929 年的托洛茨基》，牛津 1959 年版。
- 《被驱逐的先知：1929—1940 年的托洛茨基》，牛津 1963 年版。
- M·伊斯特曼：《列昂·托洛茨基：一个青年的画像》，纽约 1925 年版。
- N·杰拉斯：《列昂·托洛茨基革命思想中的政治参与》，载 G·帕里编《政治上的参与》，曼彻斯特 1972 年版。
- L·戈特沙尔克：《列昂·托洛茨基和革命的天然历史》，载《美国社会学刊》，1938 年。
- J·汉森等：《列昂·托洛茨基其人及其著作》，纽约 1969 年版。
- G·霍奇森：《托洛茨基和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诺丁汉 1975 年版。
- I·豪：《托洛茨基》，伦敦和纽约 1978 年版。
- B·奈-帕兹：《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政治思想》，牛津 1978 年版。
-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与革落后的命》，载 S·阿维尼里编：《形形色

色的马克思主义》，海牙 1977 年版。

N·克拉索编《托洛茨基：大辩论重新开展》，圣路易斯 1972 年版。

李振中：《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载《问题与研究》，1972 年。

S·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被放逐的时期》，载《中国论文集》第 18 辑，哈佛 1964 年版。

G·利希特海默：《评托洛茨基》，载利希特海默：《意识形态概念》，纽约 1967 年版。

A·麦克英泰尔：《流放中的托洛茨基》，载《文汇》，1963 年。

K·麦克尼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阐释》，载《加拿大的斯拉夫人文集》第 5 册，1961 年版。

L·梅坦：《不断革命论》，载 E·曼德尔编《世界革命五十年》，纽约 1968 年版。

A·马洛：《列昂·托洛茨基》，载《托洛茨基文集(1933—1934 年)》，纽约 1972 年版。

K·马弗拉基斯：《论托洛茨基主义：理论问题和历史》，伦敦 1976 年版。

N·莫斯利：《暗杀托洛茨基》，伦敦 1972 年版。

J·尼达瓦：《托洛茨基和犹太人》，费拉德尔菲亚 1972 年版。

G·普罗卡奇：《托洛茨基对 1929—1936 关键年代的看法》，载《科学与社会》，1963 年。

H·舒热：《不断革命：列昂·托洛茨基》，载拉贝兹编《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文集》，纽约 1962 年版。

L·辛克莱：《列昂·托洛茨基：文献目录》，斯坦福 1972 年版。

I·H·史密斯编《托洛茨基》，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1973 年版。

M·S·温卡图拉马尼：《列昂·托洛茨基在美国激进政治中的冒险尝试(1935—1937 年)》，载《社会史国际评论》第 9 期，1964 年。

R·沃兹：《列昂·托洛茨基：作家和历史学家》，载《当代史杂志》，1948

年。

F·温斯顿：《托洛茨基和社会学方面：对社会行动的分析》，载《社会力量》，1961年。

B·沃尔夫：《作为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载《斯拉夫评论》，1961年。

# 第七章 列宁 党

《怎么办?》是列宁论党的基本著作——虽然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样,不应该过高估计它的重要性。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对说明历史背景有特殊意义。

列宁一方面毫无新的建树,而力图重申 1894 年以前那个时期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学说,以反对新近的发展趋势<sup>①</sup>;一方面在书中毫不透露不再信任群众的情绪,而仅仅旨在弥补“领导者落后于群众自发高潮”<sup>②</sup>的弊端。前三章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和恐怖分子,并描述了 1890 年代后期运动中的混乱情况,等等。列宁把库斯柯娃的《信条》和两家俄国工人报刊《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当作“经济主义”的典型加以抨击<sup>③</sup>。他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小团体已显然不适于充当领导,也没有能力体现无产阶级在反专制斗争中作为各阶级领导者的作用。列宁立足于自己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断言经济主义者不可能产生出必需在政治上适应从家庭手工业到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最初的党组织。经济

---

① 参看本书第 85—86 页节末的最后四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317 页。

③ 关于列宁事实上如何歪曲经济主义者,见 A·怀尔德曼;《工人革命的形成》,芝加哥 1967 年版第 118 页以下。

主义者只能重复无产阶级受孤立而从事的局部的努力。在随后几章中，列宁持相同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详细阐述了他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其中包括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和对各个阶级的展望。而对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其“经济”斗争太狭隘了，因而不可能获得这种意识。（对于无产阶级，列宁从来不谈“阶级意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相唱和，坚称如果放任自流的话，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追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列宁详细引证了考茨基，然后在这一关键段落中继续写道：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sup>①</sup>

在第四章，列宁转而提出他的一些积极的建议。由于党的任务是在民主革命中对一切被剥削阶级起领导作用（用普列汉诺夫的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它就必须拥有一个全俄的组织。这个组织最好是以一份全俄的报纸为中

---

<sup>①</sup>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56页。

心，就象《火星报》所渴望充当的那样。这样，它就能够在全俄的基础上保持联系和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其专业化和一元化，从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这样一种组织也就带有保密性、集中性、专职性和独断性。而所有这些特性都必然取决于列宁的基本思想，即这种组织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个想法正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的要害所在。必须是职业革命家，这有两个意思：他们将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他们应受充分的训练。“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sup>①</sup>与此相反，列宁也并不反对群众组织，但他坚决主张群众组织必须与党的中坚完全区别开来：

“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极普遍地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使群众本来已很模糊的一种认识完全消失，也就是使他们忘记要为群众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sup>②</sup>

列宁也不反对党内民主，这意味着完全公开化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产生。但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才会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鼓吹这种党内民主。因此，只能按照寡头政治的人事内定原则来选择领导者。<sup>③</sup>

应当强调，列宁的观点代表了包括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内的整个劳动解放社，因此《怎么办？》是得到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赞同的最后一部重要的出版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21页。

② 同上书，第336页。

③ 进一步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08页以下对这种民主集中制的详细叙述。

裂以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都谴责列宁“独裁”。卢森堡发表了一篇尖锐批评列宁思想的文章<sup>①</sup>。并且正如我们所知，托洛茨基也这样做了。但是至少在1905年以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对党内民主并没有太大的分歧<sup>②</sup>。列宁与批评他的人之间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并且某些对布朗基主义的谴责也完全是无的放矢，因为影响群众和得到群众支持，是列宁理论的绝对要素。

总之，过分强调《怎么办？》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列宁后来写道，不应把他的小册子“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我们党在发展中早已度过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sup>③</sup>。他在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说，“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要弄直这根棍子，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面，这一点我已经做了”<sup>④</sup>。1917年以后他从未再版过这本书——虽然斯大林出于明显的理由把它奉为圣典。

1905年席卷俄国的罢工和骚乱浪潮使得《怎么办？》中的许多东西完全过时了，群众的革命自发行动驳倒了列宁的悲观主义<sup>⑤</sup>。尽管列宁在《怎么办？》中一直反对向群众开放的党，但在1905年变化了的情况下却涌进了大批新党员。党员增加了十倍，杰出人物的党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差别变得不怎么严格了。尽管列宁没有放弃秘密党的思想，但他毕竟承认了“我们党曾经在秘密环境中停

---

① 见R·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版；详见本书第58页第15行以下。

② 例如，考茨基在评断两派的分裂可能涉及哪些原则问题时便遇到了困难。参见C·韦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1898—1904年）》，巴黎1977年版第123页以下。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84页。

④ 同上书，第6卷，第445页。

⑤ 关于一般情况，见S·施瓦兹：《1905年俄国革命》，芝加哥1967年版第4章。

滞不前”<sup>①</sup>。他督促他的追随者们“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号召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到自己方面来，把他们成百成千地吸收到党组织中”<sup>②</sup>。他还说，“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散漫的’组织”<sup>③</sup>。这就必须改变党的结构，而列宁自己曾表示要实行选举原则，并削减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甚至主张公民投票原则。<sup>④</sup>

党的新结构被概括为“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这个术语源出于孟什维克，在两派暂时统一的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把它写进了党章<sup>⑤</sup>。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解释道，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于“要进行顽强的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口头上成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使所有的上层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出来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sup>⑥</sup>。党内少数派的权利也得到了保证。列宁把他的原则说成是“讨论自由，行动一致”<sup>⑦</sup>——行动的号召只能由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发出。

当然，1905—1906年提出新的民主集中制，确实并非单纯出于当时的革命热情。列宁不能不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即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是少数派，而且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处于孟什维克控制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布尔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1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参阅同上书，第11卷第418—419页。

⑤ 参阅同上书，第10卷第137页。

⑥ 同上书，第345页。

⑦ 同上书，第349页。



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重新分裂,并且适逢 1908到1912 年的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宗派情绪又大规模地回潮了。在列宁的推动下,这个在国内受迫害而在国外闹内部分裂的党,又变得日益铁板一块了。列宁着手坚持“党”的路线<sup>①</sup>。

然而,由于 1905 年已使布尔什维克党严格的组织受到涤荡,1917年再次开始了党内生活中最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党员人数几个月内重新增加了十倍,党的铁板一块般高度集中的结构便难以承受开创新自由的狂热气氛的冲击。不同倾向在党内起作用,党的组织便“必然有些松散和可塑性”<sup>②</sup>,在每一级都出现了挑选政策的激烈辩论。以前遭到列宁恶评而今受到同志般欢迎的托洛茨基,甚至宣称党应该“非布尔什维克化”<sup>③</sup>。

但这一事态未能、也不可能维持很久。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1年间所遇到的内战和严重混乱,迫使它取缔了先前的自由。以布哈林与列宁为对立的双方,在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上曾有过非常公开的辩论;到1921年以前,在经济政策和对苏维埃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也发生了多次争论。但国内战争结束时,这个国家已消耗殆尽。无产阶级大批遭到杀害,而大多数人对共产党怀有敌意——当时它已重新命名。中央委员会与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所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发生了争执,后者要求工人有充分自由的权利选举他们自己的工会领导人并独立于党。当时几乎同样与党对立的派别是“民主集中派”,他们希望党内更加民主,希望地方苏维埃有实权。他们的反对立场实在是出于积怨过甚<sup>④</sup>,而列宁迟至 1920 年

① 参阅同上书,第 17 卷第 199 页以下。

② L·夏皮罗:《苏联共产党》,伦敦 1970 年第 2 版第 174 页。

③ 引自 I·多伊彻:《武装的先知: 1879—1921 年的托洛茨基》,牛津 1954 年版第 258 页。着重谈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激进选择的看法,见 R·丹尼尔斯:《革命的心灵》,纽约 1969 年版头两章。

④ R·丹尼尔斯:《革命的心灵》,第 5,6 章。

年底还在重申党内所有派别都有自由表达意见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其相应代表的权利。但 1921 年 3 月在残酷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sup>①</sup> 仅仅几个星期后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明确标志着与这一传统决裂。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项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并责令立即执行”<sup>②</sup>，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把这些成员开除出党。第二项决议特别谴责工人反对派，并以迥然不同于 1917 年对群众表示信任的精神宣布，“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sup>③</sup>。紧接着发生了开除事件，不久以后斯大林成了党的总书记。

## 革 命

列宁的革命观师承于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传统，而更著特色于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俄国经济发展的考察。列宁在其 1894 年反对民粹派的论战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结论：俄国的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于资产阶级太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某些评论家认为《什么是人民之友》是在以唯意志论的雅各宾派方式鼓吹一场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虽然谈到过一场“胜利的共产

---

① 见 P·艾弗里奇：《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70 年版。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32 卷第 231 页。

③ 同上书，第 233 页。

主义革命”，但是他所认定的若干先决条件表明，他认为这一革命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他在1916年研究帝国主义时改变其基本概念以前，从未谈论过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那时为止，他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俄国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想法的近期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几乎所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后来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特别是同盟军问题。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都同意与自由派的联盟是必要的，但孟什维克对这一联盟的可能性是乐观的，而列宁对此却始终持怀疑态度，尤其在1905年革命期间疑虑更重了。从这次革命的失败中，孟什维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与自由派结盟赢得初步的改革，社会主义才能胜利。列宁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自由派在任何革命斗争中都是完全靠不住的同盟者。这一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待杜马的态度上。孟什维克热衷于参加杜马并随之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结成联盟；列宁先是不顾强烈的反对意见而硬要他的追随者抵制杜马，后来他有了改变，并承认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但正是在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农民的作用问题上，列宁显示了其思想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他对自由派越来越不肯让步的态度，使他更加乐观地看待农民，以致可以称为第一个提出在政权中联合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使农民处于经典的西欧马克思主义图式中的自由派的地位。1905年的事件使他深信，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边缘集团特别是农民的态度。孟什维克认为农民太无组织，不能作为可靠的同盟者；而列宁在其1905年夏写成的《两种策略》中，却提出一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按照《两种策略》的结论，之所以把农民包括在内，是因为

“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

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表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象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地，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sup>①</sup>

在1906年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土地国有化和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建议，以刺激农民脱离大资产阶级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这是走与普鲁士道路相反的美国道路，即宁要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要容克制度。同时，这将是一场“民主”革命，因为列宁十分清楚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而迅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sup>②</sup>但是认定一场革命就社会经济形式而论是资产阶级的，就政治形式而论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想法看来也许相当矛盾。

列宁的思想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什么区别呢？这一直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总想确认列宁有一种兼及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单一而连贯的理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希望缩小与列宁的分歧，而斯大林主义者则竭力证明事实恰好相反，企图以此作为他们认定托洛茨基早就“背叛”的根据。这场论战还由于大量使用了不确切的术语而蒙上了疑云。很清楚，托洛茨基决不象他经常被指责的那样敌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83—84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视农民，而列宁本人对于两种革命的关系也常常是并不明确的。他甚至在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段落中说过：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sup>①</sup>

并且，列宁在许多场合提到“转变”或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

然而，不能因此而模糊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就开始研究经济学了，因此任何在俄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议都很容易使他想起从前的对手。虽然列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但他还是严厉指责托洛茨基“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sup>②</sup>，并把托洛茨基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sup>③</sup>。他在1917年以前一直持这一基本评价。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1917年2月恰如1905年时一样，又大惊失色地跟在群众起义后面，而不是去领导起义。列宁于1917年4月初到达彼得堡以前，布尔什维克一直犹豫不决，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合作而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应该置身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列宁在1917年3月的《远方来信》里原已不怎么考虑从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221页。

② 同上书，第16卷第379页。

③ 同上书，第15卷第344页。

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可能过渡到某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了。而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他又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这至少使一位布尔什维克惊呼“列宁恰恰使自己成为过去三十年中一直空着的巴枯宁宝座的候补者了”<sup>①</sup>。列宁宣称：

“目前俄国形势的特征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sup>②</sup>

因此，党应当拒绝支持临时政府，放弃与孟什维克重新联合的想法，并向群众宣传结束战争、全部土地国有化和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声称，他自1905年起一直主张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而

“现在谁只是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送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古董保管库去（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sup>③</sup>

不过列宁仍然坚持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任何举动中都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任何其他的路线，任何以少数派名义行动的企图，都将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sup>④</sup>。但在7月，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尽管布尔什维克并未予以支持，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临时政府却仍然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镇压。列宁得出结论说：

“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

---

① N·苏哈诺夫：《1917年俄国革命》，伦敦和纽约1955年版第1卷第287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2页。

③ 同上书，第25页。列宁的《四月提纲》标志着他与其先前理论的彻底决裂。后来他通过强调苏维埃的作用，又回到了这些理论。这种见解可参阅J·弗兰克尔：《1917年4月列宁在理论上的革命》，载《当代史杂志》，1969年4月号。

④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234页。

军人专政最终取得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9日以前,即政权实际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还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估计到这种转变,没有估计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已经完全背叛革命。”<sup>①</sup>

但列宁并未将上述思想立即兑现。在7月剩下来的日子和8月里,他流亡于芬兰,正忙于写作《国家与革命》。但到9月,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政变失败,引起了有利于左派的反应。托洛茨基(他刚刚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任主席的彼得堡苏维埃,以及莫斯科苏维埃,都处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无组织的起义席卷了农村地区。到9月中旬,仍在芬兰的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sup>②</sup>仍在俄国的大部分党领导人对7月的失败记忆犹新,不肯认真采纳列宁的建议,而列宁竟然威胁要退出中央委员会,并向普通党员呼吁,要他们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一行动只是在他于10月中旬亲自来到彼得堡时,才终于着手进行的。即使如此,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他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是继续反对起义,甚至在出版物中公开了这一分歧(因而也公开了列宁的意图)。但由托洛茨基精心布署并督促执行的起义计划自有其本身的能量,而当临时政府10月24日企图封闭某些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时,布尔什维克便开始夺取政权。这毕竟是有史以来最容易而不流血的一次夺权行动,至少在其最初阶段是这样。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26卷第1页。

## 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现象是与资本主义成长为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本性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二十世纪初叶，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竞争的资本主义，使当时发达的经济操纵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所掌握的银行控制下的金融资本手中。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商品输出，而垄断资本主义则输出资本。过剩的资本不能用于国内（因为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意味着降低利润），而是“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sup>①</sup>。这又导致事实上把世界分割为各个国际卡特尔的势力范围。虽然对列宁的一般批评意见是，殖民扩张实际上发生在垄断资本高度发展之前<sup>②</sup>，但他的表述只是含糊不清，其实并没有包含一种因果性的论点。<sup>③</sup>

对此，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都很普遍，其中包括考茨基，他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中已经改变了对帝国主义前途的看法。他认为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超帝国主义”，它们将以某种国际卡特尔的形式和平地分割世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sup>④</sup>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783页。

② 参阅D·菲尔德豪斯：《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伦敦1967年版第187页以下。

③ 参阅E·斯托克斯：《十九世纪后期的殖民扩张和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抨击：是误认为有同一性的一例吗？》，载《历史杂志》，1969年第12卷第289页以下。

④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802—803页。



而且,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只关心产业资本,而没有认识到,使帝国主义具有其必不可免的特征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达到平衡,因为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sup>①</sup>

列宁在其小册子的第八章中指出了帝国主义对国内的两个影响。第一,作为帝国主义基础的垄断造成了延缓和阻滞技术进步的趋向。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帝国主义有超额利润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sup>②</sup>。这里提出了对第二国际政策的解释。列宁并未研究有多少工人已被收买,何以一些有关联国家的整个无产阶级不会受到侵袭,以及这对革命的可能性将有何影响等问题。<sup>③</sup>

虽然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但他的见解总的说来却远不乐观。他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sup>④</sup>

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是“通俗的论述”,从而并未自称是一部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815页。

② 同上书,第822页。

③ 详见E·霍布斯鲍姆:《列宁和“劳工贵族”》,载《每月评论》,1970年第4期第47页以下。

④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842页。

高度独创性的著作。列宁具体参考了英国自由派霍布森(他曾主张,殖民扩张应归咎于缺乏国内的投资机会)和希法亭,但他最直接的来源却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该书在列宁这本小册子的前几个月写成。布哈林把希法亭根据金融资本的必然要求而对帝国主义进行的分析<sup>①</sup>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接着描述了希法亭著作出版后几年以来垄断发展的程度。国家日益增强的干预已使整个国民经济以资本主义托拉斯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然而,为了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见解,布哈林强调了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帝国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与革命。<sup>②</sup>另一方面,列宁从卢森堡那里却很少有所借鉴,原因是她的见解侧重于过多地强调不发达国家,而且包含了一种不给政治以活动余地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他的革命观点发展的关键。帝国主义战争使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进入其最后阶段,并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客观的和主观的前提。列宁早在1915年就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③</sup>1917年他离开瑞士以前已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sup>④</sup>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曙光在望,而列宁开始致力于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

---

① 见本书第75页第2行以下的论述。

② 关于列宁大大得益于布哈林,见S·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25页以下。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381页。

④ 同上书,第23卷第382页。

## 国 家

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最重要著作是他的《国家与革命》，它真正是柯莱蒂所肯定地称为的“列宁对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sup>①</sup>。它可以说是列宁把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应用于实践的产物。

该书源起于1916年夏天列宁与布哈林就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国家的存在问题进行的一场争论。布哈林强调“消亡”方面，而列宁则坚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剥夺者的必要性。事实上是列宁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写成于1917年夏天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许多想法，特别是反国家主义的主题，原是布哈林的思想<sup>②</sup>。

列宁关于国家的直截了当的定义是，“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sup>③</sup>。因此他甚至对议会民主也加以贬低，因为这种民主已受到他所认为现代日益增强的官僚和军事势力的影响：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sup>④</sup>

于是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结论奉为楷模<sup>⑤</sup>，跟着宣称革命的仁务是打碎国家。虽然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① L·柯莱蒂：《从卢梭到列宁》，伦敦和纽约1972年版第224页。

② 见S·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年版第39页以下。

③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190页。

④ 同上书，第209页。

⑤ 他在《两种策略》中对公社持迥然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所不当模仿的那个政府”，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66页。

国家”<sup>①</sup>，但列宁相信，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不仅已开始消亡，而且已处于一种高度的解体状态。不过，列宁还是把国家称作“武装起来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难道这也要消亡吗？是的，就其无论如何是一种脱离群众且与群众对立的权力而言，它是要消亡的。（苏维埃的最新经验对列宁的影响在这里很清楚。）他几乎不谈这一过渡时期的机构形式，而特别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sup>②</sup>

但对于这一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几乎未作分析。既然列宁竭力坚持国家在革命后立即消亡，因而具有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所以专政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就益发令人费解了。他的一般见解似乎体现了古典的社会主义公式，即对人的统治能够让位于对物的管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命官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sup>①</sup>

在政治领域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极少提到革命的动力——党本身。在一处严肃谈到党的地方,列宁写道: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sup>②</sup>

到底是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在这里是不明确的。列宁思想的一般特征大概是倾向于前者,但前者必然与他那更为自由主义的阐述发生明显的冲突,而他从来就没有详细论述过这一冲突。

然而,《国家与革命》中固有的乐观主义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就消失了。由于苏维埃国家在怀有敌意的列强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由于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政府必须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屈辱的和约,各种困难加剧了。面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列宁在接受和约的政策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列宁在1918年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回答布哈林时,已经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重点。“什么时候国家才开始消亡呢?”他提出问题并回答说,要“等到我们可以说:你们看,我们的国家在消亡!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来得及召开几次党的代表大会。而现在还早得很。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会破坏历史的发展远景”<sup>③</sup>。无产阶级的专政逐渐变成党的专政,并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这两种情况是由三个主要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212—213页。

② 同上书,第192页。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135页。

因素促成的：党事实上使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们很难有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1917 年后期，布尔什维克党弱小而且其组织无效率。某些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提出，要把党融化到苏维埃里面去。但是，正如列布曼所说，

“新政权的民众基础缩小了，苏维埃民主变得更加徒具形式；与此相应，党由于更团结而更坚忍地克服了种种社会政治困难，增强了它的威信，并重新建立起先前有利于自己的不平衡地位。”<sup>①</sup>

到 1919 年党和国家已交融为一体，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等同于党的专政，于是列宁可以谈论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阶级关系了<sup>②</sup>。

党的这种统治由于 1918 年 1 月解散立宪会议并开始镇压反对派而得以加强。革命前，列宁一直赞同召集立宪会议；而没有明显意识到这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之间的必然冲突。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表决权的立宪会议，对于一个主张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立宪会议中最大的党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会议的整体结构更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苏维埃作为民众意志的体现也未能维持多久，内战和社会生活的军事化很快就使苏维埃政权黯然失色了。反对党存在本身也逐步受到威胁。1917 年以前，列宁从未提出过一党制国家，因而后来布尔什维克不能与自己的社会主义反对派达成联合，正是由于这些反对派同他们自己一样互不让步。然而，内战的压力和把反布尔什维主义与反革命等同起来的倾向最终导致镇压所有的反对党。一贯代表富裕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从根本上对布尔什

---

① M·列布曼：《列宁的列宁主义》，巴黎 1973 年版第 2 卷第 109 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31 卷第 29 页。

维克的纲领怀有敌意，而孟什维克的情况不同，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尽管有布尔什维克的干扰）日渐增长。1918年6月，他们被逐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到1920年底就被全面镇压了。

这种强行一致的倾向由于官僚主义的发展而增强了<sup>①</sup>。助长官僚主义的因素是征用制和为战争努力所导致的国有化方案的层层加码，再加上俄国专制制度传统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以及将越来越多的待业者蓄意纳入国家机关为他们安排工作。到1920年底，这架行政机器已经拥有几乎六百万雇员，形成一种与经济生产能力恰成反比的增长。虽然列宁赞成吸收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和专家，并确实给了他们种种特权，但他也不断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他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潭里。”<sup>②</sup>1921年初，列宁指出苏联的特点是“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sup>③</sup>。一年以后，列宁在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上承认：

“如果拿……这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在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是很怀疑的。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sup>④</sup>

甚至著名的工农检查院这个对行政机关实行人民监督的组织，也成了另一个要与之斗争的、具有无限缺陷的机关。列宁在他一生中活动的最后几个月里，就这一问题写下的评论是近于失望的。

党和官僚机关权力的增长必然妨碍基层工人阶级有效地表达

---

① 参看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评论，见《共产主义ABC》，哈门德斯沃兹1969年版第237页以下。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6卷第588页。又见他1921年12月给波格丹诺夫的信。

③ 同上书，第32卷第32页。

④ 同上书，第33卷第254页。

意见。工人监督已在1917年11月原则上加以采用，但在经济上并不成功，几个月后就开始放弃了。在经济形势的压力下，列宁要求实行计件工资制，甚至泰罗制。1918—1921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有必要采取高度集中的控制，而其后的新经济政策则意味着（虽然也是必要的）后退一步。罢工在“属于”工人的国家里被看成是不合逻辑的。在工会地位这个重大问题上，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见解。第一种是以柯伦泰和施略普尼柯夫为代表的所谓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会在经济事务的管理中应享有决定权。第二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工会只不过是政治当局的一个工具。列宁则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赋予工会以某种独立性，但他的意见最后并没有占上风<sup>①</sup>。苏联政府普遍无能为力去实践《国家与革命》的原理，使列宁在逝世的前几年中深感悲观和忧虑。

## 民族问题

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但他让这一权利服从于一些最终使它在实践中归于消灭的条件。列宁在他最初的一处表述中写道：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而支持民族自治要求，则决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是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sup>②</sup>

因此，列宁只能给予民族独立的要求以有条件的承认。这方面特别严重的例子是欧洲最大的被征服民族波兰，也是在社会主

---

<sup>①</sup> 见本书第148页第10—16行。详见R·丹尼尔斯：《革命的心》，纽约1969年版第119页以下。

<sup>②</sup>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96页。



义者中间长期进行辩论的一个话题。马克思曾经无条件地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但列宁却批评波兰社会党无条件地要求其国家独立。这并不是说在列宁那里民族问题是个不重要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完全懂得利用民族愿望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性。诚然，他几乎比当时所有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都更强烈地表示赞成民族自决原则，但他从未谈论过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文化。（他在1914年12月的《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似乎赋予大俄罗斯民族文化以一种内在的价值，这必须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是由于希望表明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对待战争上并不完全是反俄的。）在列宁看来，民族自治问题纯粹是个策略问题，因为自决权始终服从于党的利益。

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联邦原则和民族文化自治。他虽确曾宣布，他的信念在于“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带强制性的国语”和“把取消任何民族特权以及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基本法律包括在宪法里”，这“尤其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sup>①</sup>。但列宁并没有走得象罗莎·卢森堡（她把民族主义看成是立足于反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畏惧感<sup>②</sup>）那么远，他在1913年非常明确地写道：

“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但我们拥护分离权，因为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大损害了民族共居的事业，有时在自由分离以后，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联系！！自决权是我们集中制总前提中的一个例外。在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存在的时候，这个例外是绝对必要的，稍一抛弃这个例外，就是机会主义（象罗莎·卢森堡那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426页。

② 关于列宁和卢森堡在这方面的分歧，见H·戴维斯为《罗莎·卢森堡民族问题选集》（纽约1976年版）所写的导言（第8页以下）。

样)。”<sup>①</sup>

1914年大战的爆发也未能使这些看法有所改变。尽管列宁接受了希法亭和卢森堡关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到来的基本论点，但他并不接受卢森堡认为这将导致一切民族集团现在趋于过时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步子是不平衡的，而列宁最关心的东欧地区，资本主义还不甚发达。

列宁对民族自决的热情随着革命的成功自然有所减弱。何况布尔什维克正陷入既要同外国现政府谈判，又须扶植当地革命事业的棘手境地。正如列宁在他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提纲》中写道：“如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sup>②</sup>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旦被确认为多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民族自主的余地也就所剩无几了。列宁称赞了红军于1921年征服格鲁吉亚——尽管他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的过分残忍感到震惊。正是在这一场合，他作出了下述著名的评论：

“如果象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泽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sup>③</sup>

其实，列宁与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如布哈林、拉狄克和斯大林相比，他的民族政策是极其“自由主义”的。只是他为实现其想法所作的努力，却因内战以及军事形势下和工业化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集权倾向而受到了阻碍。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502页。

② 同上书，第26卷第422页。

③ 同上书，第36卷第628页。

## 哲 学

列宁早年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哲学上的特殊组成部分。例如，列宁在写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坚持辩证法……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sup>①</sup>确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内容是十九世纪末的一个普遍看法。资产阶级批评家视之为缺陷，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弗兰茨·梅林）视之为优点，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企图用康德或马赫的观点来补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时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便认定马克思主义正好需要一门沿用普列汉诺夫本人思路的哲学。但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建党之后，列宁仍然相信哲学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党的路线”，而宁肯把这些问题留给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高尔基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专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去讨论。

波格丹诺夫深受物理学哲学的近期发展、特别是恩斯特·马赫思想的影响。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科学家当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其上辈颇为肤浅的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对原子改变认识上，即从道尔顿以来长期认为实体的原子是基本的“宇宙之砖”的看法，改变为视原子为一团带负电荷的电子云。粗看起来，“物质”似乎消失了。马赫在预测科学进展的路线时，企图创立一种世界完全存在于感觉之中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称之为客观的东西（包括自我在内），只不过是“以最经济而有条理的方式归类而来的各种感觉的复合而已”<sup>②</sup>。波格丹诺夫捡起了这种看

<sup>①</sup>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44页。

<sup>②</sup> 关于马赫，可进一步参看J·布莱克默：《恩斯特·马赫》，伯克利1972年版第15章。

法，他在其名之为经验一元论的体系中企图进一步表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是同一个经验，尽管其组织起来的方式并不相同。波格丹诺夫观点的中心是组织起来的经验的思想：心理现象是以个人方式组织起来的，物理现象是以社会方式组织起来的。

甚至到1908年，列宁仍把马赫主义看作一件个人选择的事情，不仅在党内如此，在各个派别内也是如此。但他本人在自己一派中激烈反对马赫主义，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列宁与召回派之间的争论从1907年起变得尖锐起来了。召回派由波格丹诺夫领导，原属布尔什维克，希望抵制第三届杜马选举。列宁当时处于少数派地位，而波格丹诺夫则被选为该派发言人。于是波格丹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把他们的影响扩大到俄罗斯以外，并在卡普里岛的高尔基住宅为党的活动分子建立了一所布尔什维克学校。因此列宁被迫破坏波格丹诺夫（及其左派敌手们）的权威，以便重新确立他本人的控制。第二，《新时代》刊印了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与革命》的译文，并在简短的序言中告诉德国读者，布尔什维克已把马赫哲学作为该派的思想基础，而孟什维克则奉行斯宾诺莎与霍尔巴赫的哲学。赞同这一看法的，还有最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集》，该书是到那时为止马赫主义者最大胆的一部著作（特别是就卢那察尔斯基关于“造神论”的言论来看）。这样，列宁就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被看作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而孟什维克则被看作正统派哲学家。因此，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的，不是把哲学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争论结合起来，而是要把它们分别开来；倒是孟什维克试图把这二者加以联系，并企图证明布尔什维克从其哲学上到其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甚至正当列宁撰写这部著作时，德波林便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写道，

“在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策略上都留下了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印记，其哲学表现就是马赫主义。我们的马赫式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有自觉

性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使马赫主义的实践和策略赋有意义。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们只是实践家,是一些不自觉的马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sup>①</sup>

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是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只有哲学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好处。他认为马赫主义这类当代哲学倾向,从党的工作的立场来看,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党的实际工作才是头等重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表述的主要哲学观点,其价值是次要而短暂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和波格丹诺夫作了详尽而充分的论战性批判。在一段证明认识论等同于本体论的文字中,列宁说:

“我们现在完全不是谈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sup>②</sup>

他对物质下的定义是,“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sup>③</sup>。这两个学说——世界外部的实在和认识的“复写”理论——组成了列宁唯物主义的中心主题。该书的基本概念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哲学派别的互相冲突。对唯心主义那怕作出最微小的让步最终都将导致信仰主义和宗教,从而在客观上援助和拯救资产阶级。他不仅力图说明那些否定不依赖感官知觉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实在性的人实际上是宗教

---

① 引自D·约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伦敦1961年版第34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128页。

信徒，而且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地企图表明在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不可知论和宗教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很少有耐人寻味的哲学兴趣。列宁的(甚为错误的)看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sup>①</sup>。确实，列宁这本书只不过是经常被人引用的恩格斯晚期著作<sup>②</sup>中一些论点的简单转述而已。(只有四处引证了马克思，其中没有一处与主要论点有关。)一般说来，列宁所介绍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的。甚至他对马赫立场的说明，在若干要点上也是一种歪曲。但是，根据其哲学内容来评价列宁这本书也许不大公平。它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并在这方面大为成功。更一般地来说，在俄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下，列宁回到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某些肤浅的形式是可以理解的。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及其宗教后盾进行反抗的组成部分。既然俄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那么唯物主义就成了无产阶级反对沙皇政权封建主义的斗争武器。总之，列宁在哲学上的落后是俄国经济发展落后的结果<sup>③</sup>。

在1914年的大分裂之后，列宁以不再是寻求应急工具的方式重新注意到哲学。面对欧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大变动，列宁为了重新确定自己的观点，竟花了许多时间极其细致地研究黑格尔，这是件令人惊异的事情。这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中只有两处关于黑格尔的评论(都很肤浅)，而且很少谈到辩证法<sup>④</sup>。列宁的笔记(篇幅长达300印刷页左右)只是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2页。

② 主要指《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还没有发表。

③ A·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伦敦1975年版第92页以下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④ 相反的解释，见D·H·鲁宾：《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大西洋高地1977年版，特别见第5、6两章。

到1929年才发表出来，以便支持当时党反对“机械论”偏向的斗争<sup>①</sup>。这部《哲学笔记》的最重要部分是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在《哲学笔记》中他打算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从而正确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重点从批判黑格尔转为热情地接受了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列宁在其笔记的结尾处写道：“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sup>②</sup>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最有名的评论是关于黑格尔与《资本论》的关系：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sup>③</sup>

实际上这是个自我批评——同他评论以前的哲学良师普列汉诺夫一样，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大约写了近一千页的东西”，但“关于……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sup>④</sup>《哲学笔记》坚持认为，关于认识的反映论中的“复写”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我们从未知道一切事物。但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不同之处最鲜明地表现在这样一种看法中，即唯心主义不是个错误，而只是一种片面的夸大。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sup>⑤</sup>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的对比取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比。列宁称赞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第225节，“在那里‘认识’（理论的）和‘意志’，‘实践活动’被描述

① 见本书第158页倒3行注④以下。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8卷第253页。

③ 同上书，第191页。

④ 同上书，第307页。

⑤ 同上书，第305页。

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两个方法、两个手段”<sup>①</sup>。列宁谈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谈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他总结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sup>②</sup>。列宁不断强调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实际上，他有时也走到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活力论”<sup>③</sup>那里去了。当然，不可能证明在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和他此后的政治态度之间有什么确切的联系<sup>④</sup>，但列宁对1914年大分裂的哲学反应——《哲学笔记》，显然是与他在经济学领域中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相对称的。某些评论家声称，他们发现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对他的《国家与革命》的若干章节、他关于革命期间党群关系的政治见解，以及他在1920—1921年对工会问题的讨论都有影响。<sup>⑤</sup>

## 参考读物

列宁

原著

莫斯科版《列宁全集》45卷集已出齐。

评论

两部详细的传记都是见过列宁的人写的：舒布的《列宁传》和费舍的《列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8卷第224页。

② 同上书，第228页等多处。

③ 参阅L·柯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纽约和伦敦1973年版第162页以下。

④ 更为肯定的见解，见M·劳维：《从黑格尔的大逻辑到彼得堡的芬兰车站》，载《批判》第6期（1976年春）第8页以下。

⑤ 参见H·勒斐伏尔：《列宁的思想》，巴黎1957年版第189页以下，以及前引M·列布曼：《列宁的列宁主义》，第2卷第349页以下。



宁生平》。沃尔夫在《缔造革命的三个人》中的描写很好，但遗憾的是只写到1914年为止。关于列宁的早年生活，有多伊彻写的表现性传记的片断。波索尼的《列宁：有强迫力的革命家》和西恩的《列宁：一个革命家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不太可信的心理学解释。摩尔根的《列宁》是一本好而简短的介绍。关于列宁在最后几年中的省悟，见卢因的《列宁的最后斗争》。在列宁的同代人中，把列宁作为一个人来写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巴拉巴诺夫、托洛茨基、瓦连廷诺夫和蔡特金的回忆可作为补充。

关于列宁的一般思想，费希尔的《列宁著作精华》虽然是很简短的介绍，却是可靠的；舒克曼的《列宁和俄国革命》则长一些。迈耶的《列宁主义》仍值得一读。相反，对列宁极怀敌意的有康奎斯特的《当代大师》中的《列宁》和厄拉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过后者包含了大量细节研究。卢卡奇的《列宁》是一部简短的哲学概述。斯威齐和麦克道夫以及雷德韦和夏皮罗合编的文集从各个不同方面收集了列宁的思想，这些文集非常有用。最近，有了克利夫夫的三卷本《列宁》，为列宁作了通盘辩解。列布曼的《列宁的列宁主义》是一本极富洞察力的书，虽然很遗憾的是英译本对法文原文作了删节。所有书中最好的是哈丁的两卷本《列宁的政治思想》，他独具匠心地再现了列宁在1914年以前和以后不同的政治战略。

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领域，曼德尔捍卫了列宁关于党的概念。关于列宁在1917年策略上的变化，见弗兰克尔的优秀文章。关于列宁战略的国际方面，见佩奇的著作。关于列宁对哲学的贡献，见保罗、乔丹尤其是潘涅库克的批判，而鲁宾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最后两章却是对列宁的辩护。关于列宁对待文化的功能主义态度，见克劳丁-尤龙多的《列宁和文化革命》。

## 1905年和1917年

关于1905年，托洛茨基用同名标题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最好的现代的分析是施瓦兹的《1905年俄国革命》。正象从下面的参考书目所将看到的那样，关于1917年的书多得不可胜数。最好而紧凑的描绘是列布曼的《俄国革命》。丹尼尔斯和费罗都详尽地描述了十月革命，而张伯伦的两卷本则一

直写到 1924 年。卡特科夫和科钱的写法不同，但都很扣人心弦。最基本的著作无疑是卡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代表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见布林顿一贯反布尔什维克的评论。

亲眼所见的记实著作，有托洛茨基的杰作《俄国革命史》，已列入经典。苏哈诺夫的《俄国革命》是一位政治记者完全凭自己的观察记述的；类似的是里德激励人心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克伦斯基在一系列回忆中捍卫他自己的立场。佩希布里奇的《俄国革命目击记》是一部有用的文集；而拉克尔提供了一部对 1917 年（及以后）看法上有变化的历史。

## 文献目录

### 列宁

#### 原著

《列宁全集》，共 45 卷，莫斯科 1960—1970 年版。

《列宁选集》，一卷本，莫斯科 1968 年版；三卷本，莫斯科 1960—1961 年版。

《列宁的基本著作》，M·克里斯琴编，纽约 1966 年版。

《列宁文选》，R·塔克编，纽约 1975 年版。

#### 评论

A·巴拉巴诺夫：《列宁印象记》，B·沃尔夫作序，安阿伯 1964 年版。

M·布林顿：《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管理》，伦敦 1970 年版。

F·克劳丁：《列宁和考茨基著作中的民主和专政》，载《新左派评论》第 106 期，1977 年。

C·克劳丁-尤龙多：《列宁和文化革命》，萨塞克斯郡哈索克斯 1977 年版。

T·克利夫：《列宁》，三卷本，伦敦 1975—1978 年版。

L·科莱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载 R·布莱克伯恩编《革命和阶级

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物》，伦敦1977年版；L·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研究》，伦敦和纽约1972年版。

R·康奎斯特：《列宁》，伦敦1972年版。

I·多伊彻：《列宁的童年》，牛津1970年版。

E·费希尔：《列宁著作精华》，纽约1972年版。

L·费舍：《列宁生平》，伦敦1965年版。

J·弗兰克尔：《1917年4月列宁在理论上的革命》，载《当代史杂志》，1969年4月。

M·高尔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纽约1932年版。

Th·哈蒙德：《列宁论工会和革命(1893—1917年)》，纽约1957年版。

N·哈丁：《列宁的政治思想》，两卷本，纽约和伦敦1977年起相继出版。

C·希尔：《列宁和俄国革命》，伦敦1947年版。

Z·A·乔丹：《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载《斯拉夫评论》第25卷第2期，1966年。

N·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A·罗思坦写有导言，伦敦1970年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传》，莫斯科1965年版。

M·卢因：《列宁的最后斗争》，伦敦1969年版。

M·列布曼：《列宁的列宁主义》，伦敦1975年版。

G·卢卡奇：《列宁：对他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伦敦1970年版。

E·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载R·布莱克伯恩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物》，伦敦1977年版。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伦敦1971年版。

A·迈耶：《列宁主义》，纽约1962年第2版。

M·摩尔根：《列宁》，伦敦1971年版。

S·佩奇：《列宁和自决权》，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1950年。

——《列宁：民族问题和波罗的海国家(1917—1919年)》，载《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7卷第1期，1948年。

——《列宁和世界革命》，纽约1959年版。

——《无产阶级在1917年3月所起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官方说法的自相

矛盾》，载《俄国评论》第9期，1950年。

A·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伦敦1975年版。

G·保尔：《列宁的感知理论》，载《分析》第5卷，1938年。

S·波索尼：《列宁：有强迫力的革命家》，伦敦1966年版。

D·鲁宾：《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哈索克斯1977年版。

L·夏皮罗和P·雷德韦编《列宁，其人，理论家，领袖：一个重新评价》，伦敦1967年版。

L·夏皮罗：《禁止列宁主义》，载《政府和反对派》第2卷第2期，1967年。

D·舒布：《列宁传》，纽约1948年版。

H·舒克曼：《列宁和俄国革命》，纽约1968年版。

P·司徒卢威：《我与列宁的接触和冲突》，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12卷第36期，1934年。

P·斯威齐和H·麦克道夫编《列宁在今天：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八篇论文》，载《每月评论》第21卷第11期，1970年。

R·西恩：《列宁：一个革命者的产生和成长》，伦敦1974年版。

L·托洛茨基：《论列宁：为一部传记准备的笔记》，伦敦1971年版。

A·厄拉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纽约1964年版。

N·瓦连廷诺夫：《列宁的早年》，R·西恩编，安阿伯1969年版。

——《与列宁相遇》，牛津1968年版。

E·威尔逊：《去芬兰车站》，伦敦1960年版。

B·D·沃尔夫：《列宁主义》，载M·德拉克科维奇编《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斯坦福1965年版。

——《缔造革命的三个人》，纽约1948年版。

C·蔡特金：《回忆列宁》，纽约1934年版。

## 1905年

S·哈卡弗：《第一次流血：1905年俄国革命》，伦敦1965年版。

H·舒热：《1905年俄国革命和德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39期，1960—1961年。

S·施瓦茨：《1905年俄国革命：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形成》，芝加哥1967年版。

L·托洛茨基：《1905年》，伦敦1972年版。

### 1917年及其后果

R·阿布拉莫维奇：《苏联革命(1917—1939年)》，伦敦1962年版。

A·亚当斯编《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起因和过程》，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1972年版。

P·阿希诺夫：《马赫诺分子运动史(1918—1921年)》，芝加哥1974年版。

A·阿谢尔：《俄国马克思主义和德国革命(1917—1920年)》，载《社会历史档案》第6—7期，1966—1967年。

N·博迪亚耶夫：《俄国革命》，伦敦1935年版。

《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十月革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伦敦1974年版。

R·布劳德和R·克伦斯基编《1917年临时政府》，三卷本，斯坦福1962年版。

J·布尼安和H·费希尔：《1917—1918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资料》，斯坦福1934年版。

E·H·卡尔：《俄国革命的背景》，载H·卢巴茨编《欧洲现代史中的革命》，伦敦1966年版。

——《1917年前前后后》，伦敦1969年版。

——《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三卷本，伦敦1950—1953年版。

W·H·张伯伦：《俄国革命(1917—1921年)》，两卷本，伦敦1935年版。

V·彻诺夫：《伟大的俄国革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36年版。

R·V·丹尼尔斯：《红十月：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67年版。

——《俄国革命在发展中》，载H·卢巴茨编《欧洲现代史中的革命》，伦敦1966年版。

M·费罗：《俄国1917年2月革命》，伦敦1973年版。

O·甘金和H·H·费希尔：《布尔什维克党人和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起源》，伦敦1940年版。

G·卡特科夫：《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伦敦1969年版。

——《德国外交部关于1917年给予布尔什维克财政援助的文件》，载《国际事务》第32期，1956年。

A·F·克伦斯基：《一场灾祸：克伦斯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个人经历》，纽约1927年版。

——《克伦斯基回忆录》，伦敦1966年版。

——《布尔什维主义的序曲》，伦敦1919年版。

L·科钱：《革命中的俄国》，伦敦1970年版。

W·拉克：《革命的命运：对苏联历史的阐述》，伦敦1967年版。

M·列布曼：《俄国革命》，伦敦1970年版。

R·佩希布里奇编《俄国革命目击记》，伦敦1964年版。

R·派普斯：《苏联的形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4年版。

M·普赖斯：《我对俄国革命的回忆》，伦敦1921年版。

A·拉比诺维奇：《革命的序曲：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人和1917年7月起义》，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68年版。

O·拉德基：《1917年俄国立宪会议选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0年版。

——《布尔什维主义在农业上的祸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们的诺言和违诺(1917年2月到10月)》，纽约1958年版。

J·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纽约1935年版。

J·L·斯内尔：《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载《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11卷第1期，1956年。

N·苏哈诺夫：《1917年俄国革命目击记》，两卷本，伦敦和纽约1955年版。

L·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三卷本，伦敦1967年版。

R·韦德：《俄国寻求和平(1917年2月到10月)》，斯坦福1969年版。

## 第八章

# 192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 战时共产主义

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即党和国家的作用和职能；一个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奠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经济问题是基本的，并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许多重大争论的实质。特别是在1921和1923年西欧革命失败以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更加转向国内问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最后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都是用来回答落后的农民国家如何发展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革命后的经济问题，以前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头开始，意味着内战的创伤必须更彻底地医治。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感到突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前指望革命具有理想的国际性，指望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从而会帮助他们克服由于本身落后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经济措施是相当温和的：有选择的国有化、八小时工作日、在平等的基础上将国有化土地在农民中按个体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偶然出现的和半自发性的工人管理制度。

然而到1918年春，经济形势已趋恶化。工人管理使得因连年

战争而枯竭了的经济变得更加混乱。列宁面对这一威胁性混乱，提出了明显以德国战时经济为榜样的、被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就是新经济政策所实行的退却的短暂前奏。它包括如下双重努力：既通过加强劳动纪律、实行工资奖励和树立管理权威以取得对经济更加集中的控制；又与较大的金融势力相妥协，换句话说，“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sup>①</sup>并试图采用同旧经济秩序妥协的权宜之计。

到1918年夏，内战爆发使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已经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无法坚持下去。只是为了苏维埃政府的生存，才实行了以“战时共产主义”著称的极端的国家控制。战时共产主义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由于1918年6月实行的全面国有化法令几乎使所有的大企业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有化程度有了巨大的提高。加上战时封锁和俄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被敌人占领导致的燃料和原料严重匮乏，更使得政府的干预甚至必不可少。国家垄断贸易又使政府的官僚主义必然加剧。第二，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使有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层陷于破产（工人由于以实物支付还有些保障），从而表明政府不能靠多发行货币来增加其财力，而必须要求农民保障供给。这样就失去了中农的支持而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第三，内战的压力一解除，就把复员的红军部队派去执行各项紧急任务，这些劳动力在上级指派的工会官员的纪律约束下，便部分地军事化了。

这些严厉政策得到布尔什维克所有领导者的支持。托洛茨基是其中最乐观的一人。他竟能在1920年初把注意力从军事问题上转到劳动问题上来，而成为大力鼓吹劳动军事化的人之一，把劳动军事化说成是落后国家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分娩的、必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224页。



不可少的阵痛。但是，托洛茨基并不是仅有的一人。布哈林在1920年发表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经典性的理论辩护。他在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和作为其崩溃标志的世界大战之后，终于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宣称革命时期难免对生产力会有最初的破坏。布哈林与希法亭之间发生了争论。希法亭曾说，无产阶级接管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能控制德国的经济。布哈林则坚决认为，“同所有革命一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伴随着生产力下降”<sup>①</sup>——这是使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聊以自慰的观点。布哈林还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即革命后的俄国比其他国家更少受到客观的限制<sup>②</sup>。而这与他那赤裸裸的强调强制的必要性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这听起来好象自相矛盾：无产阶级的一切强制形式，从各种机构到强迫劳动，正在形成一套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素质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性的方法。”<sup>③</sup>

这一观点还同强调国家包揽一切的作用结合起来：

“工会的国家化和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是由改造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劳动机构各个最小的基层组织必须使自己成为总组织进程的代理人，共同接受工人阶级的集体理性有计划的指导和领导，其具体化身就是最高的和最全能的组织，即国家机器。这样，国家资本主义制便向其对立面辩证地转化，变成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

---

①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纽约1971年版第58页。

② 在这方面，应该提及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入门》一书。这本书是1919年出版的，尽管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趣味，却十分流行，而且集中体现了对战时共产主义所持的英勇的乐观主义。

③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160页。

式。”<sup>①</sup>

列宁仔细阅读了布哈林的这本书，并对它进行了评论<sup>②</sup>。尽管不赞成某些术语，但列宁基本上确实赞成布哈林的观点，而且特别赏识他那令人咋舌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一章。<sup>③</sup>

## 新经济政策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不可能持久。原以为在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某些方面，战时共产主义会重新得到更为持久的体现，但到1921年初，它除了显然使国家的经济问题恶化而外，未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权自身将处于危险之中。喀琅施塔得叛乱正好发生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这决不是一种巧合；内战行将结束，使采取极端措施失去其直接的理由。持续了七年的新经济政策是从1921年3月开始的，当时用一定份额的实物税取代了余粮征收制，使农民能保留其剩余产品。这又导致取消自由贸易的限制和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市场关系。实行了一定数量的非国有化，但仅限于小企业；工业则按托拉斯组织起来，并享有有限的市场独立性。1921年11月，国家银行重新开放，硬通货政策被采纳，到1923年卢布稳定下来。

---

①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79页。

② 这些引人注目的评论作为斯大林发动对布哈林的攻讦的组成部分于1929年首次发表，现作为附录重载于同上书第212页以下。

③ 当时有一种不同的国家观，参看E·帕休卡尼斯1924年写的颇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法的一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伦敦和纽约1978年版。该书已超出其表面上关于法律理论的主题。作者坚持认为，法律形式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他还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对服从法律的崇拜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是并行不悖的。

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根据列宁的倡议采取的。列宁尽管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这一转变做了些辩解<sup>①</sup>，但很快就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继战时共产主义失误之后重新恢复1918年初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提到最后三年时，他写道：“‘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sup>②</sup>几个月后，他说，战时共产主义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sup>③</sup>同时，列宁继续把新经济政策称为“退却”，即意味着在发动一次新进攻之前临时重新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列宁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只看作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sup>④</sup>，目的在于同农民建立一种经济上稳定的联盟，他甚至暗示联盟将为期十年<sup>⑤</sup>。这种过渡性的混合体制或称国家资本主义，其特征就是渐进主义，即“目前我国革命的新东西，就是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sup>⑥</sup>。他还说：“与原先的革命的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是一种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尽可能少破坏地、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sup>⑦</sup>

布哈林最初有些犹豫，后来他变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阐述者之一。他承认他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虽足以破坏旧制度，但不足以建设新制度。他为新经济政策的渐进主义辩护的理由

---

① 参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2卷第394页以下。

② 同上书，第333页。

③ 同上书，第33卷第43页。

④ 同上书，第32卷第421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424页。

⑥ 同上书，第33卷第86页。

⑦ 同上书，第87页。

是：无产阶级（不同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刻是落后的，只能在革命后的社会里趋于革命的成熟；而这个社会将由一个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党来加以控制。（布哈林曾担心甚至谈到，这会导致可能出现“新阶级”的危险。）

托洛茨基虽然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前一年极力主张过改行实物税，但是他并没有附和新的经济政策。他在实施伊始就宣称反对新的经济政策，并且不同意战时共产主义是国外形势强加于俄国的失误观点。他承认新的经济政策在农业中获得的成功，但认为它在解决工业化的主要问题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的确，新的经济政策实施之初标志着托洛茨基整个影响的下降。这方面有一个实例，即1921年初党内发生的关于工会作用的大辩论。托洛茨基有鉴于工人反对派力争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恢复工人对工业的管理，并在内战接近结束时体验到工会难以对付之后争辩说，应当剥夺工会的自治权，并将其归并入政府机构内。列宁把托洛茨基的主张称为对工会的“官僚主义折磨”而加以反对，并寻求一项保证工会自治权的折衷方案。托洛茨基的观点尽管得到布哈林的支持，但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仍被彻底地否决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热衷于使党愈益成为铁板一块。1919年3月，五人政治局重新设立，它的前身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战也要求许多重大决定只能由少数人作出，而二十七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则很难驾驭。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组织局和一个书记处，而唯有斯大林一人是所有这四个机构的成员。随着经济政策的更加自由化，就更有必要加强严格的政治控制。因而代表大会强烈谴责了工人反对派，并禁止党内派别的存在。然而，由于列宁患病和逝世，集体领导的某些形式还是必要的，尽管它存在着固有的不稳定性。党既然日趋铁板一块，便使当权者更容易加强其统治。随着列宁失去工作能力，斯大

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必然组成为一个反对托洛茨基的联盟，而托洛茨基当时仍然是最有声望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对于他可能被排除出权力之外没有作出反应。他既没有利用列宁对斯大林进行的及时而无情的批评，也没有不失时机地支持党内的民主事业。只是到了1923年底，列宁处于垂危之际，权力的天平已决定性地向不利于托洛茨基的方向倾斜时，他才打破沉默，在《新方针》这本小册子（其中已包含有后来他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所详尽阐述的全部重大命题）中，号召党组织的民主化和党内言论自由，同时还谴责了个人统治和官僚主义倾向。但是，托洛茨基影响的衰落还取决于下述比政治局内部斗争更重大的因素。内战已经结束，军事人民委员部不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托洛茨基的特殊行政才干也不再需要了。在政治局委员中，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主义后期吸收的成员，势单力薄，在党组织中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欧洲革命的可能性（托洛茨基特别予以重视）也在减小，而整个国家已经被以托洛茨基为象征的“英雄”时代弄得筋疲力竭，正渴望着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建设的时期。平凡得多的经济问题已开始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

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正如托洛茨基指出，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这一根本问题。在需要增加资本来发展经济同需要发展工业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而农业是前者唯一的源泉，后者则只有牺牲农业才能做到。对经济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究竟应该是农业还是工业这个问题，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是，农业部门购买力的提高是工业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相反，托洛茨基认为，不扩大工业品的交流，粮食和原料的生产必将下降。这两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意见分歧。那时注重务实的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取决于军事需要的权宜之计，而深受布尔什维主义英雄传统鼓舞的

人则认为那是一场尽管尚不成熟、但正是直奔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旦条件许可，它就会重新发展。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首先在看待 1923 年出现的所谓“剪刀差”危机上明显暴露出来。“剪刀差”危机因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而形成，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家工业占垄断地位并有能力在同农业部门的贸易中取得有利条件。布哈林作为反托洛茨基联盟的发言人坚持认为：繁荣的农民经济是工业复苏的先决条件，任何其他政策将损害同农民的有历史意义的联盟。为了扩大眼前农民的生产，也为了提高工业本身的效益，必须降低工业品的价格。这样就能通过国家工业利润的日益增长、通过对繁荣的农业部门实行征税和富裕农民或富农的储蓄，获得进行投资的资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是相反观点的主要代表。他显然重视生产而不重视流通，因而认为只有私有成分即农民，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本。他在 1924 年出版的《新经济学》一书中宣称，有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也就有反对私人积累的必要。他给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所下的定义如下：

“一个正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转变的国家愈在经济上落后，即愈适应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则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能为社会主义积累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小；其社会主义积累势必有赖于从社会主义以前经济成分的剩余产品中提取的份额（在比重上）愈大，它靠自己生产进行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就愈小，也就是说，它将愈加无法依靠社会主义工业中工人的剩余产品来积累资金。”<sup>①</sup>

不发达的工业成分既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国家便不得不向农民榨取，正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向各种非资本主义成分榨取资金一

---

<sup>①</sup> 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巴黎 1966 年版第 180 页。

样。因此剪刀差危机不仅受到欢迎，还通过国家干预使之保持下去。在过渡时期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在争夺优势的紧急关头，速度是根本问题。正是经济形势的这一特征，要求采取大规模地把来自农业的剩余价值转到国家所有制成分中去的办法来加紧工业化，而不管党的领袖们愿意与否。托洛茨基基本上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尽管他否认他希望剥削农民，并且显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积累可以在一种孤立的经济中进行的观点。尽管斯大林出于政治目的而很想利用左派明显的反农民倾向，但他在这场争论中最初并没有攻击任何一方，只是在他获得了无懈可击的支配地位之后，才把借自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某些原理，塞进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

## 一国社会主义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成功有多种原因：国际风云对革命不利，特别是1923年萨克森和汉堡起义的失败，助长了俄国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可靠，甚至应受一定程度的蔑视，因为与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相比，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能耐的。由于整个国家在反击外来侵略和内战的几年中被弄得疲惫不堪，因而渴望着某种发展经济的政策，而一国社会主义论似乎提出了一个追求经济目标的明确而乐观的方案。此外，还存在着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独立的自豪感来作为进一步追求经济目标的诱导因素。

一国社会主义源出于布哈林为新经济政策的辩护，是保证俄国能以自己的资源“长入”社会主义的一种孤立主义的说教。斯大林皈依这一教义则事出偶然。他迟至1924年4月还这样认为：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

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sup>①</sup>

在192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才第一次阐述了这一理论。在这里,他从列宁关于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言论中引申出如下结论:

“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sup>②</sup>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由于被说成是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抱悲观主义,便相形之下被斥为“孟什维主义的变种”。斯大林曾承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确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在《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1月)中,他用如下的话来更有力地表述他的理论:

“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sup>③</sup>

其附言的调子较为缓和: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即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

---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321页。

③ 同上书,第8卷第64页。



复辟的完全保障”<sup>①</sup>。

斯大林经常把一国社会主义称为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从列宁1915年反对托洛茨基欧洲联邦口号的声明中援引一段话，来对这一理论作自我标榜：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sup>②</sup>

斯大林还提到列宁1923年写的《论合作制》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过，“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是“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sup>③</sup>。

然而，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发明花言巧语地归之于列宁，这是显而易见的。列宁曾经明确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sup>④</sup>这是他多次重申并符合他整个思想的声明<sup>⑤</sup>。

毫无疑问，一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布哈林。他根据列宁的晚期论述论证说：“甚至在这种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以爬行的速度前进，但……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会建成它。”<sup>⑥</sup>新经济政策将导致社会主义，因

---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65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321页。

③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682页。

④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134页。

⑤ 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著作中较之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能找到更多的东西来支持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参看K·拉蒂亚维：《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巴黎1975年版第148页以下。

⑥ 引自S·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5年版第187页。

为在苏联社会中，上层建筑调节着基础。掌握经济命脉（特别是控制了信贷）将引导着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包括农业）向社会主义发展。西欧资本主义即使没有从俄国市场受益也已经稳定了，因此俄国不得不在孤立中发展。更加集中地使用现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将降低工业品价格，有利于农业部门。布哈林最着重强调的是农业部门。富裕而精明强干的农民——富农将通过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据此他向全体农民提出了一个受到许多非难的口号：发财吧！

托洛茨基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由于受到斯大林的讽刺与丑化，有点搞得模糊不清。斯大林把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对苏联内部前景悲观而寄厚望于不切实际的国外冒险活动。托洛茨基曾白费力气地抗议说，他以前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与当前形势无关，因此与这场辩论也无关。的确，托洛茨基早期的著作并没有排除一国社会主义的某种可能性。内战一结束，托洛茨基所倡导的以经济孤立为基础的政策就非常近似一国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到1925年表述的观点仍可看成是回复到托洛茨基1920年倡导的自力更生观点。只是到了1926年，托洛茨基才向斯大林的主张挑战，尽管季诺维也夫早就这样做了。托洛茨基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事过各种经济任务，因而确信只有同世界经济重新结合，俄国才能扩大她的资金总额<sup>①</sup>。托洛茨基在放弃他1921—1923年的观点时争辩说，欧洲的衰退及其为新的出口而斗争将变得对俄国有利，因为她可以很容易为谷物业进口机器；俄国应该鼓励租让的申请并欢迎外国投资。这样，俄国的经济将不致于缓慢发展到布哈

---

<sup>①</sup> 参看R·戴伊：《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剑桥1973年版第1—3章。

林所说的“爬行速度”。托洛茨基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书中,强调了他同斯大林的保护主义有根本分歧:

“如果我们突然把资源转到……新机器的制造上,我们要末将破坏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甚至一个部门内部基本资金和流动资金之间的必要比例,要末将为保持必要的比例而大大降低整个发展的速度。对我们来说,发展速度的下降要比从外国进口我们通常需要的机器和商品危险得多。”<sup>①</sup>

托洛茨基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在政治上分裂为两个阵营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分裂;俄国应准备从国际分工中得到好处。换句话说,托洛茨基所反对的并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漠视整个世界经济妄图在单独一个国家中发展社会主义。但是,托洛茨基的主张不只是一种经济主张。他在《共产党宣言》以来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势力的推动下,并没有放弃俄国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他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似乎偏离了党的整个国际方针,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感到绝望。英一苏委员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鼓励同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合作并直接反对革命。同样的失策是同中国国民党的灾难性合作。然而总的说来,党内采纳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观点的越来越少。使托洛茨基作茧自缚的是他自己宣称的观点:“归根结底,党总是正确的。”<sup>②</sup>此外,他在1920年反对考茨基的论战性著作《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实际上把公理和强权等同起来。托洛茨基日益孤立,尽管在1926年他最后挣扎时企图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

<sup>①</sup>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伦敦1976年版第43页以下。

<sup>②</sup> 引自I·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1921—1929年的托洛茨基》,牛津1959年版第139页。

起重整旗鼓，结成一个反斯大林的联合反对派，但他还是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赶出莫斯科，1929年被赶出俄国。

## 艺术和哲学

十月革命前，党对艺术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观点。1905年，列宁写道：

“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sup>①</sup>

但是，这只是就党内人士而言，并不是提倡针对非党人士的检查制度。与十九世纪文学相反，革命时期的主要流派都着重于考究形式而不是内容。因此，他们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拍即合的，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尤其是未来派及其主要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革命是满腔热忱的。为弥补这一缺陷，于1917年创立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党，它的策动者是列宁的哲学宿敌波格丹诺夫。它还得到了新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真理报》编辑布哈林的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具体培植无产阶级的艺术形式来领导文化（相对于政治或经济而言）革命为己任。1920年，它创建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尽管无产阶级文化派完全符合战时共产主义的艰苦创业精神，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却成了它的末日。列宁尖锐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领袖们的观点：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0卷第25页。

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sup>①</sup>

1922年,对公开非议官方路线者实行的一般检查制度出现扩大化。卢那察尔斯基写道:

“检查制度甚至必须加诸于纯文学,对此我们决不迟疑,因为在纯文学这面旗帜和这副漂亮的外表之下,毒药可能被灌输到广大人民天真的和蒙昧的心灵中去。这个心灵是易受波动的,并且由于前进途中的困难太大,容易摆脱指引它通过茫茫荒野到达希望之乡的那只手。”<sup>②</sup>

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最精辟的批评来自文学方面最有才干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否定“马克思主义”艺术的存在,正如他曾否定内战期间某些人提出的“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的概念一样。同样地,不能抛弃过去的文化成就。托洛茨基宣称:“不首先吸收和同化旧文化的要素,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开始建设新文化。”<sup>③</sup>在反对那些想用无产阶级文化取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人时,托洛茨基写道:

“把资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同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永远不会存在,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伟大的道义力量正来源于以下事实:它为一种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真正第一流的人类文化打下了基础。”<sup>④</sup>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54页。

② 引自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卷,伦敦1953年版第65页。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安阿伯1960年版第226页。

④ 同上书,第14页。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任务是“把现有文化的基本要素传授给落后群众”<sup>①</sup>。党对待艺术问题,一般说来都应当慎言,因为“艺术领域并不是要党去发号施令的领域”<sup>②</sup>。但对那些积极反对革命的人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在艺术领域中应该有警觉的革命检查制度和广泛灵活的政策,以免受到卑鄙的和宗派的恶毒偏见的影响”<sup>③</sup>。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论获得胜利,托洛茨基的观点受到了特别是来自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的攻击。攻击的主要根据是,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否定在革命前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之间留下了文化真空。直到1929年为止,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艺术的关系这一争论一直是很活跃的。1929年,随着斯大林的“向左转”,党加强了对文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以1930年初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为标志的独立文学创作的终结。

虽然在艺术上马克思主义没有传统的理论,但哲学上情况就不同了。自从恩格斯以来,马克思主义拥有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它的重要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再次加以强调。在革命时期,庸俗唯物主义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对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两种微妙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自称继承了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短文中所提出的有关哲学的最后指示。列宁在短文中论证了哲学家应该同自然科学家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联盟,以及他们应该创立一个“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sup>④</sup>。上面谈到的两个学派,根据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究竟强调辩证法一面还是强调唯物主义一面,而终于以机械论者和德波林主义者著

---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安阿伯1960年版第193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③ 同上书,第221页。

④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205页。

称。机械论者有其主要代言人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后者在列宁的遗嘱中被指责为“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sup>①</sup>。他们认为哲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切科学的方法。其次，他们相信，一切运动都是外在的、外来的。每一事物都是一个统一体，并且没有内部矛盾。布哈林说过，运动是从外面产生的，并且提出均衡论来解释各种联系：

“世界上存在着起各种作用的互相对立的力量。这些力量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暂时保持均衡。于是就有一种‘静止’状态，即这些力量实际的‘斗争’隐蔽起来了。但是只要改变了其中的一个力量，‘内在的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平衡遭到破坏；如果新的均衡重新确立起来，这种均衡就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即各种力量新组合的基础上等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斗争’、‘矛盾’即向不同方向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对抗，决定着这个体系的运动。”<sup>②</sup>

第三，机械论者实际上贬低了质的飞跃的思想。按照他们的说法，一切比较高级的现象原则上都能还原为比较简单的和低级现象。就布哈林来说，这些哲学观点完全符合他在经济学中的决定论和渐进主义主张，而且也完全符合整个新经济政策的观点，不过还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尽管很少涉及哲学，却也是一个机械论者<sup>③</sup>。

德波林主义者得名于科学院士、哲学教授阿布拉姆·德波林。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独立的地位；自然界是辩证的，在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之中，矛盾是固有的。因而他们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6卷第617页。

②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纽约1925年版第74页。

③ 参看托洛茨基1925年对化学家门捷列夫评论（《全集》第21卷，第268页以下各页），以及，特别是他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73年）第44页以下和第73页以下各页。

强调存在着辩证的飞跃，并否认精神可以还原为物质。1925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问世和1929年列宁《哲学笔记》的出版，帮了德波林主义者的忙。他们还由于布哈林在政治上垮台后，他的机械论在1929年受到了正式的谴责而得到了好处。然而，如果说机械论是右倾的话，德波林主义很快就同“左”倾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被指责为哲学上的政治中立，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过低估计列宁，过高估计黑格尔和普列汉诺夫，并于1930年最终被贬斥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在哲学问题上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斯大林的意见已成为至高无上的了。

## 参考读物

### 1920年代的俄国

基本教科书是卡尔的多卷本历史。贝特兰的两卷本《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提出了新的毛主义的解释。卢因的《俄国农民和苏维埃政权》对农民问题作了最基本的论述。关于工业化问题，参看厄利奇和贾斯尼的著作，以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和戴伊的暴露性著作《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布尔什维克党之日益成为铁板一块，在夏皮罗的《共产主义独裁的根源》和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中有很好的描述。关于以工人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工人的命运，参看卡普兰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苏联工人的道德观》和布林顿的《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管理》。艾弗里奇的书充分论述了喀琅施塔得的转折点，而菲茨帕特里克《启蒙人民委员会》对文化问题写得好。布哈林的《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过渡时期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主要著作都有单行本。科恩的大部头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未来的很长时期中将是一部主要的评注。有关这个时期托洛茨基的原著以及论述他的著作，参看本书第六章所列书目。



## 文献目录

### 1920年代的俄国

P·艾弗里奇:《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70年版。

Ch·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第一时期,1917—1923年》,萨塞克斯郡哈索克斯 1977年版。

——《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第二时期,1923—1930年》,同上 1978年版。

C·布莱克编《俄国社会的改造》,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0年版。

F·博克瑙:《世界共产主义》,安阿伯 1962年版。

M·布林顿:《布尔什维克和工人管理(1917—1921年):国家和反革命》,伦敦 1970年版。

N·布哈林和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入门》,伦敦 1924年版。

N·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纽约 1927年版。

——《过渡时期经济学》,纽约 1971年版。

——《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社会学的体系》,纽约 1925年版。

——《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纽约 1929年版。

E·卡尔:《无人主政时期(1923—1924年)》,伦敦 1954年版。

——《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年)》三卷本,伦敦 1958—1964年版。

E·卡尔和R·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1926—1929年)》,三卷本,伦敦 1969—1978年版。

E·卡尔:《俄国革命从列宁到斯大林(1917—1929年)》,伦敦 1979年版。

S·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 1975年版。

R·丹尼尔斯:《革命的心:苏俄的共产主义反对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0年版。

R·戴维斯:《苏俄的工业化》,两卷本:第一卷《社会主义的进击(1929—1930年)》;第二卷《苏联的集体农庄(1929—1930年)》,伦敦 1979年版。

- R·戴伊:《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剑桥 1973 年版。
- J·底格拉斯编《共产国际(1919—1943 年)》,伦敦 1956 年版。
- A·厄利奇:《苏联工业化的争论(1924—1928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0 年版。
- S·菲茨帕特里克:《启蒙人民委员会:苏联的教育组织和卢那察尔斯基指导下的艺术》,剑桥 1970 年版。
- D·富特曼:《俄国的内战》,伦敦 1961 年版。
- S·海特曼:《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载 L·拉贝兹编《修正主义》,伦敦 1962 年版。
- N·贾斯尼:《二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纽约 1972 年版。
- F·卡普兰:《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苏联工人的道德观(1917—1920 年):形成时期》,伦敦 1968 年版。
- A·卡弗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一篇关于苏联经济思想的论文》,载《苏联研究》第 3 期,1953 年。
- M·卢因莱文:《俄国农民和苏维埃政权——对集体化的研究》,伊利诺斯州艾凡斯顿 1968 年版。
- R·派普斯:《苏联的组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4 年版。
- 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新经济政策到社会主义:俄国和欧洲的未来一瞥》,伦敦 1962 年版。
- 《新经济学》,牛津 1965 年版。
- 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剑桥 1971 年版。
- L·夏皮罗:《共产主义独裁的根源:苏联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第一阶段,1917—1922 年)》,伦敦 1955 年版。
- R·塞维斯:《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伦敦 1979 年版。
- J·索伦逊:《苏联工会主义的生存与死亡(1917—1928 年)》,纽约 1969 年版。
- N·斯普伯:《苏联经济增长的战略》,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 1964 年版。
- A·惠廷:《苏联的对华政策(1917—1924 年)》,伦敦和纽约 1954 年版。

## 第九章

# 斯大林主义

### 工业、农业和党

斯大林的创新是使一切(包括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方面和党组织本身)服从于以牺牲农业部门为代价的迅速重工业化这一目标。1920年代中期,斯大林曾经肆意嘲笑过托洛茨基那样的“超工业化派”,后者提出俄国的产量应每年增加大约百分之二十。但是,在1929年年中,基本投资的拨款突然增加高达五倍之多,并且作出了实行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决定。这个壮举只有一个团结的党才能实现,而在此以前的两年中,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发生了最后一次大辩论。这次辩论是在以下两伙人中进行,一伙人主张在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苏联经济,他们的主要代表是布哈林;另一伙人主张绝对优先增加工业生产,这就是斯大林的方针,尽管要证明这个方针多么偏激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两个因素加速了党内危机:其一是,到1929年工业生产率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因而必须商定发展的计划。而定于1929年春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处于酝酿阶段。其二是,1927年底和1928年初粮食供应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工业品越来越缺乏,这意味着可以和农民交换剩余产品的东西越来越少。

在危机面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而政治局却分裂了。布哈林

维护已经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也是反对托洛茨基的)正统做法,即按美国模式发展农业以求得进步。1928年1月,他勉强同意了夺取富农手中剩余产品的带有惩罚性的临时措施。事实上,由于这些措施是由斯大林所控制的各级党机关执行的,斯大林能够使这些措施比政治局已批准的决定猛烈得多,同时他自己却抱怨后者“过火”。

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布哈林及其伙伴们一开始就碰到了厄运。他白费工夫地一再引证列宁后期论合作制的文章,并强调列宁是多么重视维护同农民的联盟。实际上,布哈林既不反对集体化,只是坚持集体化是一个长远目标,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储备等等为其先决条件罢了;也不反对有计划的工业化,只要求工业化是逐步而灵活的。但是,“右倾反对派”(这完全是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绰号)之所以一蹶不振,就在于这次斗争是在斯大林牢固控制的党的最高机关中进行的。“右倾反对派”曾得到农村群众甚至城市工人的有力支持,但因他们以前谴责过宗派主义,并在两年前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时如此卖力地以团结和遵守党的决定要求过对方,因而妨碍了他们去利用群众的支持。斯大林对党的机器的控制当时已处于压倒的优势,同时党员人数从1924到1928年增加了三倍,的确使党的性质本身发生了根本变化。比较一般的看法是,右派总与悲观主义有联系,而斯大林直到1929年年中以前,一直是以中间派人物的面目出现的,有一套解决农村问题的强有力办法,包括起用越来越多的务实的行政官员。到1928年7月,右派未能说服中央委员会,并失去了他们在政治局的潜在多数。同情布哈林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被解职,和托姆斯基被逐出工会领导岗位,标志着右派已完全势孤力竭。既然布哈林把斯大林的政策描绘为朝着沙皇政权的“军事封建”剥削倒退,分裂也就无法避免了。

于是斯大林对党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他推行的政策也更激进了。整个1928年粮食供应问题依然存在，而就在这年夏天他还拒绝发动农村阶级战争和剥夺富农的主张（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集体化农户只占百分之二十），可是1929年下半年内，一场迅猛的变革便明朗化了，这是斯大林的“自上而下革命”的先兆。斯大林越来越独断专行，同农民的关系恶化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个人崇拜”也就随着政府在集体化运动中面临各种明显的困难而逐渐形成起来。在共产国际内部，同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政策（以前曾遭到托洛茨基的猛烈批判）也被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人被当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甚至认为是比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更大的敌人。

1929年12月，蕴蓄已久的风暴突然爆发了。斯大林在一次同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问题专家的谈话中宣布，党“最近已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sup>①</sup>。他接着又说：“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sup>②</sup>他作的下述结论简直是置千百万人于死地的声明：“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sup>③</sup>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从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混乱和弊病普遍存在，于是斯大林下令停止前进。到1930年9月，所占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一。但是到1930年底，再次超过百分之五十，而到1934年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这场大折腾导致大约一千万

---

①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同上。

人被放逐，并引起广大农民阶层而不限于富农的激烈反抗；其实富农本身是一个模糊的名称，它不超过农民的百分之四。党的干部对于政策的急剧改变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尽管政府终于牢固地控制住了农业部门，坚决要维持甚至扩大为城市征购的粮食数额，却导致饿殍载道，几百万人死亡。农业生产花了许多年才恢复到19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一半以上的牲畜被绝望的农民屠宰掉了），但是，1930年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却就此奠定了牢固的基础。<sup>①</sup>

尽管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控制的决定贯彻得很迅速，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一步骤的先决条件却是逐渐形成的。整个1929年，城市的粮食供应一直处于困难状态，并引起了普遍的骚乱。由于农民更加反对政府的要求，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一些粗暴的作法，比如说对不能或不愿完成定额的人停止供应工业品，只能使关系更加紧张。斯大林为他的所谓“伟大的转折”提供的理由是：在工业部门，特别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劳动生产率已有所提高，同时集体化农业成分虽比负隅顽抗的个体所有者略逊一筹，但它所提供的粮食供应也有了改善。在意识形态上，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激烈的观点。更确切地说，他感到只有通过农业的正面进攻，才能保护工业化的虚弱勢头。老布尔什维克顾虑农民成为异己的绊脚石的心情仍然很浓重，这就很容易重新导致内战的气氛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随着农业实现集体化，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计划经济结构便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在对待党的政策上作出的反应同样是很激烈的。1930

---

<sup>①</sup> 回想起来有点啼笑皆非的是，在1902年关于党纲的争论中，列宁曾经说过，如果农民不接受无产阶级的建议，那么“当专政建立时，我们将对你们说：‘你们既要动武，就用不着浪费语言了’。”维拉·查苏利奇对此加了批注：“就靠几百万人！你试试瞧！”见L·夏皮罗：《苏联共产党史》，伦敦1970年版第47页。

年代后期的清洗可以看作斯大林在政治上对其经济政策的配合。尽管清除布哈林分子削弱了党，但是许多托洛茨基分子被及时吸引回来支持斯大林的左转。1934年年底暗杀基洛夫，为大清洗发出了信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第一批作为政治反对派被审讯和处死的人中的两个。以1938年对布哈林的审判为顶点的几次公开审判，实际上消除了任何选择政府的可能性。对此，多伊彻做过这样的简要描述：

“在历次审判庭中，前列宁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除斯大林本人和托洛茨基以外，全都在场。而托洛茨基虽不在场，却是主要的被告。而且在被告中，有一位前任总理，几位副总理，两位前任共产国际首脑，以及工会首脑（托姆斯基在审讯前已自杀），还有总参谋长，军队的首席政治委员，所有重要军区的最高司令员，几乎所有苏联驻欧洲和亚洲的大使，最后还有也不算小的两名政治警察头目。”<sup>①</sup>

政府人员从上到下被撤换。大约杀死了三百万人，以致1939年见到的出席过1934年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只占百分之三，而且，上届中央委员有百分之七十已被枪毙。一批新的行政人员填补了清洗后的空缺。尽管有一部“民主的”1936年新宪法，却连形式上民主的表面文章也不曾做——在斯大林统治的漫长岁月里，只开过四次党代表大会和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 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委婉地说，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敏锐的头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九项流传很广的创新他应该负责。他精心制定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已在前面详细提到。把斯大林的理论加

---

<sup>①</sup> I·多伊彻：《斯大林，一部政治传记》，哈门德斯沃兹1966年版第368页。

以概述的主要教科书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于1938年问世，并连续近二十年被当作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权威著作。《教程》包括几项创新：首先，斯大林颠倒了恩格斯论述的顺序，在论述哲学之前论述了辩证法。斯大林主要依靠恩格斯的后期著作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起来，并给辩证法作了这样一种明确的表述：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切现象都处在运动的状态中，运动可能突变，而且量变引起质变，最后，矛盾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主要特征则被表述为：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物质是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以外并独立于我们的精神的本原的客观实在，精神则是物质的从属的反映，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把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以上两点，因而尽管谈到了对立面的互相渗透和量转化为质，却一点也没有谈及否定之否定规律，其政治含义是很明显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刻板地分割开来。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斯大林认为应当重视观念的作用，它不可能仅及于其所由产生之处，因而故意强调了观念的重要性。尽管新观念的产生有待于物质的适当发展，然而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 and 意义……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即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sup>①</sup>

斯大林在1939年又进一步对观念作了强调，他宣称：

---

<sup>①</sup> 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版，第130页。



“在苏联,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象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sup>①</sup>

斯大林还把“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新奇的概念用之于苏联。在谈到剥夺富农时,斯大林写道:“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直接支持。”<sup>②</sup>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出现,尽管阶级依然存在,但是没有一个阶级压迫其他的阶级,所以它们被确定为“非对抗性的”。新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有助于说明国家还不可能消亡。斯大林宣称,甚至到共产主义时期(苏联仍未能达到)国家也将继续存在,“除非资本主义的包围已不存在,外国军事进攻的危险已被消除”<sup>③</sup>。

战后一次范围广泛的“哲学讨论”使人们对哲学问题又产生了兴趣。这次讨论以谴责亚历山大罗夫的《西欧哲学史》过于“客观主义”而告结束。讨论主要是根据斯大林在一切知识领域中的发言人日丹诺夫的倡议进行的。斯大林还亲自干预,支持李森科反对孟德尔的遗传学观点,以致这种干预后来在学术界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但是,斯大林创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1950年语言学争论的表态,他谴责了苏联最卓越的语言学理论家马尔的观点。马尔曾坚持,语言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与阶级发展相联系的各种语言体系之间,显然存在着互不相关的质的区别;形式的和逻辑的思维应由辩证唯物主义所取代;直到最后,

“思想比语言更占优势,在新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思想将一直比语

---

① B·富兰克林编《斯大林著作精华》,纽约1972年版第367页。参看《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237页。

② 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版,第336页。

③ 《斯大林著作精华》,第387页。

言更占优势。在新的无阶级社会里，才能废除口头语言体系，并创造出一种单一的语言；音节语言与单一语言的距离，就象手势语与音节语的距离一样远，甚至更远。”<sup>①</sup>

相反，斯大林坚持，语言是整个人类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创造物；语言是逐渐地、而不是跳跃式地发展的；从语言从来不可能与思想分离这一现象来看，马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更概括地说，斯大林为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讨论开辟了道路。他再次宣称：

“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sup>②</sup>

他重申了他的非对抗阶级论，实际上否认量和质的规律适用于苏联。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sup>③</sup>

斯大林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sup>④</sup>更一般地说，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只限于它们被提出的那个时期。斯大林自己的某些论点看来可能就与

---

① 引自G·韦托尔：《辩证唯物主义》，伦敦1958年版第196页。苏联对语言学的最有创见性贡献，写于1929年，参见V·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纽约1973年版。

②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521页。

③ 同上书，第539页。

④ 同上书，第525页。

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抵触,但是

“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象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sup>①</sup>

这些理论上的创新和斯大林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出现虽然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思想,却激发出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贡献,即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批评。这连同他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卓见的分析一道,是他在流放中的主要钻研成果。的确,斯大林曾借用托洛茨基(更确切地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1920年以来所持的几个观点,以致布哈林竟过火地把斯大林的政策称为“在意识形态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彻底投降。”<sup>②</sup>但是,托洛茨基并不同意斯大林的经济孤立主义,也不同意他轻视西方革命的民族主义观点,以及他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见解。因此,托洛茨基面临着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苏联归类这个问题。他把官僚主义现象作为他分析的中心(马克思本人曾经多次谈到官僚主义现象<sup>③</sup>)。虽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暗示过,官僚主义问题能够通过政治和行政措施

①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558页。

② 引自S·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5年版第311页。

③ 例如,参见I·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官僚主义》,载《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纽约1971年版第204页。

来解决，但托洛茨基不同于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扎根于俄国的社会和历史环境，是落后的产物。在《被背叛了的革命》（写于1936年，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中，他写道：

“官僚主义统治的基础是消费品的匮乏以及由此产生的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的争夺。当商店有足够的商品时，顾客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来购买。当商店没有多少商品时，顾客被迫排队购买。当队伍很长时，需要指派一名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主义政权的出发点。”<sup>①</sup>

然而，对于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避免出现官僚主义这一合乎逻辑的问题，托洛茨基从未明确回答过。

托洛茨基在对苏联社会的描述中，拒绝把国有化财产等同于社会财产，因为只有国家财产这种过渡形式消失了，社会财产才能产生。在苏联，所有权的改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在同时出现了巨大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工资级差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时候。那么能把苏联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吗？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的关键性的第九章中，托洛茨基否认了这种说法。官僚阶层并不构成一个新阶级。他们并不象资产者一样拥有生产资料或者积累和世袭他们的财产。官僚阶层尽管得到了充实，在经济结构中却并没有独立的财产来源。因而他们的作用不能当作阶级剥削的例子，而只是一种社会寄生现象。

那么，苏联社会制度的特征何在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它的特征就在于生产力日益社会化和分配日益效法资产阶级方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它是一个过渡的社会，但又未必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它可能朝着两条（也仅此两条）道路发展：走向社会主

---

<sup>①</sup> L·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伦敦1937年版第110页。这个论点在1923年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新方针》中已被简要地提出来。

义或者走向资本主义。旷日持久的官僚主义统治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相似性，托洛茨基苦心孤诣地在俄国找出与热月相同的事件。热月政变标志着雅各宾派的最后失败，并成了波拿巴崛起的前提。1920年代末期，托洛茨基曾经认定热月式的危险来自布哈林和右翼反对派，因为当时他把法国热月政变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这种分析并不适用于斯大林的崛起，因为后者并不意味着阶级之间的权力转移。然而，托洛茨基想把斯大林称为俄国的波拿巴，而到1934—35年间，即在基洛夫遭暗杀之后，托洛茨基则把热月政变看成是革命运动内部权力的转移，即从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富有的少数人。苏联与此类似的事件是，1924年以后权力从无产阶级群众移向官僚阶层和工人贵族。这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内部的一种反动。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的热月式说教。正是在这种见地之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与波拿巴主义的类比：

“拿破仑进一步推行了热月的政策，他不但进行了反对封建世界的斗争，而且进行了反对‘下层民众’和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斗争；他用这种方法，把革命所产生的政权的种种成果都集中在新资产阶级贵族手中。斯大林在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时，不但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且反对劳苦大众的要求，反对他们的急切心情和不满；他粉碎了左派及其所代表的没有特权的劳动群众所固有的符合历史和进步的倾向；他实行工资、特权、地位等方面极为严格的区别对待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斯大林靠这个新社会等级最高层的支持来反对最低层（有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已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不把这个政权称为苏联的波拿巴主义，又该称作别的什么东西呢？”<sup>①</sup>

---

<sup>①</sup>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载《列昂·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纽约1971年版第181页。

这两种波拿巴主义同法西斯形式有十分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是处于危机时刻的政权，它们都通过权力的人格化，使政治已凌驾于社会而取得了某种独立性。在托洛茨基看来，关键的差别在于斯大林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布尔什维克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是旧的垂死阶级的波拿巴主义。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与苏联决裂。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仍然是革命的国家，并且对世界无产阶级是一种鼓舞。因为只有苏联有国有化的财产，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前提条件。苏联尽管蜕化了，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而需要一次政治革命，而不需要一次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还受到他自己下述信念的影响，即同法西斯分子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苏联在这个战争中将需要支持。这些观点开始受到第四国际内部某些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对。尽管第四国际是托洛茨基于1934年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建立的，但托洛茨基分子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把斯大林同苏联区别开来，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整个十月革命的正确性。这一观点在第四国际的美国支部中特别普遍，其中象詹姆斯·伯纳姆和麦克斯·沙切特曼这样一些作家开始论证说，苏联的官僚化是世界官僚化的开端，后者将以合理而有效地生产的名义取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sup>①</sup>。托洛茨基本人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因此就在他临终之前，为苏联想象出第三种选择。在提出即将到来的时代究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呢还是蜕化为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这一问题时，托洛茨基宣称：

“不言而喻，鉴于我们整个时代和当前新战争的经验，如果国际无产阶级表明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希望

---

<sup>①</sup> 参见B·里兹：《世界的官僚化》，巴黎1939年版，以及它的续篇。J·伯纳姆：《管理上的革命》，纽约1941年版。

的破灭,因为不可能想象还有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sup>①</sup>。他还谈到,也许“无产阶级天生地不能成为统治阶级”,也许“根据目前苏联的基本特征来看,它已是新的国际性剥削政权的先驱”<sup>②</sup>。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想象到,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可能正好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原因——这就是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虚弱,以及随之出现的政治处于空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激烈的措施和计划工业的扩展使权力集中并加剧了官僚主义。托洛茨基最后推测的两点并不代表他思想中的主要论点(而且他气愤地否定了那些由这两点妄加推断的人),但是这两点却表明,直到他去世时他的许多结论都是很不确定的。

## 参考读物

### 原著

斯大林毁誉后,《斯大林全集》出至第13卷即停止出版。他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有单行本。富兰克林的《斯大林著作精华》是一部有用的文集,并附有一篇为斯大林辩护的导言。

### 评论

苏瓦林和托洛茨基(都是他们所描写事件的参与者)所写的传记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两部最好的研究成果。费舍说得对:最浅显易懂的是多伊彻公平对待斯大林成就的饶有风趣的尝试。最近问世的有,厄拉姆的一部详尽的叙述性作品,塔克更多地从心理学进行的研究,以及欣克利的敌意浓厚的研究。

---

① 《战争中的苏联》,载L·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73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还出版了许多对斯大林时代的研究——其中有一些论战性大大超过分析。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卡尔的《一国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基础》是详尽无遗的可靠之作。关于1930年代的清洗,康奎斯特的《大恐怖》写得细致,令人惊心动魄。多伊彻的《未完成的革命》大概是最深思熟虑的介绍。关于斯大林晚年的气氛,见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塞顿-沃森对国际各个方面作了很出色的评述。出自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部有分寸的描述,见爱伦斯坦的《斯大林现象》。

## 文献目录

### 原著

《斯大林全集》,共13卷,莫斯科1952—1955年版。

《斯大林著作精华:主要理论著作(1905—1952年)》,B·富兰克林编,纽约1952年版。

J·斯大林:《列宁主义》,伦敦1940年版。(即《论列宁主义基础》——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伦敦1936年版。

《斯大林著作:注释提要》,R·麦克尼尔编,斯坦福1967年版。

### 评论

V·亚历山大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伦敦1963年版。

S·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伦敦1967年版。

J·阿姆斯特朗:《极权主义政治:1934年以来的苏联共产党》,纽约1961年版。

A·阿夫托尔哈诺夫:《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权力学》,纽约1959年版。

H·巴比塞:《斯大林,通过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伦敦1935年版。

N·巴塞歇:《斯大林》,伦敦1952年版。

M·贝洛夫:《苏俄的外交政策(1929—1936年)》,伦敦1962年版。



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58 年版。

E·卡尔：《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 年)》，三卷本，伦敦 1958—1964 年版。

E·卡尔和R·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1926—1929 年)》，三卷本，伦敦 1969—1978 年版。

D·科勒德：《苏联的司法和对拉狄克等人的审判》，伦敦 1937 年版。

L·科莱蒂：《斯大林问题》，载R·布莱克伯恩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物》，伦敦 1977 年版；又载《新左派评论》第 61 期，1970 年。

R·康奎斯特：《大恐怖：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纽约 1968 年版。

R·丹尼尔斯编《斯大林的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还是背叛共产主义？》，波士顿 1965 年版。

Th·丹诺：《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苏联的展望》，海牙 1964 年版。

I·多伊彻：《苏联的工会》，伦敦 1950 年版。

——《斯大林：一部政治传记》，哈门德斯沃兹 1966 年版。

——《未完成的革命：1917—1967 年的俄国》，伦敦 1967 年版。

M·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伦敦 1962 年版。

M·德拉克科维奇和B·拉齐奇：《共产国际：历史性高潮》，纽约 1966 年版。

J·爱伦斯坦：《斯大林现象》，伦敦 1976 年版。

A·厄利奇：《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发展的观点》，载E·J·西蒙斯编《俄国与苏联思想的连续性和变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55 年版。

L·费舍：《斯大林的生与死》，伦敦 1953 年版。

R·费希尔：《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48 年版。

V·杰拉塔那：《斯大林、列宁和列宁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 103 期，1977 年。

Z·戈卢博维克：《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史》，伦敦 1964 年版。

E·古德曼：《苏联对世界国家的设想》，纽约 1960 年版。

A·戈尔巴托夫：《我生平中的几年：对一位苏联将军的回忆》，伦敦 1964

年版。

L·格拉厄姆：《苏联科学院和共产党(1927—1932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7 年版。

C·哈曼：《革命是怎样失败的》，伦敦 1969 年版。

R·欣克利：《约瑟夫·斯大林：其人和传奇》，伦敦 1974 年版。

G·赫德森：《五十年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1917—1967年)》，伦敦 1968 年版。

G·D·杰克逊：《共产国际和东欧的农民(1919—1930年)》，伦敦 1966 年版。

J·雅科布森编《苏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幻想》，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 1972 年版。

N·贾斯尼：《苏联的工业化(1928—1952年)》，芝加哥 1961 年版。

G·卡特科夫：《对布哈林的审判》，伦敦 1969 年版。

A·凯斯特勒：《正午时的黑暗》，纽约 1961 年版。

I·D·莱文：《斯大林》，伦敦 1931 年版。

K·麦肯齐：《1928—1943 年的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学说的形成》，纽约 1964 年版。

R·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纽约 1971 年版。

B·穆尔：《苏维埃政治——权力的困境：观念在社会指控中的作用》，纽约 1965 年版。

O·纳杰维茨：《苏联国家机器的形成》，曼彻斯特 1970 年版。

A·诺夫：《经济合理性和苏联的政治：或，斯大林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吗？》，纽约 1964 年版。

T·里格比编《斯大林》，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1966 年版。

A·罗森堡：《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纽约加登城 1967 年版。

H·塞顿-沃森：《从列宁到赫鲁晓夫：世界共产主义史》，纽约 1960 年版。

M·沙彻特曼：《官僚主义的革命：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兴起》，纽约 1962 年

版。

E·史密斯：《青年斯大林：一个难以捉摸的革命者的早年》，纽约 1967 年版。

B·苏瓦林：《斯大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伦敦 1939 年版。  
——《斯大林主义》，载 M·M·德拉克科维奇编《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斯坦福 1965 年版。

J·陶斯托：《1917—1947 年的苏联政权：苏联国家政权的理论和结构》，牛津 1948 年版。

L·托洛茨基：《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伦敦 1941 年版。

R·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 年）：关于历史和人格的研究》，纽约 1973 年版。

R·塔克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 1977 年版。

R·塔克和 S·科恩合编《大清洗的审判》，纽约 1965 年版。

A·厄拉姆：《未完成的革命》，伦敦 1970 年版。

——《斯大林：其人及其时代》，伦敦 1974 年版。

A·乌拉罗夫：《斯大林的统治》，伦敦 1953 年版。

S·韦伯和 B·韦伯：《苏联的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纽约 1938 年版。

## 第十章

# 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

在1956年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反响。斯大林被宣布曾经

“以整个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了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的侵犯，支持了严刑拷问和迫害，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作法导致了对那些清白无辜的人们的诽谤和他们的自我控告”。<sup>①</sup>

赫鲁晓夫谴责“个人崇拜”，并要求恢复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实行了与俄国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限度的经济分权方案。不过他首先集中改进在斯大林统治下受到严重忽视的农业部门。恢复了物质刺激，改善了投资，允许集体农庄管理自己的机械化动力，着手大力开垦哈萨克的处女地。

为了和新精神保持一致，1961年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修正纲领，以取代1903年和1919年的两个纲领。修正纲领的新原理在于它宣布，“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sup>②</sup>，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次新的

---

① E·克兰克肖编《赫鲁晓夫回忆录》，纽约1971年版第530页。

② 《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莫斯科1961年版第506页。

危机，“其主要特征是，它的发展不是与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sup>①</sup>。另一方面，苏联在未来十年中将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的和技术的基础，而到1980年“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苏联基本上建立起来”<sup>②</sup>。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更加惊人的是，它声称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这个纲领还要求反复灌输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这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传统中早已不存在的概念）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然而，由于1964年赫鲁晓夫的垮台，出现了对斯大林的比较肯定的态度，同时还减弱了对和平共存的强调。这种情况是1967年出版的政治基础教科书《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反映出来的。在国际舞台上还同时出现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有限主权论”包含这样一些主张：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是不同的，保卫社会主义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事情，以及把无产阶级在一国专政的思想改为无产阶级国际专政的思想。代替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新宪法在1961年已经制定，但直到1967年才公布。新宪法加强了党的权力——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集于勃列日涅夫一身——并和二十二大保持一致，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鼓吹“全民国家”。

虽然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没有多大的贡献，但其东欧邻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波兰，政府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奥斯卡·兰格试图把计量经济学这样的“资产阶级”学科，引进到一个实行权力下放并容许一定数量的自主管理和按价值规律确定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在波兰，莱塞克·科瓦科夫斯基领导了哲学的复兴。他在一系列充满生气的文章中声称，马克

---

① 《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莫斯科1961年版第470页。

② 同上书，第512页。

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并从理论上证明立足于实践概念而不是立足于反映论的认识论<sup>①</sup>。科瓦科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则含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要素：

“人们不能借口其行动只构成一定历史进程中的一星半点而推卸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一个战士在道义上要对其听命于上级而犯下的罪行负责；一个人更要对其接受想象中或实际上某种不为人知的历史使命而采取的行动负责……我们完全接受关于个人要对其行动负全部责任和关于历史进程不属于道德范围的论点。”<sup>②</sup>

科瓦科夫斯基终于流亡国外后，在国内更有影响的是亚当·沙夫的著作。沙夫是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语言学专家。他在《语义学导论》（1962年版）中作出了把现代语言学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尝试<sup>③</sup>。尽管沙夫强烈反对科瓦科夫斯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并为一种经过修改的反映论形式辩护，但他又确实求助于异化概念，并对社会主义能以多大速度消灭国家、家庭和商品生产持怀疑态度。他宣称：

“要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存在着异化是完全可能的。而要否定它的存在，就象连某些自诩为科学的书也经常令人遗憾地做的那样，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或至少是欠妥当的。想象人的意识、立场和社会惯例仅仅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在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那是不真实的。”<sup>④</sup>

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共二十大意味着莫斯科影响的放松，使捷

---

① 特别参看L·科瓦科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纽约，1968年）。

② L·科瓦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第140页。

③ 特别参看同上书第140页以下。

④ A·沙夫：《马克思主义和人的个性》，R·科恩编，纽约1970年版第128页。

克人得以依靠他们悠久的民主和文化传统来恢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顶点。改革在经济学和哲学中尤为明显。经济学方面的主要人物奥塔·希克,在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一书中为1968年的许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希克想强调的是市场关系甚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很重要,以及允许工人集体有极大主动性也同等重要。在一篇可与韦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媲美的分析中,希克说明了由于计划体制的过分集中,捷克斯洛伐克经济运转不佳:

“行政管理体制限制了企业的独立性,并妨害它们最佳地发挥主动性。企业的管理机构难以按照迅速变化的经济状况独立和灵活地决定任何经济进程,而主要是被迫完成行政上规定的数量指标以保持一些形式上的纪录。”<sup>①</sup>

希克并不否认需要计划,但他坚持来自下面的反馈的必要性:

“在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些经济关系,这些关系将迫使他们在决定生产时考虑到消费者的利益。在这里,做出片面决定损害消费者的任何生产者,也会跟消费者一道自食恶果,正如最佳决定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样。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民的利益既保持经常对抗,又直接得到相互平衡,从而促成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消耗,这样的经济关系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sup>②</sup>

这等于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将继续存在。

1960年代最有独创性的捷克哲学家是卡列尔·科西克。他借用了卢卡奇、马尔库塞和萨特著作中的思想,来重申被他视为马克思哲学根基的东西。科西克的基本命题是:

---

① 奥塔·希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怀特普莱恩斯和布拉格1967年版第98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人并不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的领域里，也不是以其一部分居住在历史领域而另一部分居住在自然领域。人一直是同时存在于自然和历史之中。人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因而也是社会的存在物，不仅使自然界具有人性，而且认识自然界，并承认自然是绝对的整体，是自足的本原，是人性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①

因而，人的中心活动是人类实践，即

“客观变为主观和主观变为客观的活动场所。它是人类意图得以实现和自然规律得以发现的‘活动中心’。人类实践是因果性和目的性的统一。”②

科西克对艺术特别重视，甚至借用海德格尔对左尔格③的想法来说明人类的状况。

南斯拉夫背离莫斯科的正统性最远。由于1948年政治上同莫斯科决裂，并拒绝把苏联作为榜样，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开展了猛烈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本身是进步的，但是苏联现在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阶级所控制，已不再走向共产主义了④。更激进的一些南斯拉夫人则把列宁主义的党视为对马克思的背叛而加以唾弃。按照他们的说法，列宁主义的直接结果是作为一种制度而确定下来的“国家主义”，其中

“国家机构同共产党的机构及其起纽带机制作用的其它政治组织完全混为一体。由于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劳动力便受国家机构雇佣和剥削。在分配剩余价值时，统治阶级每一个代表个人所得的份额，同他在国家

---

① K·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多德雷赫特1976年版第151页。

② 同上书，第71页。

③ 左尔格(Reinhard Johannes Sorge, 1892—1916)是德国作家，属表现主义流派。——译者注

④ 参看例如M·吉拉斯：《新阶级》，伦敦和纽约1962年版。



等级制中的地位是相称的。对待这个中央集权主义者阶级,我们也必须根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来强调剥夺剥削者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前景。”<sup>①</sup>

对苏联的这一批评一直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复兴运动的支持。这个运动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和1967年创办的评论性刊物《实践》。《实践》杂志的早期成员和编辑之一加欧·彼得罗维奇说过:

“战后我们哲学发展的基本成就之一,在于发现了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心。人在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作为障碍而排除了。”<sup>②</sup>

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和自由问题这样关注,势必导致向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回归。正如《实践》派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

“已经很明显的是,青年马克思力求解决的那些问题,诸如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冲突,什么东西构成真正的需要和人的基本能力问题,异化,解放,劳动和生产,以及当时表示过关注的其他问题,非但不是奠定他全部成年著作的青年时代的过错,而且现在仍然是我们时代甚至整个过渡时期的充满生气的关键问题。”<sup>③</sup>

然而,1975年《实践》派被镇压了,它的许多领导成员被解除了职务。

南斯拉夫模式最令人注目的方面是他们强调工人自治(始于1949年),其背景是有相当分散的经济和浓厚的市场社会主义倾向。南斯拉夫自治起端于战争期间,那时游击队员需要寻求一种

---

① S·斯托扬诺维奇:《理想和现实之间》,伦敦和纽约1973年版。

② 《实践》,1967年第1卷第64页。

③ M·马尔科维奇和R·科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兴与衰》,诺丁罕1975年版第18页。

能够管理解放区的方法，后来随着对立足于合法个人利益和强烈物质刺激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追求，它就愈加带有务实性了。

在斯大林以后的时代，西欧共产主义的中心人物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曾经是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陶里亚蒂始终坚持完全独立的路线，而赫鲁晓夫1956年的讲话为他提供了一个传播自己主张的机会。他宣布：第一，只对斯大林个人进行批判是以一种过于肤浅的态度对待斯大林主义现象；第二，在多党制国家中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莫斯科已不再拥有独特的地位。陶里亚蒂在1964年的雅尔塔备忘录中保持上述观点，同中国共产党所持的立场发生了争执，但也同样反对苏联对中国的正式谴责。陶里亚蒂宣称“再次创立一个集权化的国际组织的任何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sup>①</sup>，并坚定地说：

“我们一向从这样一种主张出发：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工人享有广泛的自由，并有组织地实际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因此，一切原则性立场和一切事实，凡是足以向我们表明上述主张不仅在苏联、也是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者，我们都欢迎。可是，有时事件向我们揭露出正好相反的情况，却足以损害整个运动。”<sup>②</sup>

陶里亚蒂的思想所依据的是意共对葛兰西作出的有利于其政策的解释，最近几年被意大利共产党广为传播，并导致了著名的“历史性妥协”。在这一妥协中，希望扩大自己力量基础的意大利共产党一直愿意有保留地支持那些基本倾向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

在1970年代，法共和西共仿效意共的榜样，从而产生并发展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1976年，法国共产党决定在其纲领中

<sup>①</sup> 陶里亚蒂：《备忘录》，载W·格里菲思编《中苏关系（1964—1965年）》，剑桥1967年版第38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83页。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而它在1978年选举中的策略，引起了对党内缺少公开讨论的空前的批评。领导这次批评的是诸如阿尔杜塞和爱伦斯坦这样一些著名的党内知识分子。目前，最无保留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他那本引起争论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一书中，强调争取并扩大民主自由和人权，把赢得选民的信任看作改造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根本步骤。在一段显然针对苏联的文字中，卡里略甚至这样说：

“事实上，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某些阶层的人们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民主缺乏‘信心’，这并不是与我们自己的活动和政策相联系的，而是与下述事实相联系的，即在那些已经消灭资本私有制的国家，一般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一党制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受到官僚主义的严重歪曲，甚至正处在严重的蜕化过程之中。”<sup>①</sup>

在1978年的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共产党不顾来自莫斯科的刺耳的反对，甚至决定在自我鉴定中不具体提及列宁主义。

## 参考读物

### 苏联

赫鲁晓夫自己的叙述（如果真是他的）已列入《赫鲁晓夫回忆录》内，其中附录有1956年他对斯大林的谴责。对赫鲁晓夫时代的最好描写是克兰克肖的《赫鲁晓夫》、林登的《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以及麦德维杰夫的近著《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谈到当代苏联的理论这个令人厌烦的题目的，有韦托尔的《当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德乔治的《新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简介是麦考利的《政治和苏联》下半部，以及莱昂哈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副面孔》第四章。还可以参看罗思伯格和塔图的评论。

---

<sup>①</sup> S·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伦敦1977年版第155页。

## 东欧

约内斯库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佩利坎的《东欧的社会主义反对派》，是两本一般介绍性的好书。关于思想方面，参看德乔治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左的方面的批判，参看巴罗的《东欧的抉择》。

关于波兰的概述，可看乔丹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还可参看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的书。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对布拉格之春的来龙去脉的最好描写是库辛的《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根源》。还可参看佩利坎、希克和科西克的书。

关于南斯拉夫，参看奥迪的《铁托传》。罗斯·约翰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克利梭尔德的文集《南斯拉夫和苏联》可以作为《铁托传》的补充。从社会学角度对自治现实的卓越评价有祖金的《超越马克思和铁托》。《实践》派简史见马尔科维奇和科恩合著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兴与衰》。斯托扬诺维奇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是一位“知情者”的最好批评。还可参看彼得罗维奇的《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

## 西欧

关于意大利式的欧洲共产主义，参看萨森的《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自述》，以及霍布斯鲍姆对那波利塔诺的访问记《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关于西班牙，参看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关于总的情况可看克劳丁那本批判性但仍抱同情态度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曼德尔的《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则进行了彻底的抨击。

## 文献目录

### 苏联(概述)

P·贝利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伦敦 1979 年版。

R·康奎斯特：《苏联的政权和政策》，纽约 1961 年版。

I·多伊彻：《斯大林以后的俄国》，伦敦 1953 年版。

W·莱昂哈德：《斯大林以来的克里姆林宫》，牛津 1962 年版。

——《马克思主义的三副面孔》，纽约 1974 年版。

M·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74 年版。

S·普洛斯：《苏俄的冲突和决策：对 1953—1963 年农业政策的实例分析》，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5 年版。

G·A·韦托尔：《当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纽约 1966 年版。

## 赫鲁晓夫

### 原著

尼·赫鲁晓夫：《斯大林时代的罪恶》，纽约 1956 年版。

——《赫鲁晓夫言论》，安阿伯 1963 年版。

——《赫鲁晓夫回忆录》，两卷本，伦敦 1972—1974 年版。

### 评论

E·克兰克肖：《赫鲁晓夫》，伦敦 1966 年版。

M·芬索德：《赫鲁晓夫主义》，载 M·德拉克科维奇编《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斯坦福 1965 年版。

M·弗兰克兰德：《赫鲁晓夫》，哈蒙茨沃思 1966 年版。

C·林登：《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1957—1964年)》，巴尔的摩 1966 年版。

R·洛温塞尔：《赫鲁晓夫政权的本质》，载《共产主义问题》第 9 期，1960 年。

R·麦德维杰夫和 Z·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牛津 1977 年版。

R·佩希布里奇：《苏联政治的内幕：反党集团的危机》，纽约 1962 年版。

L·皮斯特拉克：《大策略家：赫鲁晓夫的上台》，纽约 1961 年版。

M·拉什：《赫鲁晓夫的崛起》，华盛顿 1958 年版。

A·厄拉姆：《苏联极权主义的新面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3 年版。

B·沃尔夫：《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幽灵》，纽约 1957 年版。

## 赫鲁晓夫以后

A·布朗和J·格雷编《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变革》，伦敦1979年第2版。

R·康奎斯特：《赫鲁晓夫以后：一次保守派的复辟吗？》，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2期，1963年。

——《赫鲁晓夫以后的俄国》，纽约1965年版。

A·达林和T·拉森：《赫鲁晓夫以来的苏联政治》，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8年版。

I·多伊彻：《俄国、中国和西方》，伦敦1970年版。

J·多恩伯格：《新沙皇们：斯大林继承者统治下的俄国》，纽约加登城1971年版。

B·迈斯纳：《勃列日涅夫的理论》，堪萨斯市1971年版。

A·罗思伯格：《斯大林的继承者：1953—1970年的不同政见和苏联政权》，纽约伊萨卡1972年版。

D·塔斯契斯：《苏联的政治议事日程》，伦敦1979年版。

M·塔图：《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的克里姆林宫政权》，纽约1970年版。

## 中苏冲突

E·克兰克肖：《新冷战：莫斯科对北京》，巴尔的摩1963年版。

L·拉贝兹和G·厄班合编《中苏冲突：十一次广播之争》，伦敦1965年版。

R·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斯坦福1953年版。

D·扎戈里亚：《中苏冲突(1956—1961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62年版。

## 东欧(概述)

R·巴罗：《东欧的抉择》，伦敦1978年版。

R·德乔治：《新马克思主义：1956年以来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纽约 1968 年版。

C·哈曼：《东欧的官僚主义和革命》，伦敦 1974 年版。

G·约内斯库：《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伦敦 1967 年版。

G·D·杰克逊：《共产国际和东欧农民(1919—1930 年)》，纽约 1966 年版。

J·佩利坎：《东欧社会主义反对派》，伦敦 1976 年版。

H·塞顿-沃森：《东欧的革命》，伦敦 1957 年第 3 版。

H·斯基林：《共产主义东欧的政权》，纽约 1966 年版。

R·托克斯：《东欧的反对派》，伦敦 1979 年版。

## 波兰

P·格林：《波兰的第三个回合》，载《新左派评论》第 101—102 期，1977 年。

Z·乔丹：《哲学和意识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波兰的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多德雷赫特 1963 年版。

L·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论历史的理解和个人的责任》，伦敦 1968 年版。

A·沙夫：《人的哲学》，纽约 1963 年版。

——《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的个性》，纽约 1970 年版。

## 捷克斯洛伐克

V·菲舍拉编《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委员会》，伦敦 1978 年版。

K·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多德雷赫特 1976 年版。

V·库辛：《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根源：1956—1967 年捷克斯洛伐克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剑桥 1971 年版。

J·佩利坎：《捷共维索查内秘密代表大会》，纽约 1971 年版。

——《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而斗争》，载 R·布莱克伯恩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物》，伦敦 1977 年版。

O·希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怀特普莱恩斯和布拉格 1967

年版。

## 南斯拉夫

P·奥迪：《铁托传》，伦敦 1970 年版。

——《南斯拉夫》，伦敦 1965 年版。

I·阿瓦库莫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史》，亚伯丁 1964 年版。

R·比察尼奇：《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剑桥 1973 年版。

S·克利梭尔德编《南斯拉夫和苏联(1939—1973 年)》，牛津 1976 年版。

M·吉拉斯：《新阶级》，伦敦和纽约 1962 年版。

J·费希尔：《南斯拉夫：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旧金山 1966 年版。

G·霍夫曼和 W·尼尔：《铁托的南斯拉夫》，加利福尼亚 1960 年版。

R·约翰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1945—1953 年的南斯拉夫状况》，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73 年版。

M·马尔科维奇和 R·科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兴与衰》，诺丁罕 1975 年版。

G·彼得罗维奇：《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纽约 1976 年版。

S·斯托扬诺维奇：《理想和现实之间：对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批评》，伦敦和纽约 1973 年版。

J·B·铁托：《讲话和文章选辑》，扎格列布 1963 年版。

A·厄拉姆：《铁托主义》，载 M·M·德拉克科维奇编《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斯坦福 1965 年版。

W·弗西尼奇编《当代南斯拉夫》，伯克莱 1969 年版。

S·祖金：《超越马克思和铁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剑桥 1975 年版。

## 西欧

G·阿门多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答记者问，载《新左派评论》第 106 期，1977 年。

S·卡里略、R·德布雷和 M·格拉罗：《关于西班牙的对话》，伦敦 1976



年版。

S·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伦敦 1977 年版。

F·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伦敦和纽约 1978 年版。

P·佛罗里斯·德阿凯斯和F·摩里蒂：《意大利政治危机的种种矛盾》，载《新左派评论》第 96 期，1976 年。

E·霍布斯鲍姆和G·那波利塔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伦敦 1977 年版。

M·马克契奥奇：《意共党内给路易·阿尔杜塞的信》，伦敦 1973 年版。

E·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伦敦 1978 年版。

D·普洛克和C·博格斯编《欧洲共产主义》，伯克莱 1979 年版。

D·萨森编《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自述》，诺丁罕 1978 年版。

G·厄本编《欧洲共产主义》，伦敦 1978 年版。



### 第三编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欧洲马克思主义

……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出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其〔黑格尔〕时代的必然产物，我们就必须竭力去了解它自产生以来的每一变化、发展和修正。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竭力弄清这些变化、发展和修正如何取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总合，并成为这一进程的总的表现（马克思）。然后，我们就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根源。我们也就能够看出，今天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作出热情而显然是“意识形态上的”努力的用意何在。

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 第十一章

### 卢卡奇

本编中所考察的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的著作，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相对短暂的资本主义不稳定时期写成的。由于1914年以前世界秩序的崩溃，也由于很大程度上由第二国际代表的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国家的职能和哲学的作用，都从根本上经历了重新表述。中欧（德国和奥匈帝国瓦解后出现的民族国家）在这一变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僵化，能发挥创造性的中心再度西移。卢卡奇的著作成了革命运动和曾领导过德国、奥地利和其故乡匈牙利1918—1919年起义的共产党的理想蓝图。但这蓝图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因为上述革命在实践中已宣告失败，而卢卡奇是在社会政治真空中制定理论的。他自己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序言中曾谈到“我们许多人对革命的持续时间和发展速度所抱的希望是过分乐观的”<sup>①</sup>。

卢卡奇188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父亲任匈牙利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董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他一直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大学里学习和写作，1918年参加

---

<sup>①</sup> G·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67年版序言，伦敦1971年版第12页。

共产党，1919年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中任教育人民委员。该政权失败后，卢卡奇移居维也纳，在那里写了收集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大多数论文。他于1929年迁居莫斯科。

卢卡奇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他就充分领会了围绕下述主题展开的辩论：新康德学派的衰亡、现象学的兴起，以及直觉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日益增长的影响。所有这些思潮都反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占主导地位<sup>①</sup>。这种世界观主要受狄尔泰的影响，而以研究历史为其中心：

“研究历史能揭示出人类经验总合中逐渐表露出来的人的基本性质，而历史学家只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再现前人用以表达自己的那些思想和活动，便能进入过去几代人的生活。人文科学与人生哲学，即‘精神科学’与‘生命哲学’，就是为了超经验地看待生动而活跃的世界历史总合而进行不懈探索的两个方面。”<sup>②</sup>

卢卡奇把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概念化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是黑格尔的哲学。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是认真评价黑格尔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作用的第一人，也许拉布里奥拉可与他相比（但也略逊一筹）；他还在现象学中（正如在逻辑学中一样）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一面。同样，卢卡奇曾惊人地预见到，1930年前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会给马克思思想投下新的光辉。象青年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是通过黑格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途径使卢卡奇终于既反对社会主义劳动联盟的领袖们二十年前推行“经济主义”的理论设想，也反对以前许多马克思主义

---

① 详见H·S·休斯：《意识和社会》，伦敦1959年版第二章。

② G·利希特海默：《卢卡奇》，伦敦1970年版第27页。

哲学家强调科学方法中如此明显的自然的必然性。他批判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即关于认识的反映论<sup>①</sup>，并指责《反杜林论》对辩证法缺乏了解：

“恩格斯甚至没有提到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更不用说给这种辩证关系以应有的突出地位。然而，没有这个要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尽管试图（但毕竟是虚妄之举）维持‘变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仍然是未被感触到的、未改变的，因此思想仍然是直观的、不合实用的；对辩证法说来，中心的问题是改变实在。”<sup>②</sup>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全部中心概念——物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以及整体性——都植根于黑格尔。这本书的主要论题，就是书名中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两个词，事实上两者完全是一码事。卢卡奇在探讨阶级意识时，是从马克思却步不前的地方出发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对阶级的阐述是不完整的。不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名言中区分了客观因素（对生产资料的一般关系）和主观因素（利益分享的意识等）<sup>③</sup>。卢卡奇撇开无产阶级实际的主观意识，而谈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即一个阶级在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后必定会有的意识。卢卡奇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在心理学上没有实在性”<sup>④</sup>。他在重要的一段中写道：

“把意识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就能推论出人们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所应

---

① 参见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00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参见B·奥尔曼：《马克思对“阶级”一词的用法》，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68年3月号。卢卡奇对马克思含蓄的看法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一问题，请见I·梅萨罗斯：《偶然和必然的阶级意识》，载《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几个方面》，I·梅萨罗斯编，伦敦1971年版第94页。

④ 见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75页。

有的思想和感情,只要他们能够估计到该特定情况,以及就地施加影响于及时的行动和整个社会结构所能导致的利益就行。这也就是说,有可能推论出符合他们的客观情况的思想和感情。在任何社会,这种情况都不是无限量的。尽管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能够使社会的类型搞得很细,但能明确区分的基本类型通常则只有若干个,其特性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占有的地位的类型。因而,阶级意识总是由下述事实形成的,即生产过程中某一特殊的典型地位往往‘被赋予’相应的理性反应。所以,这种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纯个人的思想或感情的总和,也不是其平均数。然而归根到底,整个阶级的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则取决于阶级的意识,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思想——只有参照这种意识,才能理解这些行动。”①

从历史的角度上说,卢卡奇对前四百多年阶级意识的发展和局限性,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阶级意识本身只能是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因为只有那时,阶级才变成民族的实体,阶级意识才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变得“更纯”——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明显地给后一阶级概念造成一些困难。卢卡奇深信,他进行写作的当时强调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时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既已成熟,世界革命的成功便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较为无形的因素。他写道:

“需要一种新的因素,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必须变成行动。但由于单纯的矛盾已提高为一种有意识的辩证的矛盾,由于变得有意识的行动转变为向实践过渡的起点,我们便再一次更具体地把无产阶级辩证法的特征看成是我们经常所描绘的那样,即意识在这里既然不是对某种对立的客体的认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那么意识的行动便推翻客体的客观形式。”②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51页。

② 同上书,第178页。



卢卡奇在这本著作的 1967 年版序言中说,他关于实际的阶级意识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与列宁在《怎么办?》中对工联主义的意识和“从外面”灌输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区分是一致的<sup>①</sup>。同时,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对历史使命的良知的体现者”<sup>②</sup>是党。

卢卡奇深信,一种发达的阶级意识能使无产阶级既成为历史的客体,又成为历史的主体:

“只有当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够指出推动历史辩证法客观地前进的、但又不可能在孤立无援情况下前进的必由之路时,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领悟到这一过程的意义,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同一个历史主体和客体,他们的实践才能改变实在。”<sup>③</sup>

卢卡奇在一篇详细的长篇分析中,试图论证以往的思想由于把主观和客观完全分裂开来,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sup>④</sup>。只是有了黑格尔才克服了这种分裂,尽管是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无产阶级是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的唯一的阶级,在其主观思想中(至少在其“被赋予的”意识中)表达出它客观地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这种历史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卢卡奇认为是辩证法的基本形式:

“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方法在这里只限于历史和社会的领域。恩格斯在解释辩证法时所产生的错误理解,基本上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恩格斯受黑格尔的错误指引,把这种方法扩展应用于自然界。可是在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是不存在下列辩证法的关键性决定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序言》第 18 页。

② 同上书,第 41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110 页以下。

因素的，即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这些范畴所立足的实际的历史变化（这是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sup>①</sup>

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卢卡奇几次引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论述。卢卡奇也同马克思一样，认为实践是思想和实际的具体统一。

先前，卢卡奇曾广为使用“物化”这一术语，来表示那种妨碍人们对世界进行了解的现象。他显然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下述分析出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既是主观地，也是客观地）转变为商品之间的关系。物的世界正通过似乎不受人支配的客观规律统治着人们。人变成了客体，变成了其生活形成过程的消极旁观者。卢卡奇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出发，探索了国家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这一物化发展过程。在这里，他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

与物化概念相联系的是整体性概念。物化的结果之一是“消灭整体的每一个形象”<sup>②</sup>。劳动的专门化和社会的普遍分裂，意味着人及其周围的世界被视为分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单个实体。资产阶级必然这样地看待事物，因为这一观点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直到现在，物化过程的主要动力一直是客观现实的普遍存在性，即在物化了的世界里不存在主体。可是，资本在社会中的演变现在已到达了如此地步，以致无产阶级可以消灭物化而成为历史进程的主体。资产阶级片面而静止的观点决不可能完成对社会的认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把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孤立的事实归结为一个整体，对事实的认识才能变成对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实在的认识。”<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强调说：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分野不是经济动力论在阐述历史时居首要地位，而是关于整体性的观点。整体性范畴，即整体无处不高于局部的普遍性，是马克思承袭黑格尔的方法的精髓……整体性范畴的这种首要地位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体现者。”<sup>②</sup>

后来，又说：

“实在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被了解透彻，而一个主体只有当它本身也是一个整体时，才能有这样透彻的洞察力……只有阶级能够敏锐地洞察社会实在，并将其作为整体来加以改造。因为这个缘故，从阶级立场提出的‘批判’就是从整体观点提出的批判，所以它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中，它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既是其反映，也是其动力。作为社会中思想之主体的无产阶级，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种无可作为的困境，这种困境是纯法律和他们的宿命论造成的，也是纯概念性质的伦理学造成的。”<sup>③</sup>

这样，卢卡奇何以极其重视正确的方法论也就一清二楚了。的确，他是多少有点不顾自己曾强调过概念的整体性和易变性，而提出了在马克思的命题和他的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两分法：

“为讨论起见，让我们假定，新近的研究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个人的每一个命题。即使这个假定得到了证实，每一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的研究成果，从而完全放弃马克思的全部命题——但一刻也不放弃他的正统……正统是专指方法而言。”<sup>④</sup>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8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39页。

④ 同上书，第1页。

在卢卡奇看来,任何当代问题,包括战争、危机和苏俄的经济问题,光凭辩证法是不能予以解决的。

我们已经指出,卢卡奇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十月革命,可以说他的著作是把这次革命理想化的理论。卢卡奇确实谈到过列宁对他的决定性影响;只要无产阶级的意识是被赋予的而不是实际的,就存在一种诱惑力,即从革命知识分子的某位精华身上找到所体现的阶级意识。但总的说来,卢卡奇相信无产阶级意识会有机地增长,相信无产阶级在列宁主义党易沾染的官僚主义倾向中有能力控制它的领袖,这是他更接近卢森堡或托洛茨基之处。

卢卡奇的这本书遭到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从哲理上说该书带有黑格尔左派的色彩,放弃了苏联据以解释世界的较为质朴的唯物论。确实,它把这种唯物论描述为“头脚倒置的柏拉图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形式”<sup>①</sup>。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改造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因而俄国以外每出现一名显然具有创新精神的大理论家,他们就感到不安。卢卡奇热爱罗莎·卢森堡和工人委员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工联主义,而工联主义倾向是使西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障碍。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了卢卡奇的这本书。卢卡奇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其后还自称那一批判作得不够严肃认真,并在1967年他为《历史和阶级意识》再版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说他的那本书是“以革命救世主自居”<sup>②</sup>的典型,“对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的争论,没有切中要害的价值”。<sup>③</sup>他认为那本书的主要错误是缩小了经济学的基础,这是由于没有把劳动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02,203页。

② 同上书,《序言》第14页。

③ 同上书,《序言》第11页。

的概念视为人与自然界的中介，否定了自然界在本体论上的客观性。这就导致了黑格尔式的将异化和客体化等同起来。这些命题仍是《本体论》这部大部头著作的命题，直到他逝世以前他一直撰写这本书。

在1920年代，卢卡奇出版了一部论述列宁的短篇著作，强调列宁方法论中的辩证法要素。他也批判了布哈林的机械社会学——虽然他在1920年代后期与布哈林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然而，随着斯大林统治的巩固，卢卡奇转到不很引起争论的问题上去了——主要从事于文艺批评。他进一步分析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比，而赞美由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司各特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认为他们力图把客观世界及其主观认识统一起来。以左拉为主要代表的自然主义者，则仅仅反映了他们的环境，没有达到完美的主、客观的统一。卢卡奇致力于对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理性的人道主义的阐述，认为它们在德国古典文学（歌德）中便得到体现，而到他那个时代由托马斯·曼保持了下来。他把这些作家的观点与后来出现的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对比，后者存在于各种颓废的资产阶级现代主义形式之中。在这一领域内，卢卡奇的《美学》是他的著述的顶点。在《美学》中，他试图在他视为颓废的西方主观唯心主义与苏联过分简单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保持中间立场。他追随黑格尔和早期的马克思，把艺术描绘为一种人性化的过程，即反映和表现人的本性和人类一致性。<sup>①</sup>

卢卡奇由于过分强调意识而受到了批判，——无产阶级不是他自身的创造者，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卢卡奇并没有提供无产阶级怎样发展自己的意识的理论，只有极左观点才认

---

<sup>①</sup> 详见A·利希特海默：《卢卡奇》，第8章。

为党是唯一有能力体现无产阶级被赋予的意识的<sup>①</sup>，卢卡奇虽然在后半生与莫斯科妥协了，但他的著作仍然是创造性的。卢卡奇重新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产生了兴趣，他所论述的异化、物化、整体性等概念，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参考读物

### 原著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特别是论物化那篇长篇论文。他早期的重要文章收集在《政治文稿》里，另见他的短篇著作《列宁》。关于他与政治无甚直接关联的哲学著作，请见《青年黑格尔》，该书试图把宗教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还可参见最近译出的《本体论：黑格尔》和《本体论：马克思》。卢卡奇最杰出的文艺批评收集在他的《小说理论》和《论欧洲的现实主义》里，也见于他最早期的著作《灵魂及其形式》。

### 评论

最通俗的介绍是帕金森的《卢卡奇传》和由他编辑的论文集。利希特海默的短篇著作精炼难懂但富于洞察力。大概阐述得最为全面的是劳维的《乔治·卢卡奇——从唯心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虽然这本书只限于写1930年以前的事。梅扎罗斯的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几个方面》是非常有用的。该作者的《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附有一篇精彩的书目。梅扎罗斯是卢卡奇的门生，对他的老师作了全面研究。关于早期卢卡奇，斯蒂德曼·琼斯的文章是一篇论据充足的批判，齐托的研究是极有特点的。关于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卢卡奇，见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第三章。

---

<sup>①</sup> 参见A·卡里尼科斯：《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6年版第26页以下；L·科莱蒂：《马克思与黑格尔》，伦敦1972年版第175页以下。

## 文献目录

### 原著

- G·卢卡奇:《理性的毁灭》,伦敦1974年版。
- 《与卢卡奇谈话》,T·平库斯编,伦敦1973年版。
- 《论托马斯·曼》,伦敦1964年版。
-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载R·W·塞拉斯和M·法伯编《哲学的未来》,纽约1949年版;又载乔治·诺瓦克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存在主义》,纽约1966年版。
- 《歌德及其时代》,伦敦1968年版。
- 《小说史》,伦敦1962年版。
- 《历史和阶级意识》,伦敦1971年版。
- 《列宁:对其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伦敦1970年版。
- 《马克思主义和人的解放》,E·桑·胡安编,纽约1973年版。
- 《当代现实主义的含意》,伦敦1963年版。
- 《本体论:黑格尔,他的谬误及其真实的本体论》,伦敦1977年版。
- 《本体论:马克思,马克思本体论的基本原则》,伦敦1977年版。
- 《政治论文集(1919—1929年):议会制度问题和其它论文》,伦敦1972年版。
- 《索尔仁尼琴》,伦敦1970年版。
- 《灵魂及其形式》,伦敦1973年版。
- 《欧洲现实主义研究》,伦敦1950年版。
- 《小说理论:一篇关于伟大史诗文学诸形式的历史哲学论文》,伦敦1971年版。
- 《作家、批评家和其他》,伦敦1970年版。
- 《青年黑格尔》,伦敦1975年版。

### 评论

- E·巴尔和R·G·孔泽：《乔治·卢卡奇》，纽约 1973 年版。
- P·布雷尼斯：《卢卡奇〈旧文化和新文化〉一书的引言》，载《目的》第 5 期，1970 年春季号。
- 卢西恩·戈德曼：《卢卡奇的早期作品》，载《三季》第 9 期，1967 年春季号。
- 《卢卡奇和海德格尔：走向一种新哲学》，伦敦 1978 年版。
- F·詹姆森：《马克思主义和形式》，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71 年版。
- G·利希特海默：《卢卡奇》，伦敦 1970 年版。
- 米切尔·劳维：《乔治·卢卡奇：从唯心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伦敦 1979 年版。
- 《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 91 期，1975 年；又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批判性的读物》，伦敦 1977 年版。
- I·梅扎罗斯编《阶级意识和历史的几个方面》，伦敦 1971 年版。
- 《卢卡奇的辩证法概念》，伦敦 1972 年版。
- P·皮科内：《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半个世纪以后》和《意识问题》，载《目的》，1969 年秋季号和 1970 年春季号。
- G·帕金森：《乔治·卢卡奇》，伦敦 1977 年版。
- 《乔治·卢卡奇：其人、其著作和思想》，伦敦 1970 年版。
- G·琼斯：《评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 70 期，1971 年；又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批判性的读物》，伦敦 1977 年版。
- M·瓦特尼克：《相对论和阶级意识：乔治·卢卡奇》，载 L·拉贝兹：《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文集》，伦敦 1962 年版。
- 维克托·齐托：《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辩证法，革命：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研究》，汉堡 1964 年版。



## 第十二章

### 科尔施

卢卡奇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命题在卡尔·科尔施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表述。科尔施是汉堡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曾学过法律，1917年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象卢卡奇一样，他的著述深受他在1918—1923年动乱年代经历的影响，并着重于理论问题。科尔施相信1918—1919年的革命是由于社会心理的原因而失败的，并试图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往的演化。科尔施的主要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出版于1923年。这本书所激起的反对，甚至比卢卡奇的著作更为强烈。他在该书的跋中写道：“就我所能确立的命题而言，我感到荣幸的是与这位作者（卢卡奇）基本一致，他的命题在许多方面与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有关，虽然本书是以哲学为基础。”<sup>①</sup> 科尔施是德国共产党最著名的成员之一，曾在图林根政府里短时期地当过部长。在1920年代中期，他是德共内极左派的成员。该派反对苏联官方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反对西欧资本主义已巩固的论点。1926年科尔施被德共开除出党，1933年他不得不逃出德国，移居美国，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理论著述。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哲学

---

<sup>①</sup> K·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莱比锡1923年版第71页。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作用。科尔施所关注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恢复黑格尔的因素，虽然他不象卢卡奇那样直率明朗。他把他那本书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总是承认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哲学。但是我们可以雄辩地、有根有据地、轻而易举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辩证学家所说的哲学的对立面，与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哲学的对立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二人的主张不外乎是超阶级差别的、无偏见的、纯理论研究……如果正确理解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纯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区别，远远胜过它与哲学的区别，而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在哲学中曾一度得到最高的理论表述。”<sup>①</sup>

然而，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们却未能领悟，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中依然存在。他们和第二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学，因此抹煞了给马克思主义赋予生命的哲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科尔施比卢卡奇更猛烈地批评了恩格斯<sup>②</sup>。科尔施的目的是“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sup>③</sup>。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起源到1848年，从1848年到上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他们的“作为一个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社会发展理论”<sup>④</sup>。第二个阶段，以他们的后期著作作为标志，他们从整体分出了各个不同的成分——经济、政治、科学等等。科尔施惯于运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引用《共

---

①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伦敦1970年版第61页以下。

② 同上书，第46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51页。

④ 同上书，第54页。

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多得多。后者在他看来，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表述唯物主义的原理”<sup>①</sup>。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们

“尽管公开宣称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均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却把社会革命理论搞得支离破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一套纯粹的科学观察，与阶级斗争的政治或其它的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sup>②</sup>

科尔施引证的例子是希法亭。在他看来，希法亭的经济学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洞察力。但是科尔施把他的批判扩大到了第二国际的一般理论：

“这个时期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现在仅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表现是，背上传统包袱的理论家们力图使形成马克思主义雏型的社会革命理论保持纯理论的形式。这种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没有实际的意义——它只不过力图抵制新改良主义理论，因为新改良主义理论当时把历史运动的真实性质作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表述。这正是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革命时期中，必然不能解决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的原因。”<sup>③</sup>

第三阶段，是由罗莎·卢森堡或列宁这样一些思想家代表的。他们复兴了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在《国家与革命》中）。科尔施注意到了“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这两个问题之间特有的相应现象”。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看，废除国家是他们克服和取代哲学的一个相应的愿望——国家和哲学二

①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伦敦 1970 年版第 67 页。

② 同上书，第 54 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 58 页。

者作为独立的领域而继续存在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特征。

总的来说，科尔施——与卢卡奇一起——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唯物论者之前，先就是辩证论者；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肩负着有待完成的重要使命。强调辩证法和整体性再次肯定了意识作用的重要性，并且这种强调在政治上的相应行动就是支持工人委员会。

## 参考读物

原著

科尔施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已有英译本。凯勒编的文集见地开阔。

评论

见哈利戴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所写的序言。凯勒为他编的文集所写的序言更好一些。全面性的论述则见于古德写的学术传记。

## 文献目录

原著

《卡尔·科尔施的革命理论》，D·凯勒编，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7年版。

K·科尔施：《卡尔·马克思》，伦敦1938年版。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F·哈利戴编，伦敦1970年版。

——《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篇论文》，伦敦1971年版。

评论

P·古德：《卡尔·科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伦敦1979年版。

H·科尔施：《回忆科尔施》，载《新左派评论》第76期，1972年。

P·马蒂克：《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载《综览》第53期，1964年，又载《目的》第26卷，1975年（论科尔施专辑）。

## 第十三章

# 委员会共产主义

两次大战间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列宁主义进行的最全面挑战，主要是环绕着逐渐以“委员会共产主义”著称的思想。这些思想家从1917—1923年的岁月里获得了灵感，而当时工人委员会或称苏维埃在革命斗争中正居突出地位。他们放弃了议会制或工会可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这一思想。一党制概念——尤其是根据列宁主义路线——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日益使他们感到不可信任。他们终于认为，苏维埃政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另一变种。

卢卡奇和科尔施二人都是工人委员会的倡导者，虽然卢卡奇的言论只局限于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发表。他在该书中写道：

“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都以一种日益激进和自觉的方式缔造了工人委员会。当这一斗争武器威力扩大到足以成为国家机构时，这种迹象就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能够克服其领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了。革命的工人委员会（不可让机会主义对它的歪曲描述混淆视听）是无产阶级意识一开始就一直努力创造的形式之一。它存在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觉悟，从而踏上了胜利的门槛。工人委员会宣告物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破产了。在实行专政以后的时期，它将消除资产阶级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在进行管理的斗争中，工人委员会的使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克服无产阶级的分裂；另一方面，它必须把经济和政治统一起来，化为无产阶级实践的真

正综合。”<sup>①</sup>

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自认为他们已经复归到马克思的境地，因为他们断言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获得自我解放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和组织良好的工人大军，从而使无产阶级有能力成为历史变革的倡导者。他们由于接受了无政府工联主义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马克思，认为不需要经过过渡性质的国家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这些观点的先驱是罗莎·卢森堡<sup>②</sup>，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还有被列宁称为“经济主义者”<sup>③</sup>的阿基莫夫那样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从1917年革命的苏维埃经验中获得最大的鼓舞；因为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后来俄国的苏维埃归附于党和国家，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便通过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治理论，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特别是他们否定了无产阶级有可能自己获得革命的阶级意识。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也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布尔什维克促成的，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仅难以与法西斯主义者区别开来，而且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自主行动的能力，从而使工人阶级抗击法西斯主义的能力遭到削弱。

最重要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是荷兰天文学教授安东尼·潘涅库克。他由于倡导群众罢工和通过斗争提高觉悟的理论，1914年以前在荷兰和德国党左派中赫赫有名。潘涅库克虽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在1917年以前还是用了很多时间来抨击那些在经济理论

---

① G·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伦敦1971年版第80页。

② 见罗莎·卢森堡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D·霍华德编《政治著作选》，伦敦和纽约1971年版第283页以下。

③ 详见J·弗兰克尔编《弗拉基米尔·阿基莫夫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困境》，剑桥1969年版。

上似乎没有给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留下余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批评了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因为他们宣扬资本主义能无限地扩张。他也批评了罗莎·卢森堡，因为她对资本主义崩溃持过于“自动的”观点。1920年代又掀起了一场关于资本再生产和一般积累的马克思模式的争论，当时亨利克·格罗斯曼变得更强调生产领域而不是强调流通领域，并声称利润率下降将导致积累的枯竭<sup>①</sup>。潘涅库克也反对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把工人描绘为只能对他们不能控制的经济力量作出反映。潘涅库克的另一个与这些经济观点相类似的看法，是他认为他称之为考茨基的“消极的激进主义”仅仅旨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一场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恰恰相反，它是一场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来消灭和粉碎国家政权的工具。”<sup>②</sup>

潘涅库克深信工人阶级自身具有改变处境的潜力。这种信念是受到荷兰、比利时、德国和俄国群众罢工鼓舞的。他相信，与工人阶级的这些自发的组织形式相比较，议会活动和工会官僚体制便不足道了，而且实际上还会引入歧途。所以他对1917年俄国的苏维埃深有感触，并象卢森堡一样表示了有批判的赞成。当布尔什维克主张在西方通过议会和工会进行工作时，他很快就感到理想幻灭了，因为潘涅库克此刻已经逐渐把这两种机构都看成是道地的反革命。他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最初困难的几年里明显地希望从当时西方的工人组织得到支持是不同情的<sup>③</sup>。在潘涅库克看

---

① 参见H·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和崩溃规律》，莱比锡1929年版。

② A·潘涅库克：《群众罢工和行动》，载《新时代》第30卷第544页。

③ 参阅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的答复，见《列宁选集》第4卷。

来,布尔什维克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对社会的专政**,而这个专政离开了国家便行不通。这主要是由于俄国经济不发达的缘故,所以潘涅库克修正了他早期的观点,即第三世界可以按俄国的模式解放自己,而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实现。东西方的工人阶级早就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同公有制或国有化搞混淆了;由于他们比资产阶级更因循守旧,要他们抛弃所承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更为缓慢,因此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潘涅库克看来,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不是一种引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仅仅是工人阶级现实运动的表述。同样,工会、政党和国家的概念基本上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并将随着它一同消失。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绝对需要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不允许把工人阶级的活动与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思想各个领域的管理分裂开。潘涅库克认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在任何革命形势下,都不得不以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资本的**利益**。他甚至概略地描述了一幅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在那里将没有政府,只有一种委员会的分级制,而工厂委员会是这一**管理制度的基础**:

“这些委员会不是政府;甚至最高一级委员会也没有政府的性质。它们不具备任何把它们**的愿望强加给群众的手段**;它们没有权力机构。”<sup>①</sup>

这些委员会将组建一个首先按劳分配的社会,再达到这样的阶段:社会消费超过个人消费并实行能确保实现《哥达纲领批判》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著名口号的自由分享。

潘涅库克的观点得到了一个荷兰同时代人海尔曼·戈尔特的支持。他是一名诗人,于1926年创立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戈尔特否定列宁说,俄国的经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适

---

① A·潘涅库克:《工人委员会》,墨尔本1950年版第52页。



用。在西欧,工人阶级必然成为生产的中心,有自我组织的能力,而农民则是反动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应该是关注的中心,而党却是次要的。工会和党的进步作用已过时。潘涅库克这样写道:

“工会和政党这些旧的组织形式,与委员会(苏维埃)这种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属于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必须在资本主义内部争取无产阶级在其他阶级中的地位,属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后者必须为工人赢得绝对的统治,摧毁资本主义,结束阶级分化,属于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sup>①</sup>

威廉·赖希的著作继续强调在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提高阶级意识。他强调有必要把无产阶级从一切生活领域——特别从性领域——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赖希不同于大多数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他对妇女和青年满怀信心。这些人比社会上其他人受压抑更深,因此更有机会看透这种压抑的机制。象其他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一样,赖希也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加强党和工会的集权主义结构,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sup>②</sup>。

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取决于无产阶级对两次大战间出现的政治挑战作出自发反应的能力。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在工人中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所以到1930年代后期他们(例如潘涅库克、科尔施、赖希)的大部分著作愈来愈抽象,愈来愈脱离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

### 参考读物

关于其他主要人物,英文书籍论及者很少,斯马特编的文集对基本原著

---

① A·潘涅库克:《组织问题综述》,载《现代马克思主义》第4卷第148页。

② 详见C·赖克罗夫特:《赖希》,纽约1971年版第3和4章。

选得很精彩。马蒂克最近撰写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潘涅库克著的《哲学家列宁》新近已再发行英文版。

## 文献目录

S·布里辛纳编《潘涅库克和工人委员会》，密西西比州圣路易 1978 年版。

P·马蒂克：《反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伦敦 1977 年版。

A·潘涅库克：《哲学家列宁》，纽约 1948 年版。

——《工人管理的道路》，伦敦 1957 年版。

D·A·斯马特编《潘涅库克和戈尔特的马克思主义》，伦敦 1978 年版。

## 第十四章

## 葛兰西

### 引言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所关注的许多问题,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是相同的。葛兰西和他们一样,深信革命运动必须从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着手。换言之,他和卢卡奇一样强调整体性概念。葛兰西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主观的、具有创造性的方面。他始终是一位彻底的革命家,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各个方面,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重要性。葛兰西的生活和思想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18年以前,他作为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成员,一直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批判。在1919和1920这两个“红色年”中,他是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幕后主要鼓动者,是《新秩序报》的主编。1921至1926年,他从意大利共产党创立起,便是该党领导人之一,而忙于制定党的政策,并与第三国际进行谈判。最后,自1926年入狱以后一直到1937年逝世为止,他都在撰写他的重大理论著作《狱中札记》。尽管他的生涯变化多端,尽管他关注的事多种多样,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过程的想法则具有某种连续性。

## 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

1891年葛兰西生于撒丁的阿莱斯。撒丁是新统一的意大利极落后的地区，一直受外国征服者的长期剥削，还没有完全迈出封建时代。葛兰西的母亲出生自小康的撒丁人之家，而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大陆本土的小文官。在他三岁那年发生了一起事故，使他成了驼背；他父亲又由于没有处理好本职工作受到了监禁。这就是说，葛兰西的童年是贫穷孤苦的。尽管他很孤独，但求知欲很强，在校成绩优异，终于进入了当地的报界。后来他就读于都灵大学，攻读语言学。1913年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1916年任该党《前进报》专职记者。葛兰西深受索列尔工联主义情绪的影响，但这时主要影响他的是克罗齐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克罗齐强调通过文化的传播来促进个人的道德责任心和发展社会主义。葛兰西在克罗齐的部分影响下，比马克思以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注重历史学。1917年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他着手积极组织政治组织，成为新兴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卓越的人物。

战后，意大利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时农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由于农民应征入伍，农业处于严重的凋敝状态。国家由于战争开支而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复员的士兵扩大了失业的人数。由于这次经济危机和战后生活水平的下降，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加强了。在战争中很多资本家发了横财，社会党人则反对战争。许多工人，尤其是都灵大冶金企业中的工人，都认为工会过于软弱，而且疏远了基层的反对派。工厂委员会运动正是由于这种动荡不安而兴起的。工厂委员会的萌芽是工会会员选举出来的“厂内委员会”，它是前十年在这些工厂内建立起来的，以处理有关仲裁和纪律之类的细小事宜。到1918年，“厂内委员

会”日益被看成是能够代表和捍卫工人阶级实际利益的团体了。

葛兰西和《新秩序报》希望“厂内委员会”能转变成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写道：

“今天，厂内委员会在工厂里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起了仲裁和维持纪律的作用。明天，它们发展和充实起来，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代替资本家行使管理和行政方面一切有益的职能。”<sup>①</sup>

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是要保证：首先，公司的每一个人选出他们的代表；其次，委员会必须切实建立在工厂内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后来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规定如下：

“每个工厂划分为若干个车间，每个车间按不同工种划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在劳动过程中负担一部分具体工作。每个小组的工人从其成员中选出一名代表，授之以权力和可撤销的委任。全厂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自身选出执行委员会。各厂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书记大会则轮流组成各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一个全市的教育委员会，负责组织宣传、起草工作计划、批准各工厂甚至个别工人提出的方案或建议；最后并领导整个运动。”<sup>②</sup>

他认为，工厂委员会同它所控制并最终取代的工会大不相同：

“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过程同具有自愿性和契约性的革命组织（如政党和工会）的发展和活动是两码事。这些组织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范围内产生的，是对这种政治自由的肯定和发展……而革命过程则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发生在工厂中，在那里存在着的关系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在那里工人没有自由，民主也不存在。”<sup>③</sup>

① A·葛兰西：《工人的民主》，载《政治著作选（1910—1920年）》，伦敦1977年版第66页。

② A·葛兰西：《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载同上书第317页。另外参看都灵工厂代表第一次大会通过的纲领，载同上书第114页以下。

③ A·葛兰西：《工厂委员会》，载同上书第260页以下。

工会,换言之,官僚主义和权贵性质的组织,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在这方面意味深长的是,《新秩序报》大肆强调在工厂内部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强调的目的是使工人能够控制和扩大真正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同资本家计较更大的眼前利益。

在对意大利进行革命改造的这个时期,工厂委员会是葛兰西关注的中心问题。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工人群众的态度,即从依附的态度改变为领导的态度。工厂委员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是通过把那些还没有代表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活动中来,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才干,这样便更新了工会和党,为一个新型的工人国家奠定了基础。因为工厂委员会是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型:

“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蕴藏在以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为特色的社会生活机构中。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经过协调和安排,使他们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集团,同时尊重每个机构必要的自主权和发言权,这样就能立刻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一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进行积极有效反抗的工人民主;就能立刻准备取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行使管理和控制民族遗产的全部基本职能。”<sup>①</sup>

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的描绘看起来很象俄国苏维埃那幅理想的蓝图。无疑,俄国苏维埃作为一种双重权力机构在1917年所起到的作用,对他很有影响。不过,强调生产中的技术效率,并把工厂委员会设想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治政府,这就远远超过了俄国苏维埃的模式。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和苏维埃权力下降这个过程,葛兰西于是强调党是对工厂委员会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起初,葛兰西曾把1917年的革命刻划为“反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革

<sup>①</sup> A·葛兰西:《工人民主》,载《政治著作选》第65页。

命”<sup>①</sup>，一次自发的、自由意志的爆发。直到1921年，葛兰西对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态知之甚少<sup>②</sup>，他所得到的消息都强调苏维埃的作用。看来他悉心研究的仅有列宁的一本著作，即《国家与革命》，在这本书里党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毫不足怪的是，他认为列宁、卢森堡和潘涅库克观点非常一致。

但由于1920年末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宣告失败，加上他日益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对法西斯崛起的关注，使葛兰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有个不甚重要的例证，那就是葛兰西把“雅各宾”一词日益使用于褒义，而该词在1920年以前始终是贬义词）。葛兰西是主张脱离意大利社会党且于1921年1月成立意大利共产党的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甚至在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就在一篇受到列宁赞许的文章中宣称：

需要“一个同质的、内部团结的党，这个党有自己的理论、战略和森严的纪律”。

没有共产党，没有一个能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协调和集中无产阶级全部革命行动的”<sup>③</sup>共产党，工厂委员会运动就注定要失败。

的确，葛兰西认为，这就是1920年失败的主要原因。足以进一步说明他的这种重点转变的是，他把党分成如下三级并作了较有军事色彩的描述：大尉——指导和制订战略；下士——传达大尉的旨意；受过训练的忠诚士兵——他们“没有任何创造精神和组织能力”<sup>④</sup>。但葛兰西始终认为，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存在着一种辩

① A·葛兰西：《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载同上书第94页。

② 详见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伦敦1977年版第163页以下。

③ A·葛兰西：《走向社会党的复兴》，载《政治著作选》第194页以下。

④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Q·霍尔和G·N·史密斯编，伦敦1971年版第152页。

证关系。例如，他对自己所说的“有机的集中制”作了如下的阐述：

“意见一致不可能是消极的和间接达成的，而必须是积极的和直接达成的。因此意见一致需要有每个人参加的意见，哪怕这会给人以分裂和混乱的外观。只有集中每个人的意见，使多样性统一起来，才能形成集体的意识，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有机体。”<sup>①</sup>

葛兰西象卢卡奇一样，强调党的道义性。他也象卢卡奇一样，在列宁和卢森堡之间持中间立场。他既反对自发性，也反对“命令主义”。他对自发的感情做了这样的表述：

“自发的感情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领导集团系统地开展教育活动的结果，而是通过‘常识’（即人们传统的世界观）所说明的日常经验而形成的，这种经验由于缺乏想象力而被称为‘本能’，其实也是一种原始的、基本的历史产物。”<sup>②</sup>

这样的感情并非错误，但必须“给予有意识的领导，或者纳入政治斗争而使之提高到更高的水平”<sup>③</sup>。相反，命令主义（葛兰西把命令主义和意共另一主要理论家波尔迪加所鼓吹的狭隘先锋队党联系起来）不懂得：

“党是革命群众的自发运动和中央有组织、有指导的集中意志这二者相结合的辩证过程产生的结果，而只把它看成是某种飘浮在空中的东西，它只限于自身中，为自己而发展，只有当形势有利、革命进入高潮、或党中央认为必须发动攻势和深入群众去鼓动并带领群众行动的时候，群众才会够得着它。”<sup>④</sup>

---

① A·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札记》，都灵1949年版第158页，引自J·皮沃特：《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巴黎1970年版第244页。

②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98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199页。

④ 《1924年1月9日葛兰西致陶里亚蒂》，引自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第208页。



因此，葛兰西虽然在1920年以后进入了他所称的“必然王国”而很少谈及工厂委员会运动，但他却没有放弃早年他在都灵的经验教训。尽管需要同波尔迪加妥协，又和第三国际有紧密的联系，但他强调的重点却仍和列宁有别。正如他在论述自发性和命令主义时指出，他不象列宁那样强调“来自外部的意识”（列宁至少在《怎么办？》一书中作如此主张）。而且，列宁似乎比葛兰西更加关心政治战略的“时机”方面和直接掌握政权的问题。但只是在《狱中札记》一书中，两人强调的重点才详尽地表现出真正的分歧。

### 《狱中札记》

《狱中札记》一书写于1929与1936年之间，无疑是葛兰西的主要理论成就。然而众人皆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札记是令人费解的。札记并非为发表而写，因而删繁就简不甚连贯之处颇多；葛兰西往往采用克罗齐和马基雅维里的语言来表述新概念；由于是狱中之作，札记往往故意写得很隐晦，甚至用暗示的手法以逃避检查；结果是，人们对这些札记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以致给意共当前的“历史性妥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提供了弹药。书中的主题是扩大知识分子的作用，突出领导权的概念和东西方革命战略必然的不同性。

### 知识分子

葛兰西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而最能说明他受如此看待的原因的，莫过于他思想中知识分子所居的中心地位。马克思根据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把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用于更狭义的传统概念；葛兰西则与马克思不同，把知识分子用于更为广义的

概念。在葛兰西看来，以前关于知识分子活动标准的定义过于狭隘了。

“在我看来，方法上最普遍的错误是，从知识活动的内在本质去寻求这种区分的标准，而不从知识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集团）在社会关系总复合体中占有其地位的整个关系体系中去寻求这种区分。”<sup>①</sup>

他继续写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sup>②</sup>。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说：

“最后，每一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之外，还从事某种方式的知识活动，就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审美观的人，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自觉的道德行为准则，从而对维护或改变世界观作出了贡献，即形成新的思想方式。”<sup>③</sup>

按照葛兰西的意见，每一个社会阶级

“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明确自己的职能。”<sup>④</sup>

葛兰西把“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传统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似乎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并超越了社会政治变革。这类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特别是牧师。虽然造就他们的生产方式已经消亡，但他们仍活了下来。他们与历史上垂死的阶级有联系，却自称在产生一种意识形态（通常具有唯心主义倾

---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8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页。

向)上具有某种独立性,以此来掩饰他们真正过时了。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那末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是社会学上涵义更为广泛的一个概念。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组织的程度如何,是看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到何种程度来定。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同时有一定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和生产界的关系没有和主要社会集团的关系那么直接,但这种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是以整个社会结构和综合的上层建筑为‘中介’的,准确地说,知识分子是综合上层建筑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衡量不同知识分子阶层的“组织性质”以及他们同主要社会集团联系的程度;应该能够对他们的职能和自下而上的上层建筑确定出一套等级。”①

葛兰西通过一系列历史研究,发展了他关于传统的和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例如,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终于在反对教士和贵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虽然在英国主要只限于经济方面)。在意大利,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的教会知识分子则竭力压迫或同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却造就了自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相当缺少传统的知识分子”,因此

“它比古老的欧洲发展速度要快得多。欧洲存在着一系列的牵制(道德上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牵制,这些牵制来自居民中特定的一部分人,即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政权的残渣余孽),以致对高速发展产生了反作用,给每一种首创精神报以节制的对策,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泯灭了首创精神。”②

---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造就本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葛兰西有时谈到这是任何革命运动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但这还不够：

“对任何正在走向统治的集团来说，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的工作做得越快和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就自己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有成果。”<sup>①</sup>

这些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葛兰西特别谈到他在《新秩序报》的经验），是把工人阶级活动中潜在的志愿和固有的潜力挖掘出来，并使之协调一致。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阶级的关系从而是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经验中吸取养料，同时又向工人阶级灌输理论意识。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形成，较之资产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形成要困难得多，因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已经享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有时候葛兰西竟然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能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sup>②</sup>

葛兰西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政党：

“对某些社会集团来说，政党只不过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内、而不只是在生产技术领域内造就它们自己那类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方法。造就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通过别的途径，而只能通过这一途径，是因为这个集团的一般性质及其形成、生活和发展的条件注定如此。”<sup>③</sup>

---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0页。

② 详见J·卡拉贝尔：《革命的矛盾：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知识分子问题》，载《政治与社会》，1976年第6卷第123页以下。

③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5页。

党是能同本阶级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这是陶里亚蒂首创的提法。葛兰西在谈到马基雅维里时，把党称为“现代王子”，他说党

“只能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一种复合成分；在其中，集体的意志得到了公认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行动，因而它开始有了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集体意志的胚芽聚合其中的第一个细胞，而这些胚芽将发展成为普遍的、全社会的意志。”<sup>①</sup>

第二国际在政治上之所以离经叛道（有人也许还要加上列宁主义某种形式的离经叛道），是由于否定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必然有机联系。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使他较之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准确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喜欢援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相信黑格尔的遗产尚未完全被那种企图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粗暴地对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所接受<sup>②</sup>。葛兰西写道，这种社会学

“一直企图按照预先制定的哲学体系的模式，去创造历史科学和政治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进化论者的实证主义方法……它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即企图用仿照自然科学模式制定的标准，来对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作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因此，它企图用‘预言’橡树生长自橡树籽的方法，‘凭经验地’解释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庸俗进化论植根于社会学，而社会学却不了解进化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sup>③</sup>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发展，而且是

“已从任何片面的、盲目的意识形态成分中解放出来（或自身正想解放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29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

③ 同上书，第426页。

出来)的一种哲学;它是充满着矛盾的意识,在这些矛盾中,哲学家本人既被理解为个人,又被理解为一个社会集团的整体,他不但了解这些矛盾,而且把自己视为矛盾的一个成分,并把这个成分提高到认识的原则,从而也提高到行动的原则”。①

在这样论述时,葛兰西指出,把恩格斯的思想 and 马克思的思想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抛弃了普列汉诺夫的“庸俗唯物主义”,提倡回到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统一。他特别详尽地批判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指责该书宣扬哲学唯物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一种进化论实证主义社会学②。这样,葛兰西的主要兴趣不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更在于无产阶级能用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方法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政治手段。同科尔施一样,他摒弃他称之为“经济主义”和“意识形态主义”的这两种倾向。他声称:

“人们忘记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强调的是其第一个词‘历史’,而不是其第二个词。强调后者的根源是形而上学。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世俗化,是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③

正是在作这种论述中,葛兰西一再强调了“意志”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性④,概述了(虽然很简略)类似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论述的那种人道主义⑤,并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将支配必然⑥。

一般地说,葛兰西倾向于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基础。他对通过间接方式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深有体会的。他是最富有辩证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404页以下。

② 同上书,第385页以下,第396页,第425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465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172,175,185,345,360页。

⑤ 参见同上书,第351页以下。

⑥ 参见同上书,第367,405页。

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特别在《狱中札记》中)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分析,对上层建筑的分析,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分析等等,始终都是用辩证方法阐述的。

## 领导权

那么,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除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权以外,就是要用他们所代表的令人信服的意识形态来维护本阶级对全社会的领导权。正如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一样,他关于领导权的概念也修正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领导权这个概念原来用得过于狭隘,而他却扩大了这个概念的含义。在本世纪交替之际,普列汉诺夫及其同辈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大量使用领导权这一术语,来描述无产阶级在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这个术语也在1920年代第三国际的各种文件中再度出现过<sup>①</sup>。葛兰西特地承认,他受到列宁的启示。他认为列宁关于领导权的见解是列宁最大的理论贡献<sup>②</sup>。葛兰西继续使用这个术语,把它理解为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赢得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特别是农民)的领导权,并把这些力量组合为“一个新的、同质而没有内部矛盾的政治经济的历史性集团”<sup>③</sup>。这个历史性集团的概念,即把各种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联合成一个临时的统一体去改造社会,乃是葛兰西许多分析的核心。历史性集团,较之仅仅是联盟含义更为深刻,因为

---

① 参见C·布西-格鲁克斯曼:《葛兰西和国家》,巴黎1975年版第19页,又P·安德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载《新左派评论》,1976—1977年第100期第15页以下。

② 参见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365页。

③ 同上书,第168页。

“统治集团是具体地同各下属集团的一般利益相协调的，而国家生活则被认为是主要集团和各下属集团之间形成和变换其不稳定平衡（法律方面的平衡）的持续过程。在这种平衡中，统治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即不勉强短缺法人的经济利益。”<sup>①</sup>

葛兰西吸取了他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经验，扩大了领导权的概念，即把分析统治阶级取得下属集团服从自己统治的方法也包括进去。他写道：

“历史上的（也是具体的）进步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发挥这样一种感化力，即他们在征服其他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以后，自己也终于不复存在了；他们就这样在所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在心理素质上（虚荣心等）和常常是在身份特征上（技术界、司法界、法人等）互相凝聚的团结体系。”<sup>②</sup>

换言之，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由其知识分子彻底传播开来，最后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韦伯所分析的官僚主义和工艺的唯一理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部分，其作用就是压抑工人阶级任何创造发明的精神<sup>③</sup>。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大部分不必诉诸武力，这种对现实的认识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断言，当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正是领导权的历史性政治概念。”<sup>④</sup>

正如研究知识分子一样，葛兰西也借鉴历史研究来阐述领导权。例如，法国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对农民有号召力，从而一度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渗透到法国人民群众之中。另外，美国的统

---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82页。

② 同上书，第60页。

③ 见同上书“科学管理”或泰罗制一节，第301页以下。

④ A·葛兰西：《致卡西尔的信》，都灵1965年版第616页，引自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伦敦1977年版第260页。



治阶级由于在没有封建传统的情况下能直接运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便能够行使巨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另一方面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则只限于知识界的杰出人物,没有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任何基础。皮德蒙特的北方自由主义曾不得不用武力征服意大利,却不能对它行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为他们不去深入群众,不得不在政治上收买知识分子。葛兰西写道,“要是你研究一下意大利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你就会发现一小批领导人通过各种方法终于把群众运动所抛弃的政治人物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这些政治人物原来就具有破坏性。”<sup>①</sup>葛兰西后来认为:第二国际的失败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

这样,领导权的概念就解开了资本主义何以能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继续存在之谜:

“在今日议会制的传统领域,‘正常地’行使领导权的特点是武力与同意相结合,二者相互平衡,武力并不过分地压倒同意。的确,有人总是试图使人们相信,诉诸武力是根据所谓舆论工具(报纸、社团)所表达的大多数人的同意。这样,在一定情况下舆论工具就人为地有增无减了。”<sup>②</sup>

只要资产阶级继续行使这种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葛兰西喜欢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意识形态各种形式的论述,即人们在这些形式中意识到社会冲突并力求克服冲突,但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权还存在,无产阶级就仍然不会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本质,也不会懂得改造这种社会的可能性。因为资本家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

<sup>①</sup> 《致卡西尔的信》,第633页。

<sup>②</sup>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80页。

是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利益。这样，葛兰西认真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能通过同意而不是通过强制继续维持其统治。他作为第一个进行这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有丰功伟绩的，尽管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至少列宁先就作过概述。很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个特点，即相信经济决定论和革命不可避免性，但不论那一种信念对革命的成功都同样有致命的危害。因为，在葛兰西看来，

“这种信念有可能排除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本身能产生出重大历史事件；危机只能创造有利的环境去传播某种思想方式，传播那些涉及今后国民生活全面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sup>①</sup>

工人阶级为了建立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少为自己的狭隘宗派利益而斗争，而必须使自己能够成为全社会利益的捍卫者。无产阶级要建立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领导权，没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党也是一个根本因素。葛兰西关于党的见解，较之列宁的更为广泛，因为他认为党对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斗争和夺取政权都身负重任。葛兰西深信，列宁主义的战略轻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然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行不通。因此，他主张党在试图夺取政权之前，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机构），由它提供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在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方面取得支配地位。党组织（还有工厂委员会）预先训练工人管理自己的生活，从而为革命后的形势未雨绸缪。在市民社会中未享有领导权便控制政权，这对社会主义纲领来说便缺少可靠的基础。在一段与上下文无甚关系的话中，葛兰西甚至宣称：

---

<sup>①</sup>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84页。

“一个社会集团在赢得政权以前，可能而且确有必要已经在行使‘领导’了（这的确是赢得政权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行使权力时，这个集团随之成了统治力量。但是它即使已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领导’。”<sup>①</sup>

当然，这不是说葛兰西轻视了必要的暴力因素，他倒是把暴力同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辩证地结合起来，认为说服和暴力二者在任何革命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资本主义世界观已长期渗透到社会中的西方，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有时至关重要。葛兰西已认识到，如果不具有那些已为掌握政权和财权的人所拥有的全部手段，这一斗争是异常艰难的，因而他有时暗示，要造就一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队伍，否则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只有夺取政权以后才能正式行使。

### 国家、市民社会和革命

葛兰西对无产阶级可能在西方取得领导权的过程进行分析时，提出了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上把西方和俄国作了对比。虽然他和马克思都声称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俩对这一术语的用法却迥然不同。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指的是全部经济关系<sup>②</sup>，葛兰西则用以指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一般称为私有的那些结构的总和”，“它适于统治集团对全社会行使领导权的职能”<sup>③</sup>。有时，葛兰西也确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57页以下。

② 参见K·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D·麦克莱兰编的《著作选集》，牛津1977年版第46页以下。

③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12页。

实谈到市民社会在经济与政治之间起中介作用,说“市民社会存在于经济结构和拥有法律和强制手段的国家之间”<sup>①</sup>。不过,葛兰西通常使用市民社会来概指统治阶级在一切文化领域内,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全部组织和技术手段。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含义既非常广泛(甚至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又多种多样(从哲学到民谣),因而市民社会首先具有文化职能,并通过统治阶级的领导权来体现“国家的道德内容”<sup>②</sup>。

葛兰西对“国家”这一术语用法也不一样。有时它用来既包括市民社会,也包括政治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二者截然不同。葛兰西写道:

“国家的总概念所包含的成分需要回溯到市民社会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即强制之盾所保护的领导权)。”<sup>③</sup>

葛兰西在别处又说,国家等于专政加领导权;甚至还说“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一码事”<sup>④</sup>。1931年在谈到他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时,他写道:

“这项研究也得出了国家概念的某些规定性,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专政,或迫使人民群众在一定时期内顺应某一特定生产形式和某一特定经济的强制机构),而不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均衡物,也不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所谓个别机构(如教会、工会、学校等)对整个国民社会所行使的领导权;正是在市民社会里,知识分子起特殊作用。”<sup>⑤</sup>

虽然葛兰西明白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甚至在法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20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63页。

④ 同上书,第160页。

⑤ 《致卡西尔的信》,第481页。

西斯统治下二者的融为一体),但他毕竟把二者作了对比。这种对比在自由资本主义政权下较之封建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权下更为明显。

葛兰西最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之一,就是在这方面指出了东方(俄国)和西方的不同之处。下面这段话最引人注目:

“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初生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关系,国家动摇时,市民社会稳定的结构就立即显示出来。国家只不过是外围的一条濠沟,它后面还屹立着强固的堡垒和工事群。”<sup>①</sup>

这段话意味着,东西方的革命战略应当不同。在落后的社会里,国家应是正面攻击的目标;在较发达的社会里,正面攻击的目标应是市民社会。葛兰西借用现代军事科学研究中的术语,把上述第一种攻击称为“运动战”,即使用炮火在刹那间打开防御缺口,让部队可以迅速从一地转到另一地,以强攻夺取堡垒;把第二种攻击称为“阵地战”,即敌人的兵力配置均衡,而不得不安下心来作长期的堑壕战。例如,法国的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胜利之前就进行过这种阵地战,其形式是对贵族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采取长期的文化攻势。葛兰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阵地战日趋重要;而运动战对于工人阶级代价高昂,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葛兰西认为罗莎·卢森堡论《群众罢工》这本小册子,是试图从理论上为西方采用运动战辩护。卢森堡认为,经济危机能突然促发一场导致革命的总危机;葛兰西批评这种见解是“经济主义的”和自发论的。他写道,在卢森堡看来,直接的经济因素能起下列作用:

---

<sup>①</sup> 《致卡西尔的信》,第238页。

“1.经济因素在使敌人陷入混乱，并使之对自己、对自己的力量和前途丧失信心之后，会突破敌人的防御；2.经济因素在刹那间，会促使人们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并造就必要的干部，或者至少在刹那间会把现有的（直到那时由总的历史进程形成的）干部配备到能把分散的力量充实起来的阵地上；3.经济因素会在刹那间使人们的思想必然集中于要达到的共同目标上。这种观点是顽固的经济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把夸大的经济因素想象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能起闪电般作用的东西。因此它是十足的历史不可知论，只期待着某种奇迹的出现。”<sup>①</sup>

另一方面，运动战也决不能完全放弃：

“在政治上，只要还有夺取非决定性阵地的问题，因而国家领导权的一切手段不可能都调动起来时，运动战便总会存在。但是，当非决定性阵地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价值，而唯有决定性阵地是成败关键时，人们才会转而采取围攻战；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需要特殊的耐性和创造性。”<sup>②</sup>

换句话说，葛兰西是在告诫人们，不要简单地以为在俄国奉为楷模的列宁主义战略，可以毫无问题地适用于西方。因为

“运动战日益成为阵地战，而且可以说，一个国家只要在和平时期在技术上时刻准备打一场战争，它就会赢得这场战争。庞大的现代民主结构，既包括各种国家机关，也包括市民社会中各种企业团体的复杂机构，只要出于政治艺术的考虑，就可以构成类似阵地战前沿的‘战壕’和永久性防御工事；它们仅仅体现了以前通常视为战争‘整体’的‘部分’运动因素。”<sup>③</sup>

与区分阵地战和运动战有关联的是，葛兰西把机制性危机同偶然性危机区分开来。他写道：

① 《致卡西尔的信》，第 2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39 页。

③ 同上书，第 243 页。

“必须把机制性的运动（相对永久性的）和可以称之为‘迸发性的’运动（它是偶然而直截了当地、几乎是意外地出现的）区分开来。当然，迸发性现象虽依从于机制性的运动，但没有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们只提出一些政治上无伤大雅的、就事论事的批评，而且批评的对象只是对政府负有直接责任的上层政治领导和政治人物。相反，机制性现象则提出社会历史性的批判，其对象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集团，而不仅限于社会头面人物和上层领导人。”<sup>①</sup>

是阵地战适宜还是运动战适宜，取决于估计危机是机制性的还是迸发性的。如果现有统治阶级几十年来都面临着不可救药的结构上的矛盾，那么机制性的危机可能为运动战提供机会，因为机制性的危机能使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造成破裂，从而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一次危机。

葛兰西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将要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差别：

“只有以国家消亡和自身消亡为奋斗目标的社会集团才可以缔造一个道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要消除被统治者的内部分裂等现象，并造就一个技术上和道义上一致的社会机体。”<sup>②</sup>

葛兰西认识到，一个过渡时期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必须在过渡时期依靠政权来改造市民社会，于是产生他称之为“中央集权”<sup>③</sup>的现象。不论葛兰西在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时如何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他们二人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即用市民社会来把政治社会重新吸收为无阶级的社会。

1920年代葛兰西以其共产主义政治学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阐

① 《致卡西尔的信》，第177页以下。

② 同上书，第259页。

③ 同上书，第268页以下。

明了东方和西方、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差别。他关于知识分子、领导权等的思想虽然是在身系囹圄中表述出来的，却与他十多年前在意大利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密切有关。在意大利，1926年在他指导下通过的《里昂提纲》，已把葛兰西关于党的知识分子和领导权的观点载入了典籍。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殊异和必须争取农民的支持这个中心问题，已成为他在囚禁期间撰写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文章《论南方问题》的主题。在国际舞台上，他在政治策略方面所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托洛茨基。葛兰西坚持（至少在原则上）第三国际1923年以后的政策，这必然导致和托洛茨基的冲突。从1921到1924年，葛兰西实际上倾向于在意大利反对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但当波尔迪加在1924年的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季诺维也夫短暂地“向左转”的鼓舞而在意大利开始捍卫托洛茨基时，葛兰西从“中间派”立场出发起来反对波尔迪加，但又被迫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立场。葛兰西反对托洛茨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革命前途暗淡的观点，而且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也被意共中央委员会（葛兰西和他的支持者在其中居多数）谴责为

“一种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悲观论点和一种在革命过程中忽视工人和农民之间正确关系的观念……认为如果西方工人阶级的胜利在短期内还得不到最发达的工业国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帮助，那么在小资产阶级居优势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便必然失败并必然蜕化。”<sup>①</sup>

1929年第三国际再次改变路线。它宣称资本主义的新崩溃在西方已迫在眉睫，而社会民主党人竭力支撑旧秩序，因此应视为主要敌人。葛兰西反对这种“阶级反对阶级”的论点，但他仍然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sup>①</sup> 引自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第219页。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构思了《狱中札记》的表述。在这本书中，葛兰西对不断革命论的各个方面丝毫不表同情。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关于俄国革命演变的思想，被描述为“呆板的和抽象的”<sup>①</sup>。葛兰西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而坚持革命、坚持民主专政，是实践中发展领导权概念的典范<sup>②</sup>。他确实勉强承认了托洛茨基在1917年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关于国际方面的思想却是葛兰西主要关注并予以批评的。葛兰西还承认，托洛茨基在1924年区分了东西方战线，从而对当时的策略做了大致的修正，但那也只是“毫无实际指导意义的官样文章”。<sup>③</sup>大体上说，葛兰西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个“在进攻只能带来失败的时期主张正面进攻的政治理论家”。在《狱中札记》中，他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区别开来，认为托洛茨基比较狭隘地力图把由于特殊原因而在俄国获胜的方法，机械地应用于其他国家；而列宁则灵活得多。不断革命论是“运动战理论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落后国家全部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反映，因为这类国家的国民生活结构尚处于稚弱和松散状态，还不能成为‘战壕或堡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布朗斯汀（托洛茨基）是貌似‘西方派’，而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表面上的民族派，表面上的西方派或欧洲派；相反，伊里奇（列宁）则是彻底的民族派，彻底的欧洲派”<sup>④</sup>。葛兰西极为反对他视之为托洛茨基的机械国际主义的东西。他写道：

“诚然，发展的路线是走向国际主义，但出发点是‘民族的’……那些民族性质的大事是正是在领导权概念中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很清楚，何以某

---

①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165页。

③ 同上书，第236页。

④ 同上。

些倾向要么回避这样的概念,要么仅仅加以掩盖。”

在论及第二国际的经验和托洛茨基在 1920 年代中期的观点时,他继续写道:

“非民族概念(即不能提及个别国家)是错误的,因而可以说是荒谬的。其所以荒谬,是因为这些观念在两个不同的阶段都使人陷入被动和无所作为: 1. 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相信他们应该发动运动,就是说,人们相信他们一动手干就会陷入孤立境地;他们等待每一个人都一齐动手,可是没有人会同时动起手来或组织为运动; 2. 第二个阶段也许更糟,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违反自然的‘拿破仑主义’的形式(并非所有的历史阶段都能以同一形式再现)。这种现代形式的旧式机械论在理论上的弱点是以不断革命的一般理论来作掩饰,而不断革命论只不过是貌似一般预想的教条而已,实际上不能实现而最终幻灭的。”<sup>①</sup>

因此,在关于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争论中,葛兰西终于支持斯大林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有一个方面葛兰西确实是同托洛茨基一致的,那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最明显不过的是,葛兰西把法西斯主义分析为小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失去政治影响而作出反映的一种运动。他写道:“法西斯主义具有特征的方面是它成功地组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sup>②</sup>

葛兰西看出,一场最初促使传统资产阶级国家崩溃的革命运动,后来逐渐变成反动的了。法西斯主义把一切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都集中在国家手里,从而剥夺了市民社会的自主权。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能抑制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

<sup>①</sup> A·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第 240 页以下。

<sup>②</sup> 引自 J·乔尔:《葛兰西》,伦敦 1977 年版第 57 页。

料的控制权。因此，法西斯主义可能只是一种短暂现象，从长期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会再度夺回政权。

除俄国革命者外，葛兰西是近五十年来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贡献遍及十月革命以后的十年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全部领域。他在言论上同潘涅库克和戈尔特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相同，还在行动上积极参与第三国际的活动。他论述领导权体系以及知识分子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起有机联系的著作，是直接根据马克思的著作和（程度上稍逊地）根据列宁的著作写出来的。

## 参考读物

### 原著

葛兰西的主要著作《狱中札记》已有精选的版本。辅助资料有两卷本的《政治著作选》，包括直到入狱前的年代和《狱中书信》。

### 评论

费奥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位革命家的一生》是最佳最全面的传记。乔尔在《现代大师》一书中有一篇极精彩的短篇介绍。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博格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也很精彩。较长篇的论述，有卡麦特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戴维森的《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关于葛兰西在都灵的革命活动，见克拉克的详细历史书《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失败的革命》。带有党派性的论著，见威廉斯的《无产阶级秩序》和斯普里亚诺的《占领工厂》。专门论述《狱中札记》的，见霍尔和N·史密斯为该书第三版撰写的导言，以及安德森分析得很透彻的文章《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

## 文献目录

### 原著

A·葛兰西：《青年葛兰西论历史、哲学和文化》，P·卡瓦尔堪迪和P·皮科尼合编，圣路易1975年版。

——《狱中来信》，纽约1973年版。

——《现代王子及其他》，L·马克斯编，伦敦1957年版。

——《新爱丁堡评论》，1974年有三期葛兰西专号。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C·马尔札尼编，纽约1957年版。

——《政治著作选(1910—1920年)》，伦敦1977年版。

——《政治著作选(1921—1926年)》，伦敦1978年版。

——《狱中札记选》，Q·霍尔和N·史密斯合编，伦敦1971年版。

### 评论

P·安德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载《新左派评论》第100期，1976—1977年。

T·巴特斯：《葛兰西和领导权理论》，载《思想史杂志》第36期，1975年。

C·博格：《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6年版。

J·卡麦特：《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斯坦福1969年版。

W·克拉克：《安东尼奥·葛兰西和失败了的革命》，纽黑文1977年版。

A·戴维森：《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伦敦1977年版。

——《不同时期对葛兰西的研究》，载《政治研究》第20期，1972年。

J·费米娅：《葛兰西思想中的领导权和意识》，载《政治研究》第23期，1975年。

G·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位革命者的一生》，伦敦1970年版。

J·乔尔：《葛兰西》，伦敦1977年版。

V·基尔南：《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载《社会主义年鉴》，1972年。

N·麦金尼斯：《安东尼奥·葛兰西》，载《综览》第53期，1964年。

J·梅林顿：《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和实践》，载《社会主义年鉴》，1968年；又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1977年版。

A·波佐利尼：《安东尼奥·葛兰西：他的思想简介》，伦敦1970年版。

P·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1920年的意大利》，伦敦1977年版。

P·陶里亚蒂：《论葛兰西及其他》，伦敦1977年版。

G·威廉斯：《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中的领导权概念》，载《思想史杂志》第21期，1960年。

——《无产阶级秩序：安东尼奥·葛兰西、工厂委员会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伦敦1975年版。



## 第四编

# 中国和第三世界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毛泽东 1938年





## 第十七章

# 拉丁美洲

### 引言

拉丁美洲受殖民统治比中国长得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以反抗西班牙为主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由于美国经济渗透的影响而受到了挫折。这一影响既有助于工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又有助于雇佣无地劳动者的大土地所有权的保持。与此同时，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中，长期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其数量大大超过工厂的工人。最后，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准无产阶级，他们非正式地从事服务性行业，其数量比所有制造业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在内还要多。

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进入了拉丁美洲的舞台。但因为工业发展不平衡，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保护相对小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群众则更愿意接受民粹主义或阶级合作主义思想，例如庇隆主义。因此正式的共产党成了制度内部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捍卫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

### 古巴

古巴革命是这一事态的一个实例，因为它既不是工人阶级发

动的，也不是共产党发动的。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们最初是从反对西班牙和美国的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启发的，而与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联。卡斯特罗起初在1953年试图推翻巴蒂斯塔，其后在1956年以一小批人发动成功的游击战争，都没有背离上述传统。卡斯特罗强调群众的支持，强调古巴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是针对靠美国撑腰的巴蒂斯塔腐败而暴虐的政权及其中间阶级联盟。1956年11月发表的七·二六运动宣言宣称：

“七·二六运动可以定义为以民主的、民族主义的和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为指导的……就民主而言，七·二六运动认为杰斐逊的哲学仍然有效，并且完全同意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信条。”<sup>①</sup>

特别是，卡斯特罗没有看到党的必要性。德布雷曾引用他的以下说法：

“没有先锋队就没有革命；这个先锋队不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只要是想干革命的人，就有权利和义务不必依赖那些政党把自己组织成先锋队。”<sup>②</sup>

但这并非否认古巴工人阶级，共产党的确对古巴革命的成功也是必要的。甚至在最初进攻蒙卡达兵营时，就得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支持<sup>③</sup>。虽然起义军大部分是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成分构成的，它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却得到了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援助。无产阶级在1959年关键时刻的总罢工，使卡斯特罗能够取得政权。古巴共产党公开支持过1940年的巴蒂斯塔第一任政府，甚至在1952年政变以后，共产党要员还成了巴蒂斯塔政府的成员。共产

① 七·二六运动的纲领，引自R·希尔和M·蔡特林：《古巴：美洲的一场悲剧》，哈门德斯沃兹1964年修订版。

② R·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哈门德斯沃兹1968年版第96页。

③ 详见J·伍迪斯：《革命的新理论》，伦敦1972年版第200页以下。

党曾把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作为“盲动主义者”来反对，只是在后者必将成功的时候才给予公开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共产党训练有素而纪律性强的干部积极参加，就不可能组织革命后的政府，并完成土地改革和群众教育的双重任务。

然而古巴革命转向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更多地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而不是由于内部的契机<sup>①</sup>。起初，古巴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和改良主义的国内政策，试图吸引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国有化措施和兴办农业合作社，遭致了美国的抵制和封锁；美国错误地把这些看成是共产主义的信号，其结果促使大批古巴资产阶级移居美国，也促使古巴政治更加激进化，而以美国背后支持的入侵匹格斯湾流产之后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达到其顶峰。

1961年7月卡斯特罗宣告组成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并合并了共产党，尽管在卡斯特罗的追随者和老式的共产党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共产党的弃绝暴力革命，更助长了这些分歧。苏联与古巴的态度截然不同，它希望同上述国家加强外交和商务关系，因此支持拉丁美洲共产党抨击任何武装革命的战略<sup>②</sup>。虽然巴蒂斯塔一倒台，古巴经济便大力强调按照苏联路线发展重工业部门，但在196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集中精力提高糖业生产水平，以便生产出为以后的多种经营所必须的剩余资金，又放弃了这条路线。古巴的许多经济计划总是过于乐观<sup>③</sup>，但它在社会平等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① 详见R·希尔和M·蔡特林：《古巴：美洲的一场悲剧》，该书中支持这一见解之处比比皆是。

② 见M·肯纳和J·佩特拉斯编《菲德尔·卡斯特罗言论集》，哈门德斯沃兹1972年版第181页。

③ 参看C·奥罗瓦：《古巴的新型农业》，巴黎1975年版第213页。

古巴革命起源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并认识到靠苏联外援是靠不住的，这些曾使古巴革命比任何别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革命在内）更多地强调觉悟和主观因素。按照格瓦拉的说法，

“一味幻想借助于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用钝了的武器（作为经济细胞的商品，利润，以及作为杠杆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来实现社会主义，很可能走入死胡同。

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在建立物质基础的同时造就新人。正确选择动员群众的手段之所以这样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手段从根本上说来必须具有道德的特征，即不忘记正确使用物质刺激，特别是那些带有社会性质的物质刺激。”<sup>①</sup>

与强调共产主义的道德方面一道，他们不承认分阶段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并试图通过扩大免费公用事业来绕过商品交换的经济。

### 里吉斯·德布雷

切·格瓦拉的实践和里吉斯·德布雷的理论认为，古巴经验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榜样。德布雷的观点与正统共产主义者的观点适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阶段的概念。照他们的说法，拉丁美洲正在经历一场由进步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来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和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场“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继之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参加议会和选举过程，以便建立由中间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来帮助前一个革命取

---

<sup>①</sup> 切·格瓦拉：《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载B·西尔弗曼编《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大辩论》，纽约1971年版第342页以下。

得成功。这一态度依据的是一种错误设想，即认为在城市资本家为一方与封建地主或美帝国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观点出发，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导致了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发展，其形式是里吉斯·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德布雷不仅拒绝了莫斯科的图式，也拒绝了毛的“四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甚至拒绝了托洛茨基以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为出发点的不断革命论。

德布雷在其通俗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中，对革命阶段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革命的初期进展，而在于革命能否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以前而不是其以后从实践中解决政权问题。……看来很明显，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在南美洲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的。”<sup>①</sup>

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要求创立游击中心，即游击活动的根据地或中央。据德布雷看来，“在今天的拉丁美洲，一条政治路线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明确而一贯的军事路线，它就不能被认为是革命的路线。”<sup>②</sup>

革命者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其答案是：“通过在适当选择的农村区域开展游击战争，或快或慢地集结起来一支机动的战略力量，作为人民武装和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sup>③</sup> 德布雷一一驳斥了武装自卫战略（因为它太被动了，易受政府的镇压）、武装宣传战略（因为它只能在军事行动胜利之后而不是先期开展）和中国的游击根据地概念（因为它所需要的一些条

---

① R·德布雷：《革命战略》，R·布莱克伯恩编，伦敦1970年版第71页以下。

② R·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第24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25页。

件,诸如广大的领土、稠密的农村人口、与友好国家邻界,以及敌军兵力不足等,在拉丁美洲并不具备)。

然后德布雷谈到了游击队与政党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他说:“使游击小组在战略和战术上服从于一个尚未根本改变其和平时期常规组织的党,或者把游击小组作为党的活动的一个分支来看待,都势必引起一系列致命的军事错误。”<sup>①</sup>只要必须与城市保持联系,游击队的领导人就势必脱离他的部队,以避免不必要地暴露而冒被捕的危险。只要依赖于城市,就会削弱游击队的士气,并往往遭到城市领导人的唾弃,因为后者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何况“山区能使资产阶级和农民成分无产阶级化,而城市则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sup>②</sup>。此外,依赖城市也打乱游击活动致胜所必要的统一指挥,而且分散游击队的力量。

德布雷的结论是,在中国毛泽东的权力高于朱德,在越南胡志明的权力高于武元甲,以及俄国内战期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地位,其所体现的军事服从于政治,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是不恰当的。在拉丁美洲,共产党没有能够象在俄国和中国那样生根和发展。因此,

“在一定条件下,政治与军事不可分割,而形成一个由人民武装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核心是游击队。作为先锋队的党可以以游击中心的形式而存在。游击队是尚未成熟的党。这是古巴革命提出的令人惊愕的新鲜事物……人民武装将是党的核心,而不是相反。游击队是核心的政治先锋队,并且能够从它的发展中产生出一个真正的党。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政治先锋队就必须先发展游击队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首先必须强调发展游击战争,而不是强调巩固现存的党或创立新党的原

---

① R·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因。这就是为什么起义行动在今天是头号政治活动的原因。”<sup>①</sup>

德布雷关于游击中心的整个想法源出于他对山区与平原或城市所作的对比。他把城市舒适生活对战士的影响估计得过火了。例如当他说下面的话时，他对城市与山区严格的两分法读起来几乎象阶级的两分法：

“一个游击小组与城市的领导人 或其 驻外代表 进行联络时，就是在与‘它的’资产阶级打交道。即使这个资产阶级是必要的（正如窒息时人造肺是必要的一样），这种利益上的差别……也决不应被忽略。”<sup>②</sup>

虽然中国出现过城市与农村接近的过程，德布雷事实上却反其道而行之：

“越南解放武装的军事金字塔是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而在拉丁美洲……这种金字塔倾向于从顶部朝下缔造——先是常备军（游击中心），然后是游击中心外围的半正规部队，最后或胜利后（古巴）则是民兵。”<sup>③</sup>

德布雷的三大金科玉律——经常警惕，经常存疑，经常转移——意味着把游击队同人民隔绝开来，这与毛泽东的农民是水、鱼在水中才能游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

游击中心理论陷入了把军事置于政治之上的境地，其方式毫无主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这是由于德布雷过高估计了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结构，以致认为其中革命条件业已成熟。德布雷从来没有讲清楚，何以一支游击队必定能够发展成为群众性政治运动——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却表明它能够导致一种僵化的官僚制度。这种藐视政治的倾向不仅仅是策略上的。正如埃奎巴尔·阿

① R·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第105、115页。

② 同上书，第69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迈德所写的那样：

“德布雷的游击中心理论拒绝与老百姓的有机联系，其原因并非只是害怕把自己暴露于政府的镇压之下，尽管这无疑是他立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这样做也不只是关心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主动性的问题。人们感到有某种更深的使人不安的东西，即一种与农村人口保持距离的意识（如果还不是完全不信任他们的话）；一种不敢承认的估计，即认为在拉丁美洲并不存在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及完全不相信政治过程和现有的政党是争取独立和社会革命的适当工具。”<sup>①</sup>

由于古巴革命以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趋于与美国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就更有必要了。再说，认为古巴革命没有党就成功了，也是一种错觉。在那里，特别在奥连特省，群众性革命组织是早就存在着的。人们得到一种印象，似乎卡斯特罗分子虽然没有政党，却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以致他们的见解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理论家们具有了吸引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很多证据表明，古巴革命极为特殊，因此不可能重演。首先，古巴革命在开始时的目标只是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政府；其次，当时的农民大部分被机械化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给无产阶级化了；第三，没有美国的干涉；最后，甚至连资产阶级也对巴蒂斯塔政权不满。象德布雷那样在理论上缺少政治分析，就产生了如下的普遍结果，即把拉丁美洲革命的伦理观念与美国人对游击战技术细节的注重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只是由一种军事浪漫主义观点给挂上钩的。该观点又与西欧最近的城市恐怖主义运动（德国的巴德-迈因豪夫组织和意大利的红色旅）有密切关系。

---

<sup>①</sup> E·阿迈德：《是激进的但是错误的》，见L·休伯曼和P·斯威齐编的《里吉斯·德布雷与拉丁美洲革命》，纽约1969年版第77页。



## 参考读物

### 古巴和拉丁美洲

关于对拉丁美洲的剥削的经典文献是弗兰克的《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佩特拉斯的优秀研究著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可以作为该书的补充。

关于古巴的背景,见布莱克伯恩的近著《奴役和帝国:现代古巴的形成》。关于卡斯特罗,见博纳奇和瓦尔德斯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选集》。肯纳和佩特拉斯汇编的一部《菲德尔·卡斯特罗言论集》已出版。西尔弗曼的文集《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重新发表了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古巴人的讨论。关于古巴群众参与活动的优秀著作是费根的《古巴政治文化的改造》。也可参看蔡特林的《革命的政治和古巴工人阶级》。奥康纳的《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详细论证了国际的和经济的压力。关于古巴经济,布尔斯廷的《古巴的经济改造》是与这场改造有着个人纠葛的作者对古巴建国初期的研究;休伯曼和斯威齐的《古巴的社会主义》考察了经济的发展;而弗拉吉纳尔提供了一部关于古巴主要的产糖业的研究。巴尔金和马尼萨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编了一本有用的文集,而瓦尔德斯和利尤文则提供了一个详尽的书目。

### 格瓦拉

最好的两部格瓦拉文选是博纳奇和瓦尔德斯的《切·格瓦拉选集》(附有完备的书目)和杰拉西的《我们必胜!切·格瓦拉的演讲和论著》。洛伊的《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本很好的评论。还有辛克莱为《现代大师》写的《格瓦拉》和拉夫雷特斯基的偶像化传记《欧内斯托·切·格瓦拉》。

### 德布雷

简炼的基本原著是《革命中的革命?》。《革命战略》收集了各种论文,论述古巴对拉丁美洲革命的经验教训。《狱中著述》更加揭示了德布雷的哲学心理,还可见他的修正主义著作《武器的批判》。至于评论,有布莱克伯恩为《革命战略》所写的简短导言,伍迪斯从正统共产主义观点出发的评论《革命的新理论》。最好的是休伯曼和斯威齐的《里吉斯·德布雷与拉丁美洲革命》。

## 文献目录

### 古巴和拉丁美洲

- R·亚历山大:《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斯坦福1973年版。
- L·安圭拉:《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纽约1968年版。
- D·巴尔金和N·马尼萨斯编《古巴:革命的逻辑》,纽约1973年版。
- R·布莱克伯恩:《奴役和帝国:现代古巴的形成》,伦敦1978年版。
- E·布尔斯廷:《古巴的经济改造》,纽约1969年版。
- F·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选集》,三卷本,R·博纳奇和N·瓦尔德斯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起出版。
- 《菲德尔·卡斯特罗言论集》,M·肯纳和J·佩特斯编,纽约1969年版。
- R·德布雷:《与阿连德的谈话》,伦敦1972年版。
- T·德雷珀:《卡斯特罗主义》,载德拉科维奇编《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66年版。
- R·费根:《古巴政治文化的改造》,斯坦福1968年版。
- M·弗拉吉纳尔:《糖厂:古巴糖业社会经济联合体》,伦敦1977年版。
- A·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纽约1969年修订版。
- P·弗雷尔:《受压抑的教育学》,纽约1971年版。
- L·休伯曼和P·斯威齐:《古巴的社会主义》,纽约1969年版。
- K·卡罗尔:《执政的游击队员:古巴革命的历程》,纽约1970年版。
- R·米利班德:《智利政变》,载R·布莱克伯恩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读物》,伦敦1977年版。
- J·奥康纳:《古巴社会主义的起源》,纽约州伊萨卡1970年版。
- J·佩特拉斯:《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纽约1970年版。
- J·佩特拉斯和M·蔡特林:《拉丁美洲》,伦敦1968年版。
- B·西尔弗曼编《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大辩论》,纽约1971年版。
- N·瓦尔德斯和E·利尤文:《古巴革命:调查研究指南(1959—1969年)》,

新墨西哥 1971 年版。

J·赞米特编《通向社会主义的智利道路》，布赖顿 1973 年版。

M·蔡特林：《革命的政治和古巴工人阶级》，纽约州普林斯顿 1970 年版。

## 格瓦拉

### 原著

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纽约 1968 年版。

《切·格瓦拉论革命：文件总汇》，J·马林编，迈阿密 1969 年版。

《切·格瓦拉言论集》，G·兰万编，纽约 1969 年版。

《切·格瓦拉选集》，R·博纳奇和N·瓦尔德斯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70 年版。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完整的日记及其它被俘获的文件》，D·詹姆斯编，纽约 1969 年版。

《切·格瓦拉日记》，R·希尔编，纽约 1968 年版。

《我们必胜！切·格瓦拉的演讲和论著》，J·杰拉西编，纽约 1968 年版。

### 评论

J·拉夫雷特斯基：《欧内斯托·切·格瓦拉》，莫斯科 1976 年版。

M·洛伊：《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革命战争》，纽约 1973 年版。

A·辛克莱：《格瓦拉》，伦敦和纽约 1970 年版。

## 德布雷

### 原著

R·德布雷：《武器的批判》，两卷本，伦敦 1977 年起出版。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谈话），载《新左派评注》第 105 期，1977 年。

——《狱中著述》，伦敦 1973 年版。

——《革命中的革命？》，纽约 1967 年版。

——《革命战略》，R·布莱克伯恩编，伦敦 1970 年版。

## 评论

L·休伯曼和 P·斯威齐编《里吉斯·德布雷和拉丁美洲革命》，纽约 1969 年版。

J·伍迪斯：《革命的新理论：评弗兰茨·法农、里吉斯·德布雷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见解》，伦敦 1972 年版。

## 第十八章

# 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现象

作为一个极其简短的附言，应当提一下新近关于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拉丁美洲的经验中得到鼓舞的。在经济领域中，他们都效法德布雷一类作者在政治领域中的做法，拒绝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宣告：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①</sup>

他以同样的基调评论了不列颠在印度的进步性作用。只有在论及英国阻碍爱尔兰发展时，他才接近于认为殖民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也许与在西欧获得的结果不同。与此形成对照，许多新近论述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54—255页。

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强调，外来资本的渗透如何有效地产生了其受害者<sup>①</sup>。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显然在任何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革命理论中，农民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国得出经验以前，农民被看作只是提供剩余价值以投资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源泉。例如，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注意中心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则基本上是为了说明西方工人贵族的出现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争的发生。即使在托洛茨基的混合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理论中，发达工业国的工人阶级也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在所有经典作家中，只有葛兰西在他论述意大利南部问题的著作里，才严肃地提出了农民的不发达问题。关于帝国主义的传统见解，则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为寻求原料、寻找国外投资出路和扩大其工业品市场的必然发展。对帝国主义的这最后两点假定，看来已越来越（或者根本）不适用了。这个事实彻底修正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某些思想家甚至说，第三世界对于发达地区的发展已成为累赘了。这种看法上的变化体现在下述事实中，即民族资产阶级在列宁看来是进步的和民主的阶级，而在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论者看来，则是反动的和寄生的阶级。承认民族主义必不可少，重新评价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抛弃无产阶级（象法农那样），给予农民以中心地位，以及世界资源严重枯竭的生态学威胁，都使讨论的背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相比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鼓吹西方非工业化和第三世界农民自给自足的纲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

---

<sup>①</sup> 在这方面有创见的著作是P·巴兰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1957年版），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354—355页对巴兰的引述。

## 参考读物

对马克思本人思想背景的说明,见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和阿维尼里的文集《卡尔·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详见肯普、萨克利夫和欧文、基尔南,以及巴勒特-布朗的研究著作。一部好的、非技术性的全面评介是沃斯利的《第三世界》,但对整个这个题材作出最简炼介绍的是福斯特-卡特的文章《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和不发达问题的探索》。巴兰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和弗兰克的《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基本著作。继他们之后有阿明的两项主要贡献《世界规模的积累》和《帝国主义与不平衡发展》,以及埃曼纽尔的《不等价交换》。也可参看阿里吉的开创性研究《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和他最近的综合性论著《帝国主义的几何学》。关于非洲,见法农的名著《大地的受苦人》和考特对法农的评论,以及弗里德兰和罗斯伯格合编的《非洲社会主义》、尼雷尔的《乌贾马》和阿克的《非洲的革命压力》。

## 文献目录

- C·阿克:《非洲的革命压力》,伦敦1978年版。
- S·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纽约1974年版。
- 《帝国主义与不平衡发展》,苏塞克斯郡哈索克斯1978年版。
- G·阿里吉:《帝国主义的几何学》,伦敦1978年版。
- 《罗得西亚的政治经济》,海牙1970年版。
- S·阿维尼里编《卡尔·马克思论殖民主义和现代化》,纽约1968年版。
- P·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1957年版。
- M·巴勒特-布朗:《帝国主义经济学》,伦敦1975年版。
- H·伯恩斯坦:《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学对发展的研究》,载《发展研究杂志》第7卷第2期,1971年。
- G·查连德:《第三世界的革命:从1945年到今天》,哈索克斯1977年版。
- D·考特:《法农》,伦敦1970年版。
- R·库斯坦蒂诺:《新殖民主义的特性和反意识:漫谈非殖民化文化》,

I · 梅扎罗斯编, 伦敦 1977 年版。

A · 埃曼纽尔,《发达的神话与不发达的神话》,载《新左派评论》第 85 期, 1974 年。

——《不等价交换:对帝国主义自由贸易的研究》,伦敦 1972 年版。

F · 法农:《大地的受苦人》,伦敦 1965 年版。

A · 福斯特-卡特:《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和不发达问题的探索》,载 K · 埃曼纽尔和 G · 威廉姆斯编《社会学和发展》,伦敦 1974 年版。

——《生产方式辩论》,载《新左派评论》第 107 期, 1978 年。

A · 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纽约 1971 年第二版。

——《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载《每月评论》第 8 期, 1966 年。

W · 弗里德兰和 C · 罗斯伯格编《非洲社会主义》,斯坦福 1964 年版。

D · 霍罗威茨:《帝国主义和革命》,伦敦 1971 年版。

K · 埃曼纽尔和 G · 威廉斯编《社会学和发展》,伦敦 1974 年版。

约翰·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关于发展的政治学》,纽约 1968 年版。

T · 肯普:《帝国主义理论》,伦敦 1967 年版。

V · 基尔南:《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伦敦 1976 年版。

G · 利希特海默:《帝国主义》,纽约 1971 年版。

——《东方的专制统治》,载利希特海默:《意识形态的概念》,纽约 1967 年版。

U · 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伦敦 1976 年版。

J · 尼雷尔:《乌贾马:社会主义论文集》,牛津 1968 年版。

H · 雷迪斯编《国际商行和当代帝国主义》,伦敦 1975 年版。

G · 斯特德曼-琼斯:《美帝国主义史》,载 R · 布莱克伯恩编《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社会理论读物》,伦敦 1972 年版。

R · 萨克利夫和 R · 欧文:《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伦敦 1972 年版。

J · 维拉米尔编《跨国资本主义和民族的发展:依附性理论的研究》,苏塞克斯郡哈索克斯 1978 年版。

P · 沃斯利:《第三世界》,伦敦 1967 年版。



第五编

欧洲和美国的现代  
马克思主义

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卡尔·马克思 1844年<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2页。



## 引 言

1914年第二国际的崩溃以及随后二十年间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的失败，给欧洲和美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留下了深刻的特征。这一崩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心转移到了东方，在那里它很快被斯大林的兴起压抑住了。本书这最后一编里所考察的人物，与其上一代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不同，他们都不是政党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不是活动家而是学术界人士，在工人阶级的活动低落时从事写作，因此相对地脱离了政治实践。于是在他们的著作里，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甚至美学比之政治学或经济学均占更大的比重。在一个时期里，当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议会制民主已成为日常准则而经济也享有长期空前的成长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曾滋蔓着一种逆来顺受的悲观主义——这是一种由于认识到苏联官僚主义的镇压本质而难以消除的悲观主义。从地理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几个有着共产主义大党的国家里。马克思是从哲学开始，然后转向经济学的，而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试图用一种先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例如阿尔杜塞著作中的斯宾诺莎，或者科莱蒂著作中的康德——来完成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复到更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仅仅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

## 第十九章

# 法兰克福学派

### 法兰克福学派与政治

没有什么比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著更能说明这种情景的变化。1920年代欧洲主要的思想家们——卢卡奇、科尔施，以及葛兰西——全都积极参与政治，法兰克福学派则相反，它不属于正式的政治党派。一名富裕粮商以一笔巨额捐款，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成立社会研究所，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奠定了基本设施。希特勒的崛起意味着研究所成员（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侨居异乡，最后该所于1936年重建于纽约，仅仅在大战以后才迁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观念，直到1930年马克斯·豪克海默担任了所长以后才诞生。最早的所长是维也纳人卡尔·格吕恩堡，他起初是一名社会主义思想史学家，具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他曾编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档案》，发挥了为研究所许多第一批出版物铺路搭桥的作用。

这些出版物虽然包括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论文，但主要是立足于第二国际颇为机械的唯物主义的史学研究著作。卡尔·维特福格尔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作了实证主义的分析；弗兰茨·博克瑙研究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生；亨利克·格罗斯曼以详尽的分析

为资本主义超积累必将导致利润率下降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观点作了辩护<sup>①</sup>。这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对苏联有好感,并致力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由于豪克海默1930年被选为所长,这个所的政策有了一个显著的转变。从政治上说,该所成员倾向于既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也反对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日益僵化的教条。他们试图不带任何政治党派之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同时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上层结构。

由于既对西方也对苏联感到失望,豪克海默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西奥多·阿多尔诺,从1920年代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如科尔施、特别是卢卡奇,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哲学的一面)那里汲取了一定程度的鼓舞。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著作,把论述中心放在物化概念上,这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有集中表述,而卢卡奇强调的整体性概念则帮助法兰克福学派纠正了对上层建筑要素相对忽视的现象。但是他们的著作更多的还是重申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的一面。例如,在豪克海默看来,黑格尔包容一切的心智主义具有寂静教的政治含义,他的倾向最终是使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等等之间的矛盾趋于某种基本的统一,这便削弱了思维的批判方面,使真正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再者,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注意复兴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某些成份,还有兴趣试图把象精神分析学这类最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综合进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哲学领域里,豪克海默(与法兰克福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期既受到叔本华、康德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也受到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等较近期思想家的“非理性主义”的影响,而把非理性看成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压抑个人的抽象一致性的抗议。尽

---

<sup>①</sup> 详见本书第215页第4—6行。

管法西斯主义者在1930年代为了证明其非理性目的的正确性而歪曲了这些思想家，但这些思想家却对人类生活中的主观和心理诸方面作了有价值的强调，使之不致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技术心理日益渗入社会而被抹煞。当然，豪克海默不赞成他们忽视现实的物质方面，因为无论怎样大肆修正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却决不否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他们显然没有做到的是，把他们在经济学中感兴趣的東西与总的社会分析结合起来。

这个缺陷在他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反映。1930年代初期，研究所成员至少在理论上投入了政治实践。他们虽然没有一个社会变革的特定纲领，但一般却十分赞成无产阶级的事业，并竭力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们相信，他们的工作对阐明社会中相互对立的力量同样起作用作出了贡献，从而提高了被剥削者的(阶级)觉悟，为他们提供了解放斗争中的武器。豪克海默对这一立场作了最有力的阐述。他写道：

“如果理论家及其具体研究的对象被公认为与被压迫阶级形成了能动的一致，以致他对社会矛盾的解释不仅仅是具体历史情况的表述，而且是促使历史内部发生变化的一种力量，那么他便真正尽到了职责。阶级中的先进部分与讲出有关其阶级真理的个人之间的冲突过程，以及最先进部分连同其理论家与该阶级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过程，可理解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觉悟趋于成熟，也连带产生了求解放的、但也是偏激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激励作用，但也需要有纪律。”<sup>①</sup>

这个观点与列宁主义的概念不同。在列宁主义的概念里，知识分子和先锋队的领导完全是一回事。虽然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在与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建立有效关系方面却明显地失败了。豪克海默

---

<sup>①</sup> 豪克海默：《批判理论论文选》，纽约1972年版第215页。

认为,工人委员会制度是1919年在德国新创的范例,它展示了走向新社会的道路。他写道:

“新社会的各种形式都是在其自身变革的过程中首先被发现的。工人委员会制度按照其倡导者的意图,是想展示出迈向新社会的道路,而这一理论上的概念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可以追溯到1871年和1905年等事件。革命总有一种传统延续下来供理论作依据。”<sup>①</sup>

这个观点还表达了豪克海默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活动的钦佩。然而,该研究所强调对社会作一般的分析,也就妨碍了对具体政治问题的关注。譬如,他们没有与科尔施保持联系,而科尔施是一位最接近他们普遍观点的政治活动家。总之,他们没有愿意接受其理论的对象;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失望,意味着德国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不能接受的。正如马尔库塞后来写道:

“领导作决定越来越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领导不再把无产阶级想象为革命的动力,而是强加领导于无产阶级和其他下层居民。”<sup>②</sup>

甚至布朗德雷领导下的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在他们看来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无论这一派怎样严厉批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集中制,它仍然赞许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研究所迁移到美国,加剧了这种倾向。在美国,该学派完全与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相隔绝,更加滋长了政治上的悲观主义和无可奈何的意识。豪克海默在《理智的衰落》中写道:

“那么按照上述解释,行动主义,尤其是政治行动主义,是完成使命的唯一途径吗?我不能肯定。这个时代并不需要对行动增加刺激。哲学决

---

① 豪克海默:《极权国家》,载A·阿拉托和E·吉布哈特编《法兰克福学派要义 读本》,纽约1978年版第104页。

② 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1958年版第106页。

不能变为宣传,即使是出于可能是最好的动机。”<sup>①</sup>

唯有马尔库塞继续主张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而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最后完全放弃了革命的前景。

## 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喜欢把他们的观点称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虽然同样反对被它视为过份唯心主义的现象学,但主要还是针对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近来已变成物化的一个根源和现状的一种保证了。对它的批判有时甚至扩及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分析中很少注意上层建筑的支配作用。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并更加关注人的个性方面,认为这个方面光靠提高经济福利的办法是不能满足的。

1937年豪克海默发表了一篇题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观点做了最出色的概括。豪克海默一开始就提出什么是理论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某一学科全部主题的总和,这些主题相互联系很紧,以致只有几个是基本的,其余都是由它们衍生的。”<sup>②</sup>这几个基本的主题,在笛卡尔那里是通过演绎得出的,在约翰·穆勒那里是通过归纳得出的,而同样的方法在现时的经验主义社会学中也显而易见,即试图“将社会现象的阐述竭力上升为对社会现象的详细比较,然后形成总的概念”<sup>③</sup>。无论基本原理是经由选择或直观得

---

① 豪克海默:《理智的衰落》,纽约1947年版第184页。

② 豪克海默:《批判理论论文选》,第188页。

③ 同上书,第192页。



来,还是仅属约定而成,在概念化形成的理性认识与被纳入概念的事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同样的区别。在这种传统理论看来,“个别客观事实的出现,概念方法之实际运用于理解事实,以及这种方法在使用中的作用,都完全是独立于理论思维以外的东西。”<sup>①</sup>

可是,批判理论则摈弃这种两分法,认为两分法是一种“异化”,从而造成价值与探索、认识与行动的分离。思维着的人总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看成超然于社会之上的“自由浮体”(象曼海因那样),或是看成归附于社会中(象庸俗马克思主义那样),都是错误的。因此,批判拉立理论的观点是:

“不光消灭这种或那种弊端,因为批判理论把这些弊端看成是与社会结构的组成方式必然相联系的。虽然批判理论本身也是从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但其目的无论按自觉的意图还是按客观意义来说,都不是更好地发挥结构中任何成份的作用。相反,批判理论对诸如较好的、有用的、适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等范畴本身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既是在现存秩序下来理解的,便不应把它们当成人们无法做到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个人通常只能接受其生存赋予的基本条件,并竭力使这些条件臻于完备而已。”<sup>②</sup>

与这种传统观点相反,

“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必要的基本活动是社会劳动,这种劳动的阶级关系形式给人类的各种反应方式,包括理论,都打上了烙印。理性对形成认识和认识对象的过程所加的干预,或者使这类过程受意识的支配,都不是发生在一个纯粹理念的世界里,而是与争取某种实际生活方式的斗争同时发生。”<sup>③</sup>

---

① 豪克海默:《批判理论论文选》,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207页。

③ 同上书,第245页。

在这一事业中,批判理论把自己看成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者。要废除的不是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如此),而是它在科学上的退化。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这一哲学传统作了广泛的论述,并把该书的主题确定为“启蒙的自我毁灭”<sup>①</sup>,来试图探讨如下的反论,即“启蒙始终是为了将人们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建立其统治权。但是被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遍布胜利的灾祸”<sup>②</sup>。他们这本书的核心是两种理性类型的对比。一种是与发现将人从外部压抑和强制中解放出来的手段有关的理性,另一种则是作为工具的理性,它对自然界起技术控制的作用,其主要动力来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按其新近的表现来看,这种类型的理性已经退化为极权主义:

“对启蒙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规则和实用性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启蒙只要能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而发展,它就不会停顿。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对待它自己的人权概念,完全与对待旧的一般概念一样。它遇到的一切精神阻力只能增强它的力量。这就是说,启蒙甚至在荒诞说法中仍能辨清自己。不管阻力可能求助于什么样的荒诞说法,正因为这些说法在对抗过程中事实上成了争论的理由,也就等于承认了原想用来驳倒启蒙的有感化力的理性原则。启蒙总是极权主义的。”<sup>③</sup>

这个态度发展到登峰造极就在现代“文化工业”中表现出来。因为在摆脱前资本主义秩序的束缚之后,启蒙并没有创造一种多样化的解放的文化,事实上却已经达到了它的反面。因为连娱乐本身也变成被工业化了的:

“商务与娱乐本来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后者有特殊意义上,也就是能保卫

---

① 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纽约1972年及伦敦1973年版第Ⅷ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③ 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6页。

社会。能使人愉快就能使人同意。要求得愉快，只有与整个社会的进程相隔绝，只有超然世外，并从一开始便盲目地放弃每一件工作应得的报偿；尽管这样做毫无意义，而且有局限性，不能用之以偏概全。欢乐总是意味着不想任何事情，忘掉痛苦，即使痛苦就在眼前。从根本上说，那是无济于事的。那是逃避；这种逃避不是一般所说的逃避丑恶的现实，而是逃避最后残存的对抗情绪。娱乐所能提供的解脱，只是摆脱思想，摆脱空虚罢了。”<sup>①</sup>

言外之意是，马克思的思想也包含有作为工具的理性成份，因为马克思强调劳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书对劳动作了积极的评论），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开发的对象，便使他陷入启蒙运动的传统。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已退居第二位，而让位于更广泛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破坏性关系的方面。

## 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和法西斯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启蒙运动传统时，扩大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而在努力吸收心理分析学的见解时，他们又缩小了它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援引恩格斯的话说：

“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sup>②</sup>

---

① 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44页。对这同一问题稍有不同的观点，见A·索恩-雷西尔：《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认识论批判》，伦敦1978年版。

② 恩格斯致弗·梅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500页。

在分析大众文化普及的同时，他们逐渐关注的另一个“上层建筑”问题，是权威的本质和发展。这一考察的中心环节是对心理分析学的、尤其是对弗洛伊德的认识。虽然托洛茨基曾经表现出对心理分析学有兴趣，但他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及其对社会变革持保守的悲观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也持这种态度）都无补于马克思主义，这种见解在1920年代算是新奇的了。艾里希·弗洛姆对弗洛伊德作了详尽的研究，但后来既脱离了法兰克福学派，也离开了正统弗洛伊德主义。但是弗洛伊德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主要影响，却表现在该派的两篇研究权威的著作（《对权威与家庭的研究》和更著名的《权威的性格》）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工作一贯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而心理分析学使他们同意了家庭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基本环节的观点。

在《对权威与家庭的研究》中，自我的削弱和由社会力量继而充当超自我的角色，被理解为晚期资产阶级社会中家庭衰落的一种功能。在更有雄心的《权威的性格》一书中，着眼点“不仅是要描绘偏见，而是要解释偏见，从而有助于消除它”<sup>①</sup>。该书探讨的主题是豪克海默所描述的权威的性格，它包括：

“向传统的社会准则机械地投降；盲从于权威同时又盲目仇恨一切敌手和局外人；反对内省；僵硬陈旧的思想方式，酷爱迷信；对人性做半说教半愤世嫉俗的恶评；心象描述。”<sup>②</sup>

虽然该学派使用美国的统计学技术，但他们摈弃那种包含有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求证之假设的方法论。他们试图揭露产生偏见的社会学根源，并就此认为深入耐心的交谈与统计资料具有同等的重

<sup>①</sup> 阿多尔诺等著《权威的性格》，纽约1950年版第1卷第Ⅶ页。

<sup>②</sup> 豪克海默：《法西斯主义的教训》，载H·坎特里尔编《引起战争的紧张局势》，厄巴纳1950年版第230页。（在资产阶级心理学中，所谓心象描述，指以心目中的形象来看待或突出一个人。——校者注）

要性。然而，由于强调宽容而不是强调革命，这种含而不露的规范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虽然没有否定非理性的社会方面，但对整个研究工作的倾向来说，心理学却重于社会政治。

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中，侧重于心理学的一面，从而忽视了对经济基础作细微的考察，只倾向于强调产生权威与暴力的社会心理机制。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直接联系，即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向垄断的方向发展，因而自由主义也向极权主义演化。豪克海默说过一句名言：“不愿对资本主义说长道短的人，也必然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sup>①</sup> 法兰克福学派由于忽视了代议制自由主义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在公民权、法律保障等形式上的真正区别，因而倾向于强调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例如，马尔库塞写道：

“自由主义国家向绝对极权国家的转变发生在单一社会秩序的结构里。鉴于这种经济基础是统一的，我们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本身‘产生’了绝对极权国家，来作为其更发达的发展阶段上对自身的完善。”<sup>②</sup>

这种方法把纳粹主义视为非理性统治的趋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结果，而这一趋势则是日益强调作为工具的理性和技术合理化的产物，即强调了上述西方自由主义启蒙运动传统的遗产所致。

对这一方法持重大异议者是弗兰茨·纽曼。他在其经典著作《巨兽》里，未能注意到他的同行们关于权威的性格和关于法西斯心理中施虐和受虐狂因素的著作。纽曼一开始就不同意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下述观点，即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新制度，在这种制

---

① 豪克海默：《犹太人与欧洲》，载《社会研究杂志》，1939年第8期第115页。

② 马尔库塞：《虚无》，伦敦和波士顿1968年版第19页。

度下私人资本积累不再是动力。在波洛克看来,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交换经济,因为政治挂帅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私人财产不再是其基础。与此相反,纽曼则强调,经济困难产生于魏玛德国不断增长的卡特尔化,以及为了“增强垄断的地位和促使所有生意活动完全合并入工业组织的网络而需要国家的干预”<sup>①</sup>。他写道:“今日德国经济有两个主要的显著特征:既是垄断的经济,又是控制的经济。它是一种由极权主义国家严密组织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给它一个最好描述的名称:‘极权垄断资本主义’。”<sup>②</sup>纳粹经济立法的受益者大都是旧垄断资本主义的受益者。获取利润仍然是基本的、恰恰需要极权主义政权支持的动机。与豪克海默不同,纽曼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纳粹国家,把它的政治看成是“接受和加强德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结构”<sup>③</sup>。纽曼还使用大量详细的观察材料来论证这个观点。

## 美 学

法兰克福学派最显赫的成就在于美学领域。他们对文化的兴趣之所以增长,是由于他们在美国的经历,以及那里的达成一致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而不是使用恐怖手段使人们循规蹈矩。按照他们的看法,大众文化与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利用或创造个人的需要来逐渐取消公私之间的差别,以利于支撑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待艺术上不同于列宁主义传统,后者评判艺术和文学主要是以它们在反映阶级斗争方面的态度来

---

① 纽曼:《巨擘: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实践(1933—1944年)》,纽约1944年修订版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261页。

③ 同上书,第366页。

确定。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恩格斯的传统（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传统，他喜爱的作家是莎士比亚和保皇主义者巴尔扎克），认为一个作品的社会洞察力比作者的政治态度更为重要。卢卡奇论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小说的大部分著作，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启示——虽然卢卡奇拒绝大多数“现代”艺术形式，使他有别于对当代艺术形式极感兴趣的法兰克福学派。后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作家和读者都有社会的局限性，但他们赋予艺术以一种比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更为自主的作用。从消极方面看，艺术是对现状的反抗，从暗示更多人的价值看，艺术超越了社会。所以他们把大众文化看作“肯定的”文化来加以批判，至于肯定一词，马尔库塞给了如下的定义：

“肯定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的这样一种文化，它在其发展进程中会脱离精神世界的文明而成为一个价值的独立王国，也就是说它高于文明。它的决定性特点是维护一个普遍义务制的、永远好些和更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加以肯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同于每天要为生存而斗争的现实世界，它可以不改变现状而通过每个人自身‘从内部’来实现。”<sup>①</sup>

不过，对肯定文化的这种反对，并不能归结为文化杰出人物统治论。他们对任何把艺术与物质需求相分离的文化禁欲主义，都是坚决反对的。大众文化的问题在于它并不真是大众化的。与其说是人民创造了它，不如说它是强加给人民的，是为统治的利益和潜在的极权主义服务的<sup>②</sup>。

在这个领域内，法兰克福学派最有才华的批评家是阿多尔诺。他早年在文化领域中主要有兴趣的是音乐。阿多尔诺认为多数现

---

① 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载《虚无》第95页。

② 这一观点最广博的表述见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

代音乐都是投合市场的。所以其他音乐则处境困难，但并不因此都是反动的。相反，阿多尔诺却推崇雪恩伯格，他的无调音乐表现了当代社会的不和谐：

“此时此刻，音乐仅仅能在其结构中表现社会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应对音乐的孤立处境负责。音乐愈是能通过其本身深刻地表现这些矛盾的力量和在社会中加以解决的必要性，而且愈是能在音乐语言和形式的矛盾中，准确地表现现实中的苦痛，并通过表现苦痛的音乐语言着重号召变革，它便愈能取得最佳的成就。”<sup>①</sup>

这表明他反对象斯特拉文斯基这类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仅仅是让前资产阶级的音乐适应于现代社会。阿多尔诺对爵士音乐持特殊轻蔑的态度，把它看成是朝商品化发展的音乐形式，只能使人顺从于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文化批评家是瓦尔特·本杰明。他与布雷克特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他的许多著作是对布雷克特作品进行理论性的商榷，尤其是他用“异化的作用”来向读者提供一种机制，使读者有批判地与布雷克特的作品保持距离，以防止他的作品受到同等看待。本杰明喜欢在语言中寓意深刻，他的多数作品以救世之道为主题，对于艺术批量生产的影响，他比阿多尔诺更为乐观<sup>②</sup>。

## 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唯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

---

① 阿多尔诺：《音乐的社会地位》，载《社会研究杂志》，1932年第1期第106页。

② 详见F·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71年版）一书的第二章。从整体来看，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是近来最杰出的贡献。



革命观点的早期成员。在加入研究所之前，他已经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形式的存在主义结合起来。他也欢迎马克思早期作品在1932年的发表，尤其是欢迎《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这一分析始终是马尔库塞思想的焦点。整个193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包含着他的后期思想萌芽的文章。但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是题名为《理性与革命》的黑格尔研究。这是介绍批判理论家观点的第一部英文版著作。马尔库塞象豪克海默一样，关注的是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理性成份。为此，他希望提出一种对黑格尔的解释，既不同于纳粹分子，又不同于斯大林主义者。纳粹分子把黑格尔视为有组织国家的非理性浪漫主义的先驱者，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把黑格尔视为一个反动的贵族思想家。马尔库塞把黑格尔思想中内涵的激进主义与其继承者孔德等许多实证主义者们的保守思想加以比较。略过黑格尔思想中神学的各个方面，马尔库塞力求揭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有一种潜在的连续性。黑格尔是德国第一位持下述见解的思想家：

“以抽象和定量的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并立足于以商品交换来统一需求的特定社会秩序，没有能力维护和建立一种理性社会。这种秩序基本上仍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的秩序，是受支配于盲目的经济机制的。”<sup>①</sup>

黑格尔主张以强权国家对付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主张也许已被引入了歧途，但他毕竟把哲学推向了社会实践的境地：

“因此，哲学的最后顶点同时就是它的退位。哲学一从纯理念中解放出来，也就从它与现实的对立中解放了出来。这意味着它不再是哲学了。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思维必须遵从于现行的秩序。批判的思想不会止

---

<sup>①</sup>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伦敦1964年第二版第60页。

息，而是采取一种新的形式。理性上的创造取决于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sup>①</sup>

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化是向不同类型的真理转化，它不能用哲学的术语来解释。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切哲学概念是社会和经济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的范畴全是哲学概念”<sup>②</sup>。黑格尔已经强调劳动的范畴，然而把强调哲学上的劳动改为强调异化了的劳动者却是马克思。在这里，马尔库塞引申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表述，触及到他继续关注的一些问题。他写道：“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这些惊人表述”，

“全都包含有黑格尔的**扬弃**一词，以致扬弃也有这样的含义，即重新赋予其真实形式以一种内容。但是，马克思所预见的未来劳动方式迥然不同于现行方式，以致他不肯使用‘劳动’一词来同样称呼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过程。但归根到底，他使用‘劳动’一词，是指资本主义所实际理解的含义，即在商品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或‘产生资本’的活动。另一些活动不是‘生产性劳动’，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可见，劳动意味着从事劳动的个人决不会有自由和全面发展，显然，在这种形势下，个人的解放同时就是劳动的否定。”<sup>③</sup>

不过，马尔库塞声称，由于理性的概念已由哲学转向社会实践，“它就已经被幸福的概念所取代了”<sup>④</sup>。这样看来，他确实超越了马克思本人。

幸福的观念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已成为泡影，是马尔库塞第

---

①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258页。

③ 同上书，第293页。

④ 关于这种观点，详见马尔库塞载入《虚无》一书中的论享乐主义的文章（自第159页以下）。

二部主要著作《爱欲与文明》的要旨。这本著作的冲击力造成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論的确可以调和一致的印象。这本书的政治目的是意味深长的：

“本文使用心理学的范畴，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的范畴了。以心理学为一方和以政治与社会哲学为另一方之间的传统分界线，已经成为过时的了。这是由于现时代人类的条件改变：以前自主的和可验证的心理过程，正在被**国家**中个人的职能（他的公开存在）所吸收。”<sup>①</sup>

马尔库塞反对那些着重从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进行治疗的弗洛伊德修正主义者。在他看来，这些修正主义者仅仅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典型，他们只为了基本上做到奉命式的实践而忽视理论，正象他已经在《理性与革命》中批判过的黑格尔实证主义后继者们所做的那样。但是，与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从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相反，马尔库塞对阻难解放的心理障碍的研究，使他走向了一种乌托邦的激进主义。

马尔库塞不同于威廉·赖希（对他也极少注意），他欢迎弗洛伊德较晚期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并认为他对死的本能的想法能够洞察现代社会矛盾心理的本质。但是马尔库塞不是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死的本能目标在于一种涅槃，即达到一种无情欲的状态。情欲产生于紧张，而紧张是阶级社会的流行病。如果这种紧张可以再生，那么死的本能的力量也必定能够再生。限制死的本能和增进爱欲，只有在提倡多方式的性满足和普遍的性解放的社会中才能达到。这包含了废除一夫一妻制的性器官至上论。马尔库塞摒弃弗洛伊德关于不可能有无拘束的文明的观点。在当代社会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

<sup>①</sup>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69年版第21页。

突取决于社会对劳动的组织，而社会对劳动的组织则有赖于马尔库塞所谓的“行为原则”使本能服从于现实。然而，这一原则只对物以稀为贵规则所统治的社会来说，才是特具的。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拘束力便日益成为“多余的”了。这样就为一个不再立足于行为原则的社会开辟了道路。这个社会通过废除异化劳动能够消灭多余的拘束。马尔库塞以一种乌托邦的情绪，预见到一个劳动将被某种有美感的游戏所取代的社会，这种游戏般的劳动最终将消灭死的本能的力量。这样，马尔库塞使用本能上受拘束的概念补充了(有时看来几乎是取代了)马克思的经济上受剥削的概念。

在马尔库塞最有影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爱欲与文明》的这一主题被置于更多的社会背景之下，而《爱欲与文明》中的乐观主义则让位于一种浓厚的悲观主义<sup>①</sup>。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判断，以及他的许多独特的分析，与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单向度的人》标志着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虽然马尔库塞同意资本家与无产者仍然是工业社会中基本的阶级。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作用，以致它们都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力量了。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以前对立的双方由于在保留和改善现行制度方面有了凌驾一切的利益而统一起来。技术的进步达到了确保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及其内聚力的程度，而质变这一概念本身，在关于非爆炸性演变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开始退却了。”<sup>②</sup>

基于“自由主义国家向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发生在单一社会秩序

<sup>①</sup> 这种悲观主义在马尔库塞较近期的一些声明中收回了。例如参见他的《论解放》，伦敦和波士顿1969年版。

<sup>②</sup>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伦敦1968年第二版第11页。

的结构内部”<sup>①</sup> 这一早期观点，马尔库塞断言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

“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调。后一种协调是由既得利益通过操纵需求而起作用的，因而防止了不顾大局的强大反对派的出现。助长极权主义的不仅是政府或政党的具体统治形式，而且是一种具体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与‘多元主义’的政党、报纸、‘抵销力量’等等和谐共存。”<sup>②</sup>

这种极权主义之所以更为安全，是因为它似乎没有明确的经济和政治方向<sup>③</sup>。技术性社会似乎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此不给异议留下余地。马尔库塞试图区别真需求与假需求。但是人们的实际需求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

“归根到底，需求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问题，必须由个人自行回答，但最终只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并在何时能自由地作出回答。”<sup>④</sup>

这显然没有解决一个已全面控制其成员的意识社会如何有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而《单向度的人》只是以大部分篇幅来揭示这种控制的全面和广泛性。现时社会的特征在于：

“通过消灭较高文化中各种对立的、异己的和超常的因素，来消除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由于这些因素的消失，较高文化便构成现实的另一个向度。”<sup>⑤</sup>

---

① 马尔库塞：《虚无》，第19页。

②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20页。

③ 虽然《单向度的人》主要涉及美国，但马尔库塞在这本书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针对苏联的类似的悲观分析，见他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1958年版。

④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22页。

⑤ 同上书，第58页。

在艺术领域里，社会的物质进步已经产生出“一种和谐的多元主义，其中最矛盾的作品与事实真象互不相关地和平共存”<sup>①</sup>。在性的问题上，也已经产生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混杂现象”：

“性与工作和社交融合在一起，因此使性更容易得到〔有控制的〕满足。技术进步和更舒适的生活容许性的各个方面有系统地纳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sup>②</sup>

甚至语言本身也正在逐渐地成为一个闭式体系，这种体系甚至排除了语言学上对立的表述方式。

面临这样一种社会，还有变革的希望吗？马尔库塞在其著作中开头便写道，他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第一个是，发达的工业社会在可见的未来有能力遏制质变，第二个则是，存在着打破这种遏制和使社会爆炸的种种力量和倾向。《单向度的人》通篇强调的是第一种倾向。第二种倾向出现的可能性，仅仅在该书的结尾才极其简扼地提到。这种倾向将不得不有赖于那些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的人们，即“受社会排斥和不受欢迎的下层人、其他种族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以及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们”<sup>③</sup>。但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倾向可能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事”

“这种机会是历史的两个极端——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和最受剥削的力量——可能的再度偶合。这无非是一种偶然性。批判社会的理论并不拥有可以弥合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的概念，因为这种理论既没有提供希望，也没有建树，它始终是消极的。”<sup>④</sup>

---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71页。

③ 同上书，第201页。

④ 同上。

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马尔库塞的经验主义色彩是最少的。同时自相矛盾的是,他是该学派条理最清晰和最系统的阐述者。他的同僚们抛弃了激进主义而他仍然信奉,这就使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持续地享有一定的地位。

## 哈 贝 马 斯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给人印象最深刻者无疑在于尔根·哈贝马斯。截至目前为止,他的著作涉及面十分博大。象他的前辈一样,他不仅讨论方法论问题和作为控制手段的自然科学理性模式的使用问题,而且关注于把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与更现代的解经原理<sup>①</sup>及系统论结合起来。哈贝马斯依据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的成果,考察了使理性从一种解放工具转变为统治工具的哲学前提。马克思倾向于把自然科学作为他的社会理论的模式,从而贬低了哲学的作用,但在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以及哈贝马斯)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发挥哲学的作用以反对一切形式的科学主义,它就只能是批判性的。哈贝马斯同意这样的说法,即马克思在其经验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对革命实践的批判性评价之间,存在一个未予澄清的二分法,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范畴有时是简化的、甚至是实证主义的。但是,哈贝马斯希望不再采取后期法兰克福学派那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以免仍被指责为重蹈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覆辙<sup>②</sup>。他试图在《知

<sup>①</sup> 解经原理本为基督教诠释《圣经》所应遵循的原则,是历史上各派颇有争议的课题。近代出现的主要对立倾向是:基要主义派认为,《圣经》出于上帝的灵感,上帝所说的一切都绝对无误,不能违背基本要义;而现代主义派则认为,《圣经》毕竟出自人的手笔,应在肯定灵感的前提下,将它视为一般典籍进行各方面的研究。——译者注

<sup>②</sup> 参见A·麦克英泰尔:《马尔库塞》,伦敦和纽约1970年版第22,40和61页。

识与人的利益》中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表述来达到这一点。象豪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一样，他不愿否定劳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范畴，但是他认为马克思是着意于把劳动与相互作用加以区别。劳动是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有目的的理性活动，而相互作用只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这两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虽然与社会进化的各个方面有关联，却是彼此独立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它自己的认识方式和理性标准，即在作为手段的活动领域里必须扩大技术的控制；在文化发展领域里必须扩大不受歪曲和控制的交流形式。哈贝马斯还试图为理想中的交流提供一种理论结构，宣称“在今天，语言问题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sup>①</sup>。哈贝马斯断言，只要技术性社会的政策是受公共控制的，它就必然是理性的社会，但是争论和意见必须不受到操纵和控制。言论的作用首先在于必须有一个发表言论的理想环境，只能让有较好论据的力量来决定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除非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平等的机会参与讨论；这就涉及到变革社会的方向问题，即必须使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养成爱发表意见的习性。因此在任何一个言论活动中都本身带有社会解放的最终目的。但是必须承认，哈贝马斯对如何实现这种社会根本未作说明。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的利益》中提出的养成健谈力论是“上层建筑的”，那么他在其迄今最重要的著作《合法的危机》中则考察了各个层次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以往的历史包括一系列社会形态，其中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取决于一种基本的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又无形中确定了社会状况改变的可能性”<sup>②</sup>。哈贝马斯用

① 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法兰克福1970年版。转引自T·麦卡锡为《合法的危机》（伦敦1976年版）写的导言。

② 哈贝马斯：《合法的危机》，第7页。



类似马克思所采用的术语,简要地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比如社会生产与私人积累之间的基本矛盾之类。为了弄清晚期资本主义是否也是那样,哈贝马斯把当代社会固有的危机作了类型学的概括: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原动力危机。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经济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国家采取步骤防止经济危机,便相应地造成了理性危机。晚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利益冲突和向国家干预提出对立的要求,必然意味着国家的援助在分配上是机能失调的。这反过来又产生出合法性的危机,因为国家干预意味着控制和选择的问题公开化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收买最大的政党,或者创立一种新的正统意识形态。此外,政府干预日益增长便会缩小私有部门的范围,而私有部门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因此便产生了原动力危机。哈贝马斯在作结论时宣称:

“经过这样一种政府的反应性避让活动,经济危机便转入了政治制度,例如通过合法程序可以使补偿赤字合理化,而增强组织机构的合理性又可以弥补确已出现的合法赤字。这里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趋势,这些趋势从发生学的观点看,都体现出危机现象自下向上转移的等级制。但是从政府处理危机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现象由于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相互替换,因而是有区别的。这些限度,一方面取决于财政上可达到的价值量(在危机理论中,价值量的短缺是不可能正确地预测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社会文化体系提供的原动力。因此,珍贵的资源、珍贵的价值与珍贵的意图之间的替换关系,对于危机的预告有决定的意义。”<sup>①</sup>

在《合法的危机》的第三章和最后一章中,哈贝马斯认为,除非求助于一套新的准则,包括他先前所讨论过的养成健谈力和恰当的社会经济组织,就无法解决这些交错的危机。

---

<sup>①</sup> 哈贝马斯:《合法的危机》第93页。

## 参考读物

###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是一本有启发性的入门书。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是一部杰出的、虽然难懂的主要美学著作。还可以参阅麦金尼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布莱克伯恩、霍华德和克莱尔、《新左派评论》社等编辑的诸论文集。

### 法兰克福学派

#### 原著

两本综合论文集是康纳顿编的《批判的社会学》与阿拉托和吉布哈特编的《法兰克福学派要义读本》。詹姆森的《美学与政治》是一本专著，阿多尔诺等人合著的《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对当代的情况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 一般评论

杰伊的《辩证法的幻想》介绍得最好，既全面而又资料丰富。斯科罗耶更为思辨性的《对统治的批判》可以作为补充。西博恩的文章和斯拉托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由来和意义》一书，是以一种更为原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作的批判。

### 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

从阿多尔诺的两本论文集《七色光谱》和《最低限度的道德》里，人们可以欣赏他作为一位论文家的才华。他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当代社会提出了控诉，在《权威的性格》中进行了哲学研究，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更从哲学上作了反省。关于阿多尔诺的评论，见巴克-莫尔斯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由来》和罗斯的《令人伤感的科学》，以及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的第一章。

关于豪克海默，请看他的《理智的衰落》和阿罗诺维茨为论文集《批判理

论》写的简短导言,以及霍华德的《马克思的遗产》中的第五章。

## 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最流行和有影响的著作是《单向度的人》。关于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努力,见他的《爱欲与文明》。在《理性与革命》中有黑格尔的背景。《虚无》这部论文集收进了马尔库塞1930年代和1960年代的论文,可能对他的思想作了最全面的介绍。马尔库塞著作的完整目录可以在马克斯的《马尔库塞的意义》中找到,这本书的介绍既精彩又简明扼要。关于高度批判概念的分析,请见麦克英泰尔的《马尔库塞》。马蒂克的《马尔库塞批判》和伍迪斯的《革命新理论》,是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的批判。布雷尼斯编辑的论文集《批判的中断》也值得一读。

## 其他人

关于本杰明,请读他的题为《启示:尝试与思考》的论文集,以及他的巨作《德国悲剧的起源》。评论方面,请读为《德国悲剧的起源》写的导言,以及阿伦特和詹姆森写的文章。关于弗洛姆的贡献,尤其见于他的《自由的恐惧》和《健全的社会》以及施凯尔写的评论。哈贝马斯的著作,包括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知识与人的利益》和《合法的危机》,已经迅速有了译本。评论方面,尤其见于麦卡锡为《合法的危机》写的导言、达尔麦耶和斯科罗耶的有关文章,以及霍华德的《马克思的遗产》中的第六章。

## 文献目录

###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伦敦1976年版。

R·布莱克伯恩编《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伦敦1972年版。

D·考特:《同路人》,伦敦1977年版。

D·霍华德和K·克莱尔编《未知的方面:列宁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纽约1972年版。

N·洛布科维茨编《马克思和西方世界》，伦敦 1967 年版。

N·麦金尼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伦敦 1972 年版。

《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 1977 年版。

## 法兰克福学派

### 原著

T·W·阿多尔诺等：《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伦敦 1976 年版。

A·阿拉托和 E·吉布哈特编《法兰克福学派要义读本》，伦敦 1978 年版。

P·康纳顿编《批判的社会学：阿多尔诺、哈贝马斯、本杰明、豪克海默、马尔库塞和纽曼选读》，伦敦 1976 年版。

F·詹姆森编《美学与政治：阿多尔诺、本杰明、布洛克、布雷特和卢卡奇》，伦敦 1978 年版。

### 评论

D·弗莱明和 B·贝林编《知识分子外流：欧洲与美洲（1930—1960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9 年版。

F·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普林斯顿 1971 年版。

M·杰伊：《辩证法的幻想：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史（1923—1950 年）》，伦敦 1973 年版。

G·利克塞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评卢卡奇、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载《季刊》第 12 期，1968 年春季号。

J·奥尔：《德国的社会理论与技术的秘密面目》，载《欧洲社会学文献》第 10 期，1974 年。

A·奎因顿：《批判理论》，载《文汇》第 10 期，1974 年。

P·罗宾逊：《弗洛伊德主义的左派》，纽约 1969 年版。

T·斯科罗耶：《对统治的批判：批判理论的起源和发展》，纽约 1973 年版。

——《认识论中的政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德国社会学目前的争论》，载《国际社会学杂志》第1、4期，1971—1972年冬季号。

P·斯拉托：《法兰克福学派的由来和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展望》，伦敦1977年版。

G·西博恩：《评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63期，1970年。又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1977年版。

A·韦尔墨：《社会批判理论》，纽约1971年版。

## 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

原著

T·W·阿多尔诺等《权威的性格》，纽约1950年版。

阿多尔诺和M·豪克海默：《启蒙的辩证法》，纽约1972年版；伦敦1973年版。

阿多尔诺：《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被损坏的生活想起》，伦敦1974年版。

——《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版。

——《七色光谱》，伦敦1967年版。

M·豪克海默：《理智的衰落》，纽约1947年版。

——《批判理论论文选》，纽约1972年版。

评论

S·巴克-莫尔斯：《否定的辩证法的由来》，纽约和哈索克斯1973年版。

D·霍华德：《马克思的遗产》，伦敦和纽约1977年版中的第六章。

F·詹姆森：《阿多尔诺——历史的象征》，载《杂集》第5期，1967年春季号。

G·罗斯：《令人伤感的科学：阿多尔诺思想介绍》，伦敦1979年版。

## 马尔库塞

### 原著

- 马尔库塞、R·沃尔夫和B·穆尔：《纯忍受批判》，伦敦 1969 年版。
- H·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伦敦 1972 年版。
- 《爱欲与文明：从哲学上探讨弗洛伊德》，伦敦 1969 年版。
- 《论解放》，伦敦和波士顿 1969 年版。
- 《否定：批判理论的尝试》，伦敦和波士顿 1968 年版。
-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波士顿 1964 年版。
- 《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伦敦 1964 年第二版。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分析》，纽约 1958 年版。
- 《批判哲学研究》，伦敦 1972 年版。

### 评论

- P·布雷尼斯编《批判的中断：新左派论赫伯特·马尔库塞》，纽约 1970 年版。
- J·科恩：《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哲学》，载《新左派评论》第 57 期，1969 年。
- A·麦克英泰尔：《马尔库塞》，伦敦和纽约 1970 年版。
- R·马克斯：《马尔库塞的意义》，纽约 1970 年版。
- P·马蒂克：《马尔库塞批判：阶级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伦敦 1972 年版。
- P·塞奇威克：《自然科学与人的理论：赫伯特·马尔库塞批判》，载《社会主义年鉴》，伦敦 1966 年版。
- J·伍迪斯：《革命新理论》，伦敦 1974 年版。

### 其他人

- H·阿伦特：《瓦尔特·本杰明(1892—1940 年)》，载《黑暗时代中的人们》，伦敦 1970 年版。
- W·本杰明：《启示：尝试与思考》，H·阿伦德特编，纽约 1968 年版。

——《德国悲剧的起源》，纽约和伦敦 1977 年版。

——《思考》，伦敦 1978 年版。

F·达尔麦耶：《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的利益〉及其后果》，载《社会科学的哲学》第 2 期，1972 年。

G·弗洛伊斯达特：《行为的社会概念：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一种行为的社会理论的评注》，载《调查》第 13 期，1970 年。

E·弗洛姆：《存在与占有》，伦敦 1978 年版。

——《超出幻想的束缚：我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冲突》，纽约 1962 年版。

——《心理分析的危机：论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社会心理学》，伦敦 1973 年版。

——《自由的恐惧》，伦敦 1942 年版。

——《自私的人》，纽约 1947 年版。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 1961 年版。

——《健全的社会》，纽约 1955 年版。

J·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伦敦 1972 年版。

——《合法的危机》，T·麦卡锡编，伦敦 1976 年版。

——《理论与实践》，波士顿 1973 年版。

——《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学生抗议》，载《科学和政治》，伦敦 1972 年版。

H·S·休斯：《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弗朗兹·纽曼》，载 D·弗莱明和 B·贝林编《知识分子外流：欧洲与美洲（1930—1960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9 年版。

F·詹姆森：《瓦尔特·本杰明，或者怀旧》，载《杂集》第 10—11 期，1969 年秋季号—1970 年冬季号。

F·纽曼：《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实践（1933—1944 年）》，纽约 1944 年修订版。

——《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政治和法学理论论文集》，纽约 1957 年版。

F·波洛克：《自动化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牛津 1957 年版。

J·H·施凯尔:《摆脱权力: E·弗洛姆的观点》, 纽约 1961 年版。

T·斯科罗耶《批判理论的辩证基础, 哈贝马斯的“理论调查”》, 载《目的》第12期, 1972 年。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 载《连续统一体》第 8 期, 1970 年。

A·索恩-雷西尔:《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认识论批判》, 伦敦 1978 年版。

K·A·维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 极权的比较研究》, 纽黑文 1957 年版。



## 第二十章

#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引言

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成为法国知识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法国固有许多社会主义传统,由于共产主义在打败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而赢得的声望(相形之下,与第三共和国相联系的自由主义则名誉扫地),以及由于许多外国知识分子发现巴黎是流亡者适宜的场所而纷纷到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丰富。这样就为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舞台。在战后法国,对黑格尔兴趣的增长和出版马克思早期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变种的出现。战争的经历使人们对明确分析的理性主义丧失了信心,而这种理性主义本是深深植根于法国哲学传统之中的。黑格尔以及他的历史哲学、他的异化概念和辩证法、他的精神现象学,似乎为新近的经验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解。黑格尔的哲学看来也是最进步思想的本源。正如梅洛-庞第所说:

“上一世纪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都起源于黑格尔,包括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正是黑格尔开始尝试去探索非理性主义,并把它归入扩充了的理性中去,而这仍然是本世纪的一项任务。”<sup>①</sup>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亚历山大·科热韦和让·依波利特的著作，接触到了黑格尔。从1933年到1939年，科热韦曾在巴黎高等教育实习学校讲授黑格尔<sup>②</sup>，他的听众中许多人在战后是有影响的思想家。在科热韦才华横溢而又别具一格的描述中，黑格尔是作为一位革命的社会理论家出现的。他的《现象学》一书的核心，是他关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劳动是基本的人类活动；劳动者为了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确认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使他们从现在的奴隶地位转变为自由社会的主人。因此，理性并不是某些抽象的和永恒的范畴，而是不断进化的人类意识，这种人类意识在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置身于并遍布于世界之中。这与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对黑格尔作马克思化的解释显然是相似的。

如果说科热韦的说明出自一得之见的话，那么让·依波利特的工作则更加紧扣黑格尔的原著。他翻译了《现象学》，并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评论。依波利特集中说明了关于不幸意识的观念——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人开始知道理想，但又发现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据依波利特的看法，黑格尔业已表明，人的这种自我分离是人的自我确认道路上必然的一步，这条道路是由不断辩证地克服“异化”而构成的。依波利特还提请读者注意黑格尔早期在耶拿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黑格尔集中关注于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异化劳动。

科热韦和依波利特对黑格尔所作的激进阐述，有助于在战后最初几年中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迅速地吸收到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去。要完成这种吸收必然要与法国共产党对抗，因为直到1950年代中期为止，法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受到荒谬

---

① M·梅洛-庞第：《感觉与非感觉》，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1964年版第63页。

② 见A·科热韦：《阅读黑格尔入门》，纽约1969年版。

可笑的斯大林主义的禁锢。在政治上，法国共产党不得不追随莫斯科的利益，在国内政策方面经常推行一条保守路线；而在哲学上，除了重复斯大林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便无所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介，给人一种印象，即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可以与现象学、人格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日益流行的哲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一般说来，马克思早期著作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他描绘了周围的一切人在与其伙伴的合作生产中自由地发展其个性的情景。技术力量的增长和人在社会中受摆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使许多评论家采纳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并得出结论说他代表了存在主义的一部分主张。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高度发达社会的复杂性本身，使得马克思这一分析的意义比十九世纪所预期的更为重大。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丧失了人的异化和实践等概念，被法国人重新发现了。这一发现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sup>①</sup>。法国的社会理论家们在阅读青年马克思的同时，也回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批独创的理论家——卢卡奇（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比《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早得多）、科尔施和差不多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的学生卢西恩·戈德曼的著作具有特别的影响，他的文学批评强调阶级意识的顺应性：

“伟大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家，是那些能以或多或少连贯的方式，表达出同一个阶级最大可能的觉悟相一致的世界观的人，特别是对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sup>②</sup>

任何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法国人，都曾经不得不以某些方

<sup>①</sup> 见本书第181页末段以下。

<sup>②</sup> L·戈德曼：《人文科学和哲学》，伦敦1969年版第59页。

式同臃肿僵化而向知识界投下阴影的法国共产党达成妥协。因此许多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是从党内涌现出来的，只是在他们的思想变得过于冒险时方被开除。两个典型的例子会说明这个趋势。罗歇·加罗蒂在战后二十年中是党内最显要的知识分子和党的政治局成员。直到1960年代早期他的著作还充满着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以致马克思主义被看成是一种实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只是当1962年法国共产党(迟迟地)公开批评斯大林主义以后，加罗蒂才开始对忽视实践概念、强调认识的反映论，以及老一套的辩证法定律等等表示怀疑。意味深长的是在批评斯大林的同时，加罗蒂写了一本论述黑格尔的书和一部对马克思有独创性研究的著作。加罗蒂采取的新立场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他写道：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非但没有毁灭我们的希望和信念，反而带来相反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次繁荣成了可能。然而，把这一页过快<sup>•</sup>地翻过，从而忽视了揭露罪恶的全部根源；或者因而不正确地归咎责任或不肯对造成以往盲目性的原因作深入分析，就不能使这个新的开端成为现实。”<sup>①</sup>

按照加罗蒂的说法，要达到“这个新的开端”只能通过表明

“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中，即在其原理中，包含着发展和更新的无限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需大力强调（也许必须过于大力地强调，因为马克思主义要求与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过程决裂）辩证法的超拔的一面，包括与它过去的内涵实行彻底的决裂和中断。”<sup>②</sup>

书中特别长的一节专门写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许多进步的天主教

---

① R·加罗蒂：《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0年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211页。

徒早就对青年马克思感兴趣(工人—教士运动开始于1944年)。在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的对话中,加罗蒂起了带头作用<sup>①</sup>。然而,加罗蒂的见解最终越出了即使是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而于1970年被开除出共产党。

亨利·勒斐伏尔是一位远比加罗蒂更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早在1934年他就出版了马克思著作的选集,包括《巴黎手稿》中的许多文章,并在很容易引起误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标题下写了一篇至今仍然是杰出的对马克思的介绍。勒斐伏尔从彻底的人道主义出发,并立足于实践是人与自然间的辩证关系、是人借以克服与其对立的自然而实现自己的手段这一认识,把与异化人相对应的整体人的概念放在他通篇解释的最前面:

“整体人同时是发生某一过程的主体和客体。他是与客体对立而又超越于这一对立的活跃着的主体。他是被分解到各个局部活动中并被分散了决心而又超越于这种分散的主体。他是行为的主体,也是行为的最终客体和产物,即使看起来是活动产生的外在客体。整体人是活动着的主—客体,他首先被撕裂、被分离并束缚于必然性与抽象性之中。通过这一撕裂,他走向自然,成为自然,但却是自由的。他成为一个整体,象自然那样,却把自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整体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sup>②</sup>

勒斐伏尔最有独创性和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在这本书中,他力图从实地考察日常生活中来论证异化现象。书中特别激怒正统共产主义者的地方,是提出即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异化也将依然存在,而且革命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能摆脱当前折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勒斐伏尔在《日常

<sup>①</sup> 关于这方面的概述,见P·赫布莱思韦特:《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及其它》,伦敦1977年版。

<sup>②</sup> H·勒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纽约和伦敦1968年版第162页以下。

生活》第二卷和他196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各种缺陷。他区分了愿望和要求,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任何真正的进步都必须由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来检验。电视的影响和密集的住房条件,以及不愿集体活动所造成的异化,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与对资本主义一样多的问题。这个“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与马克思描述的社会大不相同,它既已不存在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有自信心的个人,也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派。勒斐伏尔对现代性的分析与马尔库塞有若干相似之处。但是,马尔库塞(普遍地说,法兰克福学派)是依靠心理学去说明消费主义的作用,而勒斐伏尔则通过语言学去解释它,即随着消费的私有化,手势被信号所代替,符号被形象所代替,这种替换剥夺了个人交流经验的任何可能性,更谈不上“汇总”经验了。<sup>①</sup>

## 萨 特

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存在主义抗议现代技术把人当作物来对待的日益增强的趋势。努力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最好的例子是让-保罗·萨特的著作。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宣言中声称:

“人简单地存在着。他不单纯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存在着,而且是他愿意的那样存在着,而且他在已经存在着之后自己所想象的,一如他在向存在跃进之后所愿意的那样。人除了是他自我创造的以外什么也不是。”<sup>②</sup>

萨特在大战期间写成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对这一见解作了最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见勒斐伏尔:《语言和社会》,巴黎1966年版;《态度:反对专家》,巴黎1967年版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伦敦1971年版。

<sup>②</sup> 萨特:《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P·梅尔特编,纽约1948年版第28页。

详细的说明。书中他大量吸取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把自由看作人类存在的中心范畴：

“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它成为可能；人类存在的本质依悬于他的自由。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不可能与‘人类实在’的存在区分开来。人并不是首先存在，以便随后成为自由的；在人的存在与他的自由存在之间没有区别。”<sup>①</sup>

虽然关于人类存在的这种描述完全是非唯物主义的、与历史无关的，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萨特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却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在《唯物主义与革命》（1964年）一书中，他抨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且再次强调“能够超脱一种情境以便对它有所展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从未有过哪一种唯物主义能够说明它”<sup>②</sup>。同时他称赞青年马克思（作为恩格斯的对立面）并概括叙述了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一个主要论题：

“人们决不能压制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除非自由以某种方式适应于这种压制，也就是说，除非把某物的出现交托给对立物，人们是不能压制它的。革命运动及其计划也可以按这种关系来理解，尽管革命会使社会经历某种形式的暴力，而自由在这种暴力中将异化为与暴力互相认可的另一种状态。”<sup>③</sup>

如果说在《唯物主义与革命》一书中，萨特发现了共产主义哲学是深不可测的，那么在1952年受朝鲜战争刺激而写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中，他却发现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是进步的，并主张工人绝对服从于党，因为这是他们未来自由的唯一保证。这一“极端布

① 萨特：《存在和虚无》，纽约1966年版第30页。

② 萨特：《唯物主义与革命》，载《文学和哲学随笔》，纽约1967年版第235页以下。

③ 同上书，第251页。

尔什维克”的立场使萨特与他从前的伙伴梅洛-庞第分道扬镳；后者在萨特接近马克思主义时，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主要著作《现象学和知觉》中，梅洛-庞第强调人类的相互影响和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以此来反对忠实的笛卡尔主义者萨特把主客体根本分开的做法。他写道：“甚至在最近时期中，使萨特继续与马克思主义分开来的东西是他关于‘我思’(cogito)的哲学。”<sup>①</sup>

在1960年出版的萨特向马克思主义让步的最重要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迄今仅有的一卷)<sup>②</sup>中，试图回答梅洛-庞第的批评。乍一看，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显得令人吃惊地肯定。在《辩证理性批判》重要的第一部分(最初以《方法问题》为题发表于1957年)中，萨特是从近代欧洲思想史的简要概述入手的，其历史时期从笛卡尔和洛克开始，经过康德和黑格尔，延续到二十世纪，其中最进步的哲学主张是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它自己的困难：

“给予马克思主义以力量和丰富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试图最彻底地从历史进程的全部去阐明历史进程。但是近二十年来，它的幽灵反而使历史含混不清了，这是因为它不再与历史一道生活，是因为它企图以一种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把变化归结为同一。”<sup>③</sup>

尽管如此，但是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正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象刚刚在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sup>④</sup>

---

① M·梅洛-庞第：《辩证法的冒险》，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1973年版第158页。

② 关于第二卷的内容见R·阿伦森：《让-保罗·萨特：空想政治》，纽约1979年版，以及摘要发表在《新左派评论》100号(1977年)题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文章。

③ 萨特：《方法问题》，纽约1968年版第29页。

④ 同上书，第30页。



萨特无保留地采用了马克思的如下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①</sup> 存在主义可能做的事（萨特仍然自认是个存在主义者）是恢复认识论的辩证方面，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点”。恢复认识论的辩证方面就要避免把认识看作简单地对外部实在的观察，或者对外部实在的反映——萨特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与马克思把认识看作实践的独到见解相对立的。

于是萨特试图确立他自己的、与他认为恩格斯和加罗蒂这类作者所持立场相对立的立场。在后者看来，意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是受一些明确的原则所限定的。萨特以求全责备的方式谈到现代马克思主义“缺少启发式的研究”。他说，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瓦莱里正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乐于并能够说明的事实是，并非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瓦莱里<sup>②</sup>。萨特断定：

“我们指责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生活的一切具体规定性委诸偶然性而加以抛弃，因而在历史的总汇之中，除了抽象的普遍性的骨架以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结果是，它完全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它只有荒谬的巴甫洛夫派的心理学来填补这一缺陷。”<sup>③</sup>

因此，萨特的目标是用下述方法来建立一种具体的人类学，在这一方法中，社会学和心理学不是“并头酣睡”，而是在真正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结合起来。这并不涉及（如在萨特某些早期著作中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因为关键在于“不是在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名义下抛弃马克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参见萨特：《方法问题》，第53页以下。如何在实际上完成这一点，详见萨特在完成了《辩证理性批判》后对弗洛贝尔所作的详尽的分析。

③ 同上书，第82页以下。

思主义,而是把人回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sup>①</sup>。

在《方法问题》的最后一节,萨特规定了一种方法,打算用它来阐发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即人们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只是在预先制约着他们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这是一种前进—逆溯的方法,萨特又把它称作辩证理性,以与分析理性相对立。以某人打开一扇窗户为例,观察者可以逆溯地(例如,意识到房间太热)和前进地理解到想放新鲜空气进来的意图来了解这个动作。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方法,它

“承认目的是存在的,不管这些目的在哪里出现,其存在本身只能表明其中的某些目的可能在历史的整体化进程中途被抵销。这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立场。以适合于具体表现的目的为出发点的辩证运动,可以使我們认识到:人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附加于行为本身的不可思议的实质;目的只能体现出一次从现在进行到将来的行为中将会超越和保持的既定的东西;目的既然构成人的行为的以及该行为内部矛盾之统一的辩证规律,它也就是实质上的具体表现。”<sup>②</sup>

正是在这一认识背景下,萨特才能够确定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虽起重要的、但毕竟不太大的作用。

“存在主义将试图用间接知识(也就是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用逆溯地表明种种存在结构的那些字句)来阐明某些特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产生一种真正全面的知识,这种知识将在社会领域里重新发现人,并且在人的实践中(或者不如说,根据确定了的情况把人扔给社会可能性的方案)去探求人。这样一来,存在主义就会表现为仅仅是跌落在认识之外的体系的一个破片而已。一旦马克思主义思想把人的尺度(即存在研究的项目)作为人类学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

① 萨特:《方法问题》,第83页。

② 同上书,第158页以下。

时,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sup>①</sup>

萨特概括了他的方法论原理以后,在写《辩证理性批判》中开始转入正题时,再次提出了辩证法问题,而把教条式的辩证法与批判的辩证法加以对照。萨特坚持后者必须从个人出发:

“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再变成一种神圣的规律、一种形而上学的定则,那就应该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某种超个人的整体出发。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矛盾:辩证法是关于整体化的规律,这种整体化创造了若干种集体、若干种社会和一种历史(即各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整体化把自身强加于个人;但同时,它又必然是由千百万个人的行为构成的。我们必须指出下述情况何以成为可能:整体化既是一种合力,虽然不是消极的平均数;又是一种统摄力,虽然不是是一种超验的天数。我们还必须指出,整体化何以能不断地使大量分散的现象与完整性达到统一。”<sup>②</sup>

人类活动趋于“整体化”的这一性质是一个活跃的过程,它与定了型的、比方说一幅绘画或一架机器那样已完成其统一体的整体性是对立的。因此整体性是分析理性的对象,而另一方面,整体化则只有通过辩证理性才能得到理解。因为“辩证法是一种整体化进程中的活动,它唯一的规律是那些整体化发展中所派生的规则”<sup>③</sup>。对辩证法的这种解释必然导致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萨特由此追溯到恩格斯,并使用他在《唯物主义和革命》一书中曾经用过的同样的语言对之进行批判<sup>④</sup>。在题为《从个人实践到实践—惰性》的冗长的一节中,萨特描述了个人间社会关系最初出现的方式。萨特从下述原理出发,即“辩证法研究的最重要发现是,正如物

① 萨特:《方法问题》,第181页。

②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第36页。又见第47页以下长而难的脚注。

③ 同上书,第47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26页以下。

被人所‘中介’一样，在同样程度上人也被物所‘中介’”<sup>①</sup>，从而把物质匮乏的概念放在这一中介的中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明了一种真正的迹象，这种迹象只要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技术的进步尚未使人类免于匮乏，我们就无法避免”<sup>②</sup>。萨特在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结尾处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著名的逆命题之后宣称：“一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了无须生产生命的真正自由的余地，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将终结；一种自由的哲学将取而代之。”<sup>③</sup>在萨特看来，匮乏是“任何社会中人类关系发生每一种物化的基本而抽象的母体”<sup>④</sup>。就萨特所描述的对抗性社会关系而言，萨特的匮乏性社会几乎是霍布斯式的社会<sup>⑤</sup>。因为

“在纯粹的相互关系中，与我不同的人也同样是人。但在受到匮乏限制的相互关系中，只要这同样的人表现为与众不同的人，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人——也就是说，是用死来威胁我们的人。”<sup>⑥</sup>

萨特否定了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存在和谐的意见。因为

“没有既从外部又从内部对人加以否定的持久因素，就不可能理解历史进程。在人的存在本身之中，便有一种把别人弄死或被别人弄死的永恒的可能性；换言之也就是匮乏的永恒的可能性。”<sup>⑦</sup>

但自然界从来不是完全消极的。当人们作用于它时，它会无意识

①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纽约和伦敦1976年版，第79页。

② 萨特：《方法问题》，第3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32页。

⑤ 霍布斯为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著有《论公民》、《论物体》、《论人》和巨著《利维坦》等。他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天生利己，追求享乐；在人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象狼一样，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状态；要摆脱这种自然惨状，需要由人的自然理性产生的协议（后来的社会契约论即源于此）和强制执行协议的国家绝对权力。——译者注

⑥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131页以下。

⑦ 同上书，第148页。

地作出反应。萨特举例说，一个中国农民把树木砍倒在自己的田地里以便改良其耕地，但发现（由于邻居也照此办理）他的田地如今被毫无阻挡的洪水冲毁了。这就是“实践—惰性”的力量，即一种异化状态。在这种异化状态中，个人实践的结果逃脱了实践者的控制，并使他们的计划归于失败。

在社会领域里，实践—惰性是由与群体（group）对立的序列（series）来体现的。在比如公共汽车车队那样的序列中，个别的车辆是并列的，只是公共汽车的惰性目标才把它们统一起来。赖以区别它们的唯一特点是它们在线路上的位置，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相互联系的结构。一个阶级也是一个序列，因为辩证法的研究“向我们表明，阶级在实践—惰性领域里是一个集体，阶级的存在是强加于构成集体的多样性之上的一种序列状态”<sup>①</sup>。《辩证理性批判》的其余部分则描述了这样一些辩证规律，它们支配着群体从序列中产生出来，又从融合的群体（fused group）逐步蜕化为法定的群体（statutory groups），最后成为制度化的群体（institutionalised groups）。制度化的群体从外部操纵一个序列的整体并转过来成为序列本身。正如戈尔茨所写的那样，按照这一历程顺藤摸瓜，则

“辩证的经验使得所有实践的整体如何从个人实践中产生出来并互相转化的问题变得易于理解了。并且，其中的任何一方单独说来对另一方都并没有任何历史上的优先权。序列、集体、融合的群体、法定的群体、制度化的群体等等并不是历史发展逐次经历的阶段，而是在基本的、形式上的结构（不完全的整体和整体化）中存在着、冲突着和结合起来。历史便是这个结构的整体化。”<sup>②</sup>

①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306页。

② A·戈尔茨：《萨特和马克思》，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1977年版第195页。

作为一个融合中的群体的例子，萨特描述了分散的个人怎样联合起来去冲击巴士底狱的。一旦他们的直接目标达到了，这个群体就开始按照自身来了解自身，并企图用忠诚誓言来保持自身——这是限制其自身自由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压力（包括运用恐怖手段）把个人保持在群体之内，在群体（组织）内划分任务并最终出现权威，而与此相关联的是个人被纳入序列中而处于依从和无权的状态：

“群体实践的极限最终就是如此，即必然导致系列消失在一个生动而错综复杂的共同体中，使群体在空间和时间的发展上受到有组织的个人无法逾越的法规的限制，并在其自身以外，即在对它本想自行约束的无组织的外表作出的一些被动性的决定中，去发现它自己的存在。当异化用实践—惰性领域来代替个人的自由实践领域时，群体便在对抗异化中形成；但它并不比个人更能逃避异化，并且因此而陷入不断逆来顺受的状态。”<sup>①</sup>

萨特的批判与黑格尔的现象学有极为相似之处，其中包括把斯大林与拿破仑相提并论。虽然萨特的批判并不（比黑格尔的现象学更为）直接地以历史为根据，但它却受到法国革命、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强烈影响。在萨特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乃在于它是一个

“自保永存的集团的专政，它以无产阶级并未授与它的代表的名义，向正处于灭亡过程中的资本家阶级、向农民阶级甚至工人阶级本身行使统治的权力。”<sup>②</sup>

再说，

---

①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668页。

② 同上书，第661页。

“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假手于工人阶级整体化而真正行使的权力)之所以从未出现过,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想法本身是荒谬的,是在积极主动的统治集团和消极被动的序列之间搞私下的妥协。”<sup>①</sup>

但萨特并不因此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注意强调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会自行崩溃的说法,都将“最终把人贬低为纯属反辩证法的实践—惰性的要素”<sup>②</sup>。萨特在指出自己的研究尚具未完成性的结论中写道:

“批判研究的回溯运动已经证明,把活动多样性的各种形式互相结合起来的实践结构和辩证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仍然处于同步整体化的水平上,还没有考虑到实践时序化(temporalisation)的历时性深度;另一方面,回溯运动终于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它必须采取复合的前进方式来完成,以便发起既同步又有时差的双重运动。通过这种双重的运动,历史不断地使自己整体化。”<sup>③</sup>

文体晦涩曲折和材料安排不当使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很不好懂。它的长处在于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和现象学的描述。这二者也是萨特以往著作的特征,他是否已成功地把二者结合成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缺乏有经验可凭的历史依据(例如,在论匮乏的一节中)、强调从个人出发<sup>④</sup>、对人下本体论的定义,这些都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容;特别是人的本体论定义似乎仍持人和自然的二元论观点,使人联想到笛卡尔主义。

---

①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662页。详见他的文章《群众,自发性,政党》,载《社会主义年鉴》,1970年。

② 同上书,第788页。

③ 同上书,第817页以下。

④ 关于这方面进一步参看R·阿伦森的批评:《萨特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论》,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1977年版。

## 论辩派和“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

萨特巨大的综合依然带有思辨性，而1950年代末 1960 年代初法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两次主要的修正，所遵循的却是更为经验主义和更为社会性的方法。萨特是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而“论辩派”集团和“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却是一些从存在主义那里找到了灵感的前共产党员。其中第一个集团以《论辩》杂志为中心，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勒斐伏尔著作的影响，追究马克思扬弃哲学的意见是否恰当，并且探讨在一个对劳动与闲散、对文化上层建筑与政治或经济同样重视的社会中异化的本性是什么。“论辩派”集团的主要思想家是科斯塔斯·阿克赛洛斯。他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对劳动过程来说太狭隘了，而且不能阐明先进技术中固有的异化，不管这种先进技术是按资本主义路线还是按社会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阿克赛洛斯认为，自我创造力有某些方面与生产劳动有所不同。他在引人注目地重新表述马克思第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把他的见解综述如下：

“所有的(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对象、实在，即各种材料只有采取生产对象、物质实在和劳动材料的形式才可以理解；它们就这样被有效地掌握，但是缺少根据和眼界。这就是为什么那另一面则由唯心主义哲学以形而上学方式（即与朴素的或精致的实在论相对立的方式）加以发展了。唯心主义哲学自然既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称之为实在的世界：它是各种形式、各种力量，以及已构成、已定形和已固定了的世界的各种弱点的总合，也是正在构成中而未固定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即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的另一面。马克思思想使感性对象高于观念对象，但他并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当作未定的活



动来掌握。于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的贫困》中同样把物质生活看作唯一真实的人类生活，而思想和诗只是在其有条件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才被掌握。”<sup>①</sup>

论辩派集团的其他成员如福歇罗拉、莫林和查特莱特对经济学的异化概念没有能力处理技术社会中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集团的前托派作家如克劳德·莱福和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等，则以更为激进的情绪分析了现代官僚主义化的问题<sup>②</sup>。

“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更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安德烈·戈尔茨和塞奇·马勒等作家既否定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革命觉悟必然消失的自由主义见解，也抛弃了在共产党那里几十年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僵化定义，从而试图重新为阶级斗争划定界限。戈尔茨作为萨特的门生，在他的《劳工战略》一书中企图表明，革命运动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把其基础建立在非悲惨化和经济剥削等概念之上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动化的引进意味着白领脑力劳动者的重要性在增强，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压迫则只消用把着重点放在工人自我创造力上的异化概念便能完全包容了。于是，为工人自治而斗争的纲领就能够从内部破坏资本主义企业，并克服由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对立而引起的政治障碍。戈尔茨的这一分析得到了马勒的支持，后者论证道<sup>③</sup>，发达资本主义的那些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迄今为止并未被看作无产阶级的核心部分，却相反地被指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这些年轻的工业骨干既不受传统的行业界限的限制，也不受

---

① K·阿克塞罗斯：《关于全球思想》，巴黎1964年版第172页，引自M·波特斯：《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75年版第225页。

② 详见D·霍华德：《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伦敦1977年版第222页以下。

③ 见S·马勒：《新工人阶级》，巴黎1963年版。

庞大的工会官僚主义的控制,加上有足够收入作保障的物质地位,就能够运用他们有决定性的地位来重建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见解在1968年的五月事件<sup>①</sup>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 参考读物

### 概述

休斯研究知识分子背景的《被阻塞的路》,考特论述党的作用的《共产主义和法国知识界》和利希特海默内容广泛的《现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三本好书。更新近的发展,见波斯特概观性的杰作《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萨特

#### 原著

萨特的主要著作《辩证理性批判》最近已有英译本。遗憾的是,这个版本未包括重要的引言部分,该引言最初以《方法问题》为题发表于1963年。萨特的两部有用的文集是《文学与哲学随笔》和《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 评论

探讨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就得讨论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也许最好的介绍是德森的《让-保罗·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它紧扣《辩证理性批判》的原文进行了分析。对萨特的政见作最全面阐述的书是阿伦森的以同情方式进行批判的《让-保罗·萨特:空想政治》,而使用较强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有奇奥蒂的《萨特和马克思主义》。戈尔茨的文章《萨特和马克思》把《辩证理性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捍卫,而利希特海默的《萨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则对该书作了更公正的评论。关于萨特政见的发展,见索蒂的《让-保罗·萨特:文学和政治的研究》第四部分。对《辩证理性批判》的较简短的

---

<sup>①</sup> 指一千万罢工者使戴高乐政权一度瘫痪的“巴黎五月风暴”。——译者注

评论,见霍华德的《马克思的遗产》第七章和波斯特的《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七章。至于背景,则见奥丹尼克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对萨特的文学和哲学见解较他的政见更为侧重的简短介绍,见格林、沃诺克和丹图的著作,以及仍是最好的那部默多契的书。

## 其他

梅洛-庞第著作有三个译本:反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恐怖》,《感觉和非感觉》尤其是第二节,以及最重要的《辩证法的冒险》。对他的评论,见班南的《梅洛-庞第的哲学》和拉比尔的《梅洛-庞第:社会领域的存在主义者》,还有霍华德的《马克思的遗产》第八章。加罗蒂、戈尔茨和勒斐伏尔的著作已翻译者,见下列书目。对他们的评论,见下列概述类中的波斯特的著作,该书也附有详尽的书目。

## 文献目录

### 概述

D·考特:《共产主义和法国知识界》,伦敦 1964 年版。

H·休斯:《被阻塞的路:1930—1960年的法国社会思想》,纽约 1968 年版。

G·利希特海默:《现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伦敦 1966 年版。

M·波斯特:《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杜塞》,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75 年版。

## 萨特

### 原著

让-保罗·萨特:《存在和虚无》,纽约 1966 年版。

——《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伦敦 1974 年版。

——《共产主义者与和平》,纽约 1968 年版。

——《辩证理性批判》,纽约和伦敦 1976 年版。

- 《斯大林的幽灵》，纽约 1968 年版。
- 《文学与哲学随笔》，纽约 1967 年版。
- 《七十年代的萨特：谈话和随笔》，伦敦 1978 年版。
- 《方法问题》，纽约 1968 年版。
- 《一国社会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00号，1976—1977 年。

## 评论

- R·M·艾伯斯：《让-保罗·萨特：失去信心的哲学家》，伦敦 1964 年版。
- R·阿伦森：《让-保罗·萨特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 1977 年版。
- 《让-保罗·萨特：空想政治》，伦敦 1979 年版。
- P·奇奥蒂：《萨特和马克思主义》，苏塞克斯郡哈索克斯 1976 年版。
- M·克兰斯顿：《萨特》，伦敦 1962 年版。
- A·C·丹图：《让-保罗·萨特》，伦敦 1975 年版。
- W·德森：《让-保罗·萨特的马克思主义》，纽约 1965 年版。
- A·戈尔茨：《萨特和马克思》，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 1977 年版。
- N·N·格林：《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的伦理学》，安阿伯 1960 年版。
- M·格林：《萨特》，纽约 1973 年版。
- K·哈特曼：《萨特的本体论：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对存在和虚无的研究》，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 1966 年版。
- D·霍华德：《马克思的遗产》，伦敦 1977 年版第七章。
- G·利希特海默：《萨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载《历史和理论》第 3 卷第 2 期，1963—1964 年。
- R·拉法歇：《让-保罗·萨特：他的哲学》，印第安纳 1970 年版。
- R·D·莱恩和 D·库珀：《理性和暴力：萨特哲学的十年》，纽约 1964 年版。

- I·默多契:《萨特:浪漫主义的唯理论者》,伦敦 1953 年版。  
W·奥丹尼克:《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纽约 1965 年版。  
J·休维登:《萨特:根本的转变》,俄亥俄州雅典城 1969 年版。  
P·索蒂:《让-保罗·萨特:文学和政治的研究》,纽约 1961 年版。  
M·沃诺克:《萨特的哲学》,伦敦 1965 年版。

## 其他

- R·阿伦:《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纽约 1969 年版。  
——《知识分子的鸦片》,伦敦 1957 年版。  
J·F·班南:《梅洛-庞第的哲学》,纽约 1967 年版。  
M·佛考特:《知识考古学和对语言的论述》,纽约 1973 年版。  
R·加罗蒂:《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伦敦 1970 年版。  
L·戈德曼:《人文科学和哲学》,伦敦 1969 年版。  
A·戈尔茨:《社会主义和革命》,伦敦 1973 年版。  
——《劳工战略》,纽约 1967 年版。  
J·依波利特:《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伦敦 1969 年版。  
D·勒古:《马克思主义和认识论》,伦敦 1975 年版。  
H·勒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纽约和伦敦 1968 年版。  
——《马克思的社会学》,伦敦 1968 年版。  
——《资本主义的生存》,伦敦 1976 年版。  
M·梅洛-庞第:《辩证法的冒险》,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 1973 年版。  
——《人道主义和恐怖》,波士顿 1969 年版。  
——《感觉和非感觉》,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 1964 年版。  
A·拉比尔:《梅洛-庞第:社会领域的存在主义者》,纽约 1967 年版。

## 第二十一章

### 德拉-沃尔佩学派

面临着僵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日益增长着的技术影响，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家试图通过吸收存在主义思想的办法，来重新发现人，发现主观方面。但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解释，却与黑格尔式的存在主义者所提出的解释根本对立。例如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及其追随者们就反对把马克思看成黑格尔派的任何企图。主要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从事写作的德拉-沃尔佩认为，黑格尔利用从抽象到具体又复归到抽象的辩证法把概念过程与现实过程混淆起来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一种以科学逻辑为基础的认识论有关，这种认识论从具体到抽象又复归到具体，类似于伽利略的假设—演绎法。在政治上，德拉-沃尔佩强调马克思受惠于卢梭，并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平等主义需要有形式的法律保证。过渡性社会废除了资产阶级一切形式的法制和代议制机构，必然要冒成为专横暴政的危险。德拉-沃尔佩的这些命题被他的弟子鲁西奥·柯莱蒂进一步发挥了。后者象前者一样，强调了卢梭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与资产阶级的分离所开展的批判的重要性，强调了卢梭所发展的人民民主概念的重要性，因为人民民主概念是巴黎公社的直接先导。在哲学领域，柯莱蒂主要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因为他们既否定唯物主义，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是柯莱蒂同

样也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他们简单地抄袭了黑格尔关于物的辩证法的说法，从而否定了任何真正的唯物主义。因为“没有无矛盾原理，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相反，‘物的辩证法’却否定这一原理”<sup>①</sup>。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柯莱蒂保留了思维领域中的辩证法，主张现实是无矛盾的；并强调异化的命题是马克思的核心。他把康德视为“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位伟大的现代思想家”<sup>②</sup>。

### 参考读物

最好的介绍是弗拉塞的《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思想入门》。德拉-沃尔佩的主要著作《鉴赏力的批判》有英文版。他的《卢梭和马克思》即将出版。关于柯莱蒂，请特别阅读他的文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及《从卢梭到列宁》。

### 文献目录

L·柯莱蒂：《从卢梭到列宁》，纽约和伦敦 1972 年版。

——《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纽约和伦敦 1973 年版。

J·弗拉塞：《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思想入门》，伦敦 1977 年版。

德拉-沃尔佩：《鉴赏力的批判》，伦敦和纽约 1978 年版。

——《卢梭和马克思》（即将出版）。

---

① L·柯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纽约和伦敦 1973 年版第 192 页。

② L·柯莱蒂：《一篇政治和哲学的谈话》，载《新左派评论》第 86 期（1974 年）第 10 页。

## 第二十二章

#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反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但影响更大的是 1960 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发达工业社会中明显的组织性和由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各自丧失了对自身使命的自信心而产生的消极性调和起来。一般说来,结构主义起源于索绪尔和雅科布森的语言学研究,他们一般地是研究基础语言结构而不是研究其具体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概念来说明原始社会,而拉肯和傅科在心理学和认识论方面也这样做。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不是人的主体有意识的活动,而是作为这些活动的先决条件的无意识的结构。既然结构主义在 1960 年代有巨大的影响,那么出现用结构主义来诠释马克思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是路易·阿尔杜塞。他是法国哲学家,1960 年前后便开始详细阐发他的思想。阿尔杜塞既不赞成青年卢卡奇、萨特和葛兰西把人作为历史主体加以强调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他视为传统辩证唯物主义所固有的那种简单化的经济主义。

阿尔杜塞是从如何解释马克思这一问题出发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著作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其中确实包含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但要把它有分析地抽取出来,则必须认清其理论上的弱



点,即其中也包含有早期思维方式的残余。为了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是要对一些有关的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得出精确的定义。这是哲学的一项任务。阿尔杜塞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存在是否有理论依据?如果它原则上存在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规定它的特性?”<sup>①</sup>要回答这些问题,《资本论》是基本的原著,而阿尔杜塞旨在揭示《资本论》中固有的哲学。对于这一努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理解到马克思著作所包含的不止是一个论述范围。阿尔杜塞否定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并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二者之间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认识论的断裂”的现象。“认识论的断裂”这个概念是从法国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歇拉尔那里借用来的,并与同一时期托马斯·库恩制作的科学范例概念相类似。根据阿尔杜塞的看法,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问题体系。所谓问题体系就是“具有特定命题的客体内部的联系体系,即支配一定答案的问题体系”<sup>②</sup>。马克思早期著作带有黑格尔色彩,着重阐述异化和存在的概念,从而展示了一个关于主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体系;只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才包含着另一个具有一门科学基础的问题体系。但这一断裂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并不明显。某些早先的思想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甚至在《资本论》中始终存在: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1867年),黑格尔影响的痕迹依然存在。只是到以后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和《评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旁注》(1882年)最终完全消除了任何黑格尔影响的痕迹。”<sup>③</sup>

因此,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需要用征兆读法<sup>④</sup>。简单而直接地

① L·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伦敦和纽约1970年版第31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L·阿尔杜塞:《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伦敦1971年版第90页。

掌握原著的意义是不可能的。杰拉斯写得好：

“问题体系在确定其范围内所包括的内容时，也就必然确定了它相应排斥的内容。因此，被排斥的概念（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没有充分提出的问题（半沉默之处，漏洞）或根本没有提出的问题（沉默之处），便与那些被提出的概念和问题一样，构成问题体系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原文中明确的论述简单地从字面来理解或者进行直觉的阅读，就很难掌握它。相反，要掌握它就必须通过‘征兆’读法，即把明确的论述与那些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沉默之处结合起来读。后者是另一种‘未曾明言的论述’，它们正是潜藏在原文中未被人意识到的问题体系的许多征兆。正确地理解和实践的读法，也象一切知识那样，不是想象力，而是理论性的劳动和生产。”<sup>⑤</sup>

这些概念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有着明显的类似。

这种征兆读法产生了什么呢？它包含了对人道主义和对阿尔杜塞视为人道主义之必然结果的经验主义的否定。经验主义把主体和客体、抽象和具体对立起来，认为世界能够直接被把握，这种见解没有明确地把概念与其对象加以区分。根据经验主义，“认知就是从实物中抽象出它的本质，于是主体占有这种本质就被称为知识”<sup>⑥</sup>。经验主义把“一定的主体与一定的客体”对立起来，“并把主体抽象出客体的本质称为知识，因此对客体的认识也是客体本身的一部分”<sup>⑦</sup>。与此相反，阿尔杜塞——显然带着新康德派的情绪——把哲学的任务视为创造概念，认为概念是认知的前提。他主张严格区分思维的对象和真正的对象。他写道，

---

④ 这里使用的“征兆(symptomatic)读法”，是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用语。即要了解一种事物，就要了解这一事物早期所出现的征兆。——校者注

⑤ N·杰拉斯：《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说明和评价》，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1977年版第244页。

⑥ L·阿尔杜塞和E·巴里巴：《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版第35页以下。

⑦ L·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伦敦和纽约1970年版第251页。

## 认知

“作用于其‘对象’……不是作用于真正的对象，而是作用于特定的原料。后者按其严格的意义来说，就是它的（即认知的）对象。这一对象甚至在认知的初朴形式中，也有别于真正的对象”。<sup>①</sup>

认知作用于其对象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理论实践：

“就**实践**说来，我一般指的是任何将规定的原料**转化**为规定的**产品**的过程。这一转化是某种规定的人类劳动、使用某些规定的（“生产”）工具完成的。在任何这样的实践中，**决定性**的要素（或因素）既不是原料也不是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即在一种特定的结构内使人、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某一技术方法都在转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劳动本身。”<sup>②</sup>

这样的理论实践由三个因素组成，阿尔杜塞称之为三个普遍要素。第一个普遍要素是属于某一学科的原料，即该学科思想和概念，它们部分是科学的，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普遍要素是加工上述原料的理论生产工具，即形成某一学科问题体系的成套概念。第三个普遍要素是这样加工出来的产品，即思维中的具体，它提供了对实在的具体事物的认识<sup>③</sup>。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关于这一理论实践的理论。

这一认识论应用于社会的结果，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阿尔杜塞既严格区分思维的对象和实在的对象，也就相应地拒绝了黑格尔的整体概念，在这一整体概念中，全部因素只不过是内在本质的现象表现。例如，罗马的本质表现于罗马的法律和政治等等。据阿尔杜塞看来，与这个简单的方法相反，马克思所做的就是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概念，

① L·阿尔杜塞和E·巴里巴：《读资本论》，第43页。

② L·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第166页。

③ 见同上书第183页以下，这里阿尔杜塞认为自己是在阐发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第三节中的见解。

“这个社会的统一性是由某种特殊类型的复杂性构成的，而复杂性表现的情况，我们可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非常图式化地概括为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sup>①</sup>

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是统一于众结构中的一种结构，而因果关系本身也是结构性的：

“结果不是在结构之外的、先于存在的客体或因素，也不是结构为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占据的空间。相反，这意味着结构寓于其结果之中，或用斯宾诺莎主义者对因果关系这个词的解释来说，原因寓于其结果之中。这也意味着结构的整个存在是由它的结果构成的，简言之，结构仅仅是其特有因素的特定组合，在其结果之外不存在任何结构。”<sup>②</sup>

每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特有时间，即自己的发展节奏。阿尔杜塞把某一特定时间诸方面或诸层次相互之间复杂的、不平衡的关系称为“关键环节”，而每一关键环节据说是在下述情况下“正反向决定”的，即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助于决定结构并被结构所决定，因而决定经常是复杂的。这样阿尔杜塞就摈弃了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存在简单的矛盾的思想。当然，每个层次的决定作用并不相等，因为它们都只有相对的自主性，而经济总是起最终决定的作用。阿尔杜塞在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与被决定的方面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在封建时期，政治是主导方面，但政治起主导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却是由经济决定的<sup>③</sup>。既然一种结构总有一个主导因素，阿尔杜塞便把这一结构称为主导结构。但经济对于这个主导结构的决定作用，决不能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中脱离出来：↪

---

① L·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第232页。

② L·阿尔杜塞和E·巴里巴：《读资本论》，第188页以下。

③ 见巴里巴在《读资本论》第216页以下对这一点的详细论述。

“经济的辩证法从来不在**纯粹状态**中起作用。在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方面，即上层建筑等等，在完成其作用后便恭敬地靠边站；或者说，在沿着通向辩证法的皇家大道上大踏步前进的经济陛下面前，这些方面不会因这种纯经济现象的时刻到来便消散。‘最终的方面’的寂寞时刻是自始至终不会到来的。”<sup>①</sup>

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是松散的，因为它的诸因素并不象黑格尔认为的那样，单单来源于一个本质或一个中心。

从结构性因果关系的概念又继而得出了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历史不是人在主宰自然方面直线发展的和同质性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就必须同下述唯心主义范畴决裂，即‘主体’作为起源、本质和原因，应以其内在性对外部‘客体’的一切决定作用**负责**，因为对于‘客体’的决定作用来说，这种内在性便被说成是‘主体’。”<sup>②</sup>

在黑格尔那里，这个主体就是**绝对**。按照阿尔杜塞的说法，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做的一切，就是用人的本质的观念取代作为历史主体的绝对。只是在1845—1846年间，马克思才开始看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③</sup>。并且，他不借助主体这个范畴，而只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就能解释历史了。这样解释历史，类似于阿尔杜塞对原著的“读法”，即两人都有一个结构，但在本质上都没有主体。关于这一点，阿尔杜塞作了如下强有力的表述：

“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从事生产的人所处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职能**，只

① L·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第113页。

② L·阿尔杜塞：《自我批评论文集》，伦敦1976年版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页。

要这些人是某种职能的‘载体’〔特拉格尔的用语〕，他们便充其量只能是处于那种地位的人。因此，真正的‘主体’（从构成该过程的主体这一意义来说）不是处于那种地位或承担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在一切外表上具有朴素人类学所‘规定的明显特性’），即不是‘具体的个人’或‘真正的人’，而是**对这些地位和职能的确认和分配。真正的‘主体’是这些确定和分配的要素，即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但是，正因为这些只是‘关系’，它们就不能在主体范畴内加以思考了。”<sup>①</sup>

阿尔杜塞对历史的这种读法既有别于他所说的“历史主义”，即把人看作历史的能动主体的倾向（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其突出的例子），也有别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因此阿尔杜塞提出一种（科学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来取代它。

阿尔杜塞对马克思的阐述，特别是其中关于问题体系的概念和坚称科学有相对自主性的主张，对于各种类型的简化论和各种极端形式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都是一剂良好的解毒药。尽管如此，阿尔杜塞的理论却在三点上遇到了批评。第一，阿尔杜塞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科学，但没有提出科学性的鉴定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它的知识是真实的知识。由于他否定了经验主义，也就排除了任何求助于“实在客体”的作法。第二，阿尔杜塞宣称意识形态是幻想的领域，但仍坚持意识形态并不限于在阶级社会中存在，而是也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存在。第三，由于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社会生产条件的影响隔绝开来，使之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并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杰出人物的独占物，也使后者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脱离了联系，这就不可能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因而成了阿尔杜塞的

---

<sup>①</sup> L·阿尔杜塞和E·巴里巴：《读资本论》，第180页。

马克思主义的最薄弱部分。批评者们迅即指出，虽然阿尔杜塞的理论看来超脱了阶级斗争，但他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相反见解事实上却是用来为党和官僚政治的存在作辩护的，因为科学知识必然只对少数人开放，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群众也将不得不与意识形态打交道。阿尔杜塞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偏差”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错误。例如在《保卫马克思》中，他写道：

“每件被说成是‘个人迷信’的事情，所涉及的恰恰是上层建筑领域，因而只是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且，它主要只涉及的这个领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知道，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这种相对自主性十分简单地从理论上说明了，在影响上层建筑犯错误的时期中，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何以能够在未受到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得到发展）。”<sup>①</sup>

阿尔杜塞能够对斯大林主义提出的唯一批评是“一种具体的批评，它存在于各种事实中，存在于斗争中、路线中，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原则和形式中”<sup>②</sup>。这些批评使阿尔杜塞多少修正了一下他的立场，承认他把哲学同化于科学是一个“理论上的”偏差，从而使哲学脱离了阶级斗争<sup>③</sup>。

阿尔杜塞也许因为是一个“理论家”，其著作是高度理论性的。他的追随者们试图将他的思想着重应用于两个主要领域：当代政治和历史研究。阿尔杜塞在早期著作中对国家问题几乎没说过什么。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sup>④</sup>这篇论文中，阿尔杜塞在国家的镇压机器与工会、教会、学校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二者之间作了区别，并且分析了后者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的作

---

① L·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第240页。

② L·阿尔杜塞：《自我批评论文集》，第92页。

③ 详见同上书，第105页以下。

④ L·阿尔杜塞：《列宁和哲学》，伦敦1971年版第135页以下。

用。但是把阿尔杜塞的思想应用于阶级和国家的努力主要是在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著作中。普兰查斯的著作仍有高度的理论性,其着重点是认真提出正确的问题体系,以分析国家和阶级。在《政权和社会阶级》中,普兰查斯试图反对用经济主义的看法把当代国家简单地看作垄断资本的工具(这是正统共产主义者的见解);并试图分析当代国家对经济有相对自主性。国家的作用是“社会形态各层次之间的一个内聚因素……和全球均衡体系的一个调节因素”<sup>①</sup>。这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国家,在这个阶级国家中,不管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在政权等方面可能占有什么职位,国家职能所维护的社会形态只是在各个层次都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形态。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混合,其中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如何解释结构的变化。普兰查斯遵循阿尔杜塞的路线,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一书中,他的分析避而不谈意识,并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简化论。他描述了当代社会中结构决定着各阶级的论点,即在社会的劳动分工中各阶级的客观地位是怎样再生产的。这种再生产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内,而且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此普兰查斯在与经济主义进行斗争的努力中作了充分强调。他特别关注的是,以相当简略而独特地采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鉴别标准的办法,来把工人阶级的定义仅限于生产劳动者,并把工人阶级同白领管理工作人员的“新工人阶级”区分开来<sup>②</sup>。

一些作家,如雷伊、特雷、米拉苏和戈德列尔<sup>③</sup>,把阿尔杜塞学派的概念应用到历史,特别是应用到“新的经济人类学”上去,并讨

---

① N·普兰查斯:《政权和社会各阶级》,伦敦1973年版第44页以下。

② 见E·O·赖特在《阶级、危机和国家》,(纽约和伦敦1978年版)第二章中的批判。

③ 见本章末文献目录中所列他们的著作(但原书漏列。——译者注)。



论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理论的后果<sup>①</sup>。在这些方面,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参考读物

### 阿尔杜塞

#### 原著

见收集在《保卫马克思》中的阿尔杜塞的早期论文,然后见他的最基本的原著——《读资本论》。还可辅以《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与《政治和历史》这两本论文集。又见新近的《自我批评论文集》,其中附有与约翰·刘易斯的论战。

#### 评论

卡里尼科斯的《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足以成书的长篇评论。杰拉斯的同名文章具有同样的同情见解和洞察力。瓦尔登和甘布尔的《从异化到剩余价值》的第五章和格鲁克斯曼的文章《一种口技表演者的结构主义》更带有批判性。为之辩护的,可见安德森和布莱克伯恩在《未知的方面》一书中的文章。

#### 其他

阿尔杜塞的弟子们中特别值得一读的是普兰查斯的著作——《政权和社会各阶级》和《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也可见他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地中海各国专政的那本更带经验主义色彩的著作。米利班德的文章对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的见解提出批评,赖特则对他关于阶级的见解写了一本批评性质的书。

---

<sup>①</sup> 这里进一步参见A·福斯特-卡特:《关于生产方式的争论》,载《新左派评论》107卷,1978年。

## 文献目录

### 阿尔杜塞

#### 原著

- L·阿尔杜塞:《自我批评论文集》,伦敦1976年版。  
——《保卫马克思》,伦敦和纽约1970年版。  
——《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伦敦1971年版。  
——《论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载《新左派评论》第104期,1977年。  
——《政治和历史》,伦敦1972年版。  
L·阿尔杜塞和E·巴里巴:《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版。  
E·巴里巴:《无产阶级专政》,伦敦1977年版。  
——《非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107期,1978年。

#### 评论

- P·安德森和R·布莱克伯恩:《路易·阿尔杜塞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载D·霍华德和K·克拉尔编《未知的方面》,纽约1972年版。  
A·卡里尼科斯:《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6年版。  
N·杰拉斯:《阿尔杜塞的马克思主义:说明和评价》,载《新左派评论》第71期,1972年;又载《新左派评论》社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伦敦1977年版。  
V·格瓦塔纳:《阿尔杜塞和斯大林主义》,载《新左派评论》第101—102期,1977年。  
A·格鲁克斯曼:《一种口技表演者的结构主义》,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物》,纽约和伦敦1977年。  
P·赫斯特:《阿尔杜塞和哲学》,载《理论实践》第2期,1971年。  
M·马克契奥奇:《意大利共产党内部致路易·阿尔杜塞的信》,伦敦1973年版。

## 其他

S·克拉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载《资本和阶级》第2期，1977年。

R·米利班德：《资本主义国家：答尼科斯·普兰查斯》，载《新左派评论》第59期，1970年。

N·普兰查斯：《资本主义国家：答米利班德和拉克兰》，载《新左派评论》第95期，1976年。

——《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伦敦1975年版。

——《专政的危机：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伦敦1976年版。

——《政权和社会各阶级》，伦敦1973年版。

E·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纽约和伦敦1978年版第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年以上，这一事实无补于他的思想在英国左派中的传播。在1880年以前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不懂德语和法语的人都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1883年，为复活宪章派的思想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该联盟原本不是一个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其领袖H·M·海因德曼在读了《资本论》以后，信奉了马克思的思想，并在其《全体人民享有的英国》中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许多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其积极成员似乎从未达到一千人以上。1893年凯尔·哈迪及其朋友们建立了独立工党。该党避讳革命和阶级对抗的思想，体现出一种更带伦理色彩而不墨守教规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后来的工党是在英国职工大会的鼓动下，于1900年从工人代表委员会中产生出来的，并在战前的岁月里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它与其他加入第二国际的工人政党不同，在观点上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胜利时，英国有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尽管同工党相比，这三个组织全都微不足道。其中最大的英国社会党，是1911年由社会民主联盟与独立工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合并组成的。英国社会主义工党是其美国同名组织在英国的翻版，并按其主要发言人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克莱

德派领袖约翰·麦克莱恩和 J·T·墨菲的解释宣传德利昂的产业工联主义。三个组织中最小的是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它是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创建的，在伦敦东区势力特别强大。所有这三个组织都向 1920 年建立的英国共产党陆续提供成员，使它后来成为英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英国共产党与欧洲其他共产党不同，不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多数派中形成起来的。因此，共产党曾力求合并于工党，但遭到了拒绝。共产党人对工党的这种态度本来是出于矛盾心情的：他们声称工党的改良主义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但同时又不得不屈从莫斯科要它充当工党左翼的统战路线。1930年代，尽管发生了普遍的产业动乱和国民内阁垮台，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发展。然而，大量知识分子的涌入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他们表达反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最好方式。诗人奥登、戴伊·刘易斯和斯彭德等，宣布他们支持无产阶级的事业。1936 年创立的高兰茨的“左翼书社”，得到了拉斯基和斯特雷奇等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合作。但是，也许战前英国唯一真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他因在西班牙内战中殒命而中断了写作。在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幻想与现实》和《垂死文化研究》中，考德威尔研究了文学的社会作用，虽然篇章结构显得凌乱，却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但自 1956 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已超出仅仅是小小英共正统的界限了。随着中苏分歧和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甚至正统的共产主义也正在大分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 1960 年代中期不断扩大的大学队伍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其主要标志是 1960 年《新左派评论》的创刊，最近二十多年来它一直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刊物。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并未导致党员人数的相应增加。共产党依然很小，尽管它在《走向社会主

义的英国道路》中采纳了一个远非革命的纲领，并试图使工党向左转。然而，它毕竟是真正扎根于工人运动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这种情况意味着在英国，革命左派几乎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同义语，而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从其最大的团体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称为国际社会党人），经过更带理论色彩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直到象工人革命党这样的极端倾向，包罗较广。

尽管在英国还没有基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贡献集中表现在英国知识分子历来所关注的焦点上，即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三个领域中。

在文学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人物始终是雷蒙德·威廉斯，他在《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考察了英国公众生活中不同文化价值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最近威廉斯得出了一种他称之为“文化写实主义”的观点，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把文化作为（社会和物质的）生产过程和特殊实践的理论，和把‘文学’作为生产社会效益的物质手段的理论（他所说的物质手段包括：从作为物质的‘实践意识’的语言，到写作的具体知识和具体形式，直到机械的和电子的信息系统）”<sup>①</sup>。威廉斯著作中一个含蓄的看法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一向是并且仍将是民主和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体现者。这与《新左派评论》的编者不同，他们始终关心的是宁愿造就一个具有领导权的社会主义知识界。

在历史学方面，居主导地位的是过去或现在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一些作家。其中包括写有关于英国内战的著作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作者E·P·汤普森。从更深的理论观点来看，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都发挥了英

<sup>①</sup> R·威廉斯：《关于大战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札记》，载《新左派评论》第100号（1976—1977年）第88页。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引起英国经济和政治动乱的命题，认为在这些革命中，资本家随时随地准备同贵族妥协。史学讨论中，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般理论问题也占有突出地位<sup>①</sup>。

但是在英国，知识分子作出最大努力的领域也许是经济学。自1960年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以来，人们认为这是新李嘉图学派对马克思作出的强有力的解释。该派作者着重研究的是交换和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他们抛弃了价值理论，并试图用单纯量的要素如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来托出马克思的思想。因此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作的区别，而争论说经济危机是交换领域中分配方面的阶级斗争引起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作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作了有力而精辟的辩护，并确信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资本和阶级》杂志的创刊，它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创办的，以讨论政治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为明确的重点。

### 参考读物

关于英国左派的起源，见毕尔的基本著作《英国社会主义史》。关于社会民主联盟，见土佐基关于海因德曼的传记和卡普的《爱琳娜·马克思传》第二卷。关于共产党的起源，见肯德尔的杰作《英国的革命运动》。查利诺尔的《英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是用托派观点所作的阐述。关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见麦克法伦不偏不倚的介绍《英国共产党》和克鲁格曼的冗长辩解。塞奇威克和威廉斯的文章对战后马克思主义作了简短而可靠的说明。威德格里的大部头选集《1956—1968年的英国左派》是根据托派观点编辑的。关于当代经济论战的优秀指南见弗恩和哈里斯的文章。

---

<sup>①</sup> 参见R·希尔敦编的文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伦敦1978年版。

## 文献目录

### 历史

P·安德森:《当前危机的根源》,载《走向社会主义》,伦敦1965年版。

M·毕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两卷本,伦敦1919—1921年版。

R·查利诺尔:《英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伦敦1977年版。

H·科林斯和C·阿布拉姆斯基:《卡尔·马克思和英国的工人运动》,伦敦1965年版。

J·格拉塞尔:《威廉·莫里斯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伦敦1921年版。

S·R·格劳巴德:《英国工党和俄国革命(1917—192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6年版。

K·哈迪:《从矿井到议会》,伦敦1913年版。

——《哈迪的讲演和著作(1885—1915)》,E·休斯编,伦敦1928年版。

B·霍尔顿:《1900—1914年的英国工联主义:神话和现实》,伦敦1976年版。

H·海恩德曼:《全体人民享有的英国: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苏塞克斯郡哈索克斯1977年版。

——《冒险生涯记录》,伦敦1911年版。

Y·卡普:《爱琳娜·马克思传》第二卷《多事之秋(1884—1898年)》,伦敦1976年版。

W·肯德尔:《1900—1921年的英国革命运动:英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伦敦1969年版。

J·克鲁格曼:《英国共产党史》,伦敦1968年起陆续出版。

D·基纳斯顿:《劳工王:1850—191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伦敦1977年版。

H·拉斯基:《共产主义》,伦敦1932年版。

L·J·麦克法伦:《英国共产党》,伦敦1966年版。

N·麦肯济和J·麦肯济:《费边派》,纽约1977年版。

P·梅耶:《威廉·莫里斯:马克思主义的空想家》,两卷本,苏塞克斯郡



哈索克斯 1978 年版。

F·摩尔赫恩:《“选票复查”的时候》,伦敦 1978 年版。

T·奈恩:《英国工人阶级》,载 R·布莱克伯恩编《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性社会理论读物》,伦敦 1972 年版。

H·佩林:《工党的起源(1800—1900年)》,伦敦 1954 年版。

S·皮埃森:《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社会主义的起源:为新的觉悟而斗争》,纽约州伊萨卡 1973 年版。

P·塞奇威克:《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变形》,载 B·克里克和 W·罗布森编《异议和不满》,哈门德索兹 1970 年版。

E·汤普森:《威廉·莫里斯:对待革命的浪漫主义》,伦敦 1977 年版。

C·土佐基:《海恩德曼与英国社会主义》,牛津 1961 年版。

S·怀特:《英国和布尔什维革命》,伦敦 1979 年版。

D·威德格里:《1956—1968年的英国左派》,伦敦 1976 年版。

R·威廉斯:《关于大战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札记》,载《新左派评论》第100号,1976—1977年。

M·伍德豪斯和 B·佩尔斯:《英国共产主义》,伦敦 1975 年版。

A·兹文德林:《奥威尔与左派》,纽黑文 1974 年版。

## 理论

B·弗恩和 L·哈里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引起争论的问题》,载《社会主义年鉴》,1976 年版。

A·格林和 R·苏特克利夫:《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的榨取》,哈门德索兹 1972 年版。

I·高夫:《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载《新左派评论》第76号,1972年。

G·霍奇森:《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载《新左派评论》第84号,1974年。

E·霍布斯鲍姆:为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一书(伦敦 1964 年版)写的引言。

R·米里班德:《议会社会主义》,伦敦 1973 年版。

-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伦敦 1973 年版。
- T·奈恩：《英国的解体》，伦敦 1977 年版。
-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伦敦 1963 年版。
- 《理论的贫困》，伦敦 1978 年版。
- I·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伦敦 1978 年版。
- R·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伦敦 1958 年版。
- 《漫长的革命》，伦敦 1961 年版。
-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牛津 1977 年版。
- 《政治学和文学》，伦敦 1978 年版。
- D·雅斐：《马克思关于危机、资本和国家的理论》，载《经济和社会》第 2 期，1973 年。

## 第二十四章

#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 历史

###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显示出对美国的极大兴趣。1850年代初,马克思曾经认真地考虑过移居美国,并在十年中是《纽约每日论坛报》最受崇敬的外国撰稿人;恩格斯则于1888年访问了新英格兰。在马克思看来,美国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sup>①</sup>,由于那里没有封建的历史,“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sup>②</sup>。其结果是在这个社会

“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人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为自身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07页。又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美国宪法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评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36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6卷(上)第4页。

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sup>①</sup>

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已预见到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在这一发展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西迁、铁路系统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以及“美国佬的不知疲倦的干劲”<sup>②</sup>，使北美大陆的南半部成了“世界商业的支轴”<sup>③</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南北战争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内战的结果为无产阶级本着“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sup>④</sup>的原则进行的斗争扫清了道路。奴隶制的废除和工业的巨大增长，特别是经过1873—1878年的慢性危机之后，为“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sup>⑤</sup>提供了可能性，虽然马克思早已预料到这个党起初将采取亲资本主义的激进主义形式<sup>⑥</sup>。

#### 魏德迈和左尔格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初向美国移植，早在马克思逝世以前就开始了。这主要是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后熟练的产业工人移居的结果。由于大多数移民为德国血统，他们无论对东海岸相对较小的有组织的劳工小组，还是对西海岸人民党的农民运动，都没有什么影响。第一次浪潮中的卓越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在美国出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853年，他和几位朋友在纽约市建立了昙花一现的“美国工人同盟”。这是一个政党和

---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11—6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1957年版第7卷第221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30页。

⑥ 见同上书第91—92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克利盖的评论。

工会的混合物，其目标是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立即改善工人的条件而进行鼓动。此后，魏德迈作为新闻记者和县的丈量员活跃在伊利诺斯州和密苏里州，在南北战争中参加了战斗，并病逝于1866年。当时第一国际在美国的影响也跟“美国工人同盟”一样，大致局限于德裔美国人。到1870年第一国际在美国已有几个支部，统一于以弗里德里希·左尔格为通讯书记的中央委员会之下。第一国际在1872年迁到纽约后，始终是一种不深入的运动，只生存了四年。左尔格关心的是坚持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主张在无产阶级的觉悟尚未发展到为建立政党而奠定可靠的基础之前，提出工人阶级的要求而进行鼓动是第一位的。这样他就与两种人同时发生了冲突：一种人把教育当作无产阶级摆脱苦难的主要药方；另一种人则全神贯注于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事业——特别致力于野心勃勃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方案。国际解散以后，左尔格退出了积极的政治生活。

### 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里昂

紧接国际解散之后，在费城召开的有左尔格和魏德迈的儿子奥托参加的会议上，建立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然而，188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党试图效法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搞选举运动，却未能成功。尽管工会的活动已高涨起来，并在1886年终于导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建立，但党还是踏步不前。特别是在1880年代中期，理想主义的、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劳动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领导了为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的鼓动，并加入了新的独立工党，而于1886年提名亨利·乔治为该党竞选人参加纽约市长选举。乔治是流行的《进步与贫困》一书（1879年版）的作者，他主张一种单一税制，其中地租将用于公众目的——这种措施用来对付土地改革和自产自销的小商人更甚于对付产业资本主义<sup>①</sup>。

几乎完全由新来的德国移民组成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丹尼尔·德里昂参加到它的行列中来之前，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里德里昂具有犹太人和加勒比人的血统，曾就读于荷兰并执教于哥伦比亚。他起初是乔治的热烈支持者，后来在1890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前，是贝拉米的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国家主义的热烈支持者。德里昂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人民报》（在美国唯一公开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的英文报纸）的主编，从1890年起到1914年他逝世之前，一直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席发言人，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最有发言权和最不妥协的辩护者。

德里昂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使马克思主义调和于人民党的土地改革运动（美国激进主义的传统形式）或者调和于中间阶级曾使上一辈人感到焦虑不堪的乌托邦主义。德里昂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工人党与新生的工会运动的关系。他的第一个战略是他在1890年代中期接管劳动骑士团失败后放弃了的“从内部加以动摇”的战略。意义更为重大的是，189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了著名的第十条政纲，其中提出“全体人民对所有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十一条政纲都来源于英国独立工党的纲领）。在赛米尔·龚帕斯（他最初受到马克思的强烈影响）的领导下<sup>②</sup>，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劳工联合会推行一种“十足工联主义”的哲学，即避免卷入一切政治和鼓吹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由于德里昂建立了一个与劳联对抗但寿命不长的社会主义贸易和劳工同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便更加反对德里昂的社会主义。

---

① 见马克思在致左尔格信中对乔治的评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191—193页。

② 见S. 龚帕斯：《生活和劳动的七十年》，伦敦1925年版第1卷第83页以下。详见S·考夫曼：《赛米尔·龚帕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起源》一书（韦斯特波特1973年版）的前半部分。

德里昂对在美国争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抱乐观态度，从而使他更强烈地反对不问政治的工联主义。他由于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改良主义倾向而尽管感到有些幻灭，但他认为在美国实行妥协甚至更加不能容忍。在1904年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他宣称：

“当封建主义被清扫在一边而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权杖的时刻，就象目前在美国那样——从那一时刻起，进行革命的场地便已经准备就绪了；进而言之，从那一时刻起，改良就成了陷阱与骗局。”<sup>①</sup>

这样，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在美国争取社会主义比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更为条件成熟，因为“别的国家尚未有成熟到可以实行马克思革命策略的”<sup>②</sup>。

德里昂的强硬立场导致189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分裂。当时大部分认为对现存工会应采取更为和解态度的党员离开了党，并建立了社会党。社会党在选举上的相当成功，促使德里昂重新强调革命工会的活动。他相信工人们尽管遭受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苦难，仍会追随保守的工会领导人，于是在1905年他参与建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这是一个源出于西北部季节性伐木工人和矿工的运动，按照马克斯·伊斯特曼的说法，它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sup>③</sup>。德里昂的理论是，劳工运动暂时分为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两翼。属破坏性一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任务是一种暂时性的任务，即为了废除国家而掌握国家。（象马克思一样，德里昂坚决相信在美国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

① 德里昂：《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光芒》，纽约1929年版第193页。

② 引自D·赫雷肖夫：《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纽约1967年版第136页。德里昂关于美国革命比德国更成熟的见解，见他在A·倍倍尔：《社会主义下的妇女》一书（纽约1971年版）第372页以下所作的脚注。

③ M·伊斯特曼：《爱与革命：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纽约1964年版第126页。

义。)属另一翼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任务是永远具有建设性的,即控制、保存和扩大生产资料。政治运动必然使阶级斗争无法妥协,而经济运动却可以更为渐进一些。然而到了1908年,德里昂被开除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这是由于后者已倾向于工团主义,并且相信应采取直接行动甚至破坏行动,从而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冲突。从此,德里昂便结束了政治生涯。他在逝世前一年总结其工作的主旨时写道:

“产业工联主义致力于把工人阶级统一到政治领域和产业部门中来——之所以要统一到产业部门中来,是因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完整的有组织的联合,革命行动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统一到政治领域中来,是因为没有别的领域可以寄托革命目的,而对革命目的若没有觉悟,联合就只是一种不牢固的结合”。<sup>①</sup>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00年代初期,社会党压倒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到1912年,社会党党员已经增长到十万以上,该党主席尤金·德布斯又在同一年作为总统候选人赢得了几乎一百万张选票。社会党作为种族多元主义者,从欧洲社会主义当时所享有的威望中得到了好处,在它根本改变了土地国有化政策以后,又从人民党成员纷纷归顺中得到了好处。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同,只略微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其庞杂,其内部有三种主要倾向:维克多·伯格领导派的右派,由中西部的市政改革者们组成;以东海岸为基地的中派,由1899年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莫里斯·希尔奎特领导;以及从西部获得力量的左派,则由最接近德

---

<sup>①</sup> 见德里昂于1913年1月20日在《人民报》上所写的文章,转引自S·胡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5年版第176页。



里昂的社会党领袖 德布斯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领袖比尔·海伍德领导,尽管后来海伍德于1912年社会党通过反对破坏的决议后被驱逐出党。与此同时,社会党产生了很多理论家,对在美国普及马克思主义有所帮助,例如:欧内斯特·昂特曼翻译了《资本论》;路易斯·鲍丁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一书,甚至在今天读来仍能获益非浅;A·M·西蒙斯曾担任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主编。临近第一次大战的前几年,出现了一个“抒情左派”的短暂繁荣时期,当时社会主义思想与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格林威治村<sup>①</sup>也应运而生,《新评论》则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女权运动和黑人问题进行微妙的讨论。然而,随着美国的参战,反战的社会主义者相继遭到镇压,从而也断送了这次复兴。

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由于约翰·里德在其《震撼世界的十天》中作了广泛宣扬,被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当作一场凯旋来欢呼,尽管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日益增强的独裁性而迅即带来了幻灭。1919年第三国际建立以后,大多数来自各地讲外语的联合会的亲布尔什维克分子脱离了社会党,并组成了由路易斯·弗雷纳和查尔斯·鲁登堡领导的共产党。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主要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组成,以本杰明·西特洛和约翰·里德为领导。这两个党都因实施战时叛乱治罪法而被迫转入地下。当他们在1921年又露头时,列宁的“向右转”<sup>②</sup>指示他们从事选举活动,并在现存的工会运动中进行工作。但是,即使完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梦魇般的精神压力,他们在美国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因为泰罗制和生产线正在那里排挤各种手工业,以致大规模的消费品生产竟使传统的种族激进主义趋于衰落。

1920年代后期,共产党在对待苏联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方针问

<sup>①</sup> 格林威治村是纽约市内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聚居区。——译者注

<sup>②</sup> 参见本书第144页第1—7行。

题上由于发生分裂而进一步削弱。1929年，由杰伊·洛夫斯东和伯特伦·沃尔夫领导的“右翼”反对派被驱逐出党。他们与布哈林的思想 and 政策有联系，认为美国是一个不能立即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化的“例外”，并强调美国帝国主义在缓和群众的革命热情方面是有成效的。早在一年以前，“左翼”反对派曾被驱逐出党，这些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组成了两个小组：一是马克斯·沙赫特曼领导的工人党（后来的独立社会主义同盟），以后又与托洛茨基决裂，而于1958年最终被解散；另一是詹姆斯·坎农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始终不渝地宣传托洛茨基的观点。还有一个分裂出来的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是由A·J·马斯特于1934年建立的形式独立而激进的美国工人党。该党以《现代季刊》和《党人评论》为中心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大论战，卷入这场论战的知识分子有詹姆斯·伯纳姆、悉尼·胡克、伯特伦·沃尔夫和马克斯·伊斯特曼等人。然而，在1930年代中后期取得最大进展的是共产党。社会党当时在其新领袖诺曼·托马斯的领导之下，特别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在整个三十年代已衰落下去。社会主义工人党则仍然是个小派别。朝气蓬勃、政见明确的共产党已成为反法西斯的一个虽然不大却很坚强的堡垒，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了新组织起来的产业组织联盟，并在其自身行列中赢得了土生土长的工人中的多数，还吸引了数量可观的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到1943年，它几乎已有十万名党员。但是，该党最后拒绝了1934年以来就担任其领袖的厄尔·白劳德的调和观点，并于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新的领导人威廉·福斯特驳斥了白劳德提倡的和平共存及其关于民族利益的谈话。这一强硬路线使共产党在美国社会中处于孤立和进一步衰落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战后的经济繁荣和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处于一个停滞和解体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40年持续到1960年<sup>①</sup>。

## 新左派

19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新左派”在许多方面看起来象1900年代的“抒情左派”。激进主义在1960年代的再起是因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而促成的。但是，越南战争虽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新左派的崛起毕竟是国内发展的必然结果。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中揭露了美国白人工人的普遍贫困和苦难；南方的民权运动终于使全国清楚地了解到黑人所遭受的社会与政治歧视。因战时需要而促成的妇女大规模长期就业，使女权运动有可能更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女权运动一向就是美国激进传统的一部分<sup>②</sup>。从一开始，这个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带有一种矛盾心理。从传统上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被看作对工人阶级的现实和理想的理论性表述，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对全国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然而在美国（这里的形势与英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这个大多数没有有机的联系，因而其新左派形式成了一切被压迫的少数的抗议手段。老左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新左派的怀疑论的人道主义，拒绝它的道德观、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及其不甚明显的“存在主义者”的姿态，这种姿态更多地与无政府主义有关，而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依据的社会政治分析相去甚远。新左派（特别是因同情第三世界而产生的）日益强烈的反工业化的生态学偏见，在老左派看来既不切实际而又反动。新左派鼓动起来的荒诞的生活方式如吸毒和性解放等，以严肃的政治责任感来审视，好比精神错乱。

新左派的理论由于以性质不同的少数为出发点，自然也是十

---

① 详见J·斯塔罗宾：《1943—1957年美国共产主义的危机》第三部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版。

② 开创性的研究见B·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纽约1963年版。

分折衷主义的,熔无政府主义、甘地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于一炉。新左派的一个基础是学生,因为它的主要组织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这是“争取工业民主学生联盟”在1959年取的新名字。虽然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起初要求的是学生在大学里有更多的权利(例如,1964年伯克利大学的自由讲演运动),但这些要求很快就成为政治性的了。企业界的需要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致对大学体制的任何挑战都势必含有反资本主义的含义。而且,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还对前面提到过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生在知识工厂里接受训练以便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要求,他们在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将象十九世纪的工业无产阶级那样,是受剥削的、被异化了的,但同时也对这种境地产生一种激进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反抗。

在这方面,C·赖特·米尔斯对新左派的影响也许超过了马克思。的确,正是赖特·米尔斯使“新左派”一词在美国广为传播。在他的最有影响的书《权力要人》(1956年版)中,赖特·米尔斯摒弃了统治阶级的概念,而代之以要人集团的雏型。虽然他批评多元主义是不可靠的(即假定政府、工会和军事方面的要人们互相牵制),却并不象任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定会驳斥多元主义那样去驳斥它。他对政治—军事机构作用的阐述与经济基础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并且否定这样一种思想,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的主宰,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主宰力量,尽管真正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历史证据与这一期望是相反的。我认为,这样一种劳工形而上学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传下来的遗产,现在已经完全不现实了”<sup>①</sup>。就马克思主义对早期新左派的影响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埃里奇·弗洛姆所诠释的、从青年马克思

---

<sup>①</sup> C·赖特·米尔斯:《权力要人》,伦敦1956年版第212页。

那里抽出来的异化概念<sup>①</sup>。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基本文件——由汤姆·海登于1962年起草的《休伦港声明》——摈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论从哪一种意义来说，已不能实现它所宣布的、领导一场世界范围的人类解放运动的意图”<sup>②</sup>，《休伦港声明》还宣称，“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他的概念工具是过时的，他的最终图景是难以置信的”<sup>③</sup>。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则使得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更有影响。

但是这一折衷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如其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三个R从改良(Reform)开始，曾走向反抗(Resistance)，现又非正式地以革命(Revolution)而告终。”<sup>④</sup>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性本身，便意味着这一运动缺乏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其容易被坚决的少数所接替。何况，人们已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诞生时的特征是不甚明显的人道主义抗议，这种抗议不可能针对例如帝国主义那样复杂的现象，所以严肃的激进主义最终将不得不立足于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共产党及其年轻的“杜波依斯俱乐部”一翼，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复兴，但取得最重大进展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托派和毛派，它们主要依靠的是青年运动。老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缔造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这是到1970年代初为止最活跃的(并且也许是最大的)左翼组织，它强调工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意识问题。但在美国日益卷入越南战争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毛派的进步工人党，该党强调激烈的反帝活动，并与断然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黑

---

① 见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1962年版。

② 引自A·阿德尔桑：《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纽约1972年版第208页。

③ N·扬：《一种幼稚的骚乱吗？》，伦敦1977年版第138页。

④ A·阿德尔桑：《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第208页。

豹党人密切合作。在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灾难性的1969年大会上,进步工人党取得了控制权,新左派也就没落了。一些放弃了进步工人党路线的人走向了自告奋勇的极端,他们组成一些短命的游击小组,如革命青年运动和天气预报者等等。在作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和大学校园内恢复相对平静之后,左派的积极性便整个地低落了,虽然1974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曾使它有限地复苏过来,特别是他们又重新强调了更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 马克思主义未能成功的原因

以上简短的概述提出了一个明显的疑问,它构成沃纳·桑巴特于1906年出版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标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是,美国与欧洲不同,没有封建的历史。美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在反对根深蒂固的社会特权的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正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有助于把劳工的要求同时加以接受。这与欧洲恰成对照。在欧洲,工人阶级由于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不得不形成社会主义的团结一致,以便表达自己的民主要求。正如德-托克维尔所说,美国人是“生而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本质上是消极的,因为美国的创立本身就是对在欧洲无法忍受的种种作出的反应而已,所以其本质就是信奉个人主义,而不是信奉共产主义。再一个因素是美国相对地与欧洲因战争而引起的剧烈动乱隔离开来。但这算不上是个充分的答案,因为美国迅速的工业发展已产生出一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似乎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就象德国人曾经表现过的那样。

边远地区的存在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向西部移民的可能性尽管遥远,却影响了许多城市的移民。在桑巴特写作的时候,美国根本上仍然是个农业国,激进主义的抗议集中表现在小农场主

的人民党立场上，他们反对垄断工业的利益和东部的银行业，而提出政府控制铁路、放宽信贷条件和直接选举参议院的主张。虽然他们的许多要求可以看作反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反对经济集中化和坚持财产私有制的人民党立场，却更多地是立足于新教徒的传统道德而不是立足于任何社会主义原则的。鉴于政治激进主义是与对工人阶级没有明显好处的人民党主张有联系的，早期的工会运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从一开始就富有反对卷入政治的精神和从事更多世俗事务的坚强决心。当然，边远地区的存在更直接地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因而限制了失业）并减缓了都市的成长。

移民的影响与土地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种族隔阂妨碍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而连续的移民浪潮则提供了一种等级结构。最新近到达的、特别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处于底层，而在早定居的熟练工人中则滋生出了工人贵族。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来移民已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国内非熟练劳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便意味着农村社会培养出来的个人主义和不求进步的态度渗入到工业劳动力中去了。直到有组织的工人作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罗斯福的新政又有可能将他们吸引到它的改良主义政策中去。这样，桑巴特对他自己设问的回答，即社会主义已“垮在成堆的烤牛肉和苹果馅饼上”<sup>①</sup>；这决不是主要因素，即使他对当时美国工人富裕的看法是正确的。

## 理 论

在过去十五年里，美国出现了十分引人注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的再度回升，特别是在学术界。这一现象最明显地表现在不仅出版了若干以马克思主义为论题的书籍，而且创办了若干

<sup>①</sup> W·桑巴特：《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伦敦1909年版第276页。

专题刊物,这些刊物通常都以“激进”为头衔,在它们论述的专题中或多或少地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以与“老字号”的刊物相抗衡<sup>①</sup>。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卓著的贡献,当然是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要评价这些新贡献的价值必然有很大的伸缩性,但有三个领域是突出的,即新左派关于当代美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编写美国历史,而最重要的是从经济上研究美国资本主义。

### 新左派

随着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埃里奇·弗洛姆等人对这些著作的评论的相继出版<sup>②</sup>,马克思的思想不再只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了,并且开始广泛接受一种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对二十世纪也象对十九世纪一样切中时弊——甚至也许更为切贴。马克斯·豪克海默在《理性的衰落》(1949年版)中,已经批判地考察了一番美国社会中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产品,即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却成了1960年代中期新左派思想的缩影<sup>③</sup>。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美国是这样一种最具典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自由在全部受压抑情况的支配下可以被转变成强有力的统治工具”<sup>④</sup>。马尔库塞的见解是: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要——也包括不受那些可容忍的、有报酬的和令人满意的事物的约束——同时,它也忍受并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镇压职能。在这里,社会的控制手段便非常需要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需要麻木不仁地去干已

---

① 也许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由激进政治经济学会在安阿伯出版的《评论》。

② 见E·弗洛姆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纽约1967年版。

③ 关于马尔库塞,本书第十九章有专节介绍。

④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伦敦1968年版第23页。



非真正必要的工作，需要安抚和延长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的娱乐方式，需要维持种种骗人的自由如按操纵价格进行的竞争自由、置于审查制度下的出版自由、在注册商标和冒牌货之间的选择自由。”<sup>①</sup>

他特别赞扬赖特·米尔斯、万斯·帕卡德和威廉·H·怀特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为他的分析提供了真实的基础。但正因为新左派的兴趣过于广泛，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才显得漫无边际，而企图把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都纳入其理论结构<sup>②</sup>。

## 美国史

激进的美国历史学家们详尽地研究了已被公认的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这一学派的老前辈是1950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特别有影响的威廉·A·威廉斯。他最关心外交政策及其对美国国内社会关系的影响。加布里埃尔·科尔柯的著作比威廉斯的更为专门。在《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1963年版)中，科尔柯考察了1900到1916年这段时期，发现当时的政府企图“以允许各公司在可预测的和安全的情况下以合理的利润长期经营为手段，来组织经济和更大的政治与社会领域”<sup>③</sup>。因此，许多改革在与之有关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是对大企业的“前进中的”抑制，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设想了企业的具体目标得到满足才能最好地提供社会总福利的前题下”<sup>④</sup>，使企业和工业的处境在政治上合理化而已。因此，“保守主义的胜利”只不过体现在公司的首脑决心保持现有的企业利益上

①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伦敦1968年版第23页。

② 有关事例，见S·费尔斯通：《性的辩证法》，纽约1970年版；又《激进的美国》1970年7月(第4卷)，詹姆斯专号。

③ G·科尔柯：《保守主义的胜利：对1900—1916年美国历史的重新评价》，伊利诺斯州格伦科1963年版第3页。

④ 同上。

罢了。科尔柯的见解与赖特·米尔斯的共通处不亚于他与马克思的共鸣。这些见解在詹姆斯·温斯坦的《自由主义国家中公司的理想》一书(1968年版)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温斯坦把公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看作美国企业中最先进部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与政府合作创造出来的,为的是把劳工、小农场主和小商人统一在作为一个法人的国家里。

### 经济学

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独创性的贡献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这些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罗·巴兰的《成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初版)。巴兰一开始就对以往经济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作了一番阐述,接着首次提出他的中心论题:经济剩余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里,他把实际剩余(社会现时产品与其现时消费之间的差额)与潜在剩余区分开来,指出后者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下借助于可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的消费品之间的差额”<sup>①</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潜在剩余大于实际剩余有四个原因:

“一是社会的过度消费(主要表现在高收入的集团一方,但在某些象美国那样的国家中,也表现在所谓中间阶级那里),二是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使社会减低了产量,三是由于现存生产机构组织得不合理和十分浪费而减低了产量,四是主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失业也使产量得不到提高。”<sup>②</sup>

巴兰随后回顾了决定资本主义从竞争变成垄断的各种因素,并得

---

① P·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哈门德沃兹 1973 年版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134 页。

出了一度起进步作用的垄断现已成为倒退力量的见解。巴兰在考察了补救生产过剩问题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做法以后（他稍许赞同把这些做法作为短期的权宜之计）得到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只能被军费支出所耗尽，其必然结果则是导致帝国主义以及战争可能性的日益增长。

在该书最重要的一节中，巴兰宣称，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垄断资本主义发挥能量的直接结果，它妨碍了不发达地区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扼杀了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

“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大、大多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以及与西方技术的接触，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这一发展却被迫离开了其正常路线，受到歪曲和损害，以适合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sup>①</sup>

印度和日本例子分别说明了这一点。印度的落后是由于它被并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而日本的进步则由于它的独立性。巴兰驳斥了关于外来投资最终可能在财政或社会方面有利于第三世界的想法，因为外来投资在不发达地区造成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直接殖民地型的、买办型的或“新政”型的）在结构上都不可能为了社会本身的利益而利用大量的潜在剩余。最后，经济发展只有在社会革命之后才有可能，那时必将有计划地使用经济剩余，并象苏联那样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

巴兰的著作在许多方面是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他的思想基础包括了列宁论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著作、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他的新颖之处在于把上述观点与世界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即认为西方的发展直接以不发达国家为代价。这种看法对现代发展理论学

---

<sup>①</sup> P·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哈门德沃兹 1973 年版第 276 页。

派<sup>①</sup>起了强大的影响，甚至形形色色的作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格瓦拉都承认受过巴兰的影响。这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侧重点的改变，即把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状态认定为停滞而非危机，并把注意力转移向第三世界，认为第三世界的未来发展不能只是费力地步西方的后尘。

1966年出版的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把巴兰在《成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述过的关于剩余的思想，同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版）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起因于消费不足的思想结合起来。这是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对美国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总看法。该书的论述围绕着一个中心论题，即“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产生和吸收”<sup>②</sup>。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竞争的消除、风险的消失和大公司相互间抱自己要活也得让别人活的态度，这一切意味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按照巴兰和斯威齐的看法，这是以竞争体制为先决条件的）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再适用了。他们写道：

“因此，剩余增长的规律代替了利润下降规律。我们决不是否定或修正政治经济学的一条久负盛誉的定理。我们只不过是估计到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从该定理制定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这一结构变革中最本质的东西，在这种代替中获得了它的理论表现。”<sup>③</sup>

巴兰和斯威齐就这样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归因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不再归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

---

① 见本书第216页末行以下。

② P·巴兰与P·斯威齐：《垄断资本》，哈门德沃兹1966年版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80页。

不断增长的剩余在消费、投资和单纯的浪费中找到了某种出路。然而调查研究表明，消费虽然在绝对数字上是上升的，但从它与剩余增长的比例来看却是下降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作为吸收剩余所需要的数量来说，总是趋向于提高到超过总收入，这就使投资失去了意义。现代公司在推销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如广告、包装、更新换代下的人为废弃等，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但也有它的极限。

“不管怎样转弯抹角，也无法避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要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却无法提供必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来吸收增长的剩余，从而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既然剩余不可能被吸收，也就不会再去生产它，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sup>①</sup>

政府在吸收剩余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对剩余的使用却严格取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并且使用越来越不合理和带有破坏性。教育制度与大资本的需要密切相关，而且是为了给大资本的不同部门提供合适的人才而组织起来的。不合理的状况集中表现在政府的巨大开销都用在为汽车提供多种便利上。但更引人注目也更危险的是军事部门吸收掉的那部分剩余，以及由此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全部影响。

巴兰和斯威齐合写的这部著作受到了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作者们的批评，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比利时人托洛茨基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他的巨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对这个题目所作的最优秀而全面的概论。在后来的著作中，曼德尔批评巴兰和斯威齐在现象的水平上进行推理，只是从市场和实际效益

---

<sup>①</sup> P·巴兰与P·斯威齐：《垄断资本》，哈门德沃兹 1966年版第 113 页。

的角度看待(有很多见解是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借用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没有深入到马克思对生产过程的价值分析的基础中去。在曼德尔看来,是资本积累过程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资本集中化的趋势既导致垄断又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在厂房设备和原材料方面的费用超过工资。虽然市场结构可能改变,但基本问题仍然是如何提高剥削率,使生产和积累仍然有利可图。所以,巴兰和斯威齐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至关重要的利润率。曼德尔自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包括在他的重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他提出了“长波周期”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试图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为何正处于这样一个周期的末尾因而无法保持剩余价值率。

巴兰和斯威齐的这本书写于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即美国的繁荣时期。在越南的失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保罗·马蒂克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一书(1970年版)中强调国家在处理剩余时碰到的固有限制。这个论题在詹姆斯·奥康纳的近作《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版)中得到了发挥。奥康纳与新近的德国学派<sup>①</sup>一样,认为国家的权力关系是复杂的、半自主的,不能将它归结为对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体现。他要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国家为什么加强了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为此,他把经济划分为竞争部门、垄断部门和国有部门,并证明为什么经济中的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是互为需要的,而这二者又都需要国家的干预——这有时具有矛盾的性质。奥康纳的主要论题是国家不可能在长时期内增加足够的税收去满足所有这三个部门的政治需要,而国家又必须令人满意地提供社会福利,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为了达到这一目

---

<sup>①</sup> 详见阿尔瓦特的著作,载J·霍洛韦和S·皮奇奥托编《国家与资本》,伦敦1978年版。

的,国家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费用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国家的职能就是用促进社会对私人资本的需要来帮助后者进行积累,如对公路之类进行投资,对学校、医疗救助事业提供资金,为竞争部门未动用的剩余劳动力提供福利费用。因此,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只是各个阶级间政治斗争的格局,就这一点来说,国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国家干预的增长和竞相争取国家的偏袒,才造成资本主义机制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国家的认可。国家所以能保存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因为它被看作独立于阶级结构之外。但据奥康纳看来,在国家帮助积累的经济职能和它保持合法性的政治职能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即产生于生产力日益增长的社会性和利润的私人占有性(在一定情况下就是政治权力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与奥康纳广泛的政治—经济观点相反,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版)通过大量的历史细节考察了垄断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布雷弗曼的这本书看起来好象与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在结构上完全一致,而与后者不同的是,他强调了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并对剩余持有一种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布雷弗曼的目标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如何发生变化。他从当前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矛盾开始分析:

“一方面有人强调,由于科技革命和‘自动化’的结果,现代劳动一般都要求越来越高级的教育和训练,要求更多地使用智力和做出精神上的努力。而另一方面,有人却对工业和办公室的劳动条件日益强烈不满,这看来是与上一见解相矛盾的。例如也有人(有时甚至是在别的时候支持第一种见解的同样一些人)说,劳动越来越被细分为一些小操作,以致不能使具有现代教育水平的人保持兴趣或发挥能力;还说这些小操作由于越来越不需要多少技术和训练,再加上对劳动的‘漫不经心’和‘官僚

主义化’，使得劳动的现代趋势成了使劳动人民中越来越大量的人产生异化。”<sup>①</sup>

布雷弗曼倾向于第二种见解，而抨击了“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家们<sup>②</sup>。他声称，只要研究了整个工人阶级就会看到，“新”职业在工人阶级中的增长并不比在其他阶层中为快。

为了支持这种论断，布雷弗曼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劳动过程的讨论作为依据。布雷弗曼否定了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和苏联都流行过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工艺技术和与管理技术与阶级利益没有关系。布雷弗曼以泰罗制为例，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它在想法上与实际作法上背道而驰的发展，其要害就在于对生产过程实行资本主义的管理，并仍然起着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影响——所谓增大计件活的措施不过是骗人的遮羞布。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布雷弗曼追溯了技术革新和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及二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对异化劳动日益增长的控制。在第三部分中，布雷弗曼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在各产业部门间的转移，这种转移涉及到现代公司的兴起；描绘了市场关系的普遍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第四部分追述了办公室工作和服务部门的成长，并认为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其监督生产过程的作用而言，也象任何最下层车间的工人一样被“泰罗化”了。由于自动化机械装置的增加，收入较好的技工人数在减少，这意味着低工资的办公室人员和服务人员构成了现代的“劳动后备军”。因为，实际上

“所谓的雇员或白领工人问题，尽管曾使得前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深感困惑，尽管被反马克思主义者吹嘘为证明‘无产阶级化’命题错误的铁证，

---

① H·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纽约1974年版第3页以下。

② 见本书第313页末段。



却在办公室职业受器重和庞大的工资劳动者人数在单方面增长的情况下,被彻底地澄清了。这种向一个庞大的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级’发展的明显趋势,已导致一个庞大的新型无产阶级的产生。”<sup>①</sup>

在第五部分中,布雷弗曼考察了中间社会阶层即低级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等的含糊不清的阶级地位,否定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对于阶级分析有任何重要性(因为二者是那样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最后还否定了机械化和教育将导致技术工人的增加,而认为一般的机器操作工和一般的服务部门工作人员都只需要很少一点儿训练。

布雷弗曼把他的著作说成是论述“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论述“自为的”阶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谈阶级斗争的主题,不谈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而这些问题例如在普兰查斯的著作中却占据那么突出的地位。这种看法起因于布雷弗曼接受了巴兰和斯威齐关于资本绝对地统治了劳动的见解。因此他全盘否定了增多就业门类的计划和工人参与管理的要求。例如,他就后一问题写道:

“工厂民主这个概念,如果只是靠强制推行一种形式上的议会制结构,比如选举厂长、对生产和其他决策用投票表决等等;如果只是靠现存的生产组织形式,那就是虚妄的。不把必需的技术知识交给工人群众,不对劳动组织进行改造——总而言之,没有真正的、新的集体生产方式,工厂和办公室里的投票就改变不了下述事实,即工人仍象从前一样依靠‘专家’,只能在专家当中进行选择,或投票赞成由他们提出的别的人选。”<sup>②</sup>

布雷弗曼的书又与普兰查斯的著作形成对照,其特点是具有丰富而细致的观察——他本人当过多年金属制造工人。他的强烈的人道主义,他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和他长于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使得

---

① H·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355页。

② 同上书,第445页。

他关于二十世纪劳动退化的论述称得上是马克思的继续。

## 参考读物

最简短的介绍是迪金斯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左派》。也见布尔在《走向一种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文章。贝尔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简短、有才气，但怀有敌意。关于德里昂和社会主义工人党，见赫雷肖夫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关于共产党的起源和早期活动，德雷珀的两本书是标准著作；关于后来的发展，见斯塔罗宾的《美国共产主义的危机》。香农的《美国社会党史》文笔犀利资料丰富。关于新左派，最好的手册是西奥多里编的文集。关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见塞尔的卓越的研究。关于当代困境，见雅各比的文章。

关于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见以下文献目录中引用的著作和以上正文中对于它们的评论。

## 文献目录

### 历史

D·贝尔：《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普林斯顿 1952 年版。

P·布尔：《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载 B·格拉尔和 P·庇康编《走向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 1973 年版。

J·坎农：《美国共产主义的头十年》，纽约 1962 年版。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纽约 1944 年版。

——《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纽约 1943 年版。

J·R·康芒斯：《美国劳工史》，两卷本，纽约 1921 年版。

J·迪金斯：《二十世纪的美国左派》，纽约 1973 年版。

T·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的根源》，纽约 1957 年版。

——《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形成时期》，纽约 1960 年版。

M·伊斯特曼：《爱与革命：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纽约 1964 年版。

D·埃格伯特和 S·珀森斯：《社会主义和美国生活》，普林斯顿 1952

年版。

P·福纳：《布尔什维克革命：它对美国、激进派、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影响》，纽约 1967 年版。

A·弗里德编《美国的社会主义：从震教徒到第三国际，一部记实史》，纽约 1970 年版。

R·金格：《尤金·德布斯传》，纽约 1970 年版。

B·吉特洛：《我坦露：美国共产主义的真象》，纽约 1929 年版。

V·戈尼克：《美国共产主义的罗曼史》，纽约 1978 年版。

D·赫雷肖夫：《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纽约 1967 年版。

M·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史》，伦敦 1906 年版。

R·雅各比：《客观现实的政治学：关于美国左派的札记》，载《目的》第 34 号，1977—1978 年。

H·W·莱德勒：《美国的社会主义》，纽约 1952 年版。

C·拉希：《美国左派的痛苦》，纽约 1968 年版。

J·拉斯勒特：《劳工和左派：对美国 1881—1924 年劳工运动中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影响的研究》，纽约 1970 年版。

S·林德：《美国激进主义的精神起源》，纽约 1969 年版。

C·迈尔斯：《先知者的大军：1928—1941 年美国的托洛茨基派》，韦斯特波特 1977 年版。

H·昆特：《美国社会主义的锻造品》，纽约 1962 年版。

K·塞尔：《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纽约 1973 年版。

D·香农：《美国社会党史》，纽约 1967 年版。

W·桑巴特：《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P·霍金译，M·哈林顿写前言，伦敦 1976 年版。

J·斯塔罗宾：《1943—1957 年美国共产主义的危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72 年版。

M·西奥多里编《新左派记实史》，纽约 1969 年版。

T·沃尔克法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纽约 1968 年版。

N·扬：《一种幼稚的骚乱吗？新左派的危机和衰落》，伦敦 1977 年版。

## 理论

P·A·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 1962 年第二版。

P·巴兰和 P·斯威齐:《垄断资本》,纽约 1966 年版。

H·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纽约 1974 年版。

P·库姆斯:《〈劳动与垄断资本〉》,载《新左派评论》第 107 号,1978 年。

M·哈林顿:《社会主义》,纽约 1972 年版。

——《资本主义的黄昏》,纽约 1976 年版。

G·科尔柯:《保守主义的胜利:对 1900—1916 年美国历史的重新评价》,伊利诺斯州格伦科 1963 年版。

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 1964 年版。

J·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纽约 1973 年版。

P·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 1942 年版。

P·斯威齐和 C·贝特兰:《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纽约 1971 年版。

J·温斯坦:《自由主义国家中公司的理想(1900—1918 年)》,波士顿 1968 年版。

——《美国社会主义的衰落(1912—1925 年)》,纽约 1969 年版。

W·A·威廉斯:《大遁词:论卡尔·马克思切合于当代兼论允许异端邪说参与关于美国前途的对话的明智性》,纽约 1968 年版。

## 结 束 语

上述概括的研究足以表明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样性。在经济学中,关键性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崩溃和何时崩溃。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如恩格斯、倍倍尔、考茨基等,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论述理解得有些肤浅,这使他们得出资本主义的崩溃已迫在眉睫并会自动发生的见解——至少从无产阶级无需积极干预这一点来说是如此。卢森堡(还有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崩溃从经济状况上作了精炼的阐述,而其他经济学家如希法亭等人的著作则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可以作为假定资本主义的死亡远非迫在眉睫的一个理由。

直到那时尚未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即在经济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而跃居首位。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经历,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思想上的争论。布哈林认为农民的逐步发展会为工业提供扩大的市场,托洛茨基则认为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把农民的剩余立即转为向重工业的投资。后者就是斯大林最终采取的政策,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是极为残暴的。毛泽东抛弃了苏联的方法,将农业置于主导地位,并强调生产关系而不重视生产力。

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中(或错误地建设中)时,资本主义在西方已恢复了活力,这就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兴趣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只在1970年代才有所回升，特别是在讲英语的世界。这既是由于资本主义西方的危机有所发展，也是由于人们对世界不平等和发展诸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政治学方面，当时进行的争论集中在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上。甚至连那些似乎相信资本主义会半自动崩溃的人（考茨基和卢森堡只是相信的方式不同而已）也要么热衷于党组织（考茨基），要么热衷于群众罢工之类的策略（卢森堡）。但是，由于西方工人阶级广大阶层（包括工会的领导层）日益趋向改良主义，由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贫困化，列宁关于一个“先锋”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意识的思想便显得有吸引力了。随着1917年革命的胜利，列宁主义的模式占了支配地位，其特征是把党看作工人阶级意识的体现者（这与卢卡奇的推论一致）。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种观念被用来贯彻自上而下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党同样有脱离人民的趋势，尽管它宣称自己体现了大致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这样的努力。在西方，象科尔施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们那样坚持工人自我解放的人，对原有的信念产生了幻灭感。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者都表现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丧失了信心。只有葛兰西是唯一一把对上层建筑的浓厚兴趣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集于一身的思想家。

在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已再度发生了变异。恩格斯曾经说，德国工人阶级是黑格尔重新概括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一直围绕着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如果还有些意义的话）是一门科学，另一是它从黑格尔承袭下来的东西的确切性质。有趣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上述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不同观点。例如，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某种科学、因而对黑格

尔很少感兴趣的人，是不肯认真接受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思想的。他们要么象考茨基那样，把自我解放委诸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过程，要么象列宁有时那样，或象斯大林经常那样，把解放的任务委诸于党或个人；后者也是中国共产党鉴于中国农民“一穷二白”而重走的路子。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比科学更科学的人，特别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卢卡奇、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著作中都有表述。然而，革命的前景既在西方暗淡下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便把注意力转向哲学而几乎以之作为目的本身，或者转向诸如美学之类与政治毫不相干的课题。当然，下述两个当前正在从事的、最有趣的理论工作领域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上世纪中涉及多远的尺度，即特别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研究和美学。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多样性表明，马克思的遗产中固有的自相矛盾的确已被他的追随者们探讨得很充分了。

# 大事记

(下表中有些年份是约略估计的)

	历史	理论
1883年	马克思逝世; 社会民主联盟成立	倍倍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 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
1884年		
1885年	费边社成立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
1886年		
1887年	独立工党成立 <sup>①</sup>	
1888年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9年	第二国际成立	
1890年		
1891年	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爱尔福特纲领》
1892年		
1893年		
1894年	尼古拉二世在俄国即位	普列汉诺夫:《保卫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1895年	恩格斯逝世; 甲午战争 <sup>①</sup>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1896年		
1897年		
1898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sup>①</sup> 英国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 中日甲午战争应为1894年。——校者注



1899年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抵制伯恩施坦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伯恩施坦：《渐进的社会主义》  考茨基：《土地问题》
1900年	英国工党成立；中国义和团起义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1901年	美国社会党成立	
1902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	列宁：《怎么办？》
1903年		
1904年	俄日战争	
1905年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	
1906年		考茨基：《伦理学》 卢森堡：《群众罢工》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
1907年	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鲍威尔：《民族问题》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908年		
1909年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
1910年		希法亭：《金融资本》
1911年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	
1913年		卢森堡：《资本的积累》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		列宁：《哲学笔记》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
1916年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7年	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美国参战	列宁：《国家与革命》
1918年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1919年	德国革命失败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共产主义入门》

1920年	凡尔赛和约	
1921年	珞琅施塔得叛乱；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
1922年	新经济政策开始施行	
1923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法西斯在意大利获胜	托洛茨基：《新方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1924年	列宁逝世；蒋介石北伐 <sup>①</sup>	
1925年		
1926年		葛兰西：《论南方问题》
1927年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8年		
1929年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大清洗开始	葛兰西：《狱中札记》（直到1935年）
1930年	俄国农业集体化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希特勒上台	
1934年		
1935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卢卡奇：《欧洲现实主义研究》
1936年		
1937年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8年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41年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
1942年	斯大林格勒大战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19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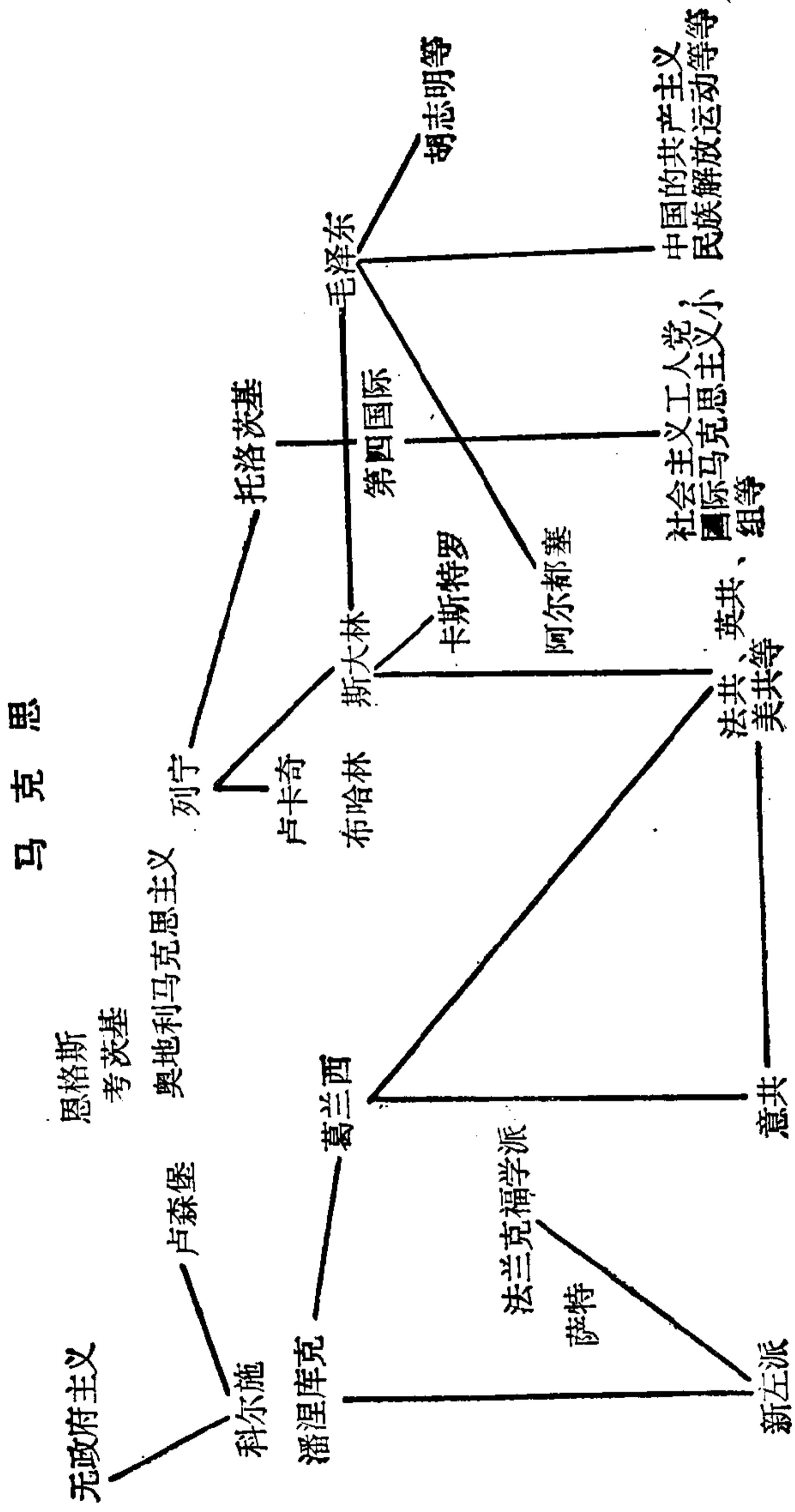
① 按北伐战争始于1926年，原著者将它归于蒋介石名下也是欠妥的。——校者注

1944年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6年		
1947年		卢卡奇：《历史小说》 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启蒙的辩证法》
1948年	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阿多尔诺等：《权威的个性》
1950年	朝鲜战争	
1951年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1952年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萨特：《共产党人与和平》
1953年	斯大林逝世	
1954年		
1955年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1956年	苏共 20 大谴责斯大林； 苏联介入匈牙利事件	
1957年		巴兰：《成长的政治经济学》 萨特：《方法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中国的大跃进	
1959年	古巴革命	
1960年	中苏分歧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1961年		
1962年	古巴的导弹危机	
1963年		
1964年	赫鲁晓夫下台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陶里亚蒂的备忘录
1965年		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

1966年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	格瓦拉：《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
1967年		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
1968年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巴黎的五月风暴	德布雷：《革命中的革命》
1969年		阿尔杜塞：《读〈资本论〉》
1970年		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 不发达》
1971年	林彪之死	
1972年	美国从越南撤军	
1973年	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	阿尔杜塞：《自我批判文集》 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
1974年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
1975年		
1976年	毛泽东逝世	
1977年		
1978年		

# 马克思主义系谱图

(以下人物的位置是高度概略的)



封面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